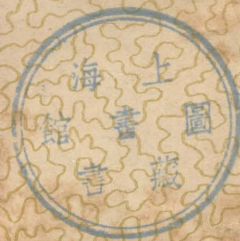


國際政治叢書之一

# 蘇聯報道選輯

中聯出版社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5667B

# 弁言

這裏所收集的十多篇文章，都是國際知名之士，關於蘇聯內情，花費很長的觀察時間所作的報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聯在國際上的地位，益增重要。其一舉一動，無不與整個世界局勢，息息相關。但因其國體特殊，所以大家對於他的國情，也特別有神秘之感。我國和蘇聯，接壤達數千里。國民對於蘇聯的理解，應該比較其他任何國家，更為親切。但坊間所售有關蘇聯問題的書籍，內容多空泛偏頗。求其能以客觀立場，深入研究，以作翔實公正的介紹者，直如鳳毛麟角。所以本書的刊行，對於輔助國人理解蘇聯問題，當能有所貢獻。

編者 三十六年十二月



# 目次

一、認識蘇聯.....	蒂恩夫人
二、怎樣瞭解蘇聯(代序).....	賽珍珠女士
三、一九四六年的蘇聯.....	愛金生
四、蘇聯政治路線的復原.....	THE WORLD TODAY
五、蘇維埃政權的透視.....	甘南
六、蘇聯國內經濟問題.....	田恩夫人
七、蘇聯工業現狀.....	美國新聞週刊
八、剖析蘇聯外交政策.....	伊特曼
九、蘇聯外交路線的真實目標.....	FRANK GERLASI
十、論蘇聯外交政策.....	紐約 P. M.

十一、論蘇聯帝國主義·····	哈 里 曼
十二、蘇聯共黨擴大控制權·····	蘇 士 柏 格
十三、蘇聯在北美的間諜活動·····	古 森 科
十四、蘇聯在南美之活動·····	克 魯 克 漢
十五、蘇聯向天空伸展·····	攷 特 納
十六、訪莫斯科記·····	柯 培 森
十七、莫斯科紀行(八章)·····	庫 恩

## 認 識 蘇 聯

蒂恩夫人

——威脅還是希望？

## 一、蘇聯人民是些什麼人？

西方國家的作家和發表演說的人們常說蘇聯是一個大謎團，邱吉爾先生（他有很會說話的偉大天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會形容蘇聯是「藏在神祕中的一個謎團」，實際說來，蘇聯人民並不是什麼謎。事實是西歐和美國大部份人民都懶得為認識蘇聯而多傷腦筋，因此在聽到來自蘇聯的消息時，就很容易地說一句「是呵，這真是神祕得不能說」，或「蘇聯人民就是這樣的」，他們信口來一句，就把問題打發開了，這本小冊子就從最基本處出發，闡述一下蘇聯人民是怎樣的人，他們為什麼在其他人民的眼光中似乎是神祕難解的。

## 一個熔爐

筆者認為首先對整個蘇聯人民作一個概括的說明，似乎不相宜，因為在蘇聯這個國家內，現在差不多有兩百個不同的民族和種族在一起生活着，他們中有很多人住在那裏住得很久，他們什麼時候就在那裏，歷史沒有記載，德國人或法國人認為他們自己是一個個別的民族，就這種意義說，就沒有所謂蘇聯人民了。我們所稱的蘇聯人民中，誠然有三大支柱：一、大俄羅斯人，他們住在歐瀾俄羅斯的中部，其中有很多人後來也

會協助開拓亞洲俄羅斯的西伯利亞。二、白俄羅斯人，他們住在歐洲俄羅斯的西部，沿着前波蘭和立陶宛的邊界，三、小俄羅斯人或烏克蘭人，他們住在俄國南部（也就是烏克蘭，烏克蘭這個字是邊境的意思，因為在早期的若干世紀中，烏克蘭是俄國抵禦波蘭人，土耳其人和韃靼人的邊地）這本書中所說的白羅斯人是基於人種意義，指的是俄國人民的一支，不是指一九一七年被逐的俄國人，他們常被稱為「白俄羅斯人」，所以這樣稱呼是要和布爾希維克人有個區別，後者被稱為「紅」俄羅斯人。

除去今天生活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邊疆以內上述的三大支俄羅斯人外，還有住在歐洲俄羅斯的芬蘭人和波蘭人集團，俄國在一八〇九年拿破崙戰爭期內，取得芬蘭，但在一九一八年又失掉芬蘭，芬蘭人在那年自建為一個獨立國家，然而很多芬蘭種族的人民仍然居住在鄰近芬蘭的俄國北部區域，俄國在十八世紀中也曾佔有波蘭東部，那時波蘭被普魯士、奧地利和俄國三國瓜分，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失去了所佔的波蘭領土，一九一九年協約國在巴黎和會中承認建立一個獨立的波蘭國家，這個新國家因此又得在她的邊界以內聚合了以前由她的強大鄰人瓜分的波蘭領土。但時代巨輪的又一次轉動，使蘇聯在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又取得了東部波蘭，那時波蘭又被瓜分（這次是被德國和蘇聯瓜分）今天蘇聯的人民中又有一些波蘭人，然而這裏應諺指出，一九四〇年併入蘇聯的波蘭東部大部份人民是由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組成。

在一九一四年以前蘇聯有很多波羅的海日耳曼人民，他們所居住的區域到一九一九年被建立為愛沙尼亞，拉特維亞和立陶宛這三個獨立國家，蘇聯在一九四〇年佔領了這三個國家，希特勒對於這個舉動顯然是同

意的，但國社黨都首先商妥將住在這三國凡說德國話的人民都遷回德國，此外，還有一支德國人已在伏爾加河流域久居，他們在十八世紀凱塞琳大帝時代就已遷居該處，這些德國人在一九四一年希特勒軍隊入侵蘇聯時，遷居西伯利亞。

蘇聯在她的疆界內還有很多亞洲人民，散居在亞洲俄羅斯各地，從北部的北極荒地到南方土耳其斯坦，像河麻堪德這些輝煌的古城，都有他們的蹤跡，如韃靼人、克茲人、巴希克人，沙摩耶茲人，卡木克人和許多其他種族。

### 不同的習俗和信仰

在這個有限的篇幅裏，我們無法詳述所有這些人民的名稱和特殊的性格，但在我們想到蘇聯時，我們必須常時憶起蘇聯的人民是由極多民族和種族組合而成，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宗教信仰方面都大不相同，舉例說，波蘭人信奉羅馬天主教，很多德國人是路德教徒，大部份大小俄羅斯人在一九一七年以前都是俄國正統教徒，很多白俄羅斯人依附另一種希臘教會宗教團體，這個組織的目的是協調羅馬和希臘天主教教習。此外很多亞洲人不是回教徒就是信奉佛教，在全部二萬萬人中還有三百五十萬猶太人，他們大部份在沙皇時代集居在俄國西部，蘇聯是一個甚至超過美國的真正民族大熔爐，在這個國家有各式各樣的民族和種族，從最原始的到最進步的都有。這種特殊的繁雜情形，給蘇聯政治行政和經濟發展方面帶來了極困難的問題。

### 許多民族——一個國家

在一九一七年布爾希維克革命前沙皇政府採取了一種俄化政策，併合所有民族和種族在他的統治之下，



在美國我們會致力同化所有新來的移民，但這主要是一種教育和適應過程。收功於和平方式，並不是依靠武力強加人一種新的範型。但沙皇政府（在教育整個人民方面還沒有多大進展，時常害怕革命會繼教育而來）却想藉武力同化他人，蘇維埃領袖選擇了另一條路，他們以我們所稱爲共產主義的統一政治和經濟形式加諸蘇聯一切人民，由此而得到高度的民族統一，但在這個由莫斯科發號施令的向心機構內，他們准許每一民族得享文化自主，隨後又准予每一民族享有經濟自主，他們鼓勵每一個民族發展牠的音樂、文學、語言文字和其他，但每一民族必須接受蘇維埃制度的政治和經濟主義，蘇聯的經驗對於世界其他國家解決戰後建設問題，或許會有價值，尤以東歐和巴爾幹半島各區爲然，因爲那裏的人民是極混雜的。

蘇聯人民常常似乎是和西方人民不同的，但他們有若干主要特徵，在他們的騷亂歷史中，時時呈現這些特徵，可能有助於我們了解他們所作行動的理由，蘇聯由於地勢孤立，仍然不能匯合形成西歐和新世界的文化主流，冒失看來，蘇聯似乎落後就是這個道理，從經濟發展的觀點看，一九一七年的蘇聯，誠然有如內戰以前的美國，蘇聯自此以後的發展，必須要以過去七十多年我們本身發展的觀點，加以評斷，但這不是說蘇聯人民的心智落後，或不能迅速適應現代思想和技術，相反地大部份蘇聯人民都很機智，有的是充沛精力，雖然在他們早期歷史中有很長的時期是和世界其他國家完全隔絕，但他們對於所接觸的其他國家却很感到奇異，在很多方面，蘇聯人民比其他人民好似美國人民，他們有如美國人亟欲提出問題和學習新的東西，他們不怕犯錯，他們的態度是活潑的自信，但不叫人討厭，他們所以如此，是因爲知道自己的幅員廣闊，無限龐大資源取用不竭，他們一心準備適應新和完全沒有經驗的環境。

## 蘇聯人民是國際主義者

蘇聯人民具有適應性的一個理由，或許是若干世紀來他們和許多不同人民生息與共，蘇聯人民的思念不局限爲一國，而擴及到整個世界，在十九世紀，很多蘇聯人民熱中於汎斯拉夫主義，這是併合全體斯拉夫人在蘇聯領導之下的一個運動，假如這個運動能獲成功，假如塞爾維亞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蘭人和保加利亞人都和蘇聯人民結合在一個國家，或國家聯邦之下，他們自然可以形成一個龐大的政治組織，因爲歐洲的斯拉夫人有三萬萬之多，除了中國和印度外，別的國家的人口都望塵莫及。

這個斯拉夫人的統一運動，是使德國人自一八七〇年本身統一以還日夜不安的一個魔怪，因爲德國人（他們今天自稱有八千七百人）知道他們的人力不是斯拉夫人之敵，他們更常認爲斯拉夫人是一支低等民族，然而在過去俄國十九世紀汎斯拉夫主義的夢想，大致說來仍然是個幻夢，雖然她會如願以償，協助塞爾比區人和保加利亞人推翻了奧托曼帝國的統治，建立起她們自己的民族國家。

蘇維埃領袖一九一七年當權後，他們發起了一個可能稱之爲汎共產主義的運動，這個努力不僅是集合斯拉夫人，而且是聯合全世界勞動者，在莫斯科的領導之下，這樣一來，莫斯科也成了世界共產主義的總部，這個運動目的在打倒民族障礙。基於階級而不基於民族建立起統一的局面，年復一年，共產主義並沒有能夠得到普遍的支持，我們看到蘇維埃的領袖們的權宜應付，他們將重心從世界革命移到一個（建立社會主義）也就是從國際主義轉向到民族主義，但在一九四一年夏季德國入侵蘇聯後，克姆林宮也和沙皇一樣，向斯拉夫人民，發出了合作的呼籲，我們知道大部份斯拉夫人都對蘇聯寄以深深關切，雖然他們所以同情蘇聯並不

常是由於仰慕共產主義，蘇聯勢力的深入，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捷克，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 蘇聯人民敏於學習

蘇聯人民也表現出他們一旦獲有相當的教育和技術訓練，就能配合現代工業方式，在西方人士看來，蘇聯人民常常似乎缺乏效率，有很多人因而奇怪缺少效率的蘇聯人民怎麼能在工業方面表現出如此輝煌的能力，以致使國社黨不得不承認蘇聯在現代武裝配備上的確是優秀超絕，這一個問題的回答，是蘇聯人民既不愚笨，也不是能力不行，一九一七年前，由於俄國還是一個停滯在農業原始階段的「個國家，他們對於工業技術，因此比較沒有多少經驗，僅在開始摸索工業化問題，大部份農民所見到的最複雜機械，只是簡單的耕犁，一九一七年後，他們被吸收到工廠去工作，對於怎樣使用複雜的機器，自然還不知道，因而常把機器看作同牛馬，機器假如壞了，他們就打機器，蘇聯常常發生機器壞了的事情，實際說來，這或不是由於我們所謂的破壞行動，而是由於蘇聯農民使用機器的大不熟練，但這並不是說蘇聯工人（尤其是青年一代，他們生下來就被指導着羨慕並尊重機械文明的）不敏於學習，斯拉夫人對於機械的使用，不比其他人民笨，不過前提是他们會首先獲得適當的訓練，蘇聯工人所製的現代化武器，獲得舉世的交相讚譽。

蘇聯人民常常困惑西方人民的另一特徵，是他們的悲喜無常，一會兒高興，一會兒憂鬱，一會兒狂歡，一會兒又陷入悲愁的深淵，但世人所見蘇聯人民的無常易變，却證明是力量和薄弱的源泉，因為假如蘇聯人民偶爾被一陣憂怨所襲，他們從不沉溺於時時襲擊德國人的那種瓦格納的消沉低潮，蘇聯人民是能適應環境的，他們能支持無數艱辛試探，而不屈服，並將他們狂歡和深愁的情緒，別作寄托，煥然發揮為音樂和文學

的不朽傑作。

## 二、蘇聯是怎樣一個國家？

缺少限度感似乎是蘇聯人民的一個非常顯著的特性，這種特性又巧妙配合蘇聯國家的一種無限度特徵，蘇聯本身是一片大陸，地跨歐亞兩洲的大陸，並分佔兩洲的文明，蘇聯不僅是一片廣闊無限的大陸，她還擁有世界上任何國家所有的一些最富饒的天然資源，沒有一個國家是完全自給自足的，但有兩個國家至少接近自給自足，這兩個國家就是美國和蘇聯。

蘇聯有鐵煤，鐵礬石，錳和油，這都是現代工業所需要的主要原料，她有種類繁多的食糧，此外還有很多製造紡織物所需的原料，如亞麻，羊毛和棉花，蘇聯是一個重要的產金國，她可以利用這項出產去購買本身所不能製造的東西，但蘇聯也和美國一樣，不能完全自給自足，很奇怪地蘇聯所缺少的也正是美國所無，尤其是橡皮和錫，這兩樣東西，她和美國一樣，常時向外面收購，她還必須輸入蘇聯人民所稱的「殖民地」產品，如咖啡，可可和椰子油，在蘇維埃政府發動工業化計劃以「追上並超過資本主義國家以前，她必須得為她的工業輸入機械和很多種製造品，這些物資大部份是來自德國，英國和美國這幾個先進工業國家，此外她還須以外匯支付外國技術人員的薪資，這些技術人員以美國人和德國人為主，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若干年中，被聘請到蘇聯去協助建立工業。

一九一七年前，俄國的龐大天然資源大部份仍未開採，這使她成爲工業較先進各國的一個誘惑目標，就這種意義說，俄國也和中國或羅馬尼亞或拉丁美洲一樣，因爲先進工業國家希望獲得她的原料（尤其是油），也希望爲她們的製成品，在俄國找到一個販賣市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俄國資源大部份賴外國資本開發，這也和智利的銅和硝酸鹽，羅馬尼亞的油和東印度的橡皮一樣，那時，法國，英國，比利時和美國的資本會投資在俄國鐵路，電車，公用事業和若干礦產企業方面。

俄國人爲甚麼不自己投資於他們本身的經濟發展呢？我們又必須記得，直到一九一七年，俄國主要說來還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扞拉丁美洲與巴爾幹一樣，統治階層不是工業家集團，而是大地主集團，他們的資本是土地和牲畜，沒有現錢可以投資到工業上去，不僅如此，俄國大地主當時（有如拉丁美洲目前的情形）害怕工業化會促成城市的繁興，工廠工人會爲害他們的本身的力量，因此願意把所有的錢仍花在自己的田地上，一九一七年，蘇聯的地位仍可能是先進工業國家的經濟殖民地，要避免這種危機，要確保本身政治獨立，只有發展現代工業。

### 向海推進

蘇聯不僅是一片大陸，她也是一塊爲陸地和冰所封鎖的大陸，只有幾處可以通海，蘇聯被封鎖於大陸，說明了她爲什麼和外界時時孤立，這是因爲蘇聯人民由於地勢原因（假如不是由於其他原因）感到難於保持和西歐以及新世界的經常接觸，讀者試看今天的蘇聯地圖就會知道蘇聯除去太平洋和白海兩方面外，就沒有直接出口，她的船隻要航往大西洋，在北面必須要沿着迂曲的航綫經過芬蘭灣，波羅的海，英吉利海峽，或

北海，在南面必須要經過黑海，韃靼尼亞海峽和地中海。飛機的大量積極使用以及蘇聯青年一代的航空熱，可能有助於打破這種孤立，但直到最近蘇聯在地勢上距外方世界的遙遠，以及她和外界往還只有陸空兩途可通，對於她的歷史仍有深遠的影響。

俄國發展爲國家形態是發源於基輔，莫斯科各城鎮四週的市區，這些城鎮位於中世紀貿易要道的若干河流之畔。基輔有俄國歷史搖籃之稱，她也是俄國基督教的搖籃，但莫斯科的地位較基輔居中，因而成爲俄國政治組織的核心，自中世紀後（除去兩百年那一段期間，首都建立於聖彼得堡），就被建立爲俄國的首都，俄國人民從這個中央區域（也就是被陸地封鎖大陸的腹地）向北面南面和東面擴展，不斷尋求暖水港和通向大海的出口，這種針對通海出口的追求，或者是俄國歷史的主要趨勢。

#### 彼得大帝是一個蘇維埃英雄

這種趨勢在十七世紀末葉彼得大帝成爲沙皇時，尤其明顯。彼得是一個偉大的建立帝國者，今天他在蘇聯被認爲是歷史上的一個英雄人物，雖然他是沙皇。彼得高瞻遠矚不擇手段地去實現他的理想，蘇維埃的領袖自然要認爲彼得大帝是一個英雄，這是因爲他在很多方面奠定了使俄國發展爲一個現代國家的基礎，他是最初訪問西方世界，並看到需要從西方人士學習的俄國人中的一個，他訪問過荷蘭的海港，研究荷蘭的造船廠，並開始爲俄國建立一支商船隊和海軍。

但俄國假如沒有通海的出口建立海軍，似乎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彼得大帝在西方面發展向海推進的運動。在西北方他和波蘭人和瑞典人（那時瑞典人統治芬蘭）抗鬥，建立了聖彼得堡（後稱彼得格勒，今稱列寧

格勒），這是一個靠人力在澤地上建立的城市，他說這是開向西方世界的「窗戶」，在南方，他和土耳其人戰鬥，在黑海之畔的克里米亞爲俄國建立若干根據地，這在一八五四到一八五五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一九二〇年代的內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德軍圍攻塞把斯托波爾時都發揮過戰略作用。

不管俄國的當權者是沙皇還是蘇維埃政府，俄國人總將盼望控制波羅的海，黑海和地中海的若干戰略據點，要不然，這些據點就可能被敵對國家利用來進攻他們。俄國人所以奮力爭取控制芬蘭和波羅的海國家並致力阻止其他國家（尤其是德國）在那裏立足，就是爲……此。他們所以奮力阻止土耳其完全控制韃靼尼爾海峽，所以要求代管義大利殖民地的黎波里唐尼亞，要求獲得多得喀尼斯羣島以及所以支持南斯拉夫要求獲得亞得里亞海方面的里雅斯特海港，也是爲此。

### 遠東前驅

俄國不僅致力獲取西方的通海出口，她也發動了強有力的行動，致力在太平洋和遠東方面獲取出口他們在十九世紀尋取太平洋方面的出口時，所負荷的任務誠有如美國向西擴展的壯舉，他們正如我們循着我們所謂巡往太平洋西岸「顯明運命」，也循着他們的顯明運命邁往太平洋東岸，沙皇政府所送到西伯利亞去的堅毅先驅者和政治流亡者，開闢了這個富源，同時表現了美國先民在幕車時代所表現的許多特性，在西伯利亞種俄國遠東部份開荒的男女移民，希望在邊地發現一塊樂園，生活狀況能够得到改善，或者只要得到不受專制限制的自由。他們中有許多人也像美國的先驅者一樣，憧憬着未來的遠景，有些移民甚至進入了阿拉斯加。十九世紀末葉，俄國人達到了目的，他們在太平洋方面得到海參崴和旅順兩個海港，但後來因爲一九〇四

年到一九〇五年和日本作戰失利，而失去旅順，在過去廿年中，新的先驅者開闢了北極區域，這個區域，可能具有啣接蘇聯最東極哨地和美國最西極哨地的戰略重要性。

### 蘇聯的戰爭收穫

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達成了她若干傳統戰略願望，她從芬蘭（一九一七年建立為獨立國家）在芬蘭灣和北極洋得到基地，並得到一部份德國的波羅的海海岸，包括科尼斯堡。蘇聯籍和多瑙河國家的密切關係而在多瑙河建立了強固勢力，多瑙河是歐洲大河之一，流入黑海。史達林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克里米亞會議時得到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對他恢復帝俄一度在中國東北所有特權的計劃的同意。

### 三、什麼是布爾希維克革命？

關於布爾希維克革命問題，所寫的書籍已不知有好多，在未來歲月中還有許多書籍將陸續問世。我們在這本小冊子中只能試提出布爾希維克革命的主要特點。

許多美國人却誤認蘇聯革命只是工業工人反抗少數有力資本主義者的革命，這種誤解是由於大多數人認為蘇聯革命的發動是依據德國社會主義作家馬克思的預言。

### 以馬克思為依據的革命

馬克思在他最有名的著作中（資本論和他與恩格斯合作的共產黨宣言）表明他的信念說共產黨人的革命將在像德國或可能是英國這樣的高度工業化國家發生，我們要將我們一般所稱的社會主義（藉和平進展達成



改造社會目的的政治運動)和共產主義(藉武力暴力以達成改造社會目的的政治運動)分別一下。我們將在以後看到，蘇聯人士所說的社會主義另有一種意義。他們用社會主義這個字來形容蘇聯到一九三六年所進抵的發展階段，他們認為蘇聯在那時還沒有能建立共產主義。

馬克思認為躋現代工業的發展，將產生一種情況，即在上層的是大獨佔資本主義者日漸縮小的階層，下面是毫無權利的工人們，日趨強大的大眾，照共產黨宣言所說，工人們解除鎖鏈的桎梏外，別無損失，並將反抗少數資本主義者階級，資本主義者的政治和經濟權力一旦崩潰後，工人們將繼之建立起他們自己的共產主義國家，在這個國家內，農場和工廠的出產，將由一切人民依據地們能力製造，另一方面依據需要分配給一切人民。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當最後工人們能够彼此自由合作時，國家機構將行「衰微」，並將像戰斧和紡車一樣，被擱進博物館裏去。

### 蘇聯並沒有符合馬克思的預言

實際說來，最不符合馬克思革命計劃的莫過於一九一七年的蘇聯。那時，有如以前所說，蘇聯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她的工業仍在襁褓時期，主要是靠外國而非本國資本經營，一九一七年極大多數人口是農民，工業工人雖然數量增加但仍然還是少數，那是真正工廠工人的處境有如十九世紀初葉英國工業革命時的最黑暗時期。很多工人雖然在工廠工作，但都是我們所謂工作場的工人，雖然當時會致力提出關於工資，工作時間和工作環境的立法。

然而，蘇聯真正的無產大眾不是工人，而是一羣貧農，這些農民直到一八六一年都是農奴，他們屬於地

主，正和美國內國以前南方的黑奴屬於他們的主人一樣。一八六一年農奴廢獲解放，這主要由於新興中層階級知識份子領袖們的努力，他們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葉，則成了俄國革命運動的先鋒，那時農民據說有希望可以得到耕田，但土地分配進行得非常遲緩，到一九一四年，僅有三分之一的農民個人領有土地，或在集團中獲得一部份土地，其餘的都是沒有土地的農民，他們在大地的田莊或富農的田園充當佃戶或耕民，一九一七年不僅蘇聯的工廠工人致力推翻工業資本主義者階級，更有無數沒有田地的窮苦農民希望得到土地，並希望犧牲地主（不僅包括個人還包括皇室和教會）的利益，以滿足他們的慾望。農民們身任布爾希維克革命的兵卒，工業工人任革命運動的伍長，而先鋒則主要來自知識份子階層。

### 布爾希維克領袖

一九一七年的布爾希維克革命由若干知識份子領導，其中大多數，壓根兒沒有看見過工人坐的板凳，也從沒有拿過農民的耕犁，其中有很多人（著名的如列寧和托洛資基）由於意見和沙皇政府衝突而曾被放逐國外，革命的領導者是列寧，他是知識階層份子，一生沒有做過手藝，擅長的是寫作和演說。

這個布爾希維克革命基本說來是一種土地革命，後來發展為求取工業化的鬥爭。一九一七年布爾希維克領袖的口號是「和平，土地和麵包，麵包是人人所需要的，因為戰事破壞了交通運輸，使城市中心感到食糧的欠缺，和平也是許多人所期待的，尤其是前線的士兵，他們失去軍火的接濟。土地尤其為農民所需要，他們五十年來一直殷切地懸念着土地。

那時，一般農民們以為他們將可驅逐一切地主，並可個人得到土地了。但結果沒有能如此，因為蘇維埃

政府無意將沒有土地的農民改變為擁有私產的個人，蘇維埃政府害怕農民擁有土地可能促使資本主義藉另一種行式恢復過來，他們決定根除資本主義的一切可能根芽。他們的計劃是給在工廠工作的工人（他們自己沒有工廠只因在機器上操作而獲得工資）和在田間耕作的農民，建立一種相同地位，農民們在農場也和工廠的工人一樣成為領受工資的人，農田和國家的工廠、銀行和天然資源一樣，將不是個刮農民的財產，而是國家的財產，農民做工由政府發給工資。

### 政府和農民之間

蘇維埃領袖們的計劃遭遇農民的堅強反對，多年來他們有時積極地，但通常消極地在和政府竭力抗鬥，拒絕耕種等等幫助收成的勞作，或破壞所存的穀物和其他糧食。政府的報復行動是把反抗的農民遷送到北部區域，罰他們在公路和鐵路做苦工或從事其他工作，除此以外，政府還採取其他種種壓制手段一九三三年歉收後，農民們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〇年的冬季忍受嚴重的飢荒，據若干美國記者的估計，因此而饑亡的人大約有二百萬至四百萬人，有些觀察家相信政府可能藉發放存糧而消除農民們所受的饑苦，但政府不這樣做，目的在粉碎農民的抵抗，並加速集體化運動的推進。今天事實上蘇聯所有的土地都是國家的財產，除去少數大規模的國家農場（經營有如工廠，工人領受正常工資），大部份土地由集體農場耕種，集體農場的組成份子獲得一部份農場所獲得的淨利，蘇維埃領袖們的有力鬥爭，並不是工業工人對銀行家和工業家所發動的鬥爭，而是蘇維埃政府和農民間的鬥爭，就蘇維埃政府表示代表工廠工人一點來說，這也是工人和農民，城市和鄉村的鬥爭，集體化運動的鬥爭也沒有完全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內，許多集體農場被入侵的德軍

破壞，重新建設可能是件艱辛的事，尤其是因為缺少機械化農業設備，以前由馬地的工具，都會換用機械化的裝備。

#### 追上外面的世界

和上述鬥爭同時進行的還有布爾希維克革命的其他重大鬥爭，這就是致力將落後的蘇聯轉變成一個可以不依賴外面世界的工業國家，蘇維埃領袖們不僅要使蘇聯不依賴外面的世界，在他們看來，外方世界威脅要把蘇聯壓縮成爲先進工業的殖民地，另一方面他們還要把蘇聯建立成一個強大難摧的國家，可以抵禦一個或一個以上「資本主義」國家的進攻。今天蘇聯國家把握着國內一切資源，和工廠、銀行、礦區以及各種原料，蘇聯因此跳過了私人資本經營，私人冒險和私人獲利的私人企業，這一段時期，這是歐洲和新世界從主要是農業經濟的階段進入主要是工業經濟的階段的過度標誌，蘇聯在二十年內套進了許多革命，這在其他國家綿長到幾世紀之久，她在那暫短的時期內，推翻皇室和專制，毀滅封建財產，並加速發展工業革命，蘇聯認爲（正確也許是錯誤）本身經常受敵視「資本主義者包圍」的威脅，這個國家內急促的改進步調，說明了蘇聯國內何以發生暴烈和混雜的情態。

#### 四、怎樣統治蘇聯？

蘇維埃政府在早年前面臨一項迫切問題，即怎樣可以統一控制擴廣大的區域，這塊領土當時的人口有一萬萬五千萬人（現在增加到一萬萬七千萬人，假如自一九三九年後併入的領土也算在內，就有二萬萬人），這

個人人口包括有近二百個在教育傳統以及經濟發展各方面都大不相同的種族和民族，四個共和國在一九二三年簽訂的條約建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這個聯邦現在有十六個聯邦共和國，關於這個聯邦主要俄國特性的一切形跡，都被故意地使之不見於聯邦的名稱，預料其他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不管在何時何地成立，最後總會加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 過渡時期的政府

在蘇聯建國初期（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六年），只有「勞動大眾」才有選舉的權利，不勞而獲或用人生的利的人（私商和富農）以及過去專制階層，小資產階級和僧侶等人都沒有選舉權。工業工人在蘇維埃選舉中更較農民佔有優勢，在他們可能選入蘇維埃的代表人數以及他們選舉代表的方式，兩方面都是如此。工人和農民選舉權利有別，是因為在資本主義轉入社會主義的過渡期內，受有政治訓練的工人，自須擔任落後農民大眾的領導。

到一九三五年，集體化運動的勝利（有意使農場和工廠工作環境一律化）以及被剝奪選舉權者，由死亡或放逐而逐漸消失給修改蘇維埃憲法開闢了途徑。史達林在一九三六年說「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在蘇維埃聯邦已「大致」實現，「剝削」階級已被「消滅」，現在只有兩個階級，就是工人和農民以及現稱為「勞動知識階級」的知識份子階層」。他說，在當前環境下，社會團體的經濟差別逐漸消除，基本的階級對立也不存在，蘇聯已經實踐社會主義經濟，現正步往社會主義民主和無階級社會的方向。

### 一九三六年憲法

根據一九三六年憲法第一條，蘇聯是個工人和農民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的政治基礎包括「勞動代表的蘇維埃或委員會，國家的經濟基礎是「生產工具和生產手段為社會所有」。

依據一九三六年憲法，選舉基於普遍平等和直接選舉的基礎，過去選舉通常是公開的，現改為祕密投票，一切公民到了十八歲，現在就可以參加選舉，不受種族、民族、宗教、教育、居住資格，社會來源，財產地位或過去活動的限制，被剝奪選舉權者，一度曾達到八百萬人，但達到一九三四年估計減到一個不多的數量，因此被剝奪選舉權者的一類已被正式取消。實際上蘇聯的選舉和美國所謂的選舉不盡同，因為蘇聯選舉時常只有一個候選人，他本人雖不一定是共產黨員，但却是由黨選擇或同意的。然而在選舉以前的會議中，選舉者假如不發表相異的政見，就有機會可以討論一下饒有興趣的當前國內問題。

#### 聯邦政府

以前已經說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是一個有十六個聯邦共和國的聯邦國家，一九二三年時只有四個聯邦共和國。在這個聯邦中，國家的名義元首（現在是許維尼克，他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和共產黨政治局委員）履行一些接見大使外賓的職務，這在西方共和國國家通常是總統份內的職務，然而憲法沒有關於主席的規定條款，而將一切立法、行政，和司法權都交付給蘇聯的最高蘇維埃和委員會（以前稱為全蘇聯大會）。最高蘇維埃每年開會兩次，依據一九二四年規定是每兩年開會一次，最高蘇維埃由依照普遍平等和直接選舉以祕密投票方式選出的一千多個代表組成，這些代表隨時可能被他們的選民罷免，最高蘇維埃立法權力的唯一上訴是人民表決，這可能由任何一個共和國提出要求，最高蘇維埃任命國內最高的執行和行政機構

人民委員長會議（有如我們的內閣），並選舉蘇聯最高法院和各特別法院，任期五年。一九四一年德軍入侵蘇聯前夕，史達林出任總理和國防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在此以前，他在蘇維埃政府中沒有担任過官職。

#### 最高蘇維埃（或委員會）

最高蘇維埃包括兩院（聯邦院和民族院），兩院委員人數差不多相等，都由公民直接選舉。聯邦院的選舉以人口為基礎，每卅萬人口中選出代表一人。民族院的代表選舉是每一聯邦共和國選出廿五人，每自治共和國選出十一人，每自治省選出五人，每郡選出一人。史達林在一九三六年反對取消民族院建立一院議會的建議，理由是蘇聯不是一個民族的國家，而是由許多民族構成的國家，聯邦院既不計民族，代表一切「勞動者」的共同利益，民族院也具有代表少數民族特殊利益的重要性。

最高蘇維埃在休會期間由主席團代行職權，主席團委員卅七人由最高蘇維埃選出，也具有一種「集體主席」的性質，主席團執行最高蘇維埃的許多職務，如任免政府官吏，批准條約和宣戰。

#### 人民委員長會議

依據蘇維埃法律，各人民委員長對最高蘇維埃負責，實際上，共產黨對於人民委員長會議的職務，具有決定性力量。人民委員長會議負責執行蘇聯一般行政所需的措施，事先檢討提交主席團一切法律方案，尤其是關於徵收新稅或增加現有稅的方案以及準備聯邦預算。

人民委員長會議包括全蘇聯各委員會（全蘇聯所共有）和聯邦共和國委員會，這在各聯邦共和國也有相同組織。第一種包括國防、國防工業、外交、對外貿易、鐵路、交通、航運和重工業，第二種包括輕工業，

糧食工業、木材工業、農業、國營穀物及牲畜農場、財政、內部貿易、司法和衛生，蘇聯的行政系統也見於各聯邦共和國，每一聯邦共和國有最高委員會（或蘇維埃）主席團和人民委員長會議。

聯邦政府不僅受有通常授予聯邦中央機構的權力（如進行外交、國防、聯邦預算行政事項），而且控制着國家的對外貿易，決定國民經濟組織，擬訂教育基本原則，處理銀行，工業和農業企業，並確定管制土地發展及利用的原則，聯邦共和國保有「自由脫離」聯邦的權利，和在不特別劃歸聯邦機構各項事宜方面的絕對主權，包括司法、衛生、教育和社會福利的行政。事實上，聯邦共和國的各项活動，必須要依照聯邦政府和共產黨的政策。

#### 政治警察機關和牠的後身

直到一九三四年人民委員長會議的一個明顯機構是全蘇聯國家政治組織，也就是被稱為加貝烏的政治警察機關，牠的前身是恐怖的「乞卡」（是一種特務組織，在蘇維埃統治初期，會對反革命活動展開過恐怖運動），加貝烏是一個强有力的秘密警察組織，本身有特殊機構負責軍事，壓制一切損害或推翻蘇維埃制度的企圖，一九三四年，蘇維埃政府取消加貝烏組織（牠居於「國內之國」的優勢地位）以牠的任務交付給內政人民委員會，後者的組織是依循民政而非軍事條規，然而這個改變只是換湯不換藥的作法，這由一九三四年基洛夫被刺事件而起的審訊和清黨得到證明，那時蘇維埃政府在政治事件方面又採取了加貝烏的作風。

美國人習慣於本國嚴格的分權制，因而對蘇維埃制度的缺少分權特徵，特別感到驚異，蘇維埃行政的一切機構，從城村最小的蘇維埃到人民委員長會議，執行着行政權和立法權，而且都可以下令約束公民。在政



治事件方面，政府還執行司法權，被控犯反對國家罪的人，很少在普通法庭受審，蘇聯的最高法院是政府致力保護國家不受敵對者侵害的第一個和最前的機構，然而缺少分權在實行上一點也不發生混亂現象，因為行政機構完全受制於共產黨。

### 共產黨是怎樣的

控制蘇聯的政治和經濟生活由共產黨一手負責，共產黨是憲法准許存在的唯一政治組織。這個黨是權力的最後來源，政府的頭腦，一個無限歧異國家的統一力量。

一九三六年憲法給予人民以結合各種組織的權利，如工會、合作協會，青年運動和防禦團體，文化和科學組織，各種組織可以提出候選人參加蘇維埃的選舉，但憲法不准組織共產黨以外的政治團體，憲法上說，共產黨是「勞動人民增強并發展社會主義秩序鬥爭中的先鋒」。史達林本人在一九三六年說憲法不改變共產黨的地位，蘇維埃國家因此是一個一黨國家，這事實上也就是一黨專政，雖然有許多非共產黨人被選入政府機構，但共產黨控制着行政機構，忠實黨員居於重要的政治和經濟職位，共產黨擬訂一切重要政策，然後由行政機構加以執行，政府和黨沒有正式合併，照上面的情形說來，兩者之間是不可能發生衝突的。

共產黨的組織和任務在憲法中沒有說明，據一九三八年的數字，牠在一萬萬七千萬全部人口中約有黨員二百五十萬人。共產黨的黨員人數比較少（在戰時增加到三百萬，或在全人口二萬萬人中佔五百五十萬人），這是一部份因為入黨的限制嚴，還因為共產黨定期「清黨」的控制。

共產黨組織的核心是黨的單位，單位必須包括不少於三個黨員的人數，可能在工廠，鄉村或辦公機關組織。黨的單位以祕密投票方式選舉代表到黨的各上層機構，至全蘇聯共產黨大會爲止，據共產黨綱，全蘇聯共產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構，大會常每二年召集一次。牠在休會期間，授權予牠以祕密投票方式選出的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由委員七十一人組成，由牠選舉一個祕書處，一個執行行政任務的組織局和一個由十名委員組成的政治局，政治局負責擬訂黨的政策，牠是蘇聯權力的真正來源。

### 真正權力所在

政治局的委員由中央委員會以祕密投票方式選出，但實際上，這些委員都由史達林決定，他從一九二二年起就一直担任共產黨的祕書長，本人同時也是政治局委員之一，在一九四一年以前，史達林在政府中沒有担任過重要職務，直到一九四一年，他才和列寧在蘇維埃政府初期成立時一樣，出任總理之職，事實雖然如此，但他對於共產黨和政府的政策都有決定性的力量，政治局沒有公佈的規章，他舉行的會議有如共產黨大會所舉行的會議一樣，是不公開的，但所商的決議案最後可見於由蘇維埃官吏所聯署的命令，公佈全國週知，共產黨和政府政策的一切基本問題首先通過政治局，如提出一套五年計劃，「消滅」富農和修憲計劃，這些具有遠大影響的發展不是出自蘇維埃政府，而是由政治局發動，事實上也是由史達林和他的最親信左右所擬訂，前面已經說過，共產黨處於駕臨政府之上的地位，並不造成政治衝突，這是因爲所有的主要蘇維埃官員都是黨員，同時大部份政治局委員，都兼任政府要職。

共產黨綱規定，關於糾紛爭執的問題可以「完全自由」討論，但在一經商獲決議後，黨的紀律要求停止討論，一切黨的機構以及非常機構（如蘇維埃工會或職業團體協會以及合作協會）必須即時致力實現黨的決定，違背黨的指示以及被黨內同志一般認為有罪的其他不當行為都由黨制委員會加以調查，並受應得的懲罰，譴責清除不等。

共產黨領袖們認為所以要對叛黨者加以嚴格的處罰，是因為黨的完全統一（這被認為是抵制資本主義反動的堡壘）只有靠嚴格執行「黨規」才能保持，黨規不是一成不變的方案，而是有伸縮性的一些規章。目的在能適應隨時發生的任何情勢，共產黨的「黨規」始終以列甯著作中的話引作根據，但也代表了史達林和他的親信們所認為最能適合目前情況的政策。

### 托洛斯基反對派

政治局一手操縱黨的大權以及禁止並終於消滅黨內的反對派，被已故的托洛斯基和他的同志譴責為違背「黨的民主」，他們說在布爾希維克革命的初期是有「黨的民主」存在的，一九三七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頒令黨的負責人員今後應依據黨綱規定自由選舉，由於個人偏愛或當地政治興擾而由上面任命的這種辦法，應即時取消，然而托洛斯基的同志們所要求的不僅是自由選舉黨的負責人員（這些人員在目前制度下必須要是史達林的忠實信徒），而且要求黨內可以擁有積極討論的機會。

我們就此看到蘇維埃政治制度和我們自己的制度極不相同，我們是兩黨制，少數黨可以提出敵對的政見，而蘇聯是一黨專制，他准許相當的經濟和文化自主，但不寬容政敵，然而我們必須記起，蘇聯和我們相反

我們人民比蘇聯人民具有更一律的政治和經濟經驗，在蘇聯人民獲得高度識字率 and 統一以前，他們可能需要一個向心的中央政府，擬訂經濟發展的綱領，我們真正最感到興趣的問題是：蘇聯有多少程度的個人自由？

蘇聯有多少程度的個人自由？

回答這個問題不能直截了當地下個決定，首先我們必須爲自己解釋一下，我們美國所謂的個人自由是什麼，美國所謂的個人自由是我們高興怎麼想就怎麼想，高興怎麼說就怎麼說，高興怎樣寫就怎樣寫，自由信奉並尊行任何一種我們世代信奉或可能選擇的宗教，自由工作，自由參加我們可能願意加入的政治組織，或其他團體。

帝俄時代有多少自由？

我們將本身和蘇聯生活方式加以比較時，必須記得在一九一七年蘇維埃政府當權以前，大多數農民和工業工人對於我們所熟悉的自由只有比較少的經驗，我們已經說過，所有農民在一八六一年以前都是農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只有三分之一的農民自己已有田？帶而有經濟自由的意識，但我們也應注意及在沙皇下治受過教育和比較興起的少數人民（貴族，地主，小中層商人，職業人士和知識份子）有的確享若干有限的自由，他們可以自由信奉並遵行宗教，雖然脫離俄國正教的支派和猶太人常受到嚴苛的歧遇，後者並常受到兇殘的殺戮，報紙享有相當自由，反對政府者的意見可以時時發表，讓那些能讀能寫的少數人知道，但政府的檢查也常常干涉到這些自由，日俄戰爭後，帝國議會在一九〇五年成立，這和由日俄戰爭促起的革命提供了政治組織的機會，議會議員的選舉誠然由城鎮有財產者居於有利地位，但至少已有一種趨向，使國內各

方面代表都可以有參加議會的機會，在這種有限制的選舉權下，俄國的各革命黨（社會革命黨和兩個社會民主黨派孟希維克和布爾希維克）都選出了參加議會的代表，他們在議會中可以發表批評政府的言論。

許多不能閱讀俄文的西方人認為沙皇政府使俄國的知識生活陷於停滯的狀態，這種看法還不透澈，沒有看到整個的全景，俄國許多知識份子都強烈反對沙皇政府竭力推翻這個政府，並改善農民和工人的處境，他們因為這樣而受到嚴厲的處罰，但俄國（也可說是世界的）文學的若干輝煌傑作，都產生於十九世紀，如偉大詩人普希金的抒情詩篇，托爾斯泰的小說力作，最著名的「戰爭」與「和平」陀斯安耶夫斯基的小說，他看到俄國未來前景，擅長刻畫田莊紳士生活的屠格涅夫的小說，以及戈果爾他給烏克蘭描繪出生動的輪廓，然而這一些詩人和小說家都呼喊出沙皇治下俄國的騷亂不安以及俄國知識份子對於蘇聯基本改革的嚮往。就一種意義說，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的黃金時代可說是布爾希維克革命的前驅，相當如十六世紀伊麗沙白時代文學的光輝燦爛，導引出克倫威爾的革命怒潮。

### 蘇聯人民沒有我們這樣的人民自由

假如我們要實際觀察蘇聯，我們必須自己承認美國和英國所習慣的人民自由，在蘇聯從未存在並且直到今天也沒有這種自由，我們看到共產黨是唯一合法的政黨，其他團體一概沒有政治結合的權利，印刷的文字全由政府控制，政府同時也管制着教育和電話，電報和無線電等各種交通工具，政府雖然嚴格控制民意的各種表現，但蘇聯人民在蘇維埃政府管治之下，在技術，科學以及在迄今大部份落後無知的人民間推進衛生，教育和現代農業方法各方面都獲得顯著的進步，假如他們在文學和藝術（戲劇除外）方面沒有獲得同樣的顯

著進步，這可能是因為他們生活在騷亂的時期，並致力於使自己的創造力去配合嚴格的馬克思範型。

### 但蘇聯人民有他種機會

蘇維埃領袖們本身不致否認蘇聯沒有西方國家所有的那種自由，但他們認為在過去廿五年中，蘇聯是處於一種動員狀態，準備抵制「資本主義」包圍的戰爭，在這種緊張狀況下，個人的希望和自由必須以共產黨所指明國家的各種需要為前提，他們還指出蘇聯雖或沒有政治自由和個人自由，但蘇聯人民在經濟方面却享有很大的推動和批評的權利，蘇聯報紙雖從沒有責詢過政府的政治決議，但報紙每天批評煤料供應欠當，燈泡製造的遲延以及其他種種有關國家經濟發展的問題，則是事實，這種批評被稱為「自我批准」，當局不僅准許，而且鼓勵，報紙的評論很有效地使蘇聯人民集中注意到他們週遭所發生的事情，工廠的工人和集體農場的農民也被鼓勵致力批評工廠和農場本身的工作，提供改進工作方法的建議，並就蘇維埃報紙和生產每一單位自辦的「壁報」所說明的一般世界動態交換意見，這樣一來，工人和農民們（其中許多以前是不識字的）都得到了很豐富的教育，並從討論直接有關他們每日工作和生活的許多問題得到了經驗。

### 公民權利

一九三六年憲法載有一個關於基本「社會」權利的綜合而詳盡的說明，根據憲法蘇維埃公民有權獲得保證的僱用，並依照工作的量和質得到應得的報酬，他們有權休息，依據憲法，這種權利的保證是給極大多數工人的二日勞作時間減至七小時，規定每年休假制，工人和僱員在休假期內仍可照樣支薪，並為勞動人民設療養院，休養所和俱樂部（實際上許多蘇維埃工人工作時間遠超過七小時，因為他們要得到加薪，同時由

於設備有限，目前可以休假去休養所安息的工人只有少數。

蘇維埃公民在七年，病時或失去工作能力時，有得到實際保障的權利，依據憲法這種權利由政府出資進行大規模的工人和僱員社會保險計劃，免費醫療和供給衛生療養院而得到保證他們有受到教育的權利，這種權利的保證是免費使一般人民必須受到基本教育，國家為高級學校極大部份學生設立獎學金，使蘇聯各種人民受到本身語言文字的教導，並組織自由職業技術和農地經營的教育，國家農場，機器和拖曳車站以及集體農場。婦女在經濟，國家，文化，社會和政治生活各方面也和男子享有同樣的權利，依據憲法，婦女的權利由使她們和男子一樣同樣得到工作，工資，休息，社會保險和教育權利得到保障，同時國家還保護母親和嬰兒的利益，婦女懷孕可以獲假，並可照樣支薪，此外還在全國各地普遍設立產科醫院育嬰所和幼稚園。

一九三六年憲法還保證不計種族民族，蘇維埃人民在經濟文化、社會和政治生活各方面都可獲得平等的權利，基於種族或民族觀點，對於這些權利的直接或間接限制，或使一些人民享受特權，以及宣傳種族或民族仇恨和鄙視，在法律之下都在懲處之列，然而這裏應該提到憲法並沒有禁止基於政治理由而進行的仇恨和鄙視宣傳，這由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八年蘇聯報紙的辱罵所謂托派得到說明。

此外，我們必須不要以為憲法是實在依照牠的條款執行的。行動時常不能依照理論，近年來蘇聯處於非常狀態，因此蘇維埃公民實際所享的上述各種權利非常有限。

### 公民責任

一九三六年憲法和權利法案不同，不僅規定公民權利，而且還規定了公民的責任，公民必須履行法律，

保持勞工紀律，並尊敬社會主義社會的規章，着重點不是個人，而是國家，國家被認為負有確保公民福利的責任。公民負有責任，「保衛並增強公共社會財產，使牠作為蘇維埃制度神聖並不可侵犯的基礎，國家富強之源，以及一切勞動人民繁榮和文化生活之源」。憲法規定「企圖侵害公共社會財產者，將被視為人民公敵」。每一公民必須認為保衛「祖國」是他的神聖責任，叛國（違犯誓言投入敵方損害國家軍事力量和間諜）將受「法律最嚴厲之處分，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期內，蘇維埃領袖齊納維夫卡開尼夫，拉迪克，巴達可夫和他們的同志們的提付審訊，就是因為被控犯有上述叛逆國家的罪行。

蘇維埃領袖們為了保衛國家安全，使之不受一切政敵侵害，不僅處決並放逐他們的政敵，並將許多政治犯（有人估計達七百萬）送進集中營，罰做苦工，這個靠軍警力量維持本身安全的國家這樣壓制反動派，雖然從猛烈內爭狀況（布爾希維克就是在這種狀況中奪取政權）可以得到一些解釋，但已特別引起西方國家輿論對蘇維埃政府表示不滿。

## 七、蘇聯有宗教自由嗎？

在布爾希維克革命所提起的一切問題中，使外方世界最感不安的莫過於蘇維埃政府對宗教所持的態度，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後席捲歐洲的大部份改革或革命運動，多少都含有反教會性質，但直至一九一七年布爾希維克革命，這些運動通常想要限制教會的行動範圍，並將教會和國家分離開來，但無意廢除宗教組織或從人民的意念中消除宗教信念。



## 反對反動教會

馬克思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列寧常常引述過這一句話，蘇維埃政府也發起運動，反對一切宗教運動，如天主教，基督教，猶太教和回教，馬克思的聲明和蘇維埃政府的反宗教運動，使世界其他國家深深驚恐，並觸怒了許多西方國家人民，要不是這樣這些西方國家的人民，可能對於蘇維埃的經濟和社會理想，寄以相當的同情，我們在這裏也得記得一九一七年俄國的落後和人民的一般無知，俄國正統教會對於這些缺憾，並沒有一點改善的作用，一九一七年，俄國有組成宗教的地位，一點也不像英國或美國今天所有的有組織宗教，許多俄國正統教會的領袖，却和沙皇政府密切往還，支持沙皇政府壓迫自由運動的政策，並支持牠對於人民教育的反動觀念，亞歷山大三世（一八八一年至一八九四年），政府嚴厲壓迫帝國以內的非俄羅斯民族，猶太人和正統教會的叛徒，手段最爲毒辣，亞歷山大三世很受他主要宗教官員的影響，那個官員是一個反動份子，叫波貝多納齊夫。

這不是說蘇聯人民沒有宗教的熱忱，相反地蘇聯民間有一種深伏的神祕主義意識，這種意識至少在早一代中，曾經歷二十年的蘇維埃的壓制和反宗教宣傳，而依然存在，然而從沒有地的貧農和沒有權力的工廠工人的觀點看，俄國正統教會似乎和沙皇主義以及私人財產制度（這對改善人民大眾處境是沒有希望的），同屬一流，因此在布爾希維克革命期內，農民和工人們很自然地不僅攻擊皇室、貴族、和地主，並同時對擁有大量田產和其他財產的教會予以打擊。

我們同時應該注意到馬克斯主義，基本反對宗教信仰，就是一個以馬克斯主義爲基礎的政府，在一個教

會不如俄國教會那樣反動的國家當政，牠還是可以採取反宗教政策，但假如西方國家的經驗，可以發生任何指導作用，傾向自由而有社會意識的教會人士可能減少社會的經濟摩擦，因此隨而減少強烈反對有組織宗教的危險，另一方面教會重視羣衆處境，並和有產階級密切合作的國家（如西班牙和墨西哥）却遭遇到有如一九一七年發生在俄國的那樣騷動。

### 蘇聯對於宗教的政策

現在我們要明確探討一下，蘇維埃政府怎樣對付宗教，蘇維埃政府在革命初期，迫害牠所認為結好沙皇主義的一切信仰的宗教領袖，蘇維埃報紙譏諷宗教情感表現，政府並積極促進無神同盟這個組織，發動了一種運動，反對宗教習俗，尤其反對附麗於俄國正統教會教儀的一切迷信。

蘇維埃一九三六年憲法第一百二十四條規定「一切公民可享宗教信仰自由和反宗教宣傳自由」，但事實上，宗教信仰自由仍受重要限制，若干教會准許在莫斯科和蘇聯其他城市設立，然而其他很多教會不被破壞重新建築，就被撥充他用，蘇維埃當局對於到教堂去祈禱的人，並沒有加以積極的壓制，但牠通過了一切可能影響民意的工具（如報紙、無線電、劇院、演說和反宗教展覽），儘量譏嘲宗教迷信和信仰，只有最有決心的人（大部份屬於上一代）可以抵得住這種不斷的當衆侮辱，蘇維埃政府更阻止新宗教領袖的教育並阻止學校給予兒童的宗教教育，不過這種教育，家長在家裏是可以默化他人的。蘇維埃政府既採取了這種手段，當老一代慢慢凋零萎去後，蘇聯的人民很可能全是奉命漠視或實際藐視宗教的人民。

### 俄國正統的教會復興

德國侵蘇後，蘇維埃政府對於宗教的態度，有顯著的變化，無神同盟機關報「無神雜誌」顯然由於缺乏紙張，而臨時停刊，當局已不再鼓勵對於宗教予以公開的攻擊，蘇聯採取這種新政策，有下面幾點因素，第一、蘇維埃領袖知道宗教情感，不但及有被兩次大戰間期內，所發動的反宗教運動沖毀，事實上依然有很多人民具有這種情感，另一方面，且因戰爭和德軍佔領的遭遇而加深了，等二、蘇維埃政府已達成了分離國教和消除幾世紀來依附宗教習俗的許多迷信的原定目標，教會已不再是一種政治危險，可以在蘇維埃國家有限制地予以恢復，第三、俄國正統教會和許多地方（尤其是巴爾幹和近東，中東一帶的斯拉夫人民）有傳統的和聯繫，對於蘇維埃政府在國際關係方面可能有很大價值，尤其對應付梵蒂岡方面有這種作用，後者自一九一七年後就一直反對蘇聯共產主義，主要理由是蘇聯的共產主義有反宗教的含性。

蘇維埃政府在作過各種考慮後，終於逐漸開始改善俄國正統教會教士的地位，很多教士，雖然過去受過壓迫，但都拒絕和德軍合作，而一致效忠蘇聯，全蘇教會會議，在一九四五年二月間舉行，選愛勒克西爲新主教，政府將所侵略的大量財產，交還教會，政府並協助恢復教會和古神龕供人民膜拜，現在開着的修道院有七十所，研究院已重開，知名的如基輔、喀山、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重要神學研究中心，當局准許主教發展一種統一國內外教會的計劃，並鼓勵他和其他國家的正統教會，以及和波蘭以及羅塞尼亞的許多教徒建立關係，一九四三年，人民委員長會議，還設立了一個關於正統教事務的蘇維埃會議，以和關於宗教祀典的蘇維埃委員會合作，由此可以看到蘇維埃政府對於教會事務的關切。

這個新政策直到現在，主要是着重在改善俄國正統教會的地位，其他宗教沒有受到像這樣的優遇，俄國

正統教會和梵蒂岡教廷的變化關係，目前很難改善在天主教蘇聯的地位，基督教在蘇聯向不普遍，牠的前途更不確定，可能受到蘇聯和基督教握佔勢力的英國，美國和德國的未來關係的影響。

### 共產主義和基督教

俄國正統教會已不是沙皇專制的工具，牠的存在似乎適合蘇維埃制度。共產黨的領袖們，並沒有完全改變他們對於宗教的觀念，他們同意可以接受沒有以前政治野心的教會，我們必須也得承認共產主義，如和政治考慮滲雜在一起，牠確也規定了一種類似最高度發展宗教運動所呼籲的生活方式。共產主義所明示的目標，是為被壓迫的勞動者改善生活狀況，這種理想，並不如有時似乎背離早期基督教理想那樣地和後者背道而馳，在幾世紀中；早期基督教理想已大大變形，很多人今天認基督教有些類似資本主義，這不是早期基督教思想家的觀點，他們譴責富有，主張基於團體基礎和窮人共有財產，具有遠見的共產黨領袖們，希望利用政治和經濟力量，不是為增進本身的利益，而是為改善人民大眾的福利，然而實行共產主義和實行基督教一樣，理想和實際之間，常有一較大的洪溝，此外，人們不能忽視蘇聯共產黨人依據為目的，不擇手段的理論，常使用與基督教道德大相逕庭的暴烈和放肆的手段。

## 八、蘇維埃經濟制度是怎樣的？

蘇維埃經濟制度，是一個極多爭議的問題，假如我們要獲得公正準確的認識，現在就得平心靜氣，致力探討一下蘇維埃經濟制度，到底是怎樣的，蘇聯現在不是（在過去二十五年內也不是）美國若干親蘇作家所

描繪那種經濟和社會的烏托邦。在另一方面，她也不是反蘇作家所勾劃的那種既殘暴又無效率的沉淪地獄。

### 蘇聯不能和美國相比

將蘇聯和美國的經濟和社會狀況加以比較，不僅是不公道，而且是徒勞無益，美國是一個先進的工業國家，具有現代工業所產生的一切優點和緊張，蘇聯情形不同，她現在才開始注意到工業化問題。

美國人觀察蘇聯所注意到第一件事，是蘇聯不是我們所謂的資本主義國家。我們所謂的資本主義是什麼呢？我們通常所謂的資本主義，是私人有機會積蓄錢或資本，並將所蓄資本為私人利益而作本人冒險，向由個人或個人所組織的集團控制的企業投資。這也就是說，私人有機會建立他自己的商業，並將他的出產自由賞給任何需要的市場。這種機會，今年在蘇聯沒有，所有工人和雇員，都被國家雇用，他們的數量在一九五〇年第四個五年計劃結束時，可望達到三千三百五十萬人。

### 蘇聯資本主義的終止

但我們必須回顧蘇聯的歷史，並記得在一九一七年前，只有極少數人有工業資源或現錢，可以投入私人企業，一九一七年，蘇維埃政府壓制資本主義，因此不是對於國家經濟制度具有一種深遠性的基本改變，這種情形，要是發生在美國，就大不同，因為在美國財富由於私人擁有公債、股票、保險等等，而普遍地分散全國蘇聯的大部份人民沒有財產，因此不因這種改變，而受到多大影響，他們所知道的只是以前由皇室貴族教會小中層階級和大地主所有的財產，現在成為國家的財產，克姆林宮一直仔細告訴人民，他們就是國家，因此現在集體（假如是間接地）擁有蘇聯森林田地礦田和工廠的就是他們。

然而蘇維埃政府無意實行馬克思的原則，把國家所出產的一切產品，「依據人們的需要」分配給一切人民，蘇聯政府鼓勵工廠工人和農場農民，致力進行更多或更好的工作，爲了鼓勵他們並給他們種種機會，使他們可以增加零工工資，獲得紅利或享受特別權利，如休假到克里米亞和高加索的國營療養院去休息，因此今天蘇聯人民的獲得報酬，不是依據他們的「需要」，而是根據他們的「工作」。

#### 技能和效率的報酬

這樣說來，要認爲蘇聯國內爲一切人民規定有一種經濟和社會狀況的確切標準，那就完全錯誤了，馬克思或列寧的原有這種觀念，和蘇聯今天的情形，距離很遠，一個有名的演員，一個受過高度訓練的技術人員，或一個有經驗的工業的經理，所得的薪金比較說來，很可和美國同樣職業個人的收入相比，蘇聯工程師、經理、或演員，拿這筆薪金，可以享受超過每技術工人或每技術農民的高標準生活，他或不能得到美國一般工人所能得到的奢侈品和必需品，這個理由，在前面已經說過，是蘇聯不能出產足量的消費品，以適應一般人民的最簡單需要，但在他可以得到的東西方面，他可以比較收入不及他的男女買得多，然而無論如何，他將不能以一部份收入，投入私人企業。

#### 蘇聯的新中層階級

由於上述工資的差異（這在過去十年中更爲顯著），蘇聯在一九三九年首次有了我們所謂中層階級的大規模出現，這是他歷史中的破題兒第一遭，一九一七年前俄國只有少數中層階級，夾在上面的皇室和貴族，與下面無地農民和無權工廠工人的羣衆之間，看起來，雖然矛盾，但蘇聯在跳過了社會和經濟發展階段（西

方國家的中層階級，是在這段內期興起發展的）後，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產生了這麼一個階層。

這個新集團有如西方國家的類似集團一樣包括工程師演員政府官吏工業經理集體農場的管理人、醫生、教師、職業人士，以及有高度技能的工人，這些工人被叫做斯泰哈納夫者，以致被打破舊生產紀錄的工人，斯泰哈納夫這個集團，有如西方國家的中層階級是一個有流動性的團體，由擢升更年青的工農，担任重要職務，而不斷擴大，隨這個集團的興起，帶來一種生活方式，這似乎和維多早期布爾布維克領袖的觀點相互抵觸，但和他們一度譏笑別國稱為「布爾喬亞」的生活方式，並不十分不同。蘇聯人民原來藐視家庭生活（由於都市中心非常缺少房屋，享受家庭生活生活無論如何，是常難如願的），但變而為愛好家庭生活，並想把能得的一兩間房屋，佈置一些傢俱，和令人憶及維多利亞盛世的椅套，蘇聯人民原對婚姻抱持一種極浮泛態度，（因此離婚和墮胎，成為慣見的事）現已一變而為尊敬婚居生活，鼓勵創立大家庭，並禁止墮胎。

#### 機會均等

這並不是說這個由工程師、經理、政府官吏，職業人士和技術工人組成和新團體，已經「凍結」，也不是說其他人民團體沒有進一步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機會，相反地，這個集團不斷在擴大這在前面已經提到了，從以前無地農民和無權工廠工人的觀點看這是蘇維埃制度的主要優點之一，他們很多入以前在沙皇治下，似乎被罰過着一種狹窄，貧乏，和他們所稱為「黑暗」的生活，今天的蘇聯（有如繁榮時期的美國，尤像十九世紀擴展大陸時期）有能力的男女發展機會無限，真可說是可以大顯身手的好時機，貧農的兒子，可以成爲一個工程師或工業經理，或一個將帥，拿破崙所說，他的每一兵士在行囊中，都有一根將官指揮杖，這句

話可以適用於今天蘇聯的各種努力。

這種機會自由是最近的發展，蘇維埃政府在布爾希維克革命後很多年，由於仍然恐懼反革命行動，對於教士（俄國正統教會准許教士結婚），帝俄官吏和工業家的兒童（後來還包括托派份子的兒童）始終加以歧視。然而這些歧視已逐漸去除，今天蘇聯的青年一代比較沒有沾染到俄國幾世紀來在各種專治統治下所形成的憎恨和偏見的傳統，每一個青年男女覺得假如自己是勤奮苦幹，在這個資源大半沒有開發的富有之鄉，有的是夢想不到的成功機會。這個有機會和發展餘地的感覺，是使青年一代歡樂興奮的一個重要因素。蘇維埃政府並會積極引用青年人，讓他們擔任負責的職務，今天在整個蘇聯，在政府，在軍隊和經濟體系方面有很多青年人（很多都不到三十歲）擔任要職，他們各本崗位，完成了理想和有创造性的工作，不受到恐懼陰沉和猜疑的束縛，但他們的上二代在蘇維埃政府最初當政時，則深陷於這些束縛的陰影之中。

### 九、蘇聯人民也可以有私人財產嗎？

有些人要問：假如額外的收入不能用置財產，這些進展的機會又怎能有多大的用處呢？這個問題的提出是因為許多美國人認為蘇聯取消資本主義也就是蘇聯人民不能置有任何私人財產，這並不是真實的情形。蘇維埃的領袖們對於擁有資本謀取私人利益和置有各種私人財產（房屋、書籍、家庭用具、衣着、傢俱和汽車等等）以供自用兩方面分別得很清楚。蘇聯人民所不能做的，是私人靠薪資積蓄投入私人企業（甚至是一個小鞋鋪或文具店），並雇人為他服務，這是絕對禁止的。蘇聯所有財政資源都出國家所有，國家並在各種企



業方面投資，這包括多納茲盆地的煉鋼廠，羅斯多夫的牽引車製造工廠以至出售民用鞋，衣和傢俱的商店。

蘇聯人民可以置有的東西

然而一個蘇聯人民可以用他的薪資為自己在城裏購買一所房子，或在鄉下買點地皮，他可以儘量購買傢俱、衣着、書籍和古玩，或者店裏可以賣的，他都可以買，後面一點更較重要，理論上只要市場上有汽車、洗衣機和冰箱可以賣給私人，他也可以買。但事實上蘇維埃政府已將全國工業資源集中於生產重要裝備（尤其是軍用物資），並且大規模地減低消費品的出產，蘇聯備戰也有好多年，可以用以製造私人汽車的鋼和其他原料都被用以製造坦克、製造飛機和蘇軍有效用以抵抗德軍的一切武器。

蘇聯缺乏消費品（連肥皂和牙刷這類普通物品都缺少）不是由於政府要阻止人民擁有私人財產，而是因為政府想不使國家的資源從戰時生產轉到平時生產，相反地，蘇維埃的領袖們會常常表示，一旦消除了戰爭的威脅，蘇聯的生產力量並適應到平時需要時，他們自然希望蘇聯和每一個男女和兒童都可以盡量獲得生產的愉快享受，換句話說，蘇維埃的理想不是要使人民永遠過低水準的生活，或在入世受苦，而是一俟外面環境許可，就提高生活標準，蘇聯人民也可以把他不用於購買消費品和一部份薪資購買政府公債，由此將他的部份薪資還交政府投資國營企業而取得利息。他也可以把他的房子傢俱和書籍等等傳留給他的孩子。

### 農民的私人財產

我們剛說的是在工廠做工或在機關辦公領取薪資的蘇聯人民可以置有私人財產的情形。在集體農場工作的農民，也可以像這樣置有私人財產，前面已經說過，蘇聯的土地現在是國家的財產，私人農場的數量已減

到不及全數的百分之一，大部份蘇聯農民因此都是集體農場份子，依據他們所做的工作，（不論是耕種、擠乳、修理工具或在農場管理處担任書記職務），在農場純利得到應得的報酬，這些純利，一部份由現金付給，一部份以農場產品付給，但除此以外，農民還可以自己有自己的住宅，自己有一個花園，他可以在花園中種植蔬菜或畜養豬兔和家禽，他還可以把花園中的產品（如蔬菜、雞蛋、鷄和其他）在自由市場販賣，他可以以把產品帶到最近的城市，賣給城裏的人，而不經過政府開辦的商店，農民可以自闢花園，並出售產品的權利是政府在一般農民都贊同集體農場後對農民所作的一種讓步。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一般蘇維埃公民有權可以自置私人財產（雖然不能作為私人投資），至少在理論上是如此的，這種情形和其他國家人民置有私人財產的權利並沒有什麼多大的不同。

## 十、什麼是第四個五年計劃？

美國人所驚異的事，不僅是蘇聯的一切資源都由國家控制，同時還注意到蘇維埃政府預先計劃各種資源的發展，不像美國像私人組織去設計，蘇維埃領袖們從一九二八年起就推行了一套五年計劃，依據所訂計劃，由一個國家機關規定經濟、工業、農業、運輸、對外和國外貿易，科學研究以及教育各方面在預定的五年期內所要達成的目標，隨而擬訂詳盡的規程推進各部門生產的發展，另一方面還定期檢查已有的進展，為要能求詳盡，每一工廠機關和國營或集體農場或許有一個五年計劃，當局希望各單位能完成所訂的計劃，假如有超過計劃規定的成就，那就更合理想，最初三個五年計劃的主要目標，是使蘇聯追上並超過主要資本主義

國家在工業生產方面的成就。

史達林元帥在一九三八年後舉行的首次全國選舉前夕，也就是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發表演說，他說蘇聯早期幾個五年計劃的成就使蘇聯由於共產黨有警覺性的不斷努力而獲得軍事勝利，他在綜述前幾個五年計劃的成就後，宣佈蘇聯現要開始執行第四個五年計劃，這個計劃有兩大主要目標。其一，軍事準備抵制「獨佔資本主義」的可能重又發動的侵略，其二、經濟建設，以達到擴充消費品出產的目的。

### 建設和平準備

據蘇聯發言人說，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〇年的工業生產，將較戰前水準增加近百分之五十，以「保證軍工業和鐵路運輸的復興和發展。」。製造消費品的的農工業也要擴展，「以保證蘇聯人民的物質福利，並增加國內主要消費品大量生產。國民經濟各方面的技術進步將予鼓勵，使它作為「有力提高生產和勞工生產力的先決條件」。當局還要致力增加「社會積蓄資本的數量，並準備用於復興發展國民經濟的集中投資資本」達到二千五百萬萬盧布的數額，此外，並確保開辦價值二千三百四十萬萬盧布的已恢復和新創立的企業，蘇維埃政府在一九四六年五月簽訂蘇聯人民以一個月的薪資投入二百萬萬盧布的建設公債或（三十七萬萬七千四百萬元），政府不付利息，而以獎券的形式撥付巨額獎金，這種辦法是蘇聯當局向建設途徑進取的一個步驟。同時政府允諾人民麵包、麵粉、穀物和通心麵的定量分配，將在一九四六年取消，其他各種物品的定量分配，也將在一九四六年或最遲到一九四七年加以廢止。

蘇聯改善生產狀況的主要障礙是恢復德軍佔領區域被破壞城村、工業、運輸、農業和文化機關的工作，

假如蘇聯政府可以從美國得到大量貸款或信用購買迫切需要的工具，機械和製造品，這個工作就可能大見減輕，德國投降後近一年期內，華盛頓和莫斯科會不斷進行協商，在這段期間傳說蘇聯要求六十萬萬元貸款。美國答應貸以十萬萬元，美蘇協商假如得不到實際結果，蘇聯的另一條路將是從其他方面獲得她建設所需的物品，一個可能的來源將是德國工業，德國工業已降至平時標準，但自然是配合着蘇聯和歐洲其他比較落後國家的需要，另外一個來源將是和蘇聯鄰國以及和西歐先進工業國家的各方面以貨易貨的貿易制度，這在本書後一部份將予提到。

不論蘇維埃政府要採取那一條途徑，牠終因控制全國經濟而居於計劃並節制進出口的地位，我們知道蘇聯的進出口是由蘇維埃政府完全獨佔的。蘇聯現在要走那一條路呢？趨向日益增強的民族主義還是趨向國際合作？

## 十一、蘇聯是民族主義國家嗎？

要說蘇聯入民是民族主義者是難說的，因為我們看到在蘇聯邊境以內居住的各民族，就德國人所認為他們是一個國家的那種意義說，還沒有併合成為一個國家。我們可以較正確一點說，蘇聯人民在拿破崙和希特勒入侵的極大危急關頭，由於強烈的國家意識和抵禦侵略者以保衛祖國的熱望而聯合一致。同時他們感到生活在一個國際社會之中，他們雖想在大國際社會中生活，但同時却懷疑外方世界對於蘇聯的用心，蘇聯對其他國家的好奇以及對外國人的不信，使她的人民有史以來就一再動搖於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之間，這也和

美國過去時要孤立時而主張和他國貿易合作一樣。

### 一國建設社會主義

蘇聯從一個極端轉移到另一個極端的趨向在過去廿五年中非常顯著，在國外寄居多年的列寧和托洛斯基受了西方思想勢力的影響，他們在蘇聯奪得大權後，對世界革命問題反而比對蘇聯國內問題更爲注意，相反地，史達林和他們的同志在一九一七年前却和西方國家沒有接觸，他們最關切的是蘇聯內部情勢，史達林在巴伐利亞，匈牙利和中國初起的革命運動如列寧所證明是「錯誤的開始」時，提出了「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口號，他認爲蘇聯可以拿她本身爲例，向世界說明社會主義是可以實行的，這樣可以比自己的力量和資源從事推進托洛斯基和他的同志所稱的「永久革命」要有力得多，列寧在一九二三年逝世，在一九二七年經過很多猛烈衝突後，史達林趕走了托洛斯基，將他放逐國外，托洛斯基流亡到墨西哥，一九四〇年被刺身死，一九二七年以後，蘇維埃的領袖們日益強調蘇聯國家的國家性，而不怎麼着重她領導世界革命的國際地位，所以說的是「國民祖國」，而不是革命初期所倡一切工人「社會主義者祖國的論調，他們形容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偉大的愛國戰爭」。

戲劇電影和書籍爲要配合上述的新趨向，也拿俄國的國民英雄做主題，如彼得大帝，十八世紀末葉在義大利身先士卒和拿破崙搏戰的蘇摩羅夫元帥，抵制拿破崙保衛莫斯科并反對亞歷山大一世使用俄國武力在外交戰計劃的庫杜索夫元帥，和在十三世紀拉多加湖一戰擊敗條頓族入侵，成名的尼維斯基太子。特別着重點因而是蘇聯國家的發展，蘇聯的歷史家已不再致力特別強調布爾希維克革命是超過本國歷史事實的一個特殊

事件。相反地，他們還把希爾布維克革命和俄國抵制外國侵略的歷史奮鬥（包括條頓武士，拿破崙或希特勒的侵略）密切地聯繫在一起。

### 新國際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維埃政府有在國際社會中樹立新的和雙重地位的顯明趨勢，蘇聯一面表示決心參加聯合國和其他國際機構的活動，居於和其他大國一律平等的地位，在另一方面她在聯合國集會中，又時時表示有意担任附屬區域和世界「被壓迫者」的代言人。蘇聯這種新國際主義使美國英國感到困惑，他們認為蘇聯的新國際主義是莫斯科對英美與附屬人民（尤其是殖民地）關係的一種干涉。然而就一種意義說，蘇聯批評西方國家殖民政策，却有建設性的作用。蘇聯的行動有如牛蠅，刺激其他大國，迅速致力改革，要不是這樣，其他大國的行動或不會像這樣敏捷。蘇聯在對外關係方面，假如準備和其他大國合作，促進人類的福利，而不只是指示出她們的失敗和錯誤，東西兩方圓滿合作的大路將藉此暢開，為國際社會的福利有所貢獻。

## 十二、蘇聯是帝國主義國家嗎？

然而就是蘇聯對於國際社會發生興趣，有許多人也會問蘇聯的政策主要說來不是帝國主義政策嗎？全世界的共產黨發言人們很多年來就認為蘇聯和英國法國德國美國和日本這幾個「帝國主義」國家不同，她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對於她的鄰國沒有野心，也不向她接界的一些所謂落後國家要求什麼特殊權利。共產黨

人還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直接結果，因為一旦資本主義工業家耗盡了他們自己國內市場的購買力後，就注定會彼此發生爭鬥，一心想在世界各落後區域控制商場和原料，這個爭取經濟帝國的爭鬥導引出續發的戰爭，據共產黨人的意見消除資本主義將可消除帝國主義，國際衝突也可隨此消除。

根據這種理論，列寧在一九一七年當權後，就代表蘇聯否認帝俄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內所訂規定，她可以合併某些領土的全部祕約以及帝俄所締結保證她可以在鄰近的落後國家（如伊朗和中國）獲得特權的一切條約，列寧認為蘇聯應診和西方國家的政策和他們對殖民地的帝國主義控制脫離，也應診和亞洲近東中東較不進步的人民建立平等關係，並担任他們反對帝國主義的代言人。列寧的反帝國主義政策那時沒有得到西方強國的讚譽，她們認為蘇聯的放棄特權（如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對於「西方」國家的聯合陣綫是一種危險的破壞，遲早會促使殖民地要求英國法國和其他國家作相同的讓步，美國和英國有許多人在一九一七年會對列寧的反對俄國帝國主義加以批評，他們如今又批評史達林執行他們認為是帝國主義的政策，看起來這似乎是矛盾的。

### 什麼是帝國主義

講到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首先問問自己，我們所說的帝國主義含義是什麼？主要地說，帝國主義這一個字是指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落後國家間所存在的一種關係，一天有發展和落後的國家，這種關係就隨之存在。

帝國主義並不常需採取軍事控制落後國家或財政剝削落後國家資源這種形式。這種形式的帝國主義是由於英國、法國、美國、德國和日本的經驗而給人以熟識的印象。先進的國家也可以借用思想的力量操縱落後

區域的發展，蘇聯在兩次大戰期間，加諸中國、外蒙、伊朗和阿富汗的就是這種努力，這些經濟落後的區域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落在蘇聯後面，和西方世界相差的程度用不着說了。蘇聯已經有太大的土地，太多的人口和極其富饒的天然資源，因此遠不像德國、日本或義大利那樣過份熱中於以帝國主義的手段擴充領土，她也不像不列顛帝國黃金時代或今天的美國那樣擁有資本向落後區域投資，但這不是說在領土和經濟情況都不如蘇聯的那些國家的共產黨政權也得採取，上述的行動方針。舉例說，德國的共產黨政權是否不像納粹政權的那樣具有帝國主義性，也只有等待事實的證明。

蘇聯在兩次大戰開期內所履行的步驟，是不以資本而以思想投注鄰近的落後國家。這只是部份由於宣傳的結果，更重要的是蘇聯的榜樣如史達林所預料，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已使伊朗、中國甚至遠如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落後人民感到深刻的印象，他們今天所臨的階段有如一九一七年的俄國，他們懷疑蘇聯的先例對他們將無裨益嗎？大部份這些人民並不是想受制於蘇聯，或甚至想身歷蘇維埃政府所加諸蘇聯人民的那種艱辛和犧牲，但不管對還是錯，他們中間有很多人已對西方列強的若干行動，感到失望，他們認為從蘇聯的經驗可以得到寶貴的教訓。

帝國主義的形式很多，不能像共產黨發言人所說只須譴責牠或藉消滅資本主義，就可以送牠的命，牠只有在落後國家工業進步，不像過去那樣寄賴列強的善意，財政協助或軍事協助時，才將逐漸消逝，要達到這個目的最有希望的途徑是通過舊金山憲章所規定的托管制度，在附屬區域的行政管治方面擴大聯合國的聲威力量。



## 自衛領土

蘇聯雖顯然不需要其他領土，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內和戰後，依據需要改進防務抵抗德日侵略的理由佔領了其他國家的土地，蘇聯依據這個理由取走了波蘭東部，佔領了愛沙尼亞，拉特維亞和立陶宛，並向芬蘭發動戰爭，我們看到東部波蘭，波羅的海國家和比薩拉比亞（這些區域雖歷時不同，但却曾一度是帝俄版圖的一部）都又併入蘇聯，此外還有芬蘭割讓的基地。

德國入侵蘇聯指陳蘇聯方面憑藉上述行動，已建立了一個抵制預期德國侵略的防禦區，作為實際的防預佈署，這是蘇聯本身的眼光，但這自然不能使波蘭人，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和芬蘭人沒有問題地接受蘇聯的統治，但假如接受蘇聯方面為了本身防禦而取得鄰近土地的論點，這就難於拒絕德日兩國的說法，德國說她的侵入波蘭，只是採取抵制蘇聯的自衛步驟，日本說她為了打破所謂西方列強的「包圍」，而有攻入泰國和菲律賓的必要，弱小和工業落後國家的地位將不能由辯論德蘇自衛相制說法的對還是錯，而得到改進，可悲的事實是在目前的國際情況下，弱國注定要毀於強鄰之間，如同在兩塊磨石之間磨碾一樣，她們所謂的獨立成為緊急時期的神話，這些國家保有若干國家自主能力的唯一希望是在聯合國組織中接受相互合作，她們在聯合國組織中，也和大國一樣，要犧牲一些本身的絕對主權，但將因此而確保了政治安全，經濟穩定，並可能對想壓迫她們的強鄰發出不平之鳴。

## 尋求「友好政府」

蘇聯不僅取回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失的領土，那時在伯萊斯特里多夫斯克不得已而接受德國嚴格和

約條款，蘇聯還致力要在接壤各國建立「友好」蘇聯國家和蘇維埃制度的政府，假如我們憶及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九年的二十年間，從波羅的海到黑海和蘇聯結壤各國政府（除了顯著的捷克）視蘇聯或蘇維埃制度，或對蘇聯和蘇維埃制度都無好感，這應該是不能使我們感到驚異的。波蘭比蘇德基元帥主持的政府，羅馬尼亞加洛爾王政府，南斯拉夫亞歷山大王政府，保加利亞鮑利基王政府和希臘麥塔薩斯總理主持的政府都恐懼蘇聯的勢力，並致力消除存本國的共產主義。

這不是說蘇聯今天想在沿邊界各地建立完全由共產黨人組織的政府。相反地，克姆林宮由於牠在芬蘭的經驗（出乎蘇聯意料，一九三九年芬蘭的共產運動證明是薄弱無力的）知道蘇聯的方案對於歷史經驗不同的其他國家可能無法適用，然而蘇聯所做的是協助一切鄰國內願意和蘇聯合作，以抵制反對合作者的團體，蘇聯這種政策受到美英兩國很多批評，最近如一九四六年美國會想利用她的政治和經濟力量在阿根廷助建一個比裴倫政府對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利益更有益的政府，但這個努力沒有能够得到成功。

我們必須記得大國會一再企圖影響一些國家的內政，這些國家在地形上和大國接近，并因戰略或經濟原因和大國發生關係，這就是我們所說大國「勢力範圍」，拉丁美洲一直被認為是美國的勢力範圍，門羅主義想把拉丁美洲事實上劃為一個獨佔的區域，地中海和近東中東的若干區域，也被一直認為是英國的勢力範圍，因此我們看到蘇聯現在她由於安全或經濟利益原因而認為對她特別有關的區域裏擴展勢力，并不感到驚奇。

史達林的這種政策的確是一九一七年列寧的政策倒轉，我們可以全然了解托洛斯基的同志為什麼認為

蘇聯的回到帝俄目標是違背列甫的理想。我們更難見到擁有殖民地 and 勢力範圍區域的其他大國將怎樣能夠對蘇聯的同樣利益要求提出有力的批評，只有在西方列強放棄一切帝國主義（不僅殖民地，還有爲求原料（如油）發展的片面讓步以及其他利益），對付蘇聯的帝國主義才能有一個堅強的立腳點。

### 十三、一九三九年前蘇聯的外交政策是怎樣的？

假如我們要了解蘇聯的外交政策，上面所述各點必須記在心頭，假如我們要依據對於現實的認識而不依據對於未來的盲目恐懼，發展一個自己具有建設性的政策，就必須要了解蘇聯的外交政策。

我們在分析蘇聯外交政策時，必須首先認清蘇維埃政府的決策受有帝俄時代決策因素的同樣影響，蘇維埃領袖們所建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和沙皇政府的制度雖大有不同，然而蘇聯的地境問題自一九一七年來並沒有什麼重大的變動，雖然有空戰的發展和原子彈的發明，今天也如沙皇時代一樣，蘇聯是一個爲地和冰所封鎖的大陸，可能受到西方以德國爲基地的陸上大軍攻擊，東方以中國東北諸省北部爲基地的陸上大軍攻擊，同時還可能受到敵對國家在冰島等地所建基地發動的空襲以及黑海和波羅的海方面的海軍攻擊，蘇聯沒有現代化海軍，她在黑海和波羅的海方面尤其脆弱。

廿五年來蘇聯所集力注意的是極其複雜的內部問題。她致力避免戰爭，尤其是兩面作戰，這樣就說明了蘇聯爲什麼從一個極端轉到另一個極端，從在日內瓦致力和西方列強合作贊同集體安全，轉到在這些努力分別在阿比西尼亞，中國東北和蘇台德區顯明失敗了而和德國締結不侵犯協定，從一九三九年締結不侵犯協定

，到一九四一年被德侵略而對德作戰，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〇年和日本發生邊疆衝突，則在德國入侵前夕和日本在一九四一年締結蘇日中立條約，最後又在德國投降前不久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宣佈廢棄蘇日中立條約，短期參加盟國對日作戰，接着佔據中國東北部，我們如不了解本段最先提及的原因，對於蘇聯這種時而變化的行動，是沒有辦法加以解釋的。

#### 國家政策，不是馬克思政策

要了解蘇聯的外交政策，我們必須知道，一般說來，史達林政府在國際方面所採取的行動不是依據馬克思主義，而是依據蘇聯的國家利益，史達林的主要目的是使蘇聯在軍事和工業方面不依賴他國，同時保護蘇聯國家安全，不受外來攻擊。前蘇聯外長李維諾夫在日內瓦國聯一再強調蘇聯需要和平時，有些人認為他胸無誠意，因為蘇聯同時在訓練大軍，並製造大量軍用物資，結果，她的軍隊和軍用物資遠比外國觀察家所預料的強大衆多，但史達林和李維諾夫的希望維持和平是相當具有誠意的，因為他們相信蘇聯需要沒有戰爭威脅的悠長時期，以完成「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他們也和英國，法國和美國的領袖們一樣，料錯了一點，他們認為可以避免和德國決戰。

#### 十四、蘇聯今天的外交政策是怎樣的？

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是一個戰勝國家，她的外交政策含性是怎樣的呢？下面的三點我們可以認為是蘇聯在國際方面所採行動的原則：

第一、蘇聯沒有疑問是一大強國，事實上，在德日義三國戰敗和英法實力轉弱後，蘇聯和美國是今天世界僅有的兩個頂強大國，蘇聯在國際問題上居於這種地位並不是新奇的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俄國後才開始注意到俄國的人認為她是二等國家，但自彼得大帝時代以後的二百年期內，歐亞兩洲發生的任一重要事件都有俄國參加，因此我們必須準備看到蘇聯要求參與國際會議今後所將採取的一切決議。

第二、我們已經看到蘇聯決心要恢復一九一七年前帝俄所有的一切領土和特權，直到現在，除去主要顯著的羅塞尼亞（這一省份居民以說烏克蘭話的人民為主，蘇聯在一九四五年得自捷克），一九三九年以後，蘇聯所合併的一切土地都一度隸屬帝俄版圖，蘇維埃政府沒有取回芬蘭的意圖，她只向芬蘭索取位於芬蘭灣的一個基地和北極洋方面的一個不結冰的貝沙摩港，蘇聯並致力恢復帝俄前在伊朗北部和中國東北北部所有的特權。

我們將記得蘇聯久已和英國競爭，爭取對伊即（那時叫波斯）的控制。一九〇七年訂約後，衝突暫時終止，依據那個條約，伊朗北部被劃為俄國的勢力範圍區，伊朗南部被劃為英國勢力範圍區，中間是中立區域，列寧廢棄帝俄政府所締結的一切條約時，他在一九二一年和伊朗締約的條約中，特別指出蘇聯讓還伊朗的特權，永不能給予任何其他國家，我們必須記及英國不像蘇聯，她那時並沒有放棄她在伊朗的勢力範圍，而且還繼續發展英伊石油公司所有的油田，蘇聯現在依據一九四六年四月和伊朗締結的條約又大量得到帝俄在一九一七年前所享有的同樣權利，蘇聯和英國在戰時都駐軍伊朗，但超過一九四二年英蘇伊條約規定的撤軍期限，遲遲不撤離伊朗，蘇聯現在還打算建立有如英伊石油組織的蘇伊石油公司。

在中國東北北部，蘇聯也恢復了帝俄在廿世紀初葉所獲有的許多特殊利益，上述的特殊利益有些因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俄國失利而喪失，其他也在一九三一年日本佔據中國東三省後轉爲他人所有，史達林在一九四五年二月雅爾達會議時所提恢復蘇聯在華地位以爲蘇聯參加對日作戰條件的計劃獲得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的贊同，蘇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廿六日和中國締結條約，由此在中國東北北部和大連旅順兩港獲得特殊權利，這兩個海港使蘇聯在太平洋方面獲有不結冰的出口，蘇聯同時還經劃定暫時負責管治朝鮮北部（俄國在帝俄時代會想在韓北獲一立足點），南部由美國負責管治。

蘇聯也和沙皇政府一樣，現正竭力想控制韃靼呢爾海峽，這是黑海的門戶，但這不是新的要求，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裏，俄國爲要控制海峽，會和土耳其交戰過十一次，有幾回似乎快要達到了她的目標，舉例說，一八七七年到一八七八年的俄土戰爭就是這樣的。但每次戰起，歐洲的兩大海軍強國英國和法國總是單獨或聯合地協助奧曼帝國保有這條備具大戰略性的水道，奧托曼帝國崩潰後，新土耳其又受到同樣的協助，蘇聯意圖控制多瑙河也不是一個完全全新的發展，她在過去會是國際管治那條重要河流的一員。

第三、我們可能假定蘇聯在積極自認是一大強國之餘，她將基於和英美地位平等的基礎，要求擁有強大國家的一切必需條件，假如我們和英國表示關切蘇聯鄰邦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內政，蘇聯就認爲她當然也可以關切希臘或拉丁美洲的事務，假如英國擬訂一個義大利非洲殖民地的管治計劃，她本身在這個管制計劃中可能佔據優勢地位，蘇聯就會說「我也要」，並要求聯合國托管的黎波里唐尼亞，當美國表示要擁有單獨控制太平洋日本島嶼的權利時，蘇聯也將以千島羣島爲要求對象，千島羣島一度爲日本所有，距西伯利亞大

陸很近。

這種相互提出要求的對峙情勢，可以無盡止的發展下去，這對世界和平是很危險的，阻止這種發展的唯一的是一條簡單但很基本的途徑，換句話說就是美國和英國停止要求戰略根據地和其他特殊利益，我們採取貸款，救濟等等步驟已經對其他國家給以很大的幫助，但在我們為未來擬訂的政治和軍事計劃中，我們必須堅決主張我們自己的行動和其他強大國家的行動（不僅是蘇聯一國）應諺和聯合國憲章的原則符合一致。

### 十五、蘇聯的歐洲目標何在？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更明晰地看到蘇聯對今日世界中她最關切的區域所抱持的具體目標，有些人說，蘇聯要企圖統治整個大陸，從維斯杜拉到大西洋，假如這是說蘇聯要統治歐洲，或甚至這就是蘇聯的野心；這將也和拿破崙或希特勒的較小野心一樣，同樣不能實現。蘇聯尤其感到困難的是對西歐更先進國家加以統治，依據西方標準，蘇聯在政治和經濟方面仍然是落後的。

#### 歐洲協調？

然而左翼集團取得政權並建立類同蘇聯的制度是可能的，在這些左翼集團中，共產黨人可能居於領導地位，如若歐洲仍然面臨嚴重的經濟問題，並仍因國內或國與國間的政治衝突而分裂不合，上述可能性將要大見增強，政治安全和經濟繁榮一旦恢復，溫和的社會主義政權很可能在整個大陸穩定建立，包括德國在內，因此，蘇聯歐洲勢力的擴展程度將大部份決定於其他強國的政策，最重要的是美國，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在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提出建議，主張四強爲解除列強軍備締結歷時二十五年的同盟，假如美國依據貝爾納斯國務卿的建議放棄他以前退出歐洲大陸的政策，而決定積極參與歐洲建設，美蘇兩國長期合作是有出路的，否則危機依然，蘇聯可能藉同情的共產黨政權，對於歐洲加以決定性的控制或者歐洲就將在德國劃一道分界線，分裂爲兩大陣營。

### 蘇聯在東歐的經濟利益

假如四強循貝爾納斯國務卿的建議，同意歐洲新協調，我們也得必須預料蘇聯將繼續在西疆接壤的各國獲有特殊利益，蘇聯的外交政策中防禦德國的安全考慮雖不再像以前是那裏一個重要因素，但互利和經濟利益的聯繫，將仍會使上述若干國家投入蘇聯懷抱，東歐和巴爾幹許多國家遲到現在才獲獨立，有些竟遲到一九一九年。大部份這些國家都是經濟不健全，我們知道民主性的政治組織不能產生於貧困和社會失調的難境，這個區域的國家通常依賴德國供給工具和製造物品。

德國一些工業已被破壞，其他工業也被盟國加以控制，在這種情形下，這些國家必須尋求新的供應來源，他們自然最願意向美國購買迫切需要的工具和產品。但他們缺少外匯，除非我們準備購買她們的出口品（如羅馬尼亞的小麥和油，保加利亞的烟草，南斯拉夫的銅和煤）她們就不能得到美金，我們自然可以給她們貸款和信用，如同我們對於所提供的那種建議，但除非我們的市場接受她們的出口品，她們將不能償還貸款，這樣我們將指責她們沒有信用了，英國需要從東歐和巴爾幹得到食糧和原料，但在英國工業不再感到戰時困難以前，她將不能以東歐和巴爾幹國家所需的機械，工具和製造品依照她們所能付得起的價格賣給她們。



## 以貨易貨的貿易組織

因此這些國家如純因需要而和蘇聯經濟發生關係，實可說是意料中事，蘇聯也不能以她本身建設所迫切需要的製成品即時供給東歐和巴爾幹國家，但蘇維埃非府擬訂了一種經濟計劃，這對於她的鄰國是可能有相當協助的蘇聯通過貿易條約的系統，發展多方面的以貨易貨貿易，舉列說，波蘭可以從蘇聯中部亞洲獲得棉花，將棉花製成紡織品後運往瑞士等歐洲工業先進國家，由此從瑞士得到精確儀器，錶和其他製成品，她自已保留一部份，而以其他一部份運到蘇聯作為對蘇聯所供棉花的償付。

美國已對這種以貨易貨貿易組織提出抗議，美國認為蘇聯現正單獨霸佔多瑙河區域的經濟權利，一方面并重申她傳統的「門戶開放」政策，華府為支持美國立場，表示現正計劃藉由擬議中的國際貿易組織鼓勵自由世界貿易。然而假如我們是現實的，我們就必須知道至少這將需長時期使我們調整稅則，由此而具體促進自由世界貿易，同時我們不能預期面臨破產和飢饉厄運的各國可以等待美國國會採取行動。

這不是說東歐和巴爾幹國家希望單獨和蘇聯結合或走入共產之路，瑞士自然是不願這樣做的，她們所以如此，是她們必須努力求生，假如我們打算參與東歐和巴爾幹的發展（過去我們在各區的貿易是沒有什麼重要的）我們可能考慮一下和英蘇兩國共同合作的可能性，在這種合作下，美國將供給資本和工業專家，英國和蘇聯將供給該區產品的銷售市場，蘇聯可能供給棉花和煤等若干原料，英國可以供給一些技術協助。然而發展東歐和巴爾幹的共同計劃需要美國承認今後必須貸款，對於有關人民的福利寄以相當注視而不完全着眼於財政的利息，同時需要蘇聯認同政治自由將可協助經濟進展，而不致阻礙經濟進展。

## 十六、蘇聯在中東的目的

中東方面，自十九世紀以還，俄國就和英國爭求勢力的拓展。英國主要關切的是保護咽喉接英倫三島和遠東通過地中海的英國生命線，維護對印度的統治以及海軍對伊朗和伊拉克產油的需要，另一方面，蘇聯所主要關切的是巴庫油田的安全（巴庫距伊朗邊疆只有幾百英里），從伊朗續獲石油利益并獲得通達波斯灣的出口。

從英國的觀點看，俄國在帝俄時代和蘇聯在蘇維埃政府時期，在中東方面的活動具有陰險的企圖，英國認為蘇聯在印度和阿刺伯方面有秘密動機，決心要將英國逐出東地中海和中東，近東或如英國外相貝文在一九四五年所說要切斷不列顛帝國的咽喉，蘇聯也同樣認為英國企圖阻止蘇聯勢力在鄰近各國擴展。蘇聯提出英國依照一九三五年的條約，在埃及享有特殊地位，該約准許英國駐軍埃及及英國控制國聯委治地勢重要的巴力斯坦，英國和伊拉克（一度是英國委任統治地）和外約旦（也是委任統治地，最近經倫敦允許獨立）有密切關係，英國曾鼓勵阿刺伯國家和土耳其合作，這在莫斯科看來，無異是阻止蘇聯控制韃靼尼爾海峽。

## 衝突焦點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聯和英國在中東方面的衝突（存在已近一世紀）更形尖銳，英國藉美國的支特，反對蘇軍違背一九四二年英蘇伊三國條約規定，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二日以後仍不撤離伊朗北部，然而英美雖然反對，蘇聯却和伊朗締結了一項協定，規定蘇聯在伊朗北部擁有石油利益，而在達成目的後，在一九

西六年五月九日將駐軍撤出伊朗，倫敦和華盛頓方面關於蘇軍長駐伊朗的批評無疑影響到英國撤離駐敘利亞和黎巴嫩軍隊以及和開羅協商將英軍全部撤離埃及的決心。

除去伊朗，蘇聯和英國不和的一個重要焦點，乃是深受猶太人和阿剌伯人相互攻訐影響而分裂的巴力斯坦，蘇維埃政府迄今對於猶太民族主義並沒有表示過同情，不過常常批評到英國在衆認爲猶太人之家的巴力斯坦對待猶太人的手段。由於蘇聯的態度和英美調查委員會在一九四五年五月所提十萬猶太人應即時獲准從歐洲遷入巴力斯坦的建議，阿剌伯人已開始尋求蘇聯的奧援，在過去阿剌伯人一向是站在英國一邊的。但阿剌伯統治者們必然注意到蘇聯的干涉自將影響到他們中封建勢力，巴力斯坦是一個歷史戰場，這個區域的危險均勢不僅對英蘇關係注定有深遠影響，而且還影響到美蘇關係，美國已逐漸關切到中東，這一部份是因為她自己要是在伊朗和沙特阿剌伯尋求新的石油資源，一部份是因為她關切到歐洲猶太人民的困境。

中東國家大部份經濟落後，仍然受制於寡頭政治，絲毫也沒有受到西方國家政治民主和社會福利觀念的影響，中東區域前途的最佳希望，不是任一強國的控制，這只有導引無限限制的衝突，而是在聯合國指導下，蘇英美三國的共同管治，以求井然發展中東資源，由此不僅有如過去裨益外國投資者和阿剌伯統治者，而且還促進當地人民的福利。

## 十七、蘇聯的亞洲目標

蘇聯在過去在歐洲方面和法國、英國、奧匈和德國爭取勢力，在中東方面和英國相互爭權，但在亞洲方

面，她的主要對手却是美國，美國所以關切亞洲，主要因為亞洲為我們的出口提供市場，我們的傳教士要改進亞洲人民（尤其是中國人民）的福利，自一九四一年後更關切到太平洋區域的軍事安全，因為這個區域受到軍國主義日本的威脅，蘇聯遠在美國以前，就震驚於日本軍國主義的成長，曾致力保證她在亞洲的安全以求不受日本在亞洲大陸的侵略，從中國（特別是中國東北）獲得鐵路和貿易讓步，并在太平洋方面獲得不結冰的海港。

從美國的觀點看，沙皇在帝俄時代以及蘇聯在蘇維埃政府時期，在中國東北所進行的經濟擴展，似乎威脅到美國在該區的貿易機會，在這方面，美國想以「門戶開放」政策予以保護，最近美國已關切到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合作的可能性，美國一方面決欲保持客觀態度，一方面支持着蘇美兩國所承認在蔣主席領導下的國民政府，蘇聯恐懼美國（當前的代表是麥克阿瑟元帥，有如過去一度代表美國西奧多·羅斯福）可能利用日本來約束蘇聯在亞洲的抱負，日本投降後美國代表盟國單獨控制日本，在這方面不能使蘇聯放心無慮。

亞洲的主要困難有如東歐和中東的主要困難一樣，乃是這個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區域（人口衆多，資源剛在開採）仍然是落後之區，居民在各方面依賴着先進的西方國家。未來假如要避免列強間的邪惡戰爭，亞洲國家本身的內戰和反抗殖民地統治的民族叛亂，三強必須要在聯合國指導下執行共同計劃，以保證亞洲人民生活穩定，并可獲得相當程度的入類福利，否則，刺激這些人民叛亂以反抗西方對於蘇聯是有利的，法國為越南，荷蘭為東印度，以及英國為印、緬所擬定的計劃，都是殖民國家和殖民地間關係進展的新界石，然而沒有一個國家單獨可以促進亞洲區域的重大發展，假如三強本身之間不能商獲同意，個別的行動將促成亞洲

（尤其是中國）現有的分裂狀態，又由內戰而擴大裂痕，這種危機，將因三強之不能合作而經常存在。

## 十八、美蘇關係如何？

美蘇接觸大約有兩世紀之久，在這兩世紀中，兩國關係一般說來是友好的，兩國彼此從沒有以戰爭相威脅，凱塞琳大帝時代的俄國不反對少年美利堅共和國的興起，儘管傑斐遜和裴恩的主義對絕對帝制展開了直接的攻擊，相反的，凱塞琳大帝國為懷恨英國稱霸海洋，所以並不討厭美國革命，減弱了英國擴展的力量，拿破崙戰爭後，俄國亞歷山大一世積極致力造成歐洲協調的局面，隨以最後形成阻止歐洲國家（尤其是西班牙）革命運動的神聖同盟，美國在這時開始恐懼俄國和她的友邦可能想對西半球加以干涉，阻止在拉丁美洲說西班牙話的國家裏建立共和國，美國門羅總統就在這時宣佈一種主義，這種主義以後就以門羅主義知名，門羅總統宣佈主義旨在阻止歐洲強國干涉美洲。

### 美國對俄情緒的起落

然而美國在一八五六年克里米亞戰爭時，却同情俄國，那時英國法國，土耳其和沙丁尼亞圍攻着黑海之畔的塞把斯托波，英國對於美國內戰同情南部諸洲，俄國却不這樣，反而正式支持林肯維繫聯邦的努力，美國黑奴的解放和俄國農奴的解放正是同時。

後來許多美國人覺得沙皇的專制，不是他們所喜歡的，時時震驚於沙皇的壓制政策，尤其是反猶的殘殺，二十世紀初葉俄國對遠東的關切更使美國感到不安，害怕俄國可能阻止美國對中國廣大市場的貿易，那時

沙皇政府從中國得到在中國東北部的特權，一九〇四年日本對俄國發動對旅順港的突襲（正如日本後來偷襲珍珠港），美國同情日本一方，西奧多羅斯福說日本是打我們的仗，然而，美國因震驚於東京勝利的勢如破竹，而表示願作調人，兩個交戰國因為都疲於作戰，而在一九〇五年在新漢壽州的樸茨茅斯簽訂和約，這個和約有力減弱了俄國在亞洲的勢力，而加強了日本在亞洲的力量，日本在那時是英國的盟邦。

### 干涉和不來往

一九一七年美國參加對同盟國（德國、奧、匈和土耳其）作戰，那時的俄國剛經過三月革命，沙皇政府被推翻了。

瀕臨於退出衝突的階段，蘇維埃政府在一九一八年布爾希維克領導發動十一月革命後，和德國簽訂了伯萊斯特里多夫斯克和約，同時，威爾遜總統由於對於布爾希維克的過份行動悶鬱，落漠地同意了最高作戰會議所商協約國對俄干涉的決議。協約國干涉的明顯目的是重建對德陣線，然而實際上若干協約國會多方助白俄軍隊支持他們在俄國北部南部和西伯利亞所謂「紅俄」作戰，美國最感不安的是七萬日軍參加協約國的干涉，日軍佔領了西伯利亞大陸，經過華盛頓方面一再抗議後，才在一九二二年退出該區，雖然蘇維埃領袖們知道威爾遜總統遠不像其他協約國領袖（尤其是邱吉爾）那樣熱衷於干涉俄國並支持反布爾希維克軍隊，但他們仍然認為美國是蘇維埃政府的可能對敵。

### 承認和貿易

羅斯福總統在一九三三年就任新職後，所採的初步步驟之一是邀請蘇聯派遣一位代表到美國來協商兩國

間的主要問題。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後任蘇聯駐美大使）李維諾夫隨後就應美國的邀請前來白宮進行協商。美國在十六年美蘇兩不往還後，承認了蘇維埃政府，蘇聯也允諾不干涉美國的內政，但在兩年後蘇聯被指責違背了上述諾言，因為美國共產黨人在一九三五年第三國際大會中（最後舉行的一次）提出了闡明美國近況的報告。兩國并規定程序便利蘇美貿易的發展，美國商人因為世界不景氣使外國對美貨購買力大見降低，都歡迎獲得有機會，將機械、工具、汽車裝備和其他產品賣給蘇聯，莫斯科也邀請許多美國技術人員到蘇聯去協助發展現代工業，古柏是應邀者之一，他的公司給蘇聯建築了丹尼伯羅斯卓耶水堤。

### 戰時關係

一九四一年德軍入侵蘇聯，六個月後，日本突襲美國，這兩大國家不是自擇而是純因需要地爲了共同目標，并肩前赴，和共同的敵人作戰，美國配合英國的協助以大量的軍事裝備和食糧運到蘇聯，蘇聯在一九四三年六月在法國開闢了第二戰場以前，必須在陸上支撐單獨和德軍作戰的任務，除了英國，蘇聯所獲的美國租借物資最多，美國飛機、坦克、軍車，食糧和其他供應品價值共達九十五萬萬元，或全部租借物資出口的百分之二十九，這些供應在蘇軍大捷中具有重要作用。

美國很願意蘇聯參加盟方共同對德作戰，我們羨佩蘇聯人民的勇敢和決斷，以致虛飾了瞭解蘇聯者所熟悉若干方面的蘇聯生活，誇張地爲蘇聯渲染，這種毫無保留的欽慕在戰爭結束階段證明是對自己不利的，因爲在戰爭結束期間，美國民意又同樣毫無保留地轉入譴責蘇聯的另一極端，然而羅斯福總統和他的顧問們覺得在德國戰敗後，必須獲得蘇聯的支持進行攻擊日本島嶼的戰爭，這個戰爭在使用原子彈以前，預期是耗時

而慘烈的戰役，在克里米亞會議中，史達林同意依據如我們所知的條件（即蘇聯應在中國東北部重獲帝俄一度享有的權益）參加遠東戰爭，以後的戰事發展是廣島長崎被投原子彈後，戰爭結束得遠比華盛頓和倫敦的預料為快，日本在蘇軍攻入中國東北後一個星期就要求准許他無條件投降了。

### 蘇聯的戰後恐懼

日本投降以後，一般人民原對蘇聯所懷的空前友好情感迅速低落，懷疑蘇維埃政府的誠意和最後目的。八一天比一天多，美國人最為困擾的是蘇聯違背一九四二年所訂外國軍隊撤離伊朗的條約，蘇軍繼續佔領東歐和巴爾幹國家，莫斯科致力在上述國家中建立「友好」蘇聯的政府，并發展以貿易協定的組織，據聞中國東北的蘇軍願意要中國共產黨軍隊接防而不願讓中國政府軍隊接防，蘇軍并拆卸中國東北境內工廠的裝備，以及蘇聯所提出的各種其他要求。許多方面認為蘇美之戰必難避免，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既獲知製造原子彈的祕密，就應診現在乘早在蘇聯科學家發現原子彈祕密前，對蘇聯使用原子彈，同時我們（還有英國和加拿大）雖然握有這種祕密，蘇聯人士却不因此而比戰前對美國減少懷疑，我們對冰島和亞速爾的基地要求（這很難被認為是目的在抵制德國以策安全）在莫斯科看來是「帝國主義包圍」蘇聯的新企圖。

相互猜懼和不信任的氛圍對於美蘇友好關係的發展是毫無裨益的，兩國交戰只有導引世界在兩次環球大戰中所沒有經歷過的更大災難，調協這世界僅餘兩大最強國家的利益有任何希望嗎？有人相信，有希望在聯合國組織中獲得行動的共同立場，另有八認為這將沒有可能，理由是蘇維埃政府在國際革命和國際合作兩者之間仍然偏愛前者。



## 十九、蘇聯放棄了世界革命嗎？

肯定答覆這個問題是很冒險的，西方國家中有些人非常相信世界革命仍然是蘇維埃領袖們的目標，他們認為史達林只爲迫不及待的任務先如「一個建設社會主義」，後如保衛蘇聯抵制德國侵略而將世界革命的目標暫時擱置一下，現在戰爭結束了，他現在又在促動世界革命，這次的目標是反對美國和英國的「獨佔資本主義」，他們爲了證明自己的觀點，還指出莫斯科和其他國家共產黨沒有受到一九四三年第三國際的正式解散的影響而依然保持着密切關係。

### 什麼是第三國際？

我們將憶及在一九一九年（蘇維埃政府在蘇聯建立後兩年）列寧在莫斯科建立了第三國際總部，那時莫斯科已代替了聖彼得堡，後改稱列寧格勒）爲蘇聯首都。共產國際的被稱爲第三國際是因爲以前已有兩個其他的工人國際組織。第一國際由馬克思的合作者恩格斯在一八六四年建立，第二國際成立於於一八八九年，總部設於比利時京城布魯塞爾。

第三國際由五十八國的共產黨代表聯合組成，理論上，蘇聯共產黨只是第三國際中五十八國共產黨的一份子，但事實上，蘇聯共產黨從一九一九年成立第三國際時起就在第三國際中居於領導地位，這一部份是因爲第三國際的總部設在莫斯科，但最重要的理由是蘇聯共產黨是自一九一九年後唯一能在一個大國中建立並保持政治控制的共產黨，據第三國際的方案，牠宣佈的目標是藉武力和暴力以世界共產主義制度代替世界資

本主義經濟。

改訂目錄

識 蘇 聯

列寧和他的同志們緊在一九一九年第三國際成立後，就利用第三國際通過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和共產黨同情者傳播他們的理想，希望促成有如布爾希維克革命的革命運動，一九二八年後，第三國際已大大失去了牠的世界革命先鋒的重要性，顯然成爲發揚史達林主義的工具，和史達林主義對立的有托洛資基的更極端意見，莫斯科指斥他是左翼反對派的領袖，此外還有雷柯夫和湯姆斯基的更溫和意見，莫斯科又指斥他們是右翼反對派的領袖，就這種意義說，第三國際已成爲史達林和他的同志意見的錄音板和蘇聯共產黨（分爲史達林主義者，托洛資基主義者和其他派系）本身黨爭的配景，在這方面，全世界的共產黨也是追步後塵。

一九三八年慕尼黑協定使德國獲得蘇台德區後，全世界共產黨跟着蘇聯指斥英法的「綏靖」政策，一九三九年八月，他們也支持史達林和希特勒簽訂互不侵犯協定的決議，希特勒在以前是被認是共產主義和蘇聯的頭號敵人的，共產黨人的這種態度使他們在戰後受到日本國內的批評。

第二次世界大戰進行後的一年半期內，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人遵照蘇聯共產黨的新「方針」不對德國攻擊，而和外國的納粹團體相當合作，同時，他們猛烈譴責英法發動「帝國主義」戰爭，但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二日德軍侵入蘇聯後，全世界的共產黨又改變了他們的「方針」，因爲蘇聯所需要的是和英美合作，一致和希特勒作戰，蘇聯既已對德作戰，並從西方國家獲得大量協助，莫斯科乃不再需要上面所說的各國共產黨的支持，因此全世界人看到史達林在一九四三年六月十日宣佈解散第三國際。

## 共產黨人的戰後勢力

同時在作戰期內，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人由於若干原因得到了顯著的收獲，第一，在希特勒侵略的大多數歐洲國家和日本所侵略的亞洲區域，共產黨人因爲一向是組成很好的政治團體而在一九四一年後的抗敵運動中居於重要地位，他們有時出生入死進行破壞的危險活動，第二，隨戰後而來的飢餓，不安和失望使許多以前反對急烈主義（甚至反對基本改革）的人投入共產主義，把它當做一條活路，最重要的是蘇聯拉德的英勇和勝利鬥爭在國外予人以深刻印象，並使蘇維埃制度的批評者深信莫斯科政府已成功建立了一個可以勝過工業先進德國的強大軍事和工業力量。成功是勝過一切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許多人相信蘇聯仍是西方世界的一次威脅，但很少人認爲蘇聯的制度是沒有效率的。

自德國投降後，歐洲從法國到匈牙利，從德國到南斯拉夫的共產黨都在擬訂政府政策方面獲得發言權，事實上歐洲大陸的任一戰後內閣都有共產黨人擔任閣員，通常担任重要職位，有些部門的職務是異常棘手的，如內政和教育，糧食和工業建設。這種發展有兩種重要結果，第一，共產黨人參加戰後政府後，自然肩負了他們以前處於反對地位時所沒有負過的責任，第二，每一共產黨的政策相當受了本國民族願望的影響，舉例說，義大利共產黨人，托格里艾第像大多數義大利人一樣，反對南斯拉夫共產黨人狄托元帥對里雅斯德和威尼齊亞吉歐利亞的要求，法國共產黨領袖杜克洛斯也像戴高樂將軍一樣，支持法國要求國際管制魯爾區，然而這是德國共產黨人所反對的，共產黨人在歐洲獲得更多的責任和勢力，也就更無意在國際問題方面建立共同國際陣線，但列寧曾一度想望過，想藉成立第三國際而建立那條一條國際陣綫，今後隨時光的

轉移，各國共產黨的工作將可能於外交政策方面反映傳統的國家分歧，並將不再是蘇聯的協助力量。

然而，西方國家有很多入害怕就是在那種情勢下，蘇聯的威脅將代替德國的威脅，世界將只有從煎鍋跳進熊火。誠然，蘇聯今天發揮着強大勢力，特別是在沒有蘇聯軍派駐防的國家裏是如此，蘇聯將利用她的勢力以毀滅西方文明的制度嗎？蘇聯或將證明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可以安然「并存」嗎？這些問題的回答將決定於西方強國和蘇聯間可能建立的合作關係以及聯合國組織可能提供給世界的經濟和社會建設計劃的遠大目光。

### 蘇聯將和聯合國合作嗎？

我們回答這一個問題必須首先了解今後要想如協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那樣排斥蘇聯參加國際事務將不可能。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時協約國非常恐懼共產主義，以致想使蘇聯與世界其他國家斷絕往還，使她處於孤立地位，蘇聯本身因為害怕「資本主義」國家將要致力推翻「世界上的第一個工人共和國」也加強了本身的孤立，這是由於她不斷批評「布爾喬亞」的制度和行動，並抱持世界革命的主張。

### 蘇聯的領導地位

今天我們必須承認蘇聯是一大強國，在戰後建設方面，必然要居於重要地位，蘇維埃領袖們經常強調需要改造經濟和社會環境，以及改善一般人民的境遇，他們同時更支持殖民地人民的獨立要求，熟悉蘇聯情形的人都不會說蘇維埃政府已就牠所催促西方強國政府給予殖民地的生活標準和政治自由，給予蘇聯人民以同樣權利的保證，然而莫斯科對落後區域社會進步需要的強調已使蘇聯在國際會議中居於領導地位，現在蘇聯

已毫無孤立的意思，她決心要獲取她新獲地位的全部利益，這一點將證明是具有重要性的，因為現在日益明顯聯合國所必將關切的不僅是政治疆界，或甚至是市場原料和殖民地問題，她尤其還要顧及改進入類福利的任務，這在國際關係方面是常常被疏忽遺忘的一點。

### 轉變中的列強

然而許多八國蘇聯是否誠心想和聯合國組織合作。這個問題的唯一公正回答方式是說在這方面蘇聯自己認為是和美國同樣誠懇的，我們現在是處於轉變階段，這時一切國家都表示相信聯合國組織是國家安全的保障，但在軍備，戰略基地和取得原料各方面仍繼續採取具有國家性的措置，在這方面要證明蘇聯的行動和英美極不相同，是為難的，（雖然蘇聯的發展確比西方強國落後約五十年，有時她的言行似乎完全是我們在十九世紀的舊作風，但在二十世紀的今天我們認為不再適宜的。）

### 聯合國的否決權問題

舉例說，關於蘇聯堅持在聯合國憲章中加以否決權一點，已經是一般熱烈討論的問題，一般認為蘇聯這種堅持又適是證明了蘇維埃政府的極權獨裁的性質，事實是美國代表團在舊金山會議中也和蘇聯代表團一樣，同樣決心要使五強（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擁有否決權，這是因為顧及到要不是這樣，美國參議院將會拒絕批准聯合國憲章。我們和蘇聯不同的一點是我們認為在討論爭端時不應使用否決權，只有在執行行動時才可使用，而蘇聯認為就是在討論爭端時也得使用否決權。

美蘇兩國之間的另一相異處是我們說國院平等是指大小國家的法律（雖然不是實際的）平等，因此堅認

伊朗（這是舉一個例）應該有權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提出她對蘇聯的控訴，蘇聯方面則認為平等是指列強大國的平等，五強假如不能一致，聯合國組織就將證明不能有效行動，蘇聯辯論說，列強在贏取戰爭中担任重大責任，因此也應該擁有特殊權力用以確保和平的取得，安全理事會會議中的有資格觀察家們感到蘇聯對於當前局勢的看法也和我們一樣的懇切。

同時，蘇聯由於她的政治獨裁制度和統制的輿論，如若准許國際監督她國內的行動誠然比美國更會感到困難。蘇聯就是主要由於這個原因而對參加國際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以及國際民用航空機構表示消極，因為依據規定建立這些機構的協定，蘇維埃政府將得准許其他國家對她的貨幣，教育和航空設施作某種程度的調查，然而這並不如初次見及那樣令人驚異。在美國我們自由和其他國家共悉情報，就是在美國這樣一個國家，若干軍事領袖也認為應該阻止國際監察我們原子彈的製造。不僅蘇聯，就是先進的西方強國也得走一段長路，才能使大家爲了整個國際社會的福利，而對國家絕對主權觀念的增長限制相互協調。我們共同前赴的最佳途徑，是通過聯合國組織，尤其是通過聯合國組織的各技術機構，負責處理關係一切人民經濟和社會問題的技術機構。

### 歧異可能克服

蘇聯和西方國家在理論和實際兩方面都存在有深深的歧異，如要否認這一點，將是一大錯誤，但是我們必須記住西方的經濟和社會制度已因兩次世界大戰和不景氣而改變，這不是因爲共產黨宣傳而改變，而是爲要適應世界和平的新環境而改變。

同時，我們必須記及蘇維埃制度，本身並不是穩定的。蘇聯也深受到戰爭的影響。蘇聯人民和其他國家接觸後已知道他們的生活標準遠比鄰國爲低，現正不斷籲請政府給以遲遲不能實現的安適享受，這些享受是只有平時工業才能供給的，依賴有力消除手段對政治反對者的壓制，以及早一代（急進的布爾希維克主義者和急進的反布爾希維克主義者）的消失，已促成蘇維埃社會基本特點的廣大協調。這種基本協調在有利環境下，可能有助於政治自由的成長，雖然蘇聯和世界許多其他國家可能永遠不會不折不扣地發展我們在西方世界所熟悉的那種政治制度。

假如蘇聯能够基於平等基礎自由參加國際社會生活，那麼消除蘇聯和西方世界歧異將可更迅速地實現，蘇聯既不是毫無保留的批評者所形容的那種恐怖威脅，也不是無條件羨慕者所描寫的那種烏托邦希望。美國和蘇聯政府和人民在對於兩國命運都很嚴重的時期所能爲商獲協議而作的任何努力，都將有於增益強聯合國組織，並改善消除戰爭原因的希望。（譯自美國外交政策協會一九四六年八月份出版小冊）

# 怎樣瞭解蘇聯

賽珍珠女士

要使和平在世界上成爲可能，美國人可以作些什麼呢？我們究竟是否還能有任何作爲呢？無論我們做了一些什麼，戰爭是否不可避免的呢？

這就是這些天來懸在所有我們的心上的問題——我說所有的我們是指那些真正需要和平的人們，因爲我們並不拿戰爭當作一種享受，對於上面問題的答覆是明顯的，即和平是可能的，假若我們願意首先尋出製造戰爭的原因是什麼，我們能够充份隨願的阻止戰爭，假若我們願意就我們所知道的來實行，戰爭絕不是不可避免的。

就美國人而論，目前走向戰爭趨勢的原因，是由於我們不能瞭解其他民族之所以那樣作爲的原因何在。現在所說的「其他民族」意義，已經主要的限於蘇聯民族。但這不過就目前而論。使得蘇聯目前如此行動的同樣原因也存於中國及印度，他們也在其他各處存在——例如巴爾幹及希臘。不過因爲蘇聯、印度、與中國地區如此廣大，特別顯得重要。

蘇聯目前的所作所爲，當然不是我們所喜歡的。但爲了我們自己以及爲了世界和平起見，我們必須要設法明瞭他們爲什麼要如此作爲，然後我們才能真正對付他們。

關於蘇聯問題已經寫有很多的書，每一本書在它本身方面也都有那有一點兒貢獻。但假若不是由於我曾在中國



過了許多年，即自一九一一年第一次革命到一九二七年第二次革命中間的那些年，以及從那以後我又看到了知識份子和軍人所組織的政府，想要統治一個龐大農民生衆的那些年月，我自己是不會瞭解蘇聯目前何以會如此的。這種知識份子和軍人所組織的政府，在精神上並不接近於知識份子，而倒是接近於舊日的皇帝的。

在知識份子們還未驅逐沙皇以前，我也在俄國住過好些年。那時我還是一個年輕的小女孩。但是就在那時，我也能看到俄國也像中國一樣，農民羣衆同樣受着富人和知識份子的壓迫，悲慘的貧困和無知，迷信宗教，一切毫無希望。但他們都是良好的老百姓，慈愛而堅強努力工作，希望過一種較好的生活。

結果俄國怎樣了呢？有一羣知識份子再也不能忍受他們周圍這樣的生活，他們計劃革命。他們不是僅爲他們自己而革命，他們是要解除政府的壓迫。他們的確想給人民以更好的生活，於是他們自己就奪過政府來，殺掉沙皇以及壓迫他們的人，建立起一個他們認爲是謀人民福利的政府。

然而，爲什麼目前的共產黨政府却成了俄國空前的最具有壓迫性的政府了呢？在美國人看來，蘇聯人民顯然是不自由的。他們服從共產黨的新的壓迫有兩個理由：假若在戰爭的時候，可以把蘇聯建立起來對抗侵略；假若在平時的時候，可以把蘇聯建設得工業化起來。大約共產黨官員們自己都相信他們目前的所作所爲，都是爲了人民的好處。

他們支配着這樣一個嚴厲而殘暴的政府，爲什麼還能使他們相信這是爲了他們人民的利益呢？這從知識份子的心裏是可以尋得解答的。他們總認爲他們可以看到那些未受訓練的人所不能看到的東西。他們計劃，他們又依照着實行。

推動知識份子的原動力和精神，至少在開始的時候差不多總是正當的。他是真正希望使得人民自由的。但當知識份子們一旦當權之後，他就成了最殘暴的人。

爲什麼？因爲他雖然愛那些人民，但他爲他們的落後而感到羞恥，爲他們改變的遲緩而感到憤怒。當俄國農民不喜歡新的方式時，俄國的知識份子竟憤怒到把幾百萬的不願意的農民和小的手工業工人都殺掉了。他們希望他們脫離舊的生活窠臼，好使新的工作迅速進行，即使得蘇聯成爲一個整潔，現代化，講究衛生，順利進行一切的國家，一個知識份子可以在現代化的世界上驕傲的國家。他們要在一天之中能有一世紀的跳躍。

蘇聯知識份子之所以怨恨美國的主要原因，是他們不能使得他們的人民迅速的達到可以與我們相比的有利的地位，要瞭解這一點，你必須要想到美國某些從未進過大學的做父母的人民。他們很驕傲的把他們的孩子們送去受教育，而這些年輕的人民回來的時候，却責罵這個古老的家庭和古老的人。但我們却不可苛責這些年輕人民太嚴厲了，——因爲他們也確乎是愛他們父母的。也就由於這種對於父母的愛，才使得他們這樣的粗暴和苛刻。他們一想到他們的父母是落後而舊式的，他們就不能忍受。他們要他們的父母改變，要他們父母成爲他們所夢想的那種樣子。這在家庭裏是多麼大的一種愁苦啊！

這種同樣的情形，我在中國也看得太多了！年輕的人民被送到外國去留學，他們看到了現代化的國家——美國、法國、英國等。他們回國以後，對於他們自己的家庭和人民感到着羞恥了。他們感覺羞恥是因爲這裏沒有現代化的建築，幾乎毫無暖氣冷氣的裝置，毫無衛生的知識。對於幾世紀以來的緩慢的生長認爲毫無

價值。他們殊不知假若沒有遭受革命的悲劇的和難以補救的損失，善的東西是不會進步到新的東西的。

在中國和印度，將來有一天我們會看到知識份子們要把這些國家澈底毀掉重新建設一個新的，也像俄國知識份子那樣的破壞俄國一樣，這是完全可能的。

假若我們明瞭了革命的心裏背景，那裏蘇聯目前的孤立狀態就很容易解釋了。在情緒上都是非常年輕的共產黨們，絕不願意隣居們看到他們古老的冢是多麼樣骯髒。傢具是多麼樣的過時，以及家庭裏的人是多麼愚昧無知。假若蘇聯的知識份子們能使那些貧窮，古老的農民和普通的人都現代化，假若蘇聯目前平均每個公民都能受很好的教育，過很好的生活，像美國平均每個公民那樣，假若蘇聯的鐵路和旅館也能像我們同樣的好——我敢斷定蘇聯所有的門戶必會開放，美蘇兩國間也必能有最誠懇的關係。但那些身為共產黨的蘇聯的知識份子們，由於對於他們人民的羞恥性的愛，使他把他的人民對我隱藏起來，除非到了他們能以他們的方式和他們的理由而對我們驕傲的時候。

當然，這都是不好而且不必要的。當然，假若我們能有一半的機會，我們是會瞭解的。當然，他們已經替他們自己定下了一件不可能的工作。任何人都不能在一代的時間中把蘇聯掃除一新。但是知識份子們是最不實際的人物，是最有理想最有精力的人物。他不願意給任何人們以時間——甚至對他自己也不願意給以時間的餘裕。

他常常夢想一個好的世界，一個完美的世界，但他毫不知道他是不能把人民當做機器來使用，就可達到這種目的的。知識份子在追求高級的創造性思想的過程中，以致損失了仁愛，這是人類中最大的悲劇。因為

我們還需要我們的知識份子——我們需要他們的先見和他們清晰的思想與計劃。但知識份子們絕不應准其組織政府。假若他們一旦當政的話，他們就會像目前在蘇聯所幹的那樣壓制人民毫不留情，假若他們在中國和印度抓到權力的話，也將要這樣幹的。

那麼假若我們要致力於和平，能够做些什麼事呢？蘇聯人民目前的苦況也許就是中國和印度人民今後數年中的苦況。若果僅將我們的國力浪費在準備戰爭上，這不僅是不夠，而且也是愚蠢的技術。出自我們方面的戰爭的威脅，正是蘇聯知識份子們所需要的武器。就由於德國進攻的威脅，才使得蘇聯那些可憐無知的農民們。去忍受由知識份子們所設計的五年計劃的奴役的。只有對於新的侵略的恐懼，目前再加上一個可怕的武器，才能刺激蘇聯人民作重新振作的努力。

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呢？用常識來回答是很簡單的。「除了用戰爭相威脅以外，什麼事都可以」。我們要想抵制共產主義，首先就不要談論對蘇戰爭的事。美國人只要一談論到對蘇戰爭，就不啻是把一支槍交給了共產黨。因為他們可以藉此向人民呼喊了：「你看，我說美國人是要和我們戰爭的，不假吧」？

第二、對於住在這裏的蘇聯人民，我們應該依照常情與他們相處。最近華盛頓某學校的會堂裏，有一位蘇聯人演講時，美入竟加以噓聲的污辱，這實在是美入極行的極點，令每一個知禮的美入感到羞恥的。這些污辱的每一個字，一定都聽到共產黨的耳朵裏去，而給他們以充份的幫助。

還有另一個真實的故事——我也替它感到羞恥。上週紐約的某一公共圖書館裏，樓上一位男人把一本書掉下來，這本書剛好打在一個女人的頭上，男人就連忙跑下樓來道歉辯解，但這女人極爲憤怒，她拒絕辯解

，大聲的對他吼道：「你是共產黨嗎？我看你準是共產黨無疑！共產黨是慣會鬼鬼祟祟，從背後打你一下的！」不斷的發生這一類的事，實在是危險的，因為他們可以把新的力量提供給共產黨，好使他們掌握着已經疲倦的蘇聯人民。

我們能够而且應該保持一種美國人的絕對堅定的立場。我絕不信仰姑息政策。但我絕不願意做那種共產黨所需要我們做的事，說那種共產黨所希望我們說的話，來幫助共產黨。

由於我們的無知，我們順口濫作反蘇的談話，就正犯了這種錯誤，我們所應該作的事，是使得生活的必需品都能普及到世界上所有的民族。

顯然的，假若只讓美國人單獨的來幹，這種工作未免太艱巨了。縱然在那些我們在政治上想起影響作用的國家裏，假若要想每個人都能吃飽，我們也會破產的。我們還必須明瞭，縱然給以救濟和金錢，像我們已經幹過及正計劃想幹的，我們也算幫助了共產黨。

我們是正把救濟和金錢給予那些人們和集團，他們雖在政治上是反共的，但却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壓迫人民。假若我們對於這些壓迫者給以支持，那麼那些我們真想爭取的人民會反而跑到共產黨方面去的。蘇聯過去所發生的，也將在別處發生，而且在中國就已經發生。我們盡把一些幫助給予那些毫未替人民幹過任何事業的古老腐化的政府，那些飢餓受苦憤怒的人民是不會安心的。目前我們在世界上面對的是一個入類的問題，並不是一個政治的問題。我們對於人民是應該給以服務的，那裏有希望在引導着他，他就會到那裏去，縱然這是一個假的希望。

目前獲得和平唯一可行的道路，是對於人民生存所必需的少數幾種基本的供應，能够成立全世界的管理機關；這些供應的需要如糧食、公共衛生、房屋、教育——技術及農業的教育——工業等。

全世界上本有足供每個人享用的充足的糧食，而且在任何地方都還可以較現在生產得更多。所缺乏的是一個進行分配的健全而簡單的管理的機構。但這種分配，必須在聯合國之下進行——不是用救濟或慈善的形式，因為這種形式極不合適，而且在給者與受者方面都有極不好的心理上的影響；而是應該採用拍賣剩餘物資的方式，或售現款或賒欠，但出售與否不是依照最高的出價者來決定，而是依照最感需要的人民來決定。

那麼美國人應做些什麼工作呢？顯然的，我們的工作應該是發動這些世界的管理機關，並且支持這些世界的管理機關。這不是指着世界政府而言。我們所需要的只是對於基本商品的管理機構，並不需要一個世界政府。這些管理機構應該在工作上合作，但在責任上應該分開。

我們美國人為什麼偏要去負那種不需要我們去負以及不應該單獨由我們去負的責任呢？這理由又是很簡單的。我們仍然還不能把世界當作整個的來看，我們仍然還沒有瞭解我們這個世界實在是一個很小的地方，小到不容許互作競爭的程度，我們是只應合作的。

但絕不要把合作與共產主義混為一談。合作是我們美國與邦之間充分發揮了的一種精神。除非我們能把握到這種事實，即世界是太小，小到除了用合作辦法，即就人類基本需要方面進行合作的辦法，已經不能再有其他方式，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是不能有和平的。

和平是可能的嗎？是可能的。

故。

那麼爲什麼我們還沒有和平呢？這因爲或者是出於無知，或者是出於故意，我們不向這方面努力的原故。

是否還能有容許阻止另一次世界大戰的時間呢？有的——但也只是稍縱即逝的了，而且只有我們從現在就開始努力才會有的。

（譯自「觀察雜誌」一九四七年八月號）

# 一九四六年的蘇聯

愛金生作

如欲與蘇聯政府建立切實可行的關係，我們先要放棄友誼觀念，友誼一詞有密切聯繫與政治讓步兩層意義，這對蘇聯是用不到的不可能，也辦不通的。俄國以「工具」二字來稱其政府，蘇維埃的政府工具實為一種政治的機械，人與人之間的友誼等關係，跟他距離得太遠了。

從大體說，俄國人民很值得欽佩，他們真誠懇實而勤於工作，你可以信任他們的力量才智與勇敢，然而我們與俄國人民之間却站着一個蘇聯政府。雖則冒用着「民主」的招牌，它實際是極權政府，所謂勞動階級獨裁，實際上是共產黨政治委員會十三個委員的獨裁而已。

蘇聯之內並無自由，但就我觀察所得，政府並非違反民意的，它也并非腐化的政府，並不以任何集團的私人利益置之於國家利益之前，雖也有內部的不安與不忠，例如最近處罰的工廠貪污案，以及克利米亞暨契真英格西共和國的反叛等，就我所得的印象，蘇聯人民大體都信任與尊重政府領袖的知慧與權力。正像美國或其他各國的人民那樣，蘇聯人民也得到了他們所應得的政府。

然而，蘇聯政府的性質，乃是傳導權力的一架機器，傳導到蘇聯範圍之內，以及其勢力所及的國外地方，任何國家如願以友誼跟它去相處，必敗無疑。我們雖非敵人，但亦非朋友，我們最大的希望不過數年的武裝和平而已。



凡是美國利益所繫的地方，應當於相對的方向，施以同樣的權力。以此處置國際關係，誠屬違反潮流的方法。但蘇聯政府的精神根本是反潮流的，我們從它對待戰敗國家以及紅軍在中國東北的行動都可以看出來，蘇政府習慣於用暴力施諸國內，於是本能地認為處置國外事務也要用暴力。

凡是看到蘇聯施展暴力的西洋人覺得它那股機械的力量摧毀了反對者，建立了政治的基礎而使人民就範，都有些震驚。它於服從與不服從之間絲毫沒有容忍的餘地。從西洋人對於民主一詞的意義說，沒有容忍就沒有友誼。

俄國人為何這樣的難於相處呢？這有許多理由。俄國領袖大都從敵意環境中，艱難革命而獲得了權位，所以他們仍舊信任一九一七年使他們成功的那種方法，這就是理由之一。帝俄時代也是一個專制而嚴刑峻法的國家，革命份子須在嚴密的紀律之下維持其組織，並且養成了祕密活動的精巧技術。嚴密紀律使他們獲得權位，於是他們相信現在發展權力亦必借助同樣的方法。

他們而且還相信一個不良的理論，認為目的可以使不正當的手段成爲止當。或許因爲這個原故，所以這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並未解放勞工的奴隸地位而把他們淪爲極權主義之下的奴隸，身心雙方都受壓迫。

革命的進行，借助於暗中計劃的戰略，以及隱瞞，祕密和暴力等手段。環境使革命的人，現在已不是破壞法律者而是創造法律者了。他們自可寬鬆一些，他們雖是如此做了，但有許多舊的傳統方法仍屬存在。他們仍用祕密來處理國事。蘇聯國民對於政府的時事，並不比外國人認識得更爲清楚。

有時他們知道得還不如外國人多，因為有些蘇聯國內所不知道的消息，却從外國的途徑透露到國外去。蘇維埃革命最激烈的時期雖已過去，而暴戾的手段仍還存在。無人知道現在有多少萬的政治犯在監獄裏或在流放中。據估計其數量之多，在一千萬至一千五百萬之間。蘇聯所需應付的內部危機與內部問題之多，絕非世界上任何政府所可比擬進行工業革命，同時還要顧到政治革命以及迅速有效的教育人民。

他們認為如欲渡過難關，處事必須祕密而迅速，到必要時則不惜運用暴力。這種心理，它自然也施諸附庸國家雖則附庸國家的人民比較地不習慣於受外國人的此種待遇。我們對蘇聯關係所接觸的對手，都是孕育於革命環境中的入物，有的是積極參與者，而沒有一個入不是革命的信徒。

觀夫蘇政府在其廣大國土內所獲成功，外國人就不難瞭蘇維埃領袖對於自身的安全，如何特別的警誡着，史達林是世界上保護得最周密的人。蘇聯人民和外僑必須隨時攜帶護照或身份證，這種證件是常常用得到的。我們認為戰時的安全措置，在蘇聯是平時的日常措置。你如果去參加紅場的一個紀念會，你得出示特別通行證及護照八次之多，每次都有八細細閱讀並對驗照片。

蘇聯內部發生的事情沒有一個外國人能澈底知道的。正像保爾，溫脫頓氏所說的那樣，大家對於蘇聯不過是大愚小慧，程度的差別而已。雖則傳說烏克蘭「某種方面」（這是蘇聯報紙所常用的名詞）有須加監視的不安現象，但據我所知，蘇聯並沒有積極而有組織的反政府行動。

所謂「某種方面」據說是戰時所付代價最高者，他們把自己所受的災害，歸罪於政府。赦得薩雄偉的共黨黨部去年十二月毀於焚燒，據猜想係出於故意的放大，烏克蘭有積極的反猶太運動。在俄國的其他部分回

教徒並非人人滿意中央政府的。但中央政府有力彈壓叛亂團體。就一個外國人的觀察蘇聯領袖的地位很強固，他們領導國民戰勝了效率很高的現代化的敵人，共產黨則自居勝利的全功，而對於盟國擊敗德國的供獻，往往加以或多或少抹殺，他們且自以為給了日本以最後致命的一擊。

人民對於生活艱苦雖有怨言，但似乎都信任他們的政府。但其性質還不到政治委員會委員們認為安全的程度。俄國是落後生活艱苦而組織鬆散的國家，其領袖急急欲其進步，自有許多不愉快的任務要履行，有許多沉重的工作負擔要去加在人民身上。他們無疑地覺得環境需要他們在上面有行動的自由，不受批評，不受反對及不受分析。他們的動機雖無可懷疑，可是手段則頗欠光明。其在國外的行為與國內者如出一轍，祇是在國外，他們沒有統制報紙及統制消極反對的方法來保護而已。

蘇聯領袖的愚昧亦為我們與之相處的困難之一。他們很少入出過國。經過了多年的隔離，以及對外的不愉快的經驗，他們對外國造成了一種猜疑的心理。蘇政府的精神是排外的。自從一九三六年的流血肅軍以來，對於外國人就有一種無明的恐怖，把他們都看作蘇聯的間諜和敵人。

對外國人發生關係或積極關切外國的事情，一概視之為不忠蘇聯，甚至領袖們亦不能例外。領袖們如果與外國人相處得很好，或是贊同外國的主張，乃是自取戾戾，他們或許在自己明白以前，早給送進監獄了。

甚至史達林，一般人認為他比較富於常識，但他也不懂自由與民主，加之他所受馬克思主義的訓練，使他憑着成見，以及蘇聯外交官等不完全的情報來判斷外國。

蘇聯領袖吃了他們對外隔閡的虧。他們雖能從國外得到大宗情報，但無分析經驗，一生都生活於鐵幕的

後面，他們不能以我們所認為正常的基礎，去應付外國問題或外國人，與外國人接觸既抱猜疑的心理，就產生了罪疚的幻覺。世界和平正在動蕩之中，因此發生了許多不必要的磨擦，這是最可痛心的事情。

去年十二月莫斯科會議之後，許多外國人都認為蘇聯的政治委員會會作深思熟慮的決策，恢復戰前狀態，把資本主義經濟的外國，看作必然的敵人。不論這種看法的正確性如何，顯然在蘇聯國內，由此可造成一種空氣，便於獨裁者的統治。人民如果相信，外界有組織地在迫害他們，則這種人民要容易治理得多。正像我們戰時經驗所告訴我們的那樣，人民如果覺得為救國而工作，那末工作成績一定要好些。

蘇聯的氣氛是反乎常態的。由於國內外文化交流諸多隔閡，因此蘇聯文化空氣已陷入停滯而不活潑的狀態，在檢查制度的鐵幕背後，人們對於謠言和事實在情緒上的反應是很神經質的。所發表的新聞報導往往距離時事背景甚遠，而且為欲適應特殊環境起見，不惜將事實加以杜撰或竄改，因此各種新聞一旦以真實的姿態暴露無遺時，人們往往為之震驚不已。

當邱吉爾在富爾登演說後若干天，蘇聯並未將其演辭予以披露，這也許是蘇聯領袖們蓄意將其祕而不宣。但後來終於在報上發表，同時附加了政治性的評論，莫斯科民衆驟悉之下，不勝震驚惶恐，似乎原子彈將於夜半以前向他們頭上拋擲一般。處於此種低氣壓之下，蘇聯人民的情緒激發是急遽，迅速，而且有些動盪不安。

經歷了二次世界大戰的我們，都深信唯有國際間的政治經濟合作始能避免戰禍，而莫斯科當局却以為世界性的思想文化聯繫亦極需要。其實莫斯科沒有新的思想，一切陳舊的思想渣滓經常地傳播着。各種報紙往

往在萬一天，以幾乎相同的筆調報導同一的新聞；除了若干鮮有的例外，各人所寫的東西簡直如出一轍，大都雷同。

蘇聯的傳統政策——將外人摒諸國境之外，使微倖潛入的外人孤立，限制其行動，檢查新聞，甚至禁止新聞的發表等等——無形中使其文化變成一無生氣，落伍，小布爾喬亞式，而且庸俗不堪。

我不大懂得科學，所以無法批評蘇聯的工業活動，但我深知蘇聯的醫藥極為落後。根據個人觀察所得，我覺得他們在戲劇、藝術和音樂方面的水準亦極低下，我想很多蘇聯作家，優伶，和音樂家們，也必有相同的感覺。總之，蘇聯藝術缺乏生氣和活力，可以說是一支復古的，奄奄一息的藝術末流。在政治統制的高壓底下，個人活動毫無發展餘地。

對於蘇聯藝術，寄以心嚮往之期望，似乎是很合邏輯的一件事。但依我看來，蘇聯藝術也和我們一樣的充滿着低級趣味的情調，他們從未產生過意味雋永的不朽作品。孤立主義和極權主義的雙管齊下已注定了新思想無法抬頭的命運。

在這種不正常的變態空氣中，蘇聯人民的集體神經錯亂，便發榮滋長了。而在我看來，蘇聯領袖們最顯著而激動的變態行為是普遍性的神經過敏。他們幻想着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敵對他們，而且他們是被周遭的敵人包圍着。當然，這是他們意欲對其它國家造成迷惑，輕蔑和敵對的不二法門。觀夫蘇聯的廣大的領土，強悍實力以及無窮盡的資源，這種恐懼心理是大可不必的，假使蓄意和蘇聯親善相處的外人並不像目前這樣遭遇困難的話。

講到國外威脅，具有完整經濟和原子彈的美國是最為舉足輕重的。但在國際方面若觀念和志趣有所差異，照蘇聯領袖們看來，便是對蘇聯的一種侵略性的敵對行爲，即在國內他們也是如此想法，任何蘇聯人民，若反對史太林的政策，他便是國家的敵人。

美國人大都以爲蘇聯領袖們是一羣熟練，精明和真實性的人物，他們都隨時警惕着他們的前程和目標。但我却懷疑他們是一羣俗不可耐的人物，在國內他們缺乏民主的經驗，而且都給國外的民主現狀所困惑而迷亂了。爲了最神聖的馬克思主義之故，在國內戕平了異己的思想以後，他們竟視別國的異己思想爲對蘇聯和其人民的叛逆不忠。在他們看來，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光輝燦爛的科學化思想，它已經把不合科學化的人類自然本性滌除清淨了。

蘇聯以社會主義國家的姿態，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力謀發展和擴張，這是維持國際間友好關係的重大障礙。依據共產黨方針，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若同樣霸持世界統治權，則蘇聯被侵略的危機永無消除的一天，換句話說，它的安全便無法獲得保障了。雖然，蘇聯在過去會和資本主義國家（當希特勒在西方作戰時的納粹德國亦已包括在內）維持過尙屬友好的關係。

但現在共產黨的方針已改變爲這一種理論：「壟斷資本」（蘇聯作家時常如此命名）是法西斯蒂的行徑，意欲維持法西斯蒂主義的中心勢力，而有毀滅社會主義的趨勢。

蘇聯報紙將美國描繪成一個強暴的帝國主義國家，專以向全世界擴充權勢和蹂躪弱小國家之主權爲能事。他們還說美國「壟斷資本家」威脅世界上愛好和平的人們。

當我在莫斯科逗留十月期間從未發現任何報章雜誌，發表過有關美國人具有優美性格之論調。英國也給描寫成一個災禍頻仍的國家，雖然社會主義已在英國、新西蘭或澳洲獲得了權勢，這事實足以說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間格格不入之情態業已瀰漫於世界每一角落。

當我在莫斯科完畢了遊歷的任務以後，我更深深地贊美西方典型的資本主義，因為它比社會主義更顧到人民，而且尊重個人的自由，確保個人自由爲此次戰爭之原因，而至今依然是世界體制中的最重要原則。照原理上講，社會主義爲達成此志願之合理途徑，而且照我們在英國看到的那樣，社會主義根本不一定要剝削入類的自由。

蘇聯包括很多民族，以它這樣一個廣博而特殊的國家，若欲求整個繁榮與進步，社會主義確乎是對症下藥的唯一制度，假使蘇聯的社會主義能與現行蘇聯極權主義有所迥異的話，則入人將密切加以注意，而希望蘇聯國內推行社會主義，能給世界上其餘國家的解決各種問題有所借鏡。

事實上任何有思想的入都重視社會主義，因爲不論社會主義在蘇聯有何成就，其對於世界各國的影響至大且鉅。各國人民都急切地期求合乎理想的某種經濟制度，他們對於蘇聯人民生活之窮困漠然無知，但深信蘇聯已實行了最理想的經濟制度。事實上，若以我們的民主主義標準比較起來，蘇聯根本沒有解決任何有關「自由」之問題。

對於崇拜社會主義理論的入們，蘇聯的警察組織非但迷惑而且恐怖。但依管見所及，社會主義本身並非蘇聯與英美不協調的癥結所在，若其餘各項事情協調一致，則英美可與蘇聯相處甚安，實非德蘇敵對情勢所

可比擬。

但此非蘇聯領袖們的出發點。他們以未來世界的主宰者自居。依照他們的意見，任何事情都以他們的意志為依歸，以共產主義為目標的蘇聯領袖們都把自己當作整個世界的原動力。他們深信正在波蘭和巴爾幹諸國行使神聖的任務，雖然各該國「未開化的」人民都報以驚人的抗拒。

在目前和英美政府進行外交折衝之際，蘇聯領袖並不確信其對象為「愛好和平的人民大眾」的真實代表。他們以為英美政府所加於其人民的是政治性的奸猾和「壟斷資本」的詭計。

蘇聯政府和共產黨（二者實為同一名稱）是否在英、美推動革命性的波蘭至今雖尚未能確定，但他們以資助並顧問法國共產黨的方法去干預法國之政治則為鐵一般的事實，他們以為社會主義是國際和平的最穩固因素，這是蘇聯在國際外交方面造成固執態度的唯一原因。在他們看來，反動份子意欲挽救行將覆亡的經濟組織，彼等任何背離蘇維埃政策之行為實為世界和平的威脅。

共產主義不僅是一種政治科學而是一種宗教，其推行受教義與理性的支配。信仰這種主義的人必須毫無保留地接受它。蘇聯對於外國人那種宗教式的歧視，是在國內苦心孤詣地培養起來的。每一個公共場所懸掛的列寧與史太林的照相，即是他們所崇拜的新上帝。

蘇聯的宣傳文字，充滿着宗教式的熱情、感謝、決心與犧牲等詞藻，莫斯科不僅是蘇俄的首都，同時是共產主義信仰者的聖城，列寧為父，史太林為子。表示這種宗教式信仰的通訊，占據了報紙的重要篇幅，它們莊嚴地宣稱，蘇聯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因為它有唯一的真理信仰，將來必定泛濫着無窮的愛與快樂。



當蘇聯代表與我們的代表，相晤於會議席間的時候，他們好像與異教的罪惡分子相周旋，欲得和洽，他們不能不犧牲一點神聖的教義。蘇俄人與不崇拜馬克思，列寧及史太林之所以不易商議出結果來，原因即在於此。

我們與蘇聯領袖，有一點是由衷地同意的，即維持和平全賴美蘇間的和平關係。觀夫蘇聯遭遇問題之多，以及瘡痍未復，倦於戰爭，他們是渴望和平的。戰爭的恐怖，他們比美國知道得更清楚。他們雖不十分推崇我們對於獲得勝利所貢獻的功績，但我們沒有理由抹殺他們的功勞與燦爛的作戰記錄，我們也不應忘記蘇聯人民所受的苦難。而且他們至今仍在苦難中。

然而，爲了儘量排除了必要的感情因素，我們對於蘇聯領袖，切不可認爲和平關係即等於友誼。美國人往往以爲世界其他各國的人民都信任我們。喜歡我們，羨慕我們，或許還想向我們借貸。

對於蘇聯領袖，最後一點或許是對的，他們想向我們借錢，以加速新五年計劃的進展。美國人或許以爲把錢借給蘇聯是友誼的姿態，蘇聯領袖却沒有這種感情的想法。

借款與英、中、法、波及別的國家之後，而不借給蘇聯，他們或許會解釋爲這是一種昏庸不負責任，隨便浪費，而由反動份子主政的國家，而認它爲敵意行動之一。將救濟物資運赴一個有排外政府的國家，這政府除了曲解美國人的急公好義之外，決無別的反應，住在德軍蹂躪區的蘇聯人民，渴欲援助，他們感銘地接受了我們的救濟。

但我們切不可希冀救濟物資稍能改變蘇聯政府嚴峻而若即若離的態度，事實上這種態度徒然使其人民斷

絕國外的援助，蘇聯的孤立主義，絕對不會因外國的慷慨救濟而徹底改觀，說句老實話，世界上任何有自尊心的入，都怨恨美國人這種神采奕奕的紳士儀態。

憑藉剩餘物資和舊衣服，美國決不能獲得友誼，而且也不能打破檢查制度的鐵石壁壘，更不能樹立二國間科學家、教授、藝術家與學生的自由交換，或者容許自由不羈的美國人入在蘇聯境內到處遊歷。

在我們看來，這些事情極爲正常，可以說是促成相互諒解的基本條件，但當蘇聯在特殊環境之下發展其社會主義之際，他們的處心積慮的政策是排除外國的勢力。

雖然蘇聯正在向全世界挑戰，但它絕無能力與世界上其它國家相競爭，也不容許其人民知道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民非但有個人自由，而且有更高的生活水準。假如其人民能與西方一般人民有自由的往來，則以「壟斷資本」壓榨工人的荒誕宣傳，不難煙消雲散。

縱令締造融洽關係的途中充滿着障礙和荆棘，也不管蘇聯會從聯合國會議場中再三悄然引退，事實上蘇聯並不希望在整個世界中失掉朋友，他們也不願蔑視世界公意，他們有時因國外的猛烈抨擊而大爲驚駭。

因在國內慣於專制性的警管統制，所以當波蘭和巴爾幹諸國較爲溫和的極權專政引起人民抗議的呼聲，以及英美人民對「壟斷資本」發出了正義的忿怒和咆哮時，蘇聯人民乃驚奇不止，國外一致的公意迫使蘇聯軍隊從伊朗退回來，雖然當時和目前我們都沒有具體的行動去制止蘇聯將伊朗歸入附庸國家的行列之內，蘇聯有軍隊和本能，可隨時將伊朗據爲己有，唯如此做法，全世界將一致與它敵對了。

去年秋天正常勝利之際，蘇聯對土耳其發動了神經戰，當時蘇聯和目前一樣，在土耳其鄰近駐有強大的

兵力，它可能藉軍事行動將土耳其從其統治者手中「解放」出來。但土耳其的神經殊為強固，國外輿論也蠢蠢欲動，同時美國也溫和地參加了神經戰，派遣一艘強力的戰鬥艦直駛土耳其，載着前土耳其大使的遺骸，作為一種緘默的啓示。

臆斷蘇聯已於其程序中劃掉了伊朗和土耳其，是最愚笨的想法，將來也許有一天，蘇聯政府為維持其聲望起見，付以相當代價，更或許因整個近東處於動盪不安的狀態而減低其應付的代價，但在目前，蘇聯不至於蔑視世界上其它國家的輿論和公意。

當我在莫斯科時，我時常在電文中拘謹地插入如下的譏嘲論調，以試驗檢查員之是否機警：「蘇聯外交政策是極合於人情的，蘇聯希冀和全世界維持友好的關係，並且到處無往而不利」檢查員往往敏感地刪除了這些惡作劇的字句，對於此種譏諷性的遊戲，他常常是最後的勝利者。

這些語句雖含有諷刺的意味，但其中蘊藏着無限的真理，「合理」抑或「悖理」這二個問題，對於極權政治無論何時何地都是不甚重要的。但目前蘇聯實不願波動國際漩渦，以爆發另外一次戰爭。

我曾提出在國際外交方面與蘇聯難以相處之原由，我們雖非朋友，但亦非仇敵，可是無論如何，當我們向世界上其它地方擴張權威時，美蘇二國實在是極不相容的競爭者，馬克斯主義根本是一種全盤性的世界計劃，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蘇聯領袖們對於美蘇間這種微妙的關係，當然看得很清楚，因此，同時我們也應透視全部底蘊而顧慮到將來，在我們的腦際應深深地刻劃着他們的觀點所在。

我們千萬不應由於蘇聯之落伍，及其生活水準之低下，而自感滿足，因為蘇聯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強大的

國家。它囊括廣闊的領土，形勢上掌握歐亞大陸的樞紐，它有富饒的物產，和比較無限制的入力。掌理極權政府的蘇聯領袖們，可使其入力（包括女人）獲致最大的效率，其工人的優異成績，也將與日俱增。

觀夫蘇聯人民的愛國與盡忠，大體說來，他們非但强悍，而且穩當，缺乏自由並不使他們感到痛苦，因為他們根本不明瞭西方民主國家的自由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依我個人信仰說來，自由較獨裁更有創造力，我想美國的顯赫戰績能證明此言之不謬，現在戰爭已過去了，我們不必一再為我們在戰場上和工廠中的功績而慶賀，但至少我們有此自信：一旦我們的自由遭受威脅，我們全國便能聯合起來向同一目標邁進。雖然我們的人力較蘇聯為小，但我們至今還是很強盛的。

我們也有富饒的物產，而我們的地理形勢也是很險要的，在國際競爭中，我們最大的資產是高度的工業技術能，以個人比較，美國人在工廠中和農場場上的生產力十分強盛，但在平時，由於其它人生事務之故，我們沒有最高的生產量，我們也無法保證人民獲得經濟上的穩固。

這是千真萬確的，雖然對於各項工作人民無自由選擇之權，而且每項職業都是粥少僧多，但在蘇聯境內從未發生過失業的現象，在和強有力的蘇聯競爭時，我們應保持至高無上的優越力量，我們應飛躍精進地增加生產，和提高生活水準。我們的基本問題是如何獲致最高額的生產量，但同時不能違背人權宣言，但試問如何始能謀大眾福利，而且同時不許剝削人民的自由？我，一個美國公民，實在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欲求答案，蘇聯的現狀足以說明一切。

在莫斯科逗留了十閱月之後，我於一月前沮喪地動身回國，由於個人經歷和觀察所得，我找不出和蘇聯

之間有誠懇而興奮的關係之存在，簡單地說，假使能和這些蘇聯人民友誼地往來，則情形將美滿些，這是多麼遺憾的一件事，

我與妻乘坐一架蘇聯飛機，從莫斯科一個優美的飛機場起飛，取道基輔，直飛敖得薩。該機系陶格拉斯式運輸機，適與許多美國人關於蘇聯飛行的報導相反，此次飛航意外地舒服，機師駕駛技術堪稱高明。我們和其他旅客談笑風生，他們相互間有一種溫暖的有似一家人的情感；後來似乎把我們也當爲他們的一家人了。

他們不時向我們略獻慇懃，情緒之中似乎表示我們雖不能參加他們的家庭，但我們並不是被排斥的，這些雖是不足道的小事情，但他們是我與政府官吏以外的蘇聯人民欣悅相處的寶貴經歷；這些小事情也證實了我們的信念：蘇聯人民是篤實而仁慈的。可是以整個國家言，我們美國還得在苦澀而緊張的氣氛中，和蘇聯周旋下去，這是一件憾事，或許也是一齣悲劇，但我們得如此做去，捨此實無其它途徑可循！

（譯自一九四六年八月五日生活雜誌）

## 蘇聯政治路線的復原

近來蘇聯有許多事情成爲世界各地紛紛推測的題目。政府官吏和工作人員大規模的腐化墮落已有發現。化界知名人士的令名也有被沾污的。這兩個現象是有着連帶的關係，都是由於大戰期中共產黨的紀律逐漸破壞的結果。農業和工業上的錯誤措施常常被忽視，甚至這些措施往往是黨裏面人員所縱容的。許多蘇聯著作的內容也逐漸減少共產意識的意味而黨方面也只好默認這樣。不過這種默許只是暫時的，因爲在一九四四年有許多跡象可以看出共產黨在要求更濃重的共產意識。在戰時緊急狀態結束以後共產黨的領導層轉移他們的注意力於內政上，新五年計劃上，以及鼓勵勸誘民衆以戰時同樣英勇的努力，在預定的時間內來完成復興的工作。這工作就在清算蘇維埃生活各部門——經濟界，智識界，藝術界——的資本主義時代的殘餘份子和西方布爾喬亞的虛偽觀念，並且更理想化蘇維埃生活到達一個空前未有的程度。許多黨的官吏被解除職務，並且建立一個新的黨紀機構——監察黨各機關的機構。

本文目的就是想說明蘇聯這個新運動的概略。

在一九四六年夏季的蘇聯報紙上可以看到許多不滿農工業各部門政府官吏的反蘇行動的控訴。這些行動多半是那些在農工業上高據要津，胆大妄爲的人所幹的營利舞弊的勾當。這些勾當只有在黨內份子故意熟視無睹或實際縱容的情形下方有可能的。這些情形在烏克蘭來得特別嚴重，那年夏天就有一個佔很大百分數的黨部人員被開革。由下面隨便舉出的幾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那些不正當行爲所包括的種類和範圍的複雜舉

廣闊了。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七日消息報上載有若干工廠經理和工會職員因為捏造工業生產報告而被解職。捏造報告原來是可以獲得一筆厚利的，因為發付紅利是根據所已完成的生產目標的百分數而定的。一個星期之後工會的報紙勞工報（*Trud*）有一篇長文說到重要的克力佛落（*Krivoy Rog*）鐵礦由於組織的惡劣努力的缺乏，設備條件的貧乏，和史泰哈諾夫運動的停滯，使那裏的生產非常微少，並且對於地方性的工會運動，也頗有微詞，指出工會委員會從沒有討論到勞動生產力問題。數天之後，（八月三十日）真理報也指出一般工業生產的遲緩是由於軸承工業不能供給其他工業以重要的東西，這對於農業也有相當的影響。到了九月一日真理報又載有十五萬四千噸的煤，因為那些有創造力而又直率煤礦主持入，由於使用炸藥於採煤試驗的失敗而完全浪費掉。假使這個試驗獲得成功的話，我們將會看到蘇聯採礦工程的又一次革新。可是由於沒有盡責去試驗，失敗實應歸咎於那些主持的人的。或者同樣可能的，失敗是由於他們為希圖高度生產以求分得巨額紅利，這種着眼於私人的利益造成了這個過失。

在一九四六年初夏就開始有農場狀況，並不甚佳的跡象。五月二十九日的消息報上載有北高加索的庫班（*Kuban*）區一六四個機器曳引機站中僅有二十二站可隨時備供收穫時的使用。七月份的真理報也提醒各方注意在底尼普伯吐甫斯基（*Dnepropetrovsk*）和克拉斯諾打（*Krasnodar*）疏忽了對穀物應有適當的貯藏和遮蓋的預防工作，說是這種疏忽就是一種反蘇行動。七月十七日的真理報又被披露了烏克蘭穀物輸繳法被破壞的消息。在敖德薩督就有許多農場偽造了已經輸送穀物交給政府的收據而事實上政府却並沒有掣給他們，這

一類事實的揭露，不過是八月份所發表的對於農業工作者，與行政人員一串更嚴重的告發的開始而已。我們在研究這些報告之前先看自戰爭結束以來蘇聯集體農場的情形，這樣也許更覺得有趣味些。

士兵的退伍歸田，固然減輕了勞力問題的嚴重性，並且使較大規模的收穫得到不少便利，至少在沒有被戰爭蹂躪的區域是這樣的。可是在戰時的一些不正常的措施也都存在於許多集體農場上以致破壞了生產。過去掩飾着的關於集體農場上工作的矛盾和錯誤在一九四五年底的各報上開始揭露出來了。第十一期「蘇維埃財政」雜誌會公開的敘述古葉拜絞夫省 (Kuibyshev) 財政金融的錯誤措施，那裏的集體農場會允許一些商業組織賒欠農場所供給農產的一筆賬。該篇文章指出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某農產供應機構會欠集體農場二百萬盧布。這種情形的存在實應歸咎於農場主腦部的會計制度和主持人的漠視。至於集體農場內部組織的失常狀況也可以由一九四六年第一期的「集體農場的生產」刊物上得到證明。據說許多農場在年會開會中都忽略沒有討論他們內部的組織，而許多農場主席（也是技術上的主持人）多被指摘沒有能够遵守過去的紀律。共產黨具領導作用的雜誌「布爾雪維克」其一九四六年三月號一期中就針對這個提出警告，其中的一篇長文特別強調集體農場制度在蘇維埃農業上的重要，並且呼籲，集體農場中各份子個人利益與團體利益的適當配合。古葉拜絞夫省和烏茲貝基斯坦 (Uzbekistan) 兩地集體農場在戰時濫用農場規程也被充分指摘，該文號召大家堅決消滅那些違反規程的不法行爲。該文作者提議在小規模農場，由農民個人就可以照料經營的情形下黨進一步的管制集體農場實爲必要，在這篇坦率的文章發表以後接着是一個短時間期的平靜。一切力量都集中於收獲上報紙上充滿了鼓勵所謂「社會主義者競賽」的論調。但是却巧那個時候的天氣不好，許多地



方大旱，因此送給政府的穀物的數量也受了影響。

那個時候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也已經在攻蘇聯農業的整個問題，在八月廿日早晨莫斯科各個報紙的第一版都發表了由人民委員會主席和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共同簽署所發佈的命令。該文件列舉違反集體農場規程的種種事實。重要的如辦事人員的挪用公款，集體農場財產——土地或穀物——被盜賣於私人與不合法的團體，偽造穀物繳交政府的回執文件和捏報工作人員農場工作的日數，以及安插過多的人員於行政位置上，並決定成立集體農場事務委員會對這些過失加以調查糾正。但是儘管有許多情節很嚴重，可是處罰却例外的寬大，至少就蘇聯的標準看來是這樣的。對於最壞的過失平均不過判處十年徒刑。這大概是因為這些不法事件過於普遍使蘇聯政府不得不比向來的處置來得特別慎重些。實際上的顧慮曾緩和了克寧姆林宮中共產黨的理論政治家們激越的情緒。因為雖然知道那個集體農場的鵝很難產出金卵，對之不能指望過高，可是一旦要清算佔相當數量的農場行政人員與工作者，將來會更加深了已經很尖銳的勞力問題的嚴重性。因此，克寧姆林宮不以嚴厲懲罰却代以溫和的處分和懲一儆百式的勸誡來解決上述問題，報紙不斷籲請集體農場工人提高更大的警覺性以防衛集體農場規程，在共產黨的許多重要雜誌中有不少文章強調着在錯誤的失敗中應有加強認識集體責任的必要。

由於自然的趨勢向蘇聯統治者們也轉移他們的注意力到教育方面，在他們心目中學校與大學的復興其重要性較次於迫切需要更堅強的組織，人民作共產黨的後盾並鍛鍊人民的力量使用於經濟事業上。在戰時那些教育工作仍然繼續着無非是為適應當時的需要。那時男女合校教育在許多學校中是被放棄了，兒童也被施以

若干程度的軍事訓練，教學強調着俄羅斯生命的一貫連續性，這特別可以由歷史與文學的教材上看出來。可是戰後時期的新問題與五年計劃對於教育設施步驟都有若干重要的修正，意識觀念上不相容的地方不再加以姑息和掩飾了。俄羅斯歷史具有一貫連續性的理論被代以嚴格劃分帝俄與蘇維埃時期生活大不相同的觀念，在每一個青年的眼睛前面到處排着共產主義國家的理想。雖然這個共產黨地位的再說教影響到教育的一切部門，可是也許其主題主要是接觸到歷史和文學方面。對於教師，教科書編者，蘇聯科學研究院所屬的教學研究所以及各個蘇維埃共和國都普遍施以意識觀念的思想測驗。結果發現許多人都缺乏這種意識的，於是一條重要的鞭子拿出來了，那就是新創刊的共產黨雜誌「文化與生活」(Culture and Life) 其主要目的在監視並督導一切教育與文藝方面的事業。該刊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份的一期中有許多篇文章都在述說與註解歷史，不止一篇文章都嚴厲的批判了一般教科書缺少黨的意識方法，以及忽視近代歷史特別是革命以來蘇維埃歷史的情形，據說歪曲的「布爾喬亞國家主義」觀念在烏克蘭，塔塔爾(Latar)巴什基(Bashkir)和哈薩克(Kazak)共和國普遍流行着，在亞曼尼亞(Armenia)喬治亞(Georgia)拉脫維亞(Latvia)哈薩克斯坦(Kazakhstan)烏克蘭(Ukraine)以及拜羅盧西亞(Belorussia)各共和國的歷史研究所撰各該共和國歷史據說是編得那麼不妥共產黨當局會下令要它重新寫過。

文學方面的教科書也遭遇到同樣的命運。一本重要的教科書提摩非耶夫(Timofeyev)教授所撰的「當代文學」曾被指為犯了不幸而且不可饒恕的錯誤，因為他居然把楚臣科(Zoshchenko)氏列於蘇聯最著名而且最卓越的作家羣中而却忽略了那些共產主義理論家心目中所認為思想最可欽讚的作家，一個作家著文論託

爾斯泰也因為被認為過份重視託爾斯泰的思想而被攻擊。因為不滿教育學研究所對文學方面的教學而施以指摘並要求它多注重蘇維埃文學多寫許多以蘇聯為題的文章。但是最嚴厲的苛評是加在若干著名的著作者身上。所以我們應把注意力轉向到文學與作家在蘇聯的地位這一方面來。

富有想像力的藝術家在全能主義的社會裏面歸根結底也不過盡一個宣傳家的責任而已，根據蘇聯官方理論，認為藝術的作用並不是在表現發揮天才的個性藉此擴大一般人的經驗與視野，而是使羣衆了解他們歷史的命運，像馬克思主義者的文獻中所指出的加以闡發而已。藝術家是為羣衆而存在的，因為沒有一個人能在蘇聯社會中可以任意了結自己的，並且因為羣衆的意志必須經由布爾雪維克黨才能具體化起來的。所以在俄國的藝術家他不會有前途除非他肯甘心變為黨的恭順的奴才。顯然的，那些有創造力的人在這種環境裏面必會常常感到創造力被窒息，抑制和阻撓。並且任何官方組織的檢查制度偶一疏忽結果就會出現了所謂「純藝術」來，對於這共產黨就會辯解為這些純藝術的復發是由資本主義時代所餘留下的，因為那些有關的藝術家都是在革命以前就開始着手寫他的創作的，或者更可以辯解為這些被前一代所破壞的。在黨方面看起來蘇聯社會戰後最迫切的工作莫過於需要動員全體智識份子與全國才智之士共同為國家服務，並且還要注意這些才智人士思想意識上是不是沒有缺陷。於是一個廣大的宣傳與教育運動發動起來了，鼓舞民衆完成經濟與工業建設工作，並且堅定他們對於共產黨的忠誠，任何藝術家他的工作若是減低了民衆的信心與決定或是他們對於黨的忠誠，這藝術家立刻就會遭到糾正或是逼迫。即使有些藝術家的創作毫無危險性，只不過沒有關涉到官方所命令要求的「國家精神」就會被那嚴厲的批判和諷刺，使他的作品無法覓得發表或上演的機會。共產

黨在去年八月覺得非常必要用加重的語氣來強調這一點。

在與德國作戰即「爲祖國而戰」期中，因爲有了對於侵略者一致的仇恨與恐怖，使民衆能够爲共同目的而同仇敵愾，團結一致也得到保證，所以那時蘇聯政府的宣傳語氣都在激發愛國心，而不在于主義意識的宣揚。對於歷史上俄羅斯民族英雄像亞歷山大，尼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底米推，唐斯柯衣（Dmitri Donskoi）蘇伏羅夫（Suvorov）甚至古圖周夫（Kutuzov）的崇拜大大的被鼓勵着，俄羅斯傳統的歷史一貫連續性成爲當時蘇聯宣傳中最常見的重複語。可是到了戰爭結束，馬上覺得這種「懷古幽情」已經盡其使命，現在必須加以揚棄了。將來在古「俄羅斯」與蘇維埃聯邦之間截然不同的劃分，必須特別加以強調。同時在戰爭期中蘇聯人民很自然的對他們西方的同盟國感到莫大的興趣，並且開始由現代的文學與戲劇爲媒介去了解它，結果「布爾喬亞」的著作在意識上無法爲共產黨所接受的「在蘇聯却很流行而普遍被閱讀着。這種外來作品的影響可以從蘇聯國內的創作中看出來，或者蘇聯官方的意見認爲戰時偶爾的「逃避現實」對於被戰爭弄得過份緊張的神經系統是有益的，或者更就戲劇電影方面說只是因爲民衆需要娛樂，國內作品遠不足應此需要，而黨在戰時也無法分其餘力於詳細檢查輸入的作品，所以才有在意識上不相投的藝術在國內流行着。雖然官方作這樣的解釋，可是意識上最不适宜的布爾喬亞影片像「辛拿脫拉的「拋錨」以及G弗蒙貝（Georgofornly）的片子也居然在蘇聯放映過，同樣有問題的戲劇像馬罕（Maughan）和品那羅（Pinezo）的戲也會在蘇聯演過，而未遭政府的抗議。可是到了現在，意識上的消毒作用對於保證五年計劃的成功是大必要的，所以政府預備根本肅清那些布爾喬亞的作品於蘇聯的藝壇上。社會主義藝術與布爾喬亞藝術間不

可逾越的界限又重新樹立起來了，正像過去的帝俄與現在的蘇聯必須劃着一道鴻溝一樣。爲消除外界的誤會，以爲政府過去對於文藝所採寬大政策並不是一時的權宜，所以去年共產黨當局就用堅決的口吻再度表明立場，八月十四日黨中央委員會特別指出「列寧格勒」和「星」兩雜誌都犯着某種嚴重的意識錯誤，作家團體的活動也有嚴重的缺點，甚至蘇維埃作家協會的工作也常常誤入歧途。中央委員會更指出作家協會及其主席N廷蒙諾夫（Tikhonov）居然無容縱非蘇維埃的文學傾向滲入「列寧格勒」與「星」兩雜誌中，兩雜誌所犯的錯誤，主要是因爲他們刊載着楚臣科對蘇維埃人民及其生活方式廉賤而惡意的諷刺雜文和阿克馬圖瓦（Akmatova）的悲觀與落伍的論調。楚馬兩人在作家協會中與讀者心目中有着很高的聲譽，可是他們仍免不了最後受到壓迫，共產黨對楚馬兩人「無價值」創作的指摘可以由黨書記A柴丹諾夫（A, Zhdanov）幾篇演詞中看出來，演詞因此也列舉出作爲一個蘇聯作家必需的修養，柴氏說「楚臣科是毫沒有顧到公衆意見的庸俗作家。」我們知道在蘇聯革命不久之後楚臣科是「沙拉賓兄弟會」（Serapion Brothers）創辦人之一，那是一個文學團體，其目的在求俄羅斯文學不受民衆見解所縛束。楚氏在一九二二年就寫過一段話，「現在作爲一個作家他心中必須先存有某種意識，這對於我是多麼頭痛的事，假如沒有共產黨來勸誘我，我的意識和地位是什麼？我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不是一個社會主義革命家，也不是保皇黨，我只是一個單純的俄羅斯人而已」。他的文學生涯就是要保持這個單純的俄羅斯人的地位。他的創作題材完全採用那些俄羅斯人民所犯的可憐的罪惡和過失，偷竊、自私、愚蠢，或是閑散等等的事例。他的幽默諷刺的風格是平靜而且克制的，使人想起像一個富有熱情和想像的長者的譴責而不是一個可憐的布爾喬亞流氓的無理取鬧。事實上楚臣科的典

型的短篇小說與蘇聯報紙上若干富有幽默的訓誡文字很相近；其目的都不過是與那些可憐的沒有遵守國家定則，常識上與禮法上的慣例的人開一點玩笑而已，楚臣科的短篇小說實在可以認為是有名的蘇維埃自我批評的典型的溫和例子。那麼他的過失到底在那裏呢？柴丹諾夫說「楚臣科把蘇維埃人民描繪成一個懶惰，愚蠢，幼稚，毫無可取的样子他對於蘇維埃人民的勞動，英雄主義，和他們的優越品質毫無興趣，他的作品中就缺乏這些方面的題材」。於是他斷言楚臣科幾乎儘是找「蘇維埃現實中有破綻的地方，這並不是嫉世妒俗者所必要，完全不過是因為這些可以給他許多寫作的材料而已。果戈理沒有創造出任何使人信仰的正派角色，可是楚臣科更沒有替蘇維埃讀者創造任何正派角色，沒有表現出完美無缺的英武的布爾雪維克的精神。更壞的是他的有些道學味的小說中的故事更予人以這是普遍情形的印象。他毫不在乎的說「蘇維埃社會與俄羅斯人民普遍都是好的，只有極有限的例外像某甲和某乙在某某地方等等……」楚臣科像這樣的諷刺社會弱點和罪惡，讓讀者自己尋求文中的真意。所以不一定就可以說楚臣科對整個蘇聯社會是加以嫉世妒俗的輕視的，不過，無論是否有意或是無意，他的作品多少減低了人民對黨的忠誠和一般的民氣。他的「日出之前」一文是由一九四四年莫斯科地方黨部機關報「布爾雪維克」上所引出來的辛辣的評論。他在戰時安全的住居在後方的亞馬亞塔（Амуната）在「誹謗正在流血的蘇聯人民」，不過，他並沒有立即遭到壓迫，到了一九四六年，他發表了一篇小說，大大激怒了黨部而不能再被容忍。那篇小說是說一隻猴子的探險，一篇通俗而乏味的寓言，却被柴丹諾夫公開咒詛為「庸俗，無意識，誹謗的等等」照柴丹諾夫的解釋認為該文的題旨是說在蘇維埃人民中生活還不如像一隻猴子在籠子裏而生活還要好些。接着是楚臣科被開除蘇維埃作家協會會

響，協會也被改組過，同時另一「帝俄時代」的作家安娜阿克馬圖瓦（Anna Akhmatova）也被逼逐。她的詩富有定命主義的，戀愛主義的與神祕主義的色彩代表俄國的頹廢派在戰時會流行一時，常常得到一般的讚揚，並且多次獲得蘇聯作家協會的獎章。

像這樣風格的文學作品自然與蘇聯的現實距離甚遠。與布爾雪克的倫理也期期不相容，在這件事上面不必說到柴丹諾夫，使我們感到興趣的倒是共產黨行動的斤斤計較的感情主義。報紙以巨大的篇幅一致贊揚黨的決定，蘇聯作家協會馬上承認它自己的錯誤，經過改組以後它被黨抓得更緊的控制着。接着各地的報紙忽然省悟過去沒有遭受批評的報紙，書籍，雜誌原來有那麼多意識上的不健全，若干布爾雪維克的批評家也不甘落後的馬上建議說那些有罪的人大聲的抗辯應受良心的裁判。這種意識觀念上的清算其範圍已經波及正在蘇聯上演的電影與話劇。西方布爾喬劇作家除掉蕭伯納，普里斯特利（Priestley），黑爾曼（Lillian Hellman）幾個八以外普遍的被攻擊，共產黨並且宣布最近攝製的影片「一個偉大的生命」完全不適宜於上演，而普渡夫金（Pudorkin）的產品「海軍上將那邢摩夫」（Admiral Nakimov）其新的手法可以接受，不過大部份內容須重新改製過。該片原有手法完全與國歷史片的傳統相同，很多宴會與跳舞會的場面，却很少政治性的與戰爭的鏡頭。

我們且不管這些被指摘的藝術作品其真實價值如何，重要的是由此已經再度證明共產黨的布爾雪維克全能主義的倫理傾向，並充分表示出要把藝術當作共產黨的禁燭。似乎任何蘇聯的雜誌或出版商現在只能接受那些可得黨的無明確說明的許可的作品，共產黨就是人民的意志，任何活動若不能為黨所允許，實際上這些

活動就是「不民主」。這是不是固執的現實主義，或是大儒主義式的詭辯。無論如何，這就是共產黨對於其壓制行爲的飾詞。口裏說蘇維埃民主如何完美，說得愈多，骨子裏國家的控制也來得愈凶。這可以由下面一點看出來，就是蘇聯能否完成迫切的經濟，工業，科學各方面的工作被認爲這是蘇維埃制度與布爾雪維克黨的生死關頭。所以全國的人力物力必須完全貢獻於完成黨的計劃，沒有一個生活部門可以有一刻逃過黨的密切的注意的。

共產黨對於自己的處境有多少了解呢？這問題的解答或者可以由莫斯科的新世界（*Novy mir*）雜誌一九四六年第十一十二期中找到。那裏會提到外國對於文藝界肅清運動的反響。該雜誌說這些蘇維埃文學的布爾喬亞幫閒們所以對於阿克馬圖瓦與楚臣科事件大爲激怒者是因為他們想在「我們的文學裏面找尋疲憊，無能，退化，與智力上衰弱的形跡。自然不是每一本書都足以代表一個偉大的民族。總之，不僅蘇聯人民沒有得到共產黨允許之前不能讀到或看到任何電影與戲劇，就是研究蘇聯現代的學者也被迫相信俄羅斯與布爾雪維克黨不但是不可分而且是迅速的變爲二而一一而二了。

上述種種現象不只對於了解當代以蘇聯國內情況極爲重要，並且可以反映蘇聯對於外界與國際問題的態

度。  
（原載英國 *the work today* chatham House Review 一九四七年四月號）



## 蘇維埃政權的透視

未來世界大局的如何演變，將視美蘇關係的發展情形而定，這已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關於蘇維埃聯邦政體的特質及其今後的施政趨向，不但是美國，即世界任何國家都認為是個最值得研究的問題，本文譯自七月份美國外交季刊，作者未署姓名。（請參看附誌）

蘇維埃政權的特質，據我們今日所知，乃是思想與情勢所造成：所謂思想，自革命運動肇端以來，便一直為蘇聯的領袖們繼承着，而目前的情勢則由於他們在俄國執政已近三十年的緣故。這裏我們也可以做幾種心理解析的工作，設法來探索上述兩種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其個別作用，對於決定蘇聯政策的關係。但似乎沒有其他的分析工作比這個更困難的了。然而為要澈底瞭解其政治動向與尋求有效對策，這項嘗試還是必需的。

我們很難撇指出蘇聯領袖們初當政時的思想概念，馬克斯思想，在俄國共產黨的計劃中，一向是在巧妙地發展着。它所根據的概念範疇是廣闊而又複雜的。但在一九一六年時共產主義思想的特點，或可略述如下：

（甲）人類生活的主要因素，也就是決定人類公共生活與「社會形態」的特性的因素，乃是物資生產與交換的方式，（乙）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是萬惡的，它無可避免地將使勞動階級被資本家剝削，並且不可能使社會經濟資源獲得充分發展，也不能把人力生產的財貨作公平的分配，（丙）資本主義本身亦含有毀滅的種子，因此，當資本階級不能使自己適應經濟變動時，最後必然引起革命轉使勞動階級握政權，（丁）資本

主義最後將演變為帝國主義，並直接促成戰爭與革命。

其餘可從列甯的言論中摘出：「經濟與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不變的規律，其結果將使社會主義在幾個資本主義國家中，甚至一個單獨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獲得勝利的起點。一個國家勝利的無產階級，在沒收國內資本家的資金與組織社會主義化的生產機構後，將繼起抵制全世界的資本主義者，並在這個過程中吸引其他國家的被壓迫階級來歸。」這裏必須注意的是：他認為沒有無產階級的革命，資本主義便不會消滅。欲圖傾覆資本主義，最後必得推動無產階級的革命，這是遲早不能避免的。

其實在革命爆發前的五十年中，這種典型思想對於參與俄國革命運動的人們早已成爲一種很大的魔力了。由於沙皇政治制度的嚴峻限制，他們受着挫折，不滿於現實，感到疾苦無由申訴——或者可說太不耐煩去尋覓機會——而對於旨在促進社會改善的流血革命却又缺乏廣大支持，於是這些革命家們在馬克斯主義的理論中發現了一個非常適合他們的願望的合理計劃。這不啻使他們對於現實的不耐，對於沙皇政治制度的不滿，對於攫取政權與報復的渴望，並且對於不擇手段直趨目標的傾向，得到一種歪曲的辯護。這樣無怪他們深信馬克斯——列寧的教導，而認爲正和他們的動機與懷抱相諧調了。我們毋庸對他們的熱誠起任何反感，這是很自然的現象。愛德華吉本（Edw. Gibbon）在他的「羅馬帝國的衰微與沒落」（*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一書中曾有很中肯的語句：「從熱忱到欺騙，其間的步驟是危險與不可靠的，蘇格拉底（希臘古代大哲人）指示我們，聰明的人會欺騙自己，善良的人也會欺騙別人，幻想與欺騙相混合也會使良心受到蔽蔽。」布爾希維克黨員們正是由於這種觀念的傾向而取得政權的。

現在我們必須注意，在多年的革命準備中，這些人的心力，正如馬克斯本入一樣，並不怎樣着重於社會主義將來的措施，而是集中在如何傾覆敵對的勢力，以爲介紹社會主義的先驅。因此，一朝大權在握，他們對於實施具體計劃的見解大都是模糊的，幻想的，與不合實際的。除工業國家化與沒收大量的私人資金外，其他沒有獲致協議的計劃。農民的處置，照馬克斯理論的規定是不列入無產階級以內的，所以在共產黨的典型思想中，這是一個含糊之點。共黨執政的最初十年中，它始終是個爭辯不決的問題。

革命以後最初階段的情勢——當時迭經國內的戰亂與外國的干涉，並且其時共產黨員祇佔全人口之一小部份——使獨裁政治確有建立的必要。「戰時共產政策」的實驗和突然排除私人生產與商業的措置直接引起經濟上的不幸後果，同時更招致了一般社會對這新革命政體的怨恨。當共黨赤化全俄的企圖被迫不得不暫時休止而代以「新經濟政策」時，幾種經濟災難竟因而收到了緩和的效果，這明顯地指出社會上的資本集團在政府壓力停頓時立刻便會活躍起來，而如可能的話，它將繼續蠢動，永遠成爲蘇維埃政權的有力對抗因素，和黨化國家的勁敵。對於個別的農民來講，多少也有這同樣的情形存在，因爲就農民的立場而言，他們也是私人的生產者。

如果列寧還活着的話，或許可以證明他是一個偉大而且勝任的人，足以調和這兩種矛盾的勢力而使俄國社會得到最後的利益，雖然究竟可能與否，仍然是一個疑問，但如史達林以及那些在他領導之下的人們，却不能忍受敵對的勢力滲入他們的勢力範圍之內，他們的不安全的感覺是太大了。他們那種特有的狂熱，缺少盎格魯撒克遜（指英美而言）傳統的妥協精神，使他們過於偏激與忌妒，以致不能了解永久的權利均霑。他們

自革命陣營初出掌政時，對於可能和敵對勢力永久和平相處一點便已抱着懷疑。由於他們深信自己的理論是「正確」的，他們堅執着所有敵對的勢力必須予以降服或消滅。在共產黨之外俄國社會間是不准有其他的嚴格的組織的。任何形式的集體活動或結社都得受黨的支配。任何其他的力量都不准成爲有活力的整體。祇有黨可以有組織，羣衆祇能以黨的意旨爲依歸。

而且即使在黨的內部，這項原則還是適用的。大多數的黨員們雖可參加選舉，會議，表決與實行等，但却絕不能出之以個人的意志，而必須仰承黨內領袖們的鼻息。

讓我們重復解釋一下，這些領袖們或許並非爲了本身而尋求專制政治。他們確信——並且發現易於相信——祇有他們才知道什麼是有益於社會的，一旦他們的權力獲得了切實的保障而成爲無可挑戰，他們必能完遂這造福社會的使命。可是爲了尋求他們自己的統制力的保障他們是不擇手段不承認天道或人倫的任何限制。直到那種保障真能獲得時，他們將大眾的愉快與幸福，放在最次要的地位。

現在蘇聯政府最顯著的情形是：直到今日爲止，這政治團結的程序並沒有順利完成，克里姆林宮的要人們仍在專心一志地爲安全保障與擴充一九一七年所獲得的權力而努力着。他們主要的是，曾與國內各種勢力相搏鬥，以保障他們的權力。但他們也與外界相搏鬥。因爲觀念指示他們外界是和他們敵對的，所以他們最後的責任必須將國外的政治勢力予以推翻。俄國的歷史與傳統觀念對於他們這種心理狀態是一項有力的支持。最後，他們對於外界攻擊性的頑強姿態，終於在國內也引起了反感，因而使他們不得不用吉本所說的「懲治頑抗」的手段來對付。

任何與他們意旨相反的主張，無論它是否有價值抑或有正當理由，都不會得到他們公開的認可。這是合乎蘇維埃領袖們心理上的自然趨向和他們思想上的特徵的。照原則上講來，這類相反的主張祇可能從正趨滅亡的資本主義的敵對與難矯正的殘餘勢力中滋生出來。祇要資本主義的殘餘仍被公開認為存在於俄國的話，它可以被視做是一種內在的因素，而把維持獨裁形式社會的部份罪責歸咎於它。但當它逐漸被清算了以後，這種辯護的正確性也就一點點地消失了，等到官方正式表示殘餘勢力已被最後消滅的時候，那種辯護的根據便完全沒有了。這事實是促成蘇維埃行動的基本動力之一；因為資本主義已不再存在於俄國，又因為蘇聯權威之下，被解放的廣大羣衆，對於克里姆林宮，也沒有表露普遍的或嚴重的反抗，於是蘇維埃政權必須強調抑制國外資本主義威脅的重要，來辯護它的獨裁政治實有必要。

這在一個很早的時期便開始的。一九二四年，史達林會特為「鎮壓機構（Organ of suppression）」的保留而辯護。例如陸軍與祕密警察，他所提出的理由是：「倘使資本主義的包圍依然存在，共產主義就隨時有被干涉的危險，並將直接引起一切不幸後果」，根據這項理論，且自這時起，俄國國內所有反對派勢力都一致被描繪為國外反動勢力的工作者，與蘇維埃政權是敵對的。

同樣地，社會主義世界與資本主義世界基本上相衝突的共產理論也被強調了起來。從許多跡象來看，我們可以清楚地見到這強調的解說是有事實的憑藉的。關於它的真正的事實，早被蘇維埃哲學與策略所激起的憤怒，以及偶然發生的武力伸張的現象（如德國的納粹政權與一九三〇年時的日本政府，確有侵略蘇聯的計劃）所淆亂了，我們可以充分證明，莫斯科所以那樣注意外界加於蘇維埃社會的威脅，並非由於真正的外

國仇蘇歡念，乃是因爲蘇聯當局對於國內人民必須解釋清楚爲什麼蘇聯有維持獨裁政府的必要。

現在蘇聯這種政治作的持續，即國內權威政治無限制的推行，輔以「半神話式」的國外侵略觀念的培養，對於蘇聯目前實際政治機構的形成，具有決定的作用。國內行政機關如不爲這目的而效勞，必定難免趨於淘汰；反之，執行這種目的的機構則組織日趨擴大。蘇聯政權是以黨的鐵一般的紀律及嚴厲而無處不在的祕密警察，以及國家對於經濟的堅強壟斷爲保障的。那些蘇維埃領袖們藉以防備敵對勢力的「鎮壓機構」也就成爲擅權的機構了。今日蘇聯政府的大部目的在使獨裁政治完備化，並在保持那種俄國已被敵八四面包圍的觀念。組成那些機構的幾百萬人，必須不顧一切地保衛俄國的這種地位，因爲不如此，他們自己便顯得多餘的了。

照今日的情形看來；那些統治者們絕不能再夢想把握這些「鎮壓機構」棄置不用。他們渴求這種在現代人看來最殘忍無比的（至少就範圍講是如此）絕對權力已將近三十年了。它在國內外已經引起了反感。警衛機構的橫暴行爲已煽動了潛在的反對力量，而使蘇維埃政權受到比警衛機構擴充以前更大的危險。

但是據以辯護獨裁政治有保留必要的那種想像乃是統治者們所最不肯放棄的。警衛機構的過分行爲已使它在俄國哲學中受到了尊封；它今日在蘇維埃思想體系中的地位，比單純的觀念要牢固多了。

(一)

歷史方面的背景已談得很多，然則據我們所知，今日蘇維埃政權的特質該是怎樣的呢？

關於最初的思想觀念，並沒有一點被官方所廢棄。執政者仍認爲資本主義有它基本上的劣點，仍深信它

必遭消滅，仍堅執着無產階級有幫助消滅它並將權利取回已手的責任。但是我們得注意，這些觀念大都是關於蘇維埃政體本身及其內部權力的相互關係的，照他們的看法，蘇維埃組織乃是黑暗與謬誤的世界中唯一具有真理的社會主義政體。

這些觀念中的第一點還是關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天然敵對性。我們已知道是觀念在蘇維埃政體的基礎中是怎樣的根深蒂固。它對於蘇聯在國際社會中的行爲，實有很錯綜奧妙的含義。這意思是說在莫斯科方面永遠不會有任何蘇聯可與其他被目爲資本主義的國家共同合作的誠意。莫斯科方面始終認定資本主義世界的目的是與蘇維埃政體及其治下人民的利益相衝突的。假使蘇維埃政府偶或簽署了一紙與這意旨相反的文件，那不過是應付敵人的一種策略（對於敵人當然不必尊重）所以我們應出之以謹慎小心的態度。基本上講來，這敵對的觀念是存在的，而且是被認定了的。從這一點我們自克里姆宮的外交政策中發現了許多令人困擾的現象如：陰險、祕密、缺乏誠意、欺詐、猜疑、與宗旨上不友誼的態度。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種現象還要繼續存在。它祇能在程度上與着重點方面起一些變動，當俄國人對我們有所需求時，他們政策中的這點可能暫時隱藏起來；遇到這種情形時，總有些美國人會以喜悅的心情宣布「俄人業已改變」，甚至有些人竟因爲促成這類「改變」而自己居功。但是我們絕不應被這種策略所矇蔽。這些蘇維埃政策上的特點，同它所依據的基本原理一樣，是蘇維埃政權基本上的內在特性，不論明顯的或晦隱的，蘇聯將永遠用這種態度來對付我們，直到那內在的特性確實改變時爲止。

這就是說我們將繼續感到俄國人難以應付。但並不是說他們應被視爲已着手進行了一個非存即亡的計劃

，在指定的日期中，將消滅我們的社會，資本主義最後必趨滅亡的定理使他們覺得沒有及早促其實現的必要。他們可以培育他們的實力，以待最後「致命一擊」的來臨。在這期間，更重要的是國內與國外的共產黨員應向「社會主義者的祖國」（指蘇聯而言）竭其擁戴與衛護之忱，協力於國運的繁榮，而使敵人感到困惑與悞亂。過速的進展，對國外施行冒險性的革命計劃，很可能使蘇維埃政權受到困難，它是無可有恕的，甚至應被視為是一種反革命的行動。莫斯科當局會昭示，社會主義運動就是蘇聯政權的支持與進展。

到了這裏我們就可來注意對於目前蘇聯的態度極為重要的第二種觀念，它便是克里姆林宮的見解與旨意的絕對真確性，蘇維埃的政治觀念絕不容許黨以外的任何組織有所主張，它規定黨的領袖在理論上是真理的寄託者。因為真理如在別處被發現，那末，這種真理所表現的有組織活動就應認為合理。但這正是克里姆林宮所不能與不願容許的。

因此共產黨的領導永遠是對的，並且在一九二九年史達林為肯定他個人的權力，宣佈政治局的決策都是一致遵行的，從那時起，黨的領導便一直是對的了。

還有黨的鐵一般的紀律，是依據在克里姆林宮的決策一定不錯的原則上，其實這兩種觀念彼此間有相輔而行的關係，嚴謹的紀律須以承認領袖的「真確」為先決條件，而承認領袖的「真確」則又需要能服從紀律。這兩項對於整個蘇維埃行政機構的措施置有很大的決定功效。但是祇靠這兩項還不足以瞭解他們的效能，除非我們將那第三種要素也計算在內，那便是領袖們為了策略上的需要，隨時都可以自由地發表任何特殊的理論，而所有共產黨員們又必須忠實而無疑地予以接受。這就是說真理並非永遠不變的，而是由蘇聯的領袖



們自己應實際需要而創造的。它不是絕對不變的而是隨時日起變化的，它並非自客觀的事實中得來，祇是蘇聯領袖們的智慧的最近表現。這些要素累積的效果，使蘇維埃政權的整個輔助機構的意向成爲無可動搖的倔強與穩固。這意向絕不受外力的影響，祇可能因克里姆林宮的指示而改變。蘇聯當局對於某一特定問題的方針一經決定以後，整個蘇聯政府機構，包括外交部門，立刻便會頑強地向指定的途徑推進，正如一具玩具汽車，讓它在一個指定的方向前駛去，惟有遇到某種阻礙，它纔會被迫停止。這機構中的份子對於外來的提議或理由是決不聽從的。他們所受的訓練指示他們不要去相信與重視外界的那些巧辯言詞，正如留聲機前的那隻白色小犬一般，他們祇聽那些「主人的聲音」。他們指定的任務如被命令停止進行的話，那也祇有主人可以發施這項命令。因此，一個外國的代表絕不能希望將言辭來影響他們。他最多祇能希望他們將意見轉達那些有權改變方針的當軸。然而，即使是那些當軸者，也不會輕易相信布爾喬亞代表的任何合理的語句，既然在目的上彼此是衝突的，於是在心理上彼此也不能接近了，基於這理由事實的表現在克里姆林宮還較言辭爲有力，而且，當言詞有堅強的事實作爲後盾的時候，那些言詞也是極有力量的。

但是我們已知克里姆林宮並未受任何思想觀念的迫使，企圖儘速完成它的一切目的。正像基督教會一樣，它的思想概念是在於長時期見效的，並且它儘可忍耐地等候。它絕不能爲了將來的一種空幻與不着邊際的目標而把已成的功業去冒險。列甯的教訓明示：欲求達到共產主義的目的，必須用慎重與具有彈性的策略。此外，俄國歷史中那些游牧民族怎樣在廣漠而無防禦工程的原野中進展幾百年不著名的戰爭更是這種教訓的一個有力的證明。在這裏，防範，謹慎，哄騙，與謀略上的彈性乃是一些有價值的特質；這些特質的價值，

俄國人，或東方民族天性上最能體會。因此克里姆林宮面對着優勢力量而退縮，自己並不感到悔恨，而且在不受時間性的束縛之下，對於必要的退縮，它也並不覺得慌張。它的政治行動是一條川渠，祇要那裏許它流動，它便會向那目標永恆不息地流去。它主要的任務，是確定它已流佈於任何對於它成爲世界惟一權力有利的罅隙與角隅中。但是如果它的途徑遇到不可抗拒的阻礙時，它也會退下來，而使自己去適應那阻礙的力量。事實是這樣的，它將始終用一種壓力，一種持久不變的壓力，以圖達到理想中的目標。從蘇維埃的心理上來看，並沒有一點顯示他們必定要在指定的日期達到目標的痕跡。

這些情形使蘇維埃的外交政策，比那些個人侵略主義的領袖們如拿破崙與希特勒的外交政策既易於應付，同時也難於應付。在一方面講來，它對於反抗力量比較敏感，如對方實力過強，它在外交戰線上，作局部的讓步，是比較能夠接受的，因此它的外交辭令與邏輯也比較合理。在另一方面講來，它絕不會因對方的一個僅有的勝利而輕易感到沮喪，或竟因而敗退。這足見它那持久的耐力絕不是用散亂與隨時決定的策略可以作有效對抗的；祇有用長時期的聰明的策略纔抵制它，而這種策略的推行更得比蘇聯本身所推行的爲堅定與機智。

在這些情形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今後任何美國的對蘇政策，其主要因素必須是一種對它擴張的趨勢的壓制，這種壓制又必須是持久，忍耐，穩固，與警覺的。可是得注意，這種政策並不需要表面上戲劇化演出。恫嚇，虛張聲勢，或一些過分的假裝「強硬」的態度都是用不着的，克里姆林宮既然對於政局的反應具有基本上的伸縮性，所以它決不會在威勢的臨罩下仍取倔強的態度。差不多像每一個其他政府一樣，它可以被

對方的威嚇與不圓滑的態度逼入一個難於讓步的地位，但雖如此，爲了顧全大局，它仍可能暫時隱忍下來。那些俄國的領袖們都是人類心理的敏銳判斷者，他們深知發怒與衝動絕不是政治上一種力量的根源。他們都能很迅速地利用對方的這種缺點。基於上述原因，問題中的外國政府如欲有效地應付俄國，應該常時保持着冷靜與鎮定，而如對俄國政策上有所要求，更必須取一種和順禮讓的態度，切不可使它的尊嚴過受傷害。這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 (三)

由於上述的種種，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蘇聯政權加於西方國家自由制度的壓力，是不能以言詞勸阻的，祇能用一種靈敏而機警的力量加以阻遏的，而且應該依照蘇聯政策上的轉變與運用，把這種阻力施用於不同的區域與政治論點。俄國人正期待着和西方國家作無限期的決鬥，而他們又覺得自己業已獲得了很大的成就。我們應記住：共黨過去有一個時期，在蘇聯國內祇代表一個少數團體，遠不及今日蘇聯在國際社會中所代表的勢力。

但是如果主義已經使俄國的統治者確信真理是在他們的一面，因而他們能耐心地等候的話，我們中不信這個主義的人便可以客觀的態度自由來考量那個前提的正確性。蘇維埃的政治理論不僅暗示西方各國完全不能控制它的經濟命運，而且還假定俄國人的團結，紀律，及忍耐力能維持一個無限時期，讓我們且把這種啓示式的幻想帶到實際中來，而假定西方世界已獲得了力量與策略，將用十年至十五年的時間來進行抑制蘇維埃政權的工作，它使俄國本身覺得怎樣？

蘇聯領袖們，利用了現代技術的各種貢獻，使他們專制主義的權謀趨於完備已使他們勢力範圍之內的人民服從當局而無問題。俄國人民很少敢於和他們的權威當局對抗的；即使他們有這種企圖，但在「鎮壓機構」監臨下，也絕不能收到任何效果。

克里姆林宮而且也證明了它足能在俄國完成建立重冶金工業基礎的計劃，雖然這是與當地居民的利益相衝突的。到現在這項計劃還沒有徹底完成，但它正在發展着，並已能追步那些主要的重工業國家了。所有這種國內政治權威的持續與重工業的建立，都是犧牲了大量的生命，希望與精力而達成的。因此蘇聯必須在和平情況之下使用強迫勞工，且其規模之大，在現代史上真是空前的創例。這使蘇聯經濟生活的其他方面遭受疏忽與損傷，特別如農業，消費品的生產，房屋及運輸等。

此外戰爭已使破壞，死亡與人民困頓的現象更為深刻了。這種情形直接引起的後果，使我們今日看到的俄國國民都是精神萎靡與身體疲憊的。現在大部份的俄國人民已經從幻夢中覺醒了，他們起懷疑的心情，再不像過去那樣地易受蘇維埃政權魔力的誘惑了。雖然這種魔力還能吸引蘇聯國外的黨羽，在戰時蘇聯人民願意上教堂作片時休憩的熱忱表現，足見他們的信仰與熱誠不能在蘇維埃政權的目的中獲得充分的表現。

在這些情形中，人民自己的體力與智力定有限度的。這種限度是絕對的，即使是最殘酷的獨裁制度也是應該遵守的，因為人民的體力與智力決不可能忍受至限度以外。強迫勞工營與其他的壓抑工具暫時脅迫人民去做比他們的自由意志所願意的更長時間的工作；但是假使人民經這樣的過分工作後，僥倖不死，還能活着的話，他們也變為未老先衰了，這類的人，我們必須認為是獨裁制度苛求下的犧牲者。他們在勞役中死去也

好，或者僥倖活着也好，在任何一種情形之下，他們的精力都不能為社會作何貢獻，及對國家服務。

這裏祇有年輕的一代可以解決。年輕的一代，不顧任何變動與壓折，是數量既多而又生氣蓬勃的，而且俄國民族乃是一個有天才的民族。但是這些孩子們因獨裁與戰爭所受到的不正常的教育，其成熟後的効果如何，還是個疑問。那所謂正常狀態的、安全與穩定，除了蘇聯的遙遠的村鎮以外，早已消失了。這種情勢對於正在成長的一代的一般能力，影響如何，觀察家們，還未能確定。

此外，事實告訴我們，蘇聯的經濟建設雖有其驚人的成就，但却是不調和與不平衡的。俄國共產主義者會說過「資本主義發展不均」，現在他們應為自己國家經濟上的這種類似的污點而感到慚愧。這裏幾種經濟生命上的枝脈如冶金工業與機械工業，是以全力去推進的，而其他經濟建設則被忽略了。這裏是一個努力企圖於短期間變成世界偉大工業家之一的國家，但却迄今還沒有值得稱道的公路網，而祇有一種與它有關的初期的鐵路網。它在另一方面為圖增進工作的效能已竭盡了很大力量，對於原始的農夫，也會普遍地指示了機械的運用法及其作用，但整個蘇維埃經濟依然在鬧着缺乏的恐慌。建築是輕率而質劣的，折舊率極大乃是必然的現象，而在經濟方面的廣大領域中，這個國家還不可能將西方精巧的工人們那種生產方面的通常教育與技術方面的自尊觀念灌注於勞工者的腦海中。

這些缺陷很難在羣衆疲憊與頹喪並且飽受驚恐與脅迫的情形下及早改善。祇要這些缺陷不被克服，俄國將仍是一個經濟上多弱點的，或在某種意義上言一個無能的國家，它祇能將一種熱狂與早期的政治活力播散出去，而卻不能以物質力量與繁榮來作實證。

同時，一種極大的不穩定脫胎正降臨在蘇聯政治生命上。就是蘇聯掌權的個人，或一個集團把權力移轉給另一個人或另一集團時勢將發生的不穩定情勢。

這當然很顯著的是史達林個人地位的問題。我們必須記住他的繼承列寧，乃是蘇維埃政權僅有的一次個人權力移轉的經驗。這次權力的移轉費時十二年才將它穩固起來。它犧牲了好幾百萬人的生命，並撼動了國家的基礎。它會使國際共產革命運動也聯帶受到震撼，而且也使克里姆林宮本身蒙受不利。

很可能地，另外一次極權的轉移會在平靖與不惹外界注目的情形中發生，而且不受到任何方面的反響。但是它也可能因而發生大的變動，這裏我們且應用一些列寧的字眼，那從「巧妙的詐騙」而到「狂暴的虐政」的「難予置信的迅速轉變」，它正是在俄國歷史上的特徵，很可能將撼動蘇維埃政權的基礎。

但這還不祇是史達林個人的問題。自一九三八年以來，蘇維埃政權的高級組織與下層組織間已產生了危險的隔離現象。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理論上是黨的最高機構，規定至少每三年舉行一次會議的，但現今距上次舉行的日期，不久將要整整八年了。在這期間，黨員人數至少增加了一倍。黨員的死亡率在戰時非常鉅大；而今日有半數以上的黨員是在上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後加入的。同時，高踞在上領導國家屢經危難的，還是原來的一個統治集團。當然，這裏有它的理由為什麼戰爭使西方各大國的政府在政治上發生了基本的變化。當然這種政治上起基本變化的原因，在俄國隱晦的政治生命中也同樣的存在着。可是雖則如此，俄國對於這種改變的理由一點也沒有反應。

我們必定可以從這一點揣測到：即使在共產黨這樣一個有高度紀律的組織中，它的新近加入的黨員們，

和高高在上，自謀保持權位的少數統治集團間，在年齡，態度與興趣方面，勢將日趨歧異，因為他們兩者間很少見面晤談與在政治關係上親近的機會。

誰能說在這樣的情形下，那最後終將實現的權力轉移會平靖而又順利地產生？或反對者不致利用時機而取得尙未訓練成熟與缺乏經驗的大眾的支持，進以爭取較高的權力？如果它萬一發生的話，奇異的後果將影響到共產黨的本身，因為黨員們祇有服從與運行鐵的紀律的經驗，而不懂得妥協與適應的技巧。而假使分離的力量萬一突然侵襲並使黨的機構麻痺的話，俄國社會的混亂狀態與缺點必然會具體的顯示出來。因為蘇維埃政權祇是隱藏一羣散亂的人羣的表皮，在它之中，任何獨立而有組織的機構都是它所不能忍受的。在俄國甚至沒有地方政府這樣的機關。現代的俄國人從來不知道人類有集體活動的天然性。所以假使一旦事故發生，使黨的團結與效能遭受破壞，使黨不復是一個政治工具的時候，蘇聯可以一夜之間由最強國家之一而變為最弱國家之一，在國際上變成一個最可憐的民族。

因此蘇維埃政權末來的保障，決不像善於自欺欺人的克里姆林宮的要人們所見到的那樣安全。若說他們自己能繼續把握政權，他們已經有了證明；若說他們能平靖而容易地將政權移轉給他人，却待事實的顯示。同時，因為蘇聯領袖專制統治的磨難，及國際局勢的變亂，已使偉大的蘇聯人民的精力與希望，遭受了重大的損害。今日蘇聯政權在思想上的吸力，却在俄國邊疆以外和它的警衛力量所達不到的地區內最為強烈，這也是令人怪異的事。這現象使我們不禁想起了湯麥斯馬因（Thomas Mann）在他的名小說「布頓勃魯克司」[ Buddenbrooks ]中所用的對比。他觀察到人類的制度常是在它實際上已十分衰敗時現出它最大的光輝。

他將布頓勃魯克司家庭最燦爛的日子和那些在這世界上照耀得最明亮的星羣中的一類相比，他說那顆星在世人眼中雖是光芒萬丈，但實際却早已死寂很久了。誰能肯定地說克里姆林宮對西方國家中那些失望的人民所放射的光芒不是一種迴光的反射？這不能證實但也不能否定。但是可能性是有的，在作者看來，這種可能性而且是很大的，蘇維埃政權，正像它觀念中的資本主義世界一樣，也含有着衰敗的種子，而且它這些種子已在發芽萌動了。

(四)

美國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不能希望和蘇聯政府建立親善政治，這已是很明顯的事實。她在政治的領域裏，必須繼續把蘇聯看做一個敵對，而不是一個合作者。它必須繼續認清蘇維埃政策決不會傾向於和平與安定，對於社會主義可能與資本主義共存共榮一點也絕不會有實際的信心，而祇是企圖分裂與破壞所有敵對勢力的一股持久而又謹慎的壓迫。

所幸衡諸事實；蘇聯雖與西方各國相敵對，但它却仍是較弱的一方，蘇聯政策是易於變化的，而它的社會含有本身的缺陷，可能使整個國家終於趨向衰弱之路。這使美國在採用堅定的抑蘇政策的時候，獲得了充分的信心，美國為消弭蘇聯破壞世界和平與安定的任何侵略表現，惟有以不變的反擊力量來抵制它。

但照今日的情形看來，美國推行這種政策的可能性絕不僅限於堅守自己的戰線與希望最好時機的來臨。美國以行動來影響蘇聯以及共產國際運動的內部發展，進而影響蘇聯的政策，那是完全可能的。這不僅是美國可以在蘇聯及其他地區從事適度的情報活動的問題，雖然這問題也是重要的。這更是一個建立適度印象



的問題，美國應明示全世界各民族；她瞭解本身的需要，她正在順利地應付她國內的問題與她一個世界蠱國應盡的責任。她的蓬勃朝氣足以在現代各種主要的思想潮流中屹立不動。如果印象的建立與保持可以達到這樣的境地，那末，俄國共產黨的一切目的，必然會顯得無效與徒然，那些莫斯科支持者的各種希望與熱忱也必然銷沉，而克里姆林宮的外交政策也必遭受更大的困難。須知資本主義世界的麻痺與衰頹，正是共產哲學所着眼的要點。甚至自戰爭結束後，蘇聯人士帶着愉快的信心預測美國將體驗到早期經濟的恐慌，這項預測的失敗，對於共產主義世界，將有深刻與重大的反響。

根據同樣的理由，美國國內的遲疑不洽與內部分離的徵象，對於整個共產運動有增加它活躍性的效果。在這些趨勢的每一證明中，一種希望與興奮的刺激，傳遍共產主義世界，在莫斯科的步驟中可以看到一種新的歡欣情緒；新的國外支持者也攀援上來而替它掃場了，而俄國對國際間的壓力，也增加了起來。

如果說美國單獨的行動，便可決定共產運動的生死存亡而使俄國的蘇維埃政權早日傾覆，這話未免近於誇張。但是美國有這一種力量去大大的增加蘇聯在施行政策時所必須遭遇的困難和迫使克里姆林宮採取與前大不相同的濫和與謹慎的步驟，而藉以促進種種趨勢，使蘇維埃權力的分解或逐漸軟化，得以最後完成。因為沒有任何神祕的救世運動，能够無限期地面臨挫折，而不終於改變方針，去適應環境的——克里姆林宮所領導的運動，尤其不能。

因此，最後的決定，將大部在於美國本身。美蘇關係的問題，主要是測驗美國在世界各國中的一般價值。要避免毀滅，美國祇須保持自己最優良的傳統觀念與精神，而證明它是一種有資格存在的大國。

這誠然是國族本質的一個最好的測驗。這些情形的顯示，可使美蘇關係的深思的觀察家不必再為克里姆林宮的向美國社會挑釁而煩惱了。反之，他對於某種主宰，將表示相當的謝意，因為它為美國人民安排下這種難於和解的挑戰，而使他們國家整個安全的條件，要看他們能否一致團結，和接受歷史所要他們擔承的道德上與政治上領導的各種責任。

附誌：據九月二日紐約前鋒論壇報載李普曼論文推測，謂本文作者即國務院決策委員會主席甘南氏（Kenzie E. Kennan）並稱此不僅為分析蘇聯之文字，亦為美國外交政策之重要文獻。

## 蘇聯國內經濟問題

Vera Michéles Pean  
(田恩夫人)作

自從歐戰勝利以來，在外交方面雖然蘇聯政府的政策和行動成了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但蘇聯人民的注意却集中在受戰爭破壞以後從事經濟復興的多方面複雜的問題上。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通過的第四次五年計劃法案，有兩個主要目的：（一）恢復在德人佔據過的區域內被德人破壞或毀滅的農業、工業、運輸和房屋，（二）發展國家經濟，使其超過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國侵略前夕所達到的限度。這種艱辛的工作，充滿了許多的困難，例如熟練人力的缺乏，急需原料，工具和機器等的缺乏，莫斯科比之與俄國歷史上兩次可怕日期的一八九一年及一九二一年相等的一九四六年夏天的大旱災；更有進者，一個已經忍受了一世紀四分之一時間的可怕的勞動和犧牲，而所得報酬只是又須遭受四年破壞性戰爭的艱苦和挫折的人民所感受的極大的疲憊。

蘇聯也像世界上大部份國家一樣，正在經歷着一次戰後的經濟恐慌。它和美國恰成一個相反的對比，它的主要問題不是要實行超過本國需要的生產，因而潛伏了物價暴跌及普遍的失業危險。它的問題是由於生產不足，它的潛伏的危險是由於人民日漸增加的需要與可以得到的物資間的懸殊，可能引起的民氣的低落，以及因而又發生了生產更爲低落的極壞的循環。

據一部份美國觀察家的意見，蘇聯的國內經濟問題大部份是由於集中在軍事的準備上，因而使得蘇聯政府在一世紀的四分之一的時期中，都把國家人力物力的資源，轉用到發展重工業上，遂忽略了消費物品的生產。因此，蘇聯在近代化方面，雖然無疑的是有進步，但蘇聯大部份的人民都被迫滿足於低下的生活水準，

這種水準，甚至就和東歐蘇聯的鄰邦比較，也是低下的。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五年計劃，蘇聯政府由於認為對「資本主義」世界的戰爭，在那時尤其指着對於德日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事，的確。是抱着要使蘇聯儘可能不依賴外國的物資資源，并能以相當的糧食和近代化的武器供給其軍隊的打算來計劃發展其國家的經濟的。美國的觀察家都相信自從一九一七年以來，已經成爲蘇聯經濟生活的特點的這種狂熱的準備戰爭的空氣，目前又在重新創造了，以英美當作蘇聯潛伏敵人的蘇聯政府，已在利用戰爭的威脅——可能使用原子彈性，情形將更可怕——作爲增加生產的刺激。

雖然要想以獨斷的確定來判斷蘇聯是否在準備一個侵略的戰爭，抑或僅在努力於保證其自己的安全以對抗真正可怕的進攻，是非常困難的事，但蘇聯政府保持着依目前估計約有五百萬人的武裝軍隊，顯然是想使該國對於任何意外具有軍事上的準備。於是人們很可以提出下面的問題，即無論是爲了準備戰爭也罷，或者爲了準備防禦也罷，這是否就是蘇聯領袖們之所以決定先創造一個重工業的基礎，犧牲了人民對於消費品的需要，等到這個目標已經達到以後，再進而發展輕工業的唯一理由呢？無論是以國家的資源主要作爲資本財抑或消費財的生產之用，都會遭遇到其他經過落後的農業階段并用很少的國外財政的援助，或不用國外財政援助而發展近代化工業的國家的。的確，假若蘇聯在一九一七年以後接受外國的貸款，恐怕已能順利的發展一個更爲平衡的經濟，而只使人民受到很少的壓榨和犧牲。然而也許是對，也許是不對，蘇聯領袖們竟然恐怕外國貸款會引起了貸款國對於蘇聯內政的政治干涉來。他們甯肯用現款或者賒欠購買外國他們所需要的這一類的工具，機器，和熟練的人工等，而不肯接受外國的貸款，或者把該國的自然資源讓給外國的投資者！

「僅在新經濟政策很短的時期內，曾有例外——這種形式的經濟國家主義，不僅特別在蘇聯爲然，還在那些目前已經遭遇到蘇聯在一九一七年已經遭遇過的決定的國家裏，已經成了非常重要的討論題目——尤其以中國和日本爲然。

一九四七年元月二十一日，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發表的報告裏，也坦白承認了蘇聯戰後經濟問題的的存在。這是關於實現復興及發展一九四六年國民經濟，國家計劃的結果的報告。該報告稱在第四次五年計劃的頭一年裏，國家工業「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工業生產的戰後復興」，又指出一九四六年民用生產的整個工業生產，已較一九四五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這種生產的增加，在初看之下，也許可以視爲一個重要的獲得，但假若我們記起了一九四五年是戰爭結束的一年，這時候生產還沒有轉變到平時的基礎上，那麼，這種生產的增加，也就無足令人興奮了。至於該年的農業生產，某種基本原料的生產，以及房屋，運輸及勞動生產力的嚴重的減少，更足令人失望。在受戰爭災害的區域內，據官方估計工業生產「甚至還沒有達到戰前生產的一半」。

雖然自一九一七年以來有了工業的生長，但農業仍爲蘇聯人民的主要的職業，蘇聯政府會有三個主要的目標：（一）恢復佔領區內大部份已被德人破壞的集體農場和國家農場，（二）擴大農業生產，（三）增加曳引機和其他農業機器的生產，這是集體農場自從一九三三年完成了集體化以後特別依賴的工具。納粹曾經計劃把烏克蘭的農業生產拿來供給他們所計劃的德國工業帝國的糧食和原料，在他們的統治之下時，集體化又被重新恢復到私人的土地所有制。我們還記得在一九三〇年初期的時候，農民是反對集體化的，尤其是在

烏克蘭，這裏的私人土地所有制，較之蘇聯其他區域都更為普遍，這種反對會引起了激烈的國內鬥爭，後來由於對反抗的農民強行驅逐，以及一部份至少是由於消極抵抗所引起的飢荒，這種鬥爭才告停止。據一部份佔領區內的戰後的報告，主要是烏克蘭的報告，已經表示出在一部份情形中證明農民是討厭採取集體農場制的。烏克蘭人民的強烈的民族主義和獨立的精神，在歷史上是聞名的。為應付這種環境，遂於一九四七年任命卡甘諾維奇為烏克蘭共產黨書記長，以代替前書記長克魯士契夫。又據曾於一九四六年十月被任為新成立的集體農場蘇維埃主席的政治局委員安得里夫正式報告稱，集體農場和集體農場的財產，曾被入盜用。據已有的情報，在一千二百萬畝的被入盜用的集體農場裏，有一千萬畝是在戰時經過政府的准許由工廠機關和其他團體為謀僱員和工人的利益而接收過去的，這些工廠機關都不願再把土地還給政府。據倫敦經濟學者雜誌稱，由農民自己盜用的土地，還不到一百五十萬畝——佔已耕面積百分之零點五。

集體農場的恢復，由於曳引機及其他農業工具的缺乏而受阻礙，這些東西都是被德國人破壞或移走的。這種缺乏的現象在一個糧食及技術作物如棉花及亞麻等都依賴着國內生產的國家內是非常看重的，所以曳引機及其他農具的製造被當作蘇聯最迫切的工作之一。一部份飛機工廠已經轉變為製造曳引機之用，新式的曳引機也正在製造。一九四六年曳引機的生產照原定計劃尚少百分之二十二曳引機和零件都感到嚴重的缺乏。對於機器及曳引機站的適當組織已經加以極大的注意——即建立中央分配的各據點，可以在一固定區域內對集體農場服務；對於機器作迅速有效的修理，以及適當的供給準備的零件，也都加以大的注意，這些辦法的最後目的是要用科學的輪種法以及使用改良的農業方法，以保證達到高度以及更重要的穩定的生產。

雖然政府會有各種警告和勸戒，由於戰爭及德國的劫掠所造成的農業的解體，熟練的農業勞動力的缺乏，造成了很多不利的條件，加以素稱穀類生產富足的區域如烏克蘭及卡弗爾加河右岸一帶特受影響的一九四六年的旱災，更加重了這種不利的條件。因此，蘇聯在過去一年來對於兩種主要糧食小麥及裸麥感到極大的缺乏，在某數區域內幾乎達到饑荒的狀態，在第四次五年計劃中預計要放棄的麵包配給的制度也終不可能放棄。在蘇聯官方的數字還沒有得到以前，據估計蘇聯在一九四六年僅生產了穀類及植物油種子的一半，生產了製糖甜菜的三分之一，而所要養活的人口與已耕土地的比例，則遠較一九四〇年為大。一九四七年早期穀物收穫的報告據說還很有可觀，美國副國務卿克萊敦說蘇聯今年也許要輸出一部份糧食，尤其是輸往東歐的各鄰國。蘇聯本身雖然急需入力，但蘇聯政府還不願把估計約有一百萬的軍隊從被佔領的國家內撤退，因為這樣可以減輕蘇聯糧食問題的嚴重。

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所發表的關於發展戰後農業經濟的方法的指示中，會令立即採取步驟以恢復及擴大農業。這個指令的主要目的是替人民創造「充份的糧食」，替蘇聯的輕工業生產技術作物如棉花、麻、橡樹及大豆；以及積累糧食及原料等。在穀類的區域裏，小麥及裸麥的生產一九四七年較一九四六年增加了一千五百七十五萬畝，一九四八年預計可較一九四七年增加一千五百二十五萬畝。依照這樣的增加，到目前的五年計劃結束時的一九五〇年時，可以保證穀物收穫達到一億二千七百萬噸，而一九四〇年的收穫估計約有四千二百萬噸。但須注意的是由於自然的生長及對新領土的歸併，蘇聯人口已自一九四〇年的一億七千萬人增加到一九四七年的二億八。

二月二十八日的綱領中號召改進由政府及共產黨組織所進行的對於農業監察的方法，澈底消除妨礙勞工生產的違反集體農場工作的份子，對於機器及曳引機的工作加以決定性的改進，以達到較高的效率，對於農業工作人員進行廣泛的訓練及再訓練的工作，以新的機器卡車肥料及燃料等裝備農業，共產黨機關報真理報在三月三十一日的社論裏強調本年收穫對於蘇聯經濟的重要，並明白指出這是經濟陣綫上最重要的一環。

真理報的社論說，「這不僅是佔國民經濟中最重要因素的爭取高度收穫的鬥爭，而且這種陣綫上的每一英勇的鬥爭也像戰爭時期每一英勇的軍事鬥爭那樣的重要和可貴」。又說，「羣衆必須明瞭這個問題不是爭取一個孤立的雖然也是很重要的勝利的鬥爭，而是謀得整個農業經濟的根本改良，想使我們農業獲得有力進步的鬥爭」。

爲了適應這種軍事性的號召，於是對於工作隊的領袖們，集體農場的主席以及每畝能够生產大量小麥和穀類的官吏們都給以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頭銜，對於製糖甜菜棉花及麻等生產有增加的人也給以這種獎勵。

對於小麥及其他穀類有特別增加的人則給列甯獎章，從二月二十八號的綱領中可以看到希望生產急速增加的情形，該綱領規定凡是具有一千畝可耕地的集體農場在一九四七年對於國家應繳的數額不是像過去一樣根據確實已耕田畝計算，而是根據整個可耕面積計算。例如由於曳引機人力或種子的缺乏，甚至僅有八十畝的已耕地也須如此計算。牲畜數目由於戰爭也會大爲減少，所以也有一個堅決的運動要增加牲畜的數目。例如在烏克蘭——這是蘇聯最能生產的區域之一——據估計集體農場戰後只有百分之六點五的馬匹，百分之六點二的牛以及百分之一點八的羊，第四次五年計劃打算到一九五〇年時將馬匹增加百分之四十六，牛增加百分之



三十九，羊增加百分之七十五，豬增加到一九四六年的三倍。爲使農業生產得到各部份的聯繫以及現代化，遂於一九四七年將三個有關農業活動的部歸併爲一個農業部，由班尼狄夫主持。

第四次五年計劃也像以前的各次計劃一樣，極注重發展重工業，這一部門在一九四六年會得到很大的收穫，各種資本設備及機器頗有增加，雖然增加得還不够，葛氏普蘭的報告裏對於近代化工業，所必需的物資生產的落後，尤其是煤、鋼、鐵、銅、石油等生產的落後頗有怨言。這種落後並不是依照計劃的標準而言，若依計劃標準大部份都已實現或甚至已經超過，而是依照戰後國民經濟的需要，這顯然是蘇聯的計劃者事先所未預料的。例如一九四六年關於煤炭生產的計劃已經實現，雖然亞洲煤礦還差百分之三，沒有達到目標，但目前生產佔蘇聯煤炭的一半的歐洲煤礦，生產已超過計劃的百分之五。

爲補救目前工業所急需的某種原料的缺乏，蘇聯政府於一九四七年宣佈要開發全國的礦藏財富。據說有八百多個遠征隊，包括有科學家工程師技術家和工人等六萬餘人，都帶了最近代化的裝備將要在廣大領土上工作。他們的計劃是要超過第四次五年計劃的需要，史達林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六日選舉前夕宣佈要完成每年生產鐵五千萬噸，鋼六千萬噸，煤五億噸，石油六千萬噸。

假若根據長期的計劃，要想增加原料的生產，需要恢復被德國人破壞或毀壞的各種礦工廠和煉油廠等，並設備新的機器，要想立刻實現這種復興，只有使蘇聯政府能從國外得到必要的裝備及機器才行。因爲該國需要各種工業設備，無怪乎蘇聯在莫斯科會議時，堅決要求從德國西部高度工業化的區域內，就目前的生產中取得價值一百億美元的賠償物資了。蘇聯政府也曾要求對日勝利時列入租借法案但未支付的各種機器及其

他物資等。這些東西包括煉油設備、農具、曳引機、電話及電報設備等，價值約在三千五百萬美元。蘇聯也像其他的接受租借物資的國家一樣，同意支付各種物資價值的百分之九十外加運費，以三十年為標準分期支付，照百分之二又八分之三納利。然而由於蘇聯政府久久不願與美國談判最後的租借決定，遂引起華盛頓方面日漸增加的注意，雖有國務院方面的辯解，國會仍拒給批准支付未付的租借物資。當蘇聯政府於一九四七年四月表示決定要談判一個最後的租借決定時，一般人認為這可能是要求美國大量貸款的前奏。據聞蘇聯與英國談判商務協定時，蘇聯要求五千五百萬鎊的信用貸款以購買電氣設備及其他機器。

蘇聯的工業問題在三月一日的部長會議所發表的聲明中曾經明白的指出。該聲明號召將平均的生產增加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希望能增加每人的生產量及減低勞力的成本。在三月及四月間會通知各部修正其生產的標準，保證在一切工程製造業中都能有上述百分數的平均增加。部長會議指出，目前在經德佔領過的解放區內（包括頓河區域）雖有一百七十五億盧布投資在資本的建設上，而一九四六年這些區域內的工業生產量甚至連戰前水準的一半都還沒有達到。工業方面的缺點可扼要分述如下：（一）煤礦工業生產的緩慢，使得重工業和運輸業各部門的發展因而遲延；（二）消費物品生產的短少；（三）未能實現房屋建設的計劃，遂轉而又使永久性勞力的組織遲延並阻礙勞動的生產力；（四）未能開闢許多新礦及冶金工廠以供一九四六年生產之用，遂留下許多未完成的建設工作；（五）電汽設備及農業機器生產的「嚴重的」落後；（六）未能生產充分的鐵軌及車輪，汽油工業所用的管子以及汽車所用的金屬片等；（七）雖有建築的器材，但和全國的房屋需要之間仍有很大的距離，大部份由於木材業發展的緩慢。

爲了克服上述各種缺點，部長會議遂替全國擬定十項基本工作：

一、煤炭生產增加一九四六年的百分之一百一十六，石油生產增加一九四六年的百分之一百一十八，以作爲發展工業和運輸的重要條件。

二、電汽設備及農業機器應較一九四六年有重大的增加！例如水電渦輪應有百分之四百三十二的生產。農業機器的生產（包括曳引機）如以一九四六年爲一百，應增爲百分之二百八十七；聯用機增爲百分之五百二十耕種機增爲百分之二百三十三；打穀機增爲百分之二百九十九。

三、根據着農業機器大量供應的大量穀物的收穫。

四、發展消費品的生產，使輕工業及紡織工業的生產價值增加百分之二十七，鞋類增加百分之四十二，機類增加百分之七十三。

五、加強機器化，特別是在開礦，運輸，伐木和建造工業方面。

六、發展合作及國營的貿易，使一九四七年貿易額可達三億二千五百萬盧比。

七、對於資本設備的建設和恢復的速度應謀普遍的增加，主要的如燃料工業，電力站，紡織冶金，機器工具及運輸工業等。

八、房屋建築應較一九四六年增加一倍，包括各工業企業所建造的房屋在內。

九、減少生產及建設的成本，注重節減，作爲增加收入減少支出的手段。

十、掌握近代化的技術，以最近近代化的武器與物資裝備軍隊。

第四次五年計劃的重要特點，是因受戰爭的影響，而使工業發展的地區有所遷移，這種遷移早在一九四一年以前即已開始，那是由於政府爲了安全（因爲自一九一七年以來，工業和農業中心都位於極易受敵入攻擊的烏克蘭和頓河區域），以及容易取得原料，決定將工業加以分散。第四次五年計劃規定在前蘇聯工業生產的中心，目前已受破壞的區域內復興其工業——此即烏克蘭及頓河區域，一部份重要的重建工作已在這裏開始，尤其是蘇聯爲執行焦土政策會將其破壞的大水閘已有部份的恢復。各種復興及新建的工廠均將用新式機器裝備，而在戰時爲謀安全而遷至烏拉爾的機器，即仍留在那裏。遷至烏拉爾、弗爾加、西伯利亞，及蘇聯遠東的工業，均將永遠留這些區域以內，並將加速其經濟的發展及繼續建造烏拉爾以東的工廠。五年計劃並要求在歐俄的北部成立工業中心，皮契爾斯克將爲新的煤礦及冶金工業的中心。

這個工業分散的大計劃最後實現了以後，蘇聯就不會再像過去那樣工業發展偏在的現象了，因爲過去的工業都是集中在西部和南部，而大部份大陸上的區域，都是比較的沒有發展或者全未發展的。

工業生產的由西部移向東部的情形，倫敦泰晤士的外交記者曾於一九四七年搜集有比較的數字。作這個估計，一九一三年時蘇聯從烏拉爾所得到的煤還不到十分之一，到一九三六年已經增加到約近三分之一；到一九四〇年佔百分之三十六，到一九五〇年必然幾乎要佔一半了——即百分之四十七。在鋼鐵方面，也可看到同樣情形；革命初期時代，烏拉爾所生產的鋼鐵還不到五分之一，到一九五〇年時將達到百分之五十一。石油的開發雖有許多延遲和錯誤的開始情形，但也有同樣的趨勢，一九一三年從東部區域所得到的還不到百分之五，到一九四〇年已達百分之十二，一九五〇年時將達百分之三十六。電汽工程和化學工業的主要基地

，也將被更爲安全的建設在東部區域內。

鐵路和公路的運輸事業雖自沙皇時代以來已有改進——由於運輸的不適當，曾大大的妨礙了日俄戰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俄國，——但目前仍未發展，又由於工業的擴張，甚至使得國家運輸的設備更受壓縮的影響，因而更增加了問題的複雜性。第四次五年計劃規定發展及改進公路，鐵路，水路，航空等運輸。特別注意於創立一個改進的鐵路制度，發展新的建設，復興已有的路線，使管理現代化，生產鐵路設備及擴大運輸量等。

也像以前各次的五年計劃一樣，主要的着重點，是在於建造或恢復那些聯繫各個生產中心以及與原料基地相聯繫的各鐵路。計畫中的新路綫總計四千四百九十三英里。這些路綫的建築，又一次的看出蘇聯經濟向東轉移的趨勢。在佔領區內曾被德國破壞的鐵路，也將重建起來。

採用各種方法，如電汽化等，使蘇聯鐵路運輸現代化的計劃，也正在進行之中，尤其是在烏拉爾及烏克蘭本部的兩大工業區域內。鉄軌，火車頭及貨車客車的車箱等的生產，也正在加速進行，製坦克車的工廠，已經轉變爲火車頭的生產。

第四次五年計畫若與以前的各次計畫比較起來，有一個顯著的特色，即注重於想增加爲人民迫切需要——如其他受戰爭破壞的各國一樣——的消費物資的生產，以提高工人和農民的情緒，因而增加其勞動的生產力。一九四六年國營企業消費品的生產雖有增加，但目前各種必要的物品，如紡織品，鞋類，及家用器具等生產，仍未能適應蘇聯的消費需要，這是爲了要發展重工業之故，因而久受遲延的原故。由於戰時所受的物

資損失，以及約有兩百萬的蘇聯士兵因在其他佔領國內與較高度的生活水準相接觸的結果，消費品的需要，最近越發迫切了。爲要實現在蘇聯經濟中仍居於幼稚狀態的國營輕工業的生產，政府遂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發佈命令，欲擴大及改進國家合作事業的活動。據目前估計，約有消費合作社一萬八千所，大部份在農村區域內。以及生產合作社一萬一千所，其中包括小型作坊和工廠等。

這個命令的目的，是要保證人民能以較低的價格獲得更多的糧食和消費品，並提高批發商業的數量和品質。消費合作社是用來收購偏遠鄉村剩餘的糧食，這些糧食由於運輸缺乏，未能運到城市中的市場去——爲了這個，以及其他的目的，政府在創辦時撥了七千輛卡車。消費合作社得准其在市區、火車站、輪船碼頭等處開設其自己的店鋪，貨攤、小肆等，以自由市場的普通價格出售，但不得超過政府經營店鋪的價格，售貨幾乎有各類物品，如糧食、麵包、肉類、魚類、脂肪牛奶、蛋類等等。

政府敦勸生產合作社擴大其家用器具、鞋類、襪類、玩具及衣服等生產，並警告其以較大的主動性以獲得必需的原料及分配其生產品。政府方面以必要的工具及設備供給生產合作社，並令地方政府尋覓必要的技術人員及熟練勞工以及供給適當的住宅等。並特別注重於在生產合作社內，雇用殘廢的老兵。蘇聯報紙表示希望生產合作社與國營商店的「健全的競爭」可以改進消費者的命運，因彼等過去在國營商店中，常受店鋪中傲慢無禮之待遇。並勸批發商人對待顧主採取「文明」態度。根據蘇聯報紙的討論判斷，蘇聯的顧主已在一世紀的四分之一的時期中，第一次獲得被人承認爲「常是對的」的機會。

對於生產合作社雖然給了一番廣告宣傳，但被國家統制的輕工業仍爲人民所容易得到的消費品的主要源

泉，例如到一九五〇年時國營的製鞋工業計劃製造鞋子二億四千萬雙，一九四七年合作社所製造的鞋子僅有一千三百五十萬雙，到一九五〇年時國營紡織工廠可以生產三十七億三千八百萬碼的棉紡織品，而一九四七年合作社僅生產二千九百萬碼的棉紡織品。

政府滿足消費者需要的計劃中，還有同樣重要的一部份是房屋建設計劃。房屋問題本來在整個世界上都很嚴重，但在蘇聯特別嚴重，因為蘇聯縱在戰爭以前房屋的建設都已遠遠落在人口的增殖之後，並且未能適當的適應由於極度工業化的結果所產生的人口自鄉區移向城市中心的人口移置的需要。由於缺乏適當的居住地方而產生的永無休止的人類間彼此的衝突，雖然目前才算剛剛開始煩惱着西方的世界，但在蘇聯方面，自一九一七年革命以來，即已成為蘇聯生活的經常現象了，並且引起了許多社會學上的問題，如家庭的大小，以及墮胎等問題。

由於大規模戰爭破壞的結果，政府不僅遇到了要替二千萬因為戰爭致成無家可歸的人們建造房屋的問題，而且也遇到了要在破壞區域內重建學校、醫院、工廠、農場等問題，必須要在這些問題解決以後，甚致才能開始計劃新的房屋或工業單位及民用機關等。國內許多重要的城市都己一部份或幾己全部份被毀了——例如史達林格勒，塞伐斯達濟爾、明斯克、勃德薩、基輔等——各該城均將重新計劃，一部份並將重建。第四次五年計劃規定建造一億平方米突的住宅區，其中的七千二百五十萬平方米突，將根據中央計劃由政府建造，其餘則由各工廠房屋建造，合作社及個人等建造，估計共需五百二十三億盧布，其中的四百二十三億盧布將作政府的建設及房屋建造之用，一百億盧布將作對個人及集團營造者的貸款之用。據估計，縱然這個計劃

能够完成，到一九五〇年時，也還不能保證使每個人得到四平方碼的住所，尚有二千萬人陷於無家可歸的狀態。——戰前人口增加的速度，每年約為三百萬人。而且目前由於缺乏水泥、磚、及木材等，使得房屋建造的計劃大受阻礙。為補充職業營造家工作的完成，曾在各界中發動自動的不受償的「星期六星期日工作」，他們是特別集中於對學校的重建及修理，以及其他在民用方面佔重要的建築等。

蘇聯官員們都自動的承認工業生產的重要的不足之一，是勞動的生產力。也像其他在從落後的農業經濟過度到想把大規模農業經營與高度工業化聯結起來的經濟的國家一樣，蘇聯過去沒有，而在最近將來也不會，有失業的問題。正相反，它的問題是缺乏熟練的男女來參加其新的工業，礦業，和提煉業等。這個問題戰前本已嚴重，後由於戰時人力的損失，（估計在軍隊與平民間損失的男女老幼約在七百萬到一千萬之間），由於尚須保留約近五百萬人在軍隊中，由於必須使戰時生產轉變為平時生產，以及由於不能從國民經濟中的某一部份轉換人力到其他方面，已使這個問題更趨嚴重。

為謀補救人力的缺乏，蘇聯政府會採取各種廣泛的方法。它已順利的將許多軍隊復員，包括蘇在德奧及軸心附庸國的佔領區內的軍隊等，均將他們恢復到礦山工廠及農場上工作。它採取利用強迫勞動的方法，利用判了廿五年有期徒刑的蘇聯政治犯以及德國的戰犯，後者據蘇聯計約有八十九萬六千人，西方觀察家估計約有二百萬到三百萬人。在國內方面，政府發動積極計劃，建立大量低級中級及高級的技術學校。以訓練各種工業上熟練的年輕人，並在各工廠中進行訓練的計劃，一九四〇年曾經發動一個計劃，號召每年動員一百萬的十四歲到十七歲的年輕人，進技術學校和工業學校，並成立一個國家人力保持局（一九四六年改組為入



力保持部），以指導上述學生的訓練。第四次五年計劃估計一九五〇年所需工人爲三千三百五十萬人，而一九四六年所能得到的工人估計只有二千七百萬人——還是一九三七年所達到的數字。

蘇聯政府顯然是不願增加勞動時間的。自從戰爭結束以來，八小時工作制已經恢復，限制超過工作時間。爲應付新的人力的需要，政府主張從農村中吸取四百五十萬新的工人，從城市中吸收一百萬新的工人，從各技術學校吸收二百萬工人，並對工人們重新加以新技術的訓練。爲使較不重要的職業中心人力轉移到較爲重要的部門中，曾把政府機關中的工作人員減少，並由政府重新訓練後，轉移到工廠礦山及農場中去，據聞此種辦法特別爲史達林所贊成。又擬定了長期的計劃以促進工業及農業中的機器化，對殘廢的軍人加以訓練及利用。又繼續限制工人的隨便轉業及轉移地區，但據親眼看到的報告說，雖有限制，工人們仍繼續轉業及轉移地區。

除了在工業及農業中設法增加工人的數目及提高工人的效率外，政府又用各種精神上的鼓勵，以刺激各人的成就，如遇這些手段失效時，即採用威脅辦法。目前正以特別的辦法使得目前在此較「軟性」的工作中的人們到礦場及農場中担任硬性的工作。例如在辦公室內担任行政工作的農業專家們的薪俸，要較在農場中工作的人的薪俸少百分之二十五。假若拒絕服從，即以取消配給證相威脅。以前政府官僚中所享受的特權已經減少，而且在任何可能的時候，行政人員都被轉變到工業及農業的「陣綫」上。對於斯塔哈諾夫運動更加注重。根據工人工作結果付給工資的政策原自一九三五年發動斯塔哈諾夫運動時即已開始，目前更被進一步的推廣了。如能超過已經提高了的標準產量，就以更高的報酬。這就是說，實際上工人爲要保持以前所得收入的

水準，必須更努力的工作。假若生產較低於新的比較高的水準時，則減少新給所得以爲懲罰。在農業工資的支付方面也有一個很大的改變，採取計時及計件工資混合制，計時制是以工作日計算，一律平等。目前按工作日付給工資的辦法已取消，今後農業工資也將根據其效率計算，使農場上的工作也接近於工廠中的工作。

據從蘇聯自戰爭結束以來有關經濟發展方面所得的消息看來，在過去廿五年來所建立的國家統制及國家計劃的經濟制度，並未根本改變。不過由於實際的需要，已在相當程度內影響了蘇聯的經濟理論或改變其具體的應用。目前在國營企業、集體農場、生產及消費合作社內都已注重採用蘇聯所謂「主動性」和「競爭性」的辦法，其注重的程度將使那些認爲蘇聯制度是完全遏制企業精神的人們爲之一驚。而在經濟報酬方面日漸增加的差異，即工資係根據個人的工作效率，不是像以前馬克斯的口號所說是根據其需要，也將同樣使得那些認爲蘇聯制度將產生一種一律平等社會的人們爲之一驚。由於安全及運輸上的考慮而使工業作地區上的分散，已經使得行政方面也有日漸增加的分散現象，關於國家計劃委員會所定計劃的實行，更注重於養成地方政府機關負責，而計劃委員會本身的計劃，也轉而根據其自全國各企業中所獲真正實行程度的報告而擬定。由於工業及農業的擴展，蘇聯領袖們更較以前深切感到需要以積極的技術訓練及給以相當的物質待遇，以便造成最高度可能的刺激，以取得及訓練能幹的經理人才，政府的行政人員以及熟練工人等。

戰後的蘇聯經濟也像戰前一樣，繼續受到一個沒有大量的外國貸款而想以最大速度由一個落後的農業國邁進到現代工業化國家的極不調整的困難，但只要給他們以能幹的經理人才和技術上的領導人才，在他們固有的本質和能力上，是並不會不足以達到可以與許多西方國家相比的經濟的，然在目前看來，若與美國的剩

餘的經濟比較起來，蘇聯的經濟實是一個匱乏的經濟。又有當蘇聯的生產能達到超過國內需要的時候——據美國有資格的專家們的意見，五十年內還達不到這程度——蘇聯才能與美國的經濟成就相比，蘇聯政府今後所將遭遇的試驗是能否在和平條件之下擴展其工業及農業的生產。——即不是在那二十五年來已成爲該國活動的特點的準備戰爭的狂熱空氣中進行生產以及是否能夠不僅創造一個重工業的基礎而且不能滿足其大量入口的消費需要，並實現一種可以鼓勵其作更大生產的生活水準，因而更推進其人類的幸福與享受。

蘇聯的領袖們深切感到與西方未經戰爭光臨的國家，尤其是美國比較起來，蘇聯所表現的落後與所受戰爭的破壞，他們對待美國態度的特點是，一方面嫉妒，一方面希望能有另一次大的經濟恐慌，以減少目前美國制度下的經濟利益，不過只要美國能給以貸款以復興蘇聯的經濟，莫斯科的嫉妒是可能減少的——而華盛頓的觀察家們也相信蘇聯政府已經不再像過去的那樣的不願接受大量外國貸款了，要想有效的對付莫斯科希望美國經濟恐慌的想頭我們只有決心使得我們自己的政治及經濟制度能夠成功，並如國務卿馬歇爾於六月五日在哈佛大學演講中所建議的給予感覺需要的國家以一切可能的援助。

（譯自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美國外交政策報告」）

## 蘇聯工業現狀

蘇聯意欲支配世界的和平條款，然其本身充滿着缺點，而沒有強勁的實力。關於這一點，參加和平談判的美國代表們，最近業已覺察到了。這種預感促使美國堅定其立場。不再向蘇聯讓步，整個世界因此所受的影響實匪淺鮮。

茲將在和平談判中足以影響美國代表的蘇聯現狀分述於後：

蘇聯幾無些微物資可以供獻於世界各國，共產主義的一切並不像理想般的易於出口。對德戰事結束後一年，蘇聯工業依然不振。蘇聯工業在目前和最近的將來都無法供應其它各國復興工業所必需的物資。它雖擁有大量軍隊，但其軍事力量因工業基礎不太穩固，所以在目前及此後若干年內實無力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戰爭。

同時，美國却有大量物資供獻給願意在它領導之下邁進的許多國家。戰火沒有毀損它的工業，而其生產力依然世無匹敵。它有大量動人的貨物賒賣給在饑餓線上掙扎的人們。它的軍事勢能既大且鉅，而且還獨占着原子彈的製造法。

目前和平談判有急轉直下之勢，美國貿易地位實有舉足輕重的微妙作用。

工業與軍事之本的鋼，在蘇聯的年產額約為一千二百萬噸。若和一九四〇年年產額一千八百三十萬公噸（一公噸合二二〇四、六磅）相較，可以反映出蘇聯鋼鐵工業所受戰事損害之大。回復一九四〇年工業活動

狀況以前，它必須修復被損壞的三萬一千個工廠，四萬哩鐵軌，一萬三千座橋樑，一萬五千八百個火車頭和四十二萬八千輛汽車，凡此種種，在在皆須鋼的供應。比較起來，美國每年產鋼八千六百萬公噸，美國工業非但不受戰事的損害，而且還大量的擴充了。

蘇聯電力生產約由一萬九千萬人服役，產量約為五百億瓦時（一瓦電力於一小時內所作之功為一瓦時），業已恢復戰前產量，約為美國電力生產與消費額的四分之一。

蘇聯石油年產量目前僅為二千萬公噸，戰前則為三千一百十萬噸。目前產量包括伊朗石油一部在內尚不及美國的十分之一。若干蘇聯大油田受德人致命的毀損，目前正在艱苦增產中。

煤的年產額為一萬五千萬公噸，殆已恢復戰前產量，但比較起來，僅為美國產量的四分之一。

這些是現代國防的基本要素，而目前蘇聯工業殊為衰落。由於人力充沛與幅員廣闊，蘇聯的國防固甚堅強，但其軍事外向力的基礎則不若美國。

依照它的新五年計劃，五年以後蘇聯的鋼產量仍將少於目前美國的三分之一。石油產量將為目前美國的四分之三。煤產量將少於目前美國的一半，而其電力生產將少於目前美國的四分之一。即使到一九六〇年，根據其預定計劃，蘇聯僅希望鍊鋼約六千萬噸，提取石油約目前美國產量的四分之一。而其煤產量則希望追及美國。

蘇聯工業的衰落，影響所及，遍及全國。蘇聯人民所需各種物品依然缺乏，若干年內生活水準無法提高。職是之故，蘇聯政府擬使其人民對於國外高水準生活狀態茫然無知，而以壓力維持其嚴格的孤立政策。以

國外言，若干年內它缺乏物資以供應它國，因此將減弱其貿易地位，而英美則地位無形中却給提高了。

若欲修復所受的毀損，並使二千五百萬流離失所的人民有家可歸，蘇聯必須擴充其建築事業。但蘇聯的水泥生產少於美國的三分之一。它希望五年以後水泥產量較多於美國產量之半。

經過四年滯緩的生產以後，汽車與貨車在世界各處都極需要。蘇聯在平時，每年最多僅能製造二十萬輛，這表示它能輸出國外的，為數甚微。到一九五〇年它希望年產五十萬輛汽車和貨車。而美國在明年即希望能製造七百萬輛之多。

食物的生產在蘇聯及其統治的領土以內頗有大量增產的可能，因此它可以多餘的食物作為對外貿易之用。其人民的食物可逐漸恢復較高的標準。蘇聯計劃到一九五〇年時每年能製造二十萬以上供農業生產用的牽引機以與美國競爭。

但是衣服的供應在長時期內恐不會充裕。蘇聯人口雖較美國多五千萬人，而其棉布的生產較美國的一半還少，即在五年以後，其計劃僅較美國生產額一半多些，蘇聯毛織品的生產約為美國的四分之一，戰後第一個五年計劃可能較美國生產額的三分之一多些。

同樣地，蘇聯皮鞋的生產量遠不及美國，約為後者的三分之一，五年以後，希望能及目前美國生產量之半。

蘇聯的產紙量僅為美國的十六分之一。五年以後的計劃僅為美國之十二分之一。

凡此種種足以闡明蘇聯遭遇的嚴重問題。蘇聯若欲取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而代之，其工業方面必須大量

生產，使人民的生活水準與其它國家相若。

由於戰爭的毀損，蘇聯的工業事實上僅與第一次五年計劃以前的一九二八年相等。它希望五年以後約可恢復一九三九年時的成績。蘇聯若擬大踏步和美國一爭領導的地位，最早要到一九六〇年。然而，蘇聯却真在硬幹下去，他們沒有罷工的風潮，工人們遵照政府的命令和意志在刻苦地工作着，工人的權利和工資係按件計酬，他們的工作是在飛速躍進中。

這裏是二個很好的例子：據真理報的記載，在克里伏洛葛鐵礦工作了二十五年的米脫羅法諾夫（Mikhov andov）因在預定時間內超出規定工作成績三十八倍，竟得民族英雄的榮譽。據消息報記載，拉克曼甯（Rakmanin），一個著名的瓦匠，因砌磚速度造成新紀錄，而得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佔一席地位，他在冰點以下的氣溫，八小時之內能堆砌十五萬四千一百塊磚，這是他保持的紀錄。

蘇聯報紙忽略增加工資和權利的消息而競載工人的生產紀錄，藉與國家重建和挽救工業的初衷相符。

在與美國競爭世界首席地位的今日，蘇聯能够供應其它國家的物資實在太少了。他們統治國境以外一萬七千萬其他國家的人民，他們雖擁有大量的人力，但缺乏工業上的力量與美國競爭，美國能供應大量物資以取得國外的人心，藉以維持寶貴的友情。在此場合之下，貿易地位的首席寶座唯有美國始能保持，殆無疑義。

（譯自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新聞週刊）

# 剖析蘇聯外交政策

伊特曼

我們的政治家現在對付史達林的政策，正有如張伯倫對付希特勒的政策，他們忽視了他對他的信徒們所發表說明他行動趨向的粗率政策聲明，而注意的却是表面諧和的會議和外交辭令，在這些場合，史達林可能藉愚弄他們，叫他們相信他不致有什麼行動，去穩穩他們的心。

當他冷冷地推行他的計劃時，我們的政治家爲了自己的安適，爲史達林想出了各種藉口，如他爲「安全」而感到不安，他「不信任美國」，他需要石油，他被他的將領們操縱等等，而當這些藉口都不適當時，他們只有驚惶地舉起手來，什麼是蘇聯外交政策呢？蘇聯外交政策到底是什麼呢？邱吉爾說蘇聯外交政策是「謎中謎」，肯納弟（美國前駐英大使）說「蘇聯世界政策或係是目前國際關係中最重要和最把握不住的因素」，參議員范登堡說「我們時代的最大謎團是「蘇聯現欲何爲」？美國人民領袖不論是共和黨或民主黨都沒有一個人有勇氣面對非常明白的事實。

只有不識字的人忽視史達林現在的行動趨向或對牠有一點懷疑才有藉口可說。史達林要做什麼明明白白寫在他所簽字並近經他修訂的一本書上，這本書經他許可已譯爲各種文字，賣出了好幾百萬本，全世界各地的信徒認爲這是教本和指導行動的典範，這本書可以用一個下半年功夫把牠看完，綜合地提出十點主題：



史達林寫了一本書叫「列寧主義問題」，這裏摘出其中一句話，可以說是蘇聯外交政策的一定指標。

「蘇維埃共和國可以和帝國主義國家共同生存，以垂永久，是不可想像的事——最後不是你征服我，就是我征服你」。

帝國主義國家也就是指的我們，告訴你，這不是史達林在一九二〇年代所說的話，不是在和希特勒締結協定以前所說的話，不是在戰前所說的話，不是在上個星期所說的話，也不是在昨天所說的話，這正是他現在用三十種語言向幾萬萬人民所說的話，這本書（內容有如前途提示了我們的命運）現在運銷美國，用很好的英文譯出，賣二角五分一本（註一），參議員范登堡，美國前駐英大使肯納弟讀過這本書嗎？杜魯門總統和貝爾納斯國務卿讀過這本書嗎？

最近的蘇聯版（一九三九年經史達林批准）（註二）載有下述關於基本原則的進一步說明：

我們革命的國際意義，在於我們的革命是從蘇聯發動，摧毀帝國主義制度的開始……這是世界革命的第一步驟和會今後發展的強大基地……蘇聯是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他不是世界革命的基地，將是什麼呢？這是史達林對他本黨一部份同志的答覆，他的同志們以為他致力清除他的本黨布爾希維克的同志，已拋棄他了，他們在「布爾喬亞」國家製造混亂，進行「摧毀資本主義」和完成世界共產化的計劃，史達林很喜歡我們的外交官相信這種說法，但他不要他的同志這樣想——他們必須知道真實情形。

他們必須知道這將是一個流血暴烈不民主和無法紀的工作，筆者再從「列寧主義問題」一書引出一段，這本書和史達林所著的「共產黨史」可說是世產共產主義的聖經或「我的奮鬥」。把舊的布爾喬亞制度急刻

地改變過來能够不靠暴力革命，不靠無產階級專政完成嗎？自然是不能的……

獨裁的科學觀念也就是指直接寄於暴力，不受任何法律限制，或受任何絕對規則的權力。獨裁就是無限的權力，寄託於暴力而不寄託於法律。

這是史達林引用列甯的話，爲我們的前途所畫的輪廓，這是他所講的話，也就是他所要做的事。

他不要他們美國信徒對於這點有任何混雜不清，他不要他們對他在戰時被迫對他布爾喬亞盟友所玩弄關於和平與民主的那套戲法看得過份認真，因此，他讓他的代表維辛斯基發表了一篇演說，追述列甯這些倔強的教義，並明顯說明這些理論現仍是有力量的，他不願整個美國要看到這本書，或出乎大的意外，也蒙到我們大外交家入目，他同意將這篇演說譯爲英文，並由蘇聯駐美大使館發表，筆者從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蘇聯大使館所發佈的公報中引述兩句如下：

列甯清理了馬克思的教義，並指出了布爾喬亞社會平順進入社會主義這種悅耳的空話，這也就是說不在戰火中，不藉革命鬥爭而靠調協階級矛盾可以實現社會主義的過程。

列甯對「擊潰布爾喬亞國家陣綫」這個重要問題發揮了馬克思的意見……

知道列甯著作的人都知道「擊潰布爾喬亞國家陣綫」這一句話。這指的就是美國接管美國政府機關，把忠於自由企業和代議自治理想或具有這種習慣的每一個官員書記和助理書記驅逐出去，這就是說在刀尖威脅下，清除機關團體，藉即決的執法和拘留營清除各機關的民主傳統，並建立一個無情的一黨極權獨裁政權，接管並經營美國的工商業。

我們美國官員不管蘇聯大使館所發出關於美國本身命運的明顯警告，仍然認為蘇聯是和平與民主的朋友，他的古怪行動，我們必須努力去了解。我們的科學家繼續要求我們把原子彈的祕密告訴史達林，我們的同胞只堅持一點，即在蘇聯知道原子彈的祕密後，史達林同意接受六十萬萬元的貸款，什麼時候方便，什麼時候發付，在我看來，我認為將我們最寶貴的軍事祕密洩露給一個公開保證要以暴力推翻我們政府的暴君的建議是一個叛國的建議，巴魯區先生關於此一問題對聯合國委員會所提的提案，只好說對史達林所公佈的計劃盲目無知來解釋，但這種疏忽是無可原諒的，這是一般性自欺政策的一部份，自欺政策無異自招美國共和國的毀滅，並毀滅全世界的自由政體。

凡受過馬克思主義訓練的，沒有人不在時機成熟時才開始進行他的任務，因此這個毀滅的圖案，不致立即在美國予以施行，但史達林在十七年前說過下面的話，這是具有重要性的，史達林說：

我認為美國發生革命危機之時，已不在遠，當美國發生革命危機時，這將是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結束的開始（註三）。

史達林現在對「時期」是怎樣想法實在是個問題，要不然蘇聯外交政策明明白白地引載在上面，人只有故意裝傻才會在讀後還認為牠是一個不可解的謎。

最大的謎是，美國具有歷史空前未見極的強大軍事工業和科學實力，為什麼美國這麼軟，不敢面對政治

事實？

人們致力要建立一個阻止戰爭的崇高機構，但看看今天的情形發現有一個參加建設工作的強國却別有懷抱，這實在是叫人困惱不過的，然而這是史達林本人在他書籍和最近演說中所表露的真相，他對一般改革的態度可見下引，這仍是援引「列甯主義問題」一書中的話：

對於一個改革者，改革是萬能的……對於革命者却適得其反……改革被用做崩毀政權的工具……用做推動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據點。

上述對於改革的態度是整個共產黨促成「布爾喬亞世界混亂繼而奪取政權策略的基本。在史達林沒有對他自己的信徒頒發相反的訓示以前，我們必須認為他是以待其他改革的大儒主義看待聯合國，他利用聯合國以貫徹「崩潰」的目的，並作為「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據點，在這裏他迄今的行動又印證了他的所言，他說什麼就做什麼。

我們政治家的思想完全集中在世界和平的最大問題上，以致不能想像有任何神志清明的人會要破壞這個任務，他們沒有「職業革命者」的經驗，他們對於一個瘋狂相信歷史和人類命運理論因而認為在資本主義下談和平是虛偽，而戰爭却是革命工作大行動的人的心境不能想像。尤其是在原子彈發明後，這個是更想不到，然而這是史達林的心境，也是全世界他的心腹信徒們的心境，史達林對於和平條約是怎樣想法，下面一段存坦白確切的說明：

每次條約的締結，無非是為下一次新戰爭重整實力，這些條約都被稱為和約，簽署條約闡明了未來下一

次戰爭的原素，這些條約的簽署時常有一套關於和平的高調（註四）

史達林對於戰爭是怎樣看法，他在下面也說明了。

我們有一個難理解的非人的但極重要的盟友——就是資本主義國家間的衝突和矛盾……無疑問地我們權力和革命的最大支持是我們敵人間的爭鬥，衝突和戰爭，我再說一遍，這是我們最大的盟友（註五）

#### 四

這些原則在一九二五年他開始領導列甯的黨時宣佈，以後又一再申述，最顯著的一次，是他對黨代表大會發表的演說，那是一九三四年的事，他說：

時勢的發展現趨向一次新帝國主義戰爭，這次戰爭自將使若干國家資本主義的生存發生問題，也像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一樣，假如這一戰爭爆發後，布爾喬亞紳士們看不到那些他們所喜歡現在由「上帝榮光」統治的政府，請不要怪我們……（註六）

一九四〇年當莫洛托夫因蘇德締結協定而將三個波羅的海國家（史達林在這三國已將布爾喬亞陣線擊潰）提交給最高蘇維埃時，史達林在歡呼聲中又說：「資本主義世界要站開點，不要擋路！」

希特勒進攻蘇聯和隨發的戰爭自然沒有能轉移這些目標，羅斯福和邱吉爾對史達林所獻的慇懃不爲人所看重，史達林雖和他們談談民主理想，但他本着「馬克思主義——列甯主義的精神準備獵取下次戰爭的收穫，他的蘇聯共產黨（戰前已銷二千萬本）近又再版一千一百萬冊即將刊爲他的全集的第十五卷，蘇聯每

一個有政治感的人將讀到革命英雄史達林怎樣爲了執行列甯的真正政策（一個社會主義和世界革命而致力肅清間諜破壞者和叛徒）的故事，他們將讀到共產黨在史達林領導下如何解釋這兩個政策的關係，共產黨的解釋是：

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也就是剷除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不能認爲是最後勝利，因爲只要沒有消除外國武裝干涉和企圖恢復資本主義的危險，最後勝利都談不到，擊潰外國資本主義干涉的危險也得擊潰資本主義的包圍……共產黨認爲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對於聯蘇勞働人民有重大關係。

這本書銷了三千一百萬本——蘇聯每一識字家庭，都有一本（註七）但我們的政治家仍欺騙自己說，蘇聯現在熱誠地和資本主義國家合作致力穩定世界，但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正當他們努力合作停止戰爭時，他們因史達林的演說而感到驚訝，史達林在那天冷靜地對蘇聯人民發表演說，他說：「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制度下」戰爭不能避免。

他用直率不變和十足的馬克思主義辭句說明在資本主義下戰爭無法避免，他仔細告訴聽衆他仍然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是在談和平民主這一套時所顧不到的。）

他說：「認爲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任何一個特殊政治家錯誤的結果是不對的……」，（換句話說，從希特勒到羅斯福都有罪，或都沒有罪），事實上戰爭是基于獨佔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政治力量發展的必然結果，史達林說資本主義一天存在，就會定期發生——競爭市場和原料將「分散資本主義世界爲兩個陣營，戰爭亦將因此而起」，史達林根據這一個出發點，他把蘇維埃經濟十五年發展的主要計劃不以聯合國爲基礎。

## 五

在最近期內，史達林希望和強國保持和平，並必須保持和平，這是很清楚的，但慣于自欺的人，在上述相反的粗率聲明發表後，還是一心相信史達林對於聯合國阻止未來戰爭的努力是認真關切的。

史達林腦中一定很清楚，最近戰爭所剩下的只有兩個大資本主義強國，他所預見資本主義世界下次戰爭中對峙的「兩個武裝陣營」，只能由英國和美國領導，蘇聯的外交只要以史達林的馬克思主義為根據終將注視到這種最後可能。美英的聰明政治家也得經常記得不論史達林的目的行動怎樣，在這個發展中他的盟友不是美國也不是英國，而是英美之間的衝突，今天似乎能完全看清楚這點的西方政治家只有邱吉爾，但筆者相信，凡知道民主文明危機的人也將逐漸理解。

我們的外交人員說，他們在「調停」蘇聯和英國間的舊時民族野心，而事實上這却有利于世界共產革命，史達林的妙稱智勝過他們，我們對英國權力的每一阻止也就是極權世界秩序的收獲，不僅在筆者引錄的片斷裏，同時也在其他很多方面，史達林曾說英國和美國以及其他民主大國是「我們的敵人」他或將先打擊弱者和困難較多的國家，在英美之間他將優遇美國，但這只是因為這樣容易攫奪「衰落」的資本主義世界。

這樣說來，史達林的地位決不是甚麼「大謎」，而是極清楚的，他認為目前的局勢（我們稱為和平）是蘇維埃獨裁和牠的「敵人」（西方民主國家）間的武裝休戰，在休戰的局勢下，他將獵取美國內外的據點，以便他和他的信徒或他們的繼承者乘有利時機推翻我們的政府，並在美國建立一個獨裁政權，為爭取這些利

益，他將和我們的政治家週旋，對他們昧良心所提的任何意見協力「合作」。

這是任何強硬戰鬥者對他心目中與之作戰的仇敵所採取的態度，並不是史達林一人如此，史達林的性格是值得研究的，但我們的政治家尤應研究他所相信的歷史演進的教義，史達林自己常說他是列甯的「一個運命的學生」，共產黨尊奉的書籍是關於列甯主義的書，不是偶然的，列甯教史達林把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國家當做「敵人」，列甯也像希特勒或馬奇維利那樣明白地主張和敵人交往不講信義。

列甯說：「我們必須準備詭計，欺騙違法，制止和隱瞞真情」（註八）

他又說：「我們能並必須藉文字寫作，使人民大眾對那些不同思想的人憎恨，不滿，蔑視」。

史達林在早年就深信戰爭和戰爭的道德是進步的方法，從他為布爾希維克黨搶劫銀行直到他因為了「安全」和「不信任戰爭販子」而在資本主義世界攫取利益的今天，他始終是依循列甯的教導，就是在爭奪權力時，把道德原則併入權宜原則。

直到現在，蘇聯是能够尊重和資本主義國家間的事務合同的，她在這方面的行為很好，但她不能夠尊重和弱小國家間所訂的條約，在這方面，蘇聯在歷史上留下最大污點，愛普斯坦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新領袖雜誌撰文說，史達林政府在過去六年中，平均每三個月要違犯條約一次，我設想我們能不注意任何特殊（或是全部）的違法行動。但我們不能忽視這些行動的基本原則，就是蘇聯和整個資本主義是在戰爭狀態中（明顯或潛在），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訂約（不論是共同或單獨的），只是爲了貫徹破壞的目的。

假如史達林不信任美國，這是聖經箴言所說：「惡人在無人追逐時逃跑」的那種特別不信任，史達林不



相信我們易欺的奇蹟，他懷疑我們將繼續欺騙自己，無知他的政策，或是假裝認為他的政策是個謎團，他怕我們有一天會從他戰時以聯合國作戰領袖地位所作的外交諾言和聲明那一頁翻到他以極權，馬克斯主義者地位所發表的演說和文字，他給他所希望去完成任務的信徒們的訓示，等那天到臨，他怕我們會像他和他的老師列甯那樣地說，「蘇聯繼續長久和帝國主義國家共同存在是不能想像的」，或說我們更熟的話說，「世界不能長久趨於一半極權一半自由的狀態」。

## 六

只有一條途徑可以避免潛伏在上述各種事實中的戰爭，綏靖是沒有效的，就是沒有世界革命的哲學，獨裁政策也是不能綏靖的，因為他們的法令是由於對權力的欲望，你讓步一次，他接受了再要你讓步，你再讓步他又接受，這樣一直下去，直到非打仗不能生存為止，希特勒的例子，我們看過了，我們付出了代價，我們不要讓這個致命的大錯再犯。

要避免和蘇聯作戰，我們必須拋棄自欺和綏靖的政策，而勇敢地面臨事實，並竭力擊潰極權制度蔓延，我們必須要如史達林那樣硬直機智為極權革命努力的態度，來為民主撐腰，我們必須乘開始時反對侵略藉民主力量的集體行動，執行這個任務，我們必須藉麵包，機械信用和聯合國內外的一貫的忠實支持那些想建立或保存一個生活制度和基於自由的政府的各個國家和團體。

我們必須也以真理支持他們，把國務院中存檔的共產黨行動確實報告和蘇聯統制的計劃公開發表出來。

以抵制極權宣傳的洪流，我們必須符合極權國家中的默默反對者的希望而發言行動，這些沉默的反對者比我們中間熱烈擁護「共產主義」的人多得多。

目前的問題是自由世界還是暴政的問題，上面所說的是保持和平的途徑，除此以外，沒有其他比較軟和的途徑了。

註

註一、紐約國際出版公司。

註二、每一新版問世有若干不合時處被刪，另添新章補充。

註三、一九二九年五月六日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美國委員會發表的演說。

註四、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全蘇聯共產黨第十四次大會報告。

註五、一九二五年莫斯科區共產黨第十三次大會。

註六、一九三四年蘇聯共產黨第十七次大會史達林報告。

註七、此數字見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蘇聯共產黨機關雜誌布爾希維克所載。

註八、美國譯文有改正處。

「詭計及欺騙」譯為「策略及機智」「制止及隱瞞真情」譯為「緘默及避不表示」。

（譯自美國水星雜誌一九四六年九月號）

## 蘇聯外交的真實目標

FRANK GERYASI

信奉帝國主義的人們都應一讀托爾斯泰所著派霍姆的故事（*Tale of Pahom*）這是一個貪得土地的蘇聯農夫的故事，你們將明白，他的目的也就是一切帝國的終極目標。

派霍姆是聰慧，勤奮而且愉快，但有一天他開始不安份起來。他發覺，他的二十畝土地對於他的突然期求的安全和權勢太不够了。他委身於土地的獲得。他獲得愈多，需要的也就更多。

有這麼一天，一個神祕的旅客告訴他，在遙遠的地方，有一片烏黑而肥沃的土地，該地居民為淳樸的排希格民族，他們能售給他一天所能走遍的土地，代價為一千盧布。派霍姆乃到排希格族的居地去了。

排希格族的首領同意給予派霍姆他所貪圖的土地，但警告他，除非他於日落前回到同日拂曉時出發的地點，否則一千盧布將被沒收，黎明時，派霍姆自指定地點舉步出發，以測定他新田地的境界。

在他滿心貪得之下，派霍姆走得太遠也太久了。他環繞着上選的田地和牧場迂迴行進，想把他們包容於他的地產之內，當他回到約定地點時，適為日落西山時分，但他終於俯身跌倒，因精疲力盡而死了。

日本，意大利和德國的贖武主義者諒必都已讀過托爾斯泰的這個故事。而托爾斯泰的國人們今日正在歐洲，中東和亞洲企圖恢復蘇聯以前的境界及政治和經濟的勢力範圍，對於彼等可能遭遇的災禍，這篇故事正好是一個警告！

的確，蘇聯在歐洲僅僅取回了以前屬於他們的一切，在巴爾幹和中東蘇聯也不過重建了勢力範圍，以及重新運動獲取曾經因征服而保持過的特權。在亞洲，以前被日本奪取的旅順口，他們也已經重新拿回來了。蘇聯的外交政策直認是到處確保其邊陲以對付他日可能的襲擊。

但從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民看來，蘇聯行徑實含有帝國主義的氣息，實際上，蘇聯人是重新在採用幾有五百年歷史的舊政策。自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帝俄採用該政策締造了有史以來最大帝國之一。在其最盛時期，芬蘭亦在其版圖之內，它伸展到歐洲的大塊領土，囊括波蘭和比薩拉比亞，統治保加利亞，控制黑海，因此享受了達達尼爾的特權，佔有克里米亞，像巨人一般雄視於中國之前，勢力遠達旅順口。

締造帝俄雖費了四個世紀，但它的分割却是迅而且速，開始於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蘇日俄戰爭，而告段落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和平條約。

有史以來，蘇聯從未有過友誼的鄰邦，自從國際聯盟的集體安全制瓦解以後，蘇聯恢復了帝俄時代的政策。它想伸展勢力到波羅的海，重開達達尼爾，而在東方重建他們的勢力範圍。像帝俄時代歷代帝王一樣，他們想到處和人家做朋友。

一九三九年之夏，當希特勒建造「持續一千年」的帝國之計劃正在進行時，他想到東方的強國。覺察到德國野心的蘇聯想和英法聯合共同對付德國，但結果失敗了，希特勒對於此事洞察無遺。他深知史太林向英法提出的代價甚高——波羅的海諸小國；蘇聯和波蘭境界的重新調整；以及達達尼爾的特權等。這代價對於英國實在太高了，因為英國已保證過波蘭和波羅的海諸小國的領土完整。

但希特勒並無阻止之意。他通知史太林，德國準備承認蘇聯在波羅的海至黑海一帶的最初利益。談判結果，乃於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簽訂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但希特勒和史太林對於各該帝國的詳確境界之劃分未能意見一致，這是值得記載的一件重要事實。當時希特勒願意給蘇聯的是波羅的海諸小國，波蘭東部，比薩拉比亞和其他若干小地方，但他却不願允准蘇聯佔有芬蘭，左保加利亞設根據地以及控制達達尼爾和設立基地。

此後，蘇聯從同盟國方面所獲得的利益（以及同盟國的軍事援助）遠比從希特勒那裏得來的多。德國於一九四二年六月侵入蘇聯，證明希特勒無論在何種場合之下，都沒有遵守諾言之意。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德黑蘭會議使蘇聯西部邊陲深入歐洲，猶如它在帝國全盛時代保持的一樣。該會議並且認可蘇聯對於芬蘭和波羅的海諸小國的意圖，讓與比薩拉比亞，而且承認蘇聯在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的勢力範圍。

據英國前首相邱吉爾言，今日蘇聯正在達達尼爾要求根據地，蘇聯這種要求和當時向希特勒提出而被拒絕的初無二致，這可能是蘇聯和西方民主國家間的最大爭端，和往昔一樣，蘇聯需要各該根據地以「保護」達達尼爾。事實上，莫斯科堅持，蘇聯在無論什麼地方的要求純係安全起見而提出。蘇聯確實希望不被襲擊，但在任何地方安全終止而帝國主義的姿態開始暴露時，英美和其他各國實不能視若無睹。

特別是美國人，他們雖然深知蘇聯意圖重新獲得波蘭東部控制渴望已久的波羅的海沿岸，佔有比薩拉比亞以及在旅順獲得一個太平洋的出口；但對於蘇聯干涉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的內政的優勢，在伊期的軍事調遣，以及蘇聯對於在達達尼爾設立根據地和地中海地區如的黎波里坦尼亞應予托管之堅持，在在都使美國感

到抗隕不安。

蘇聯的拓展主義在經濟方面沒有明顯的根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除去波羅的海諸小國，波蘭東部和比薩拉比亞以外，蘇聯尚有足夠的天然資源以維持一萬八千萬人民的生存。它的耕地極為廣博。蘇聯領土佔有全球面積的七分之一，僅次於英帝國。蘇聯無理由需要更多的土地去耕種。他們不是一個人口擁擠和土地荒瘠的國家。

除了缺少橡皮和錫以外，蘇聯具備着現代工業所必需的原料，它也缺少足量的石油，雖然在它以前蘇聯界之內蘊藏的石油礦源較世界上任何其它國家為豐富。

事實上，蘇聯可以說是一個更大的美國，雖然不若美國的繁榮，但同樣是自給自足的。由於蘇聯的自給自足，其人民對於蘇聯在歐洲，中東和東方的行動發生了疑問，他們想蘇聯到底是爲了些什麼呢？

他們都希望明白「爲什麼蘇聯要干涉任何鄰邦的內政，甚至在並非鄰邦的國家如匈牙利和奧大利的內政上要求獨斷呢？它爲什麼堅持要達達尼爾的堡壘，土耳其之若干部份，而且向伊朗進軍呢？它在亞洲一定要有特權的地位嗎？擊敗日本，它並沒有出了多大的力！」

當然，干涉他人之事並非只是蘇聯一國的罪過，英國感覺到自己的帝國因蘇聯重新成爲世界強國之一而受到威脅，因此也積極干涉希臘和意大利的內政，甚至只要有些微傾向蘇聯陣營的威脅以及和蘇聯有利害衝突的其他地方，英國都積極干預其內政。在這一方面，英國有美國穩秘的幫助，由於世人的嚴厲注目，英國在巴爾幹中東和其他地方的謀略已昭然若揭。

但是蘇聯也拉下了鐵幕，由於缺乏正確可靠的消息以了解英國和蘇聯的行動，因此產生了猜疑、恐懼、憎恨和偏執的迷霧。

這一種迷霧蒙蔽了西方民主國和蘇聯間的關係。在這迷霧底下，一個新的戰爭正在形成中，好像若干河流灌注入一個海中一般的確實，任何人都理會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交戰國一方面是英國和它的聯盟，另一方面是蘇聯和它的赤色衛星國。在這一種衝突中，美國無疑的會幫助英國。

情形是沒有比這一次更慘絕人寰的了。在耶穌紀元一千九百四十六年而四十一一次主要的戰爭中，最近一次世界大戰是人類生命財產方面包括一切和最糜費的一次戰爭。

下一次戰爭也許是人類在原子彈爆炸中徬徨生存以前的最後一次戰爭了，然而，人們却暢談着另一次戰爭——並不當作他們的欲望，而是一種行將到來而不可避免的恐怖。

與蘇聯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是華盛頓官方和非官方談論時的普通題目。這已深深地銘刻在任何地方的人們腦中。報紙標題及無線電正為之嘶嘶力竭地呼籲着。當伊期在本年二月遭遇危機時，美國某權威評論家預言，蘇聯將於四月間侵入土耳其以強佔博斯福魯，而使歐洲瀕於戰爭之危機。

若干專欄作家指摘蘇聯意欲實現一九一七年革命的目標；「推翻任何其它社會秩序，在紅星之下將全世界統一起來」。以前的美國外交家如喬其厄爾（George H. Marble）等准許各報作反蘇性質的訪問，無異每日在和蘇聯宣戰，若干眾議員和參議員也參加這一種惡作劇的諧謔。

前駐蘇大使史丹特雷（Admiral William Standley）比較溫和的論調却給湮沒不彰了。他說對蘇戰爭的

可能性是「全然荒謬的」。他不了解人民爲什麼「要去談論它」他不相信，蘇聯有統治全世界的意圖，蘇聯在保加利亞的先入爲主和美國的在阿根廷的所作所爲，在他看來，亦無多大區別。

但從整個看來，這正是侵略主義者的野外演習日，當杜魯門總統之面，前英首相邱吉爾在密蘇里州富爾頓地方發表的反蘇演說，使對蘇關係更形緊張了。在該篇演說中，他譴責蘇聯在它與世界其餘部份之間樹立了一個鐵幕，此種言論引起了人們對蘇聯議論紛紛，却也收了澄清局勢的效果。一經邱氏發表演說以後，美國始領悟對莫斯科的關係業已變爲如何的惡化！

三月下旬國務院主持了一次民意測驗，測驗結果，發現美國人對蘇聯願和民主國家合作維持和平的信任已一落千丈，不信任蘇聯的增高至百分之五十二，僅有百分之三十四表示信任，而百分之十四感到「困惑」或「沒有意見」這些數字明顯地反映出演說辭報紙標題和評論家之論調間的衝突。

國務院的第一次民意測驗舉行於一九四二年二月，蘇聯至少在中途會和美國維持世界和平及繁榮的信念相吻合，此後若干年舉行的測驗顯示美國人對於蘇聯此種意念之信任已大爲增高。第一次民意測驗證明美國人民信任蘇聯與否各佔半數。大約百分之四十說是的，百分之四十說否，其餘的未加斷語。一九四二年底時投同意票的佔百分之四十六，投不同意票者百分之廿七，未能決定者亦爲百分之二十七。

但於一九四三年十月莫斯科會議，三大強國協議聯合以期軸心敵人即速傾覆時，對於蘇聯表示信任的計百分之五十五，抱懷疑態度者僅爲百分之二十六。

此後，信任蘇聯的人數常在百分之五十左右，而於一九四五年二月舉行雅爾達會議時昇高至百分之五十



八。當雅爾達密約使蘇聯獲得千島列島的消息洩露時，信任者的百分數隨之下降，後來稍微回復若干，但當蘇外長莫洛托夫和英外相貝文在倫敦聯合國會議席上討論英國軍隊駐留希臘是否造成世界和平的威脅而意見衝突時，信任者的百分數又再度下降了。

倫敦會議閉幕以後，當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亨德大學開會討論伊朗及西班牙問題時，表示信任的曲線下沉，而表示不信任的曲線却隨之上升，年將終時，不信任蘇聯的入數較信任的為多，計百分之四十四與四十二之比；時至今日，其數字為百分之四十五與三十四之比，百分之二十一未加決斷。

目前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和蘇聯之間的敵對態度已到如此程度？五年，十年，十五年或二十年之內是否將會發生另一次戰爭，幾乎端賴三大強國是否能夠打消相互間的不信任，遏制各自的野心，鎮定他們的恐懼心理，消散他們的憎恨，抑制他們的驕慢心和超脫他們的偏執心理。

每一方面都有統治世界和消滅敵人的陰謀，二方面而都常常是很善良的，同時也常常是很邪惡的，各陣營的領袖們同意他們必須「合作」，而且必須互相了解，俾能避免戰爭，但根據過往經歷，沒有一方面會赤誠合作過，即使在對抗軸心國的聯盟時期；二方面也從未奮力以求彼此了解的要素，——去除相互間的仇視心理，事實上，自從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開端以後，西方民主國家和蘇聯之間的合作和了解是顯然缺乏的。

二十九年以來，事實上，二方面是在思想戰的狀態中，其衝突發軔於自由企業和國家資本間的根本積不相容。可能世界上沒有二種制度同時存在的餘地，但也可能有的。如此說來，任何方面都未嘗證明有此可能與否。例如，一九二七年時史太林在克里姆林宮召見美國工人代表團，史太林對他們所說的話未能緩和西方

民衆對於社會主義狂濫怒潮之恐懼。

『在國際革命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中』史太林對他的訪問者們說：『行將出現有關世界重要性的二大中心，其中之一是拉攏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國家之社會主義者中心，另外一個將是資本主義者中心，凡有資本主義趨勢的國家皆歸之。這二個中心之間爭取世界經濟統治權的戰爭，將決定整個世界上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命運』。

蘇聯被資本主義敵人包圍着，二者不能永遠同時存在，這是蘇聯或他們的共產階級所堅持的觀念，蘇聯緩和和共產主義恐怖的最大一次嘗試是一九四三年五月的廢止第三國際。由是蘇聯乃正式取消了赤化世界的手段，然而在當時，第三國際似乎不能用作世界革命的工具。社會主義的種子已廣佈於世界各處，而且已在東西二半球的很多地方萌了芽。南美洲、中美洲、加勒比海諸國家，不列顛共和國，歐洲和亞洲如火如荼的左翼運動無疑的是受了俄國革命的影響。

左翼運動如何應直接由第三國際的宣傳和策動力負責，該運動的發生有多少，是由於現存社會不公平而使然呢，這是很難評價的一個問題。無可否認的，蘇聯極力使其反資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廣為傳播，照理論講，這一種計謀在戰爭時是該斂跡的。

實際上蘇聯確緩和了他們的宣傳活動，尤其在美國和英國。然而自從對日勝利日以後，共產黨的方針又再度在世界各國漸見明朗化。蘇聯的宣傳政策似乎是（一）設法使蘇聯的權勢成爲國際關係中的一個因素。（二）促使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發生齟齬和衝突。（三）利用國外民主進步份子以壓迫他們的政府使各該國的政策

和蘇聯所提倡的相吻合一致，而同時(四)反對外圍的左傾份子；因他們對於民主之效忠較強於他們對於蘇聯民主的同情心。

然而，民主主義會強有力地和共產主義鬥爭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美、法、中和其他若干國家的軍隊進入蘇聯境內，表面上是防止德國和日本進入，因蘇聯軍事崩潰所造成的真空地帶，而實際上是防止馬克斯主義的國家之形成。民主主義的目標是够偉大和高貴的，但試觀過去歷史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若干事件，這一種目標之高貴很難使蘇聯人信服。

例如，凡爾賽條約建立著名的庫松界線 (Cutzon Line) 為新獲獨立的波蘭劃定東部邊界。然而波總統匹爾祖次岐將軍 (Marshal Pilsudski) 和其部下反對這種境界的限定。波蘭的地主爵士在傳統上極想統治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當蘇聯無力防禦上述地區時。

在匹爾祖次岐將軍統領之下的波蘭軍隊，利用蘇聯在國際間所處的窘境和軟弱，乃進駐庫松境線以外的蘇聯城市維爾那 (Vilna) 和明斯克 (Minsk) 當時蘇聯準備接受深入蘇聯國境之內的波蘭境界。但匹爾祖次岐要求佔領蘇聯的其它領土，統治波羅的海和黑海地區以及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他的要求如此悖理，因此英美政府立刻請求波蘭退回庫松界綫。

然而波蘭對於蘇聯領土的欲望是貪得無厭的，匹爾祖次岐下令侵犯烏克蘭，佔領基輔，甚至想奪取彼得薩。蘇聯人民乃加抵抗，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聞名遐邇的蘇聯英雄波第尼將軍 (General Budenny) 領導之下，將波蘭人自基輔驅回華沙。取道但澤而來的英國軍火及法國的麥克沁，衛貢將軍 (General Maxime Wey

gan) 之指揮防守波蘭首都使波蘭不致併入蘇維埃版圖之內。

華沙解圍以後，接着便是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八日里加條約 (The Treaty of Riga) 的簽訂，波蘭由是得到很大一塊蘇聯領土（以及四百萬蘇聯人民），但遠較匹爾祖次岐進攻以前蘇聯願意賦給之領土為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前的若干年多事之秋，沒有一件事能完全證明蘇聯對於其鄰邦以及利用各該國家作為攻蘇的跳板之恐懼是有所依據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發生的事情，僅證實了蘇聯的此種恐懼，而使蘇聯對於西方民主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每一次維護和平的行動發生一種不能磨滅的猜疑。

國務卿貝爾納斯建議英、法、美、蘇四國訂立二十五年軍事同盟以對付德國與日本，唯有病理學上所謂不安全的感覺和心理上不信任資本主義美國的種種動機才使蘇聯輕覘此種建議，貝爾納斯看透了蘇聯的精神病態才有此建議。像一個精神病治療專家一般，他用去除病源的方法去治療其精神病。他推理到，假使蘇聯得到德日解除武裝的保證，它便沒有什麼懼怕了。然而敵人（尤其是德國）的解除武裝，已不再是蘇聯思維之一環，這是貝爾納斯失察的地方。

設若貝爾納斯的建議能在對意，甚至對日勝利日左右提出，蘇聯或許已經接受了。一年雖又過去，然而在德國，甚至英、蘇利害衝突的任何地方，沒有一件事情能誘導蘇聯鎖定它根深蒂固的恐懼心理，也不能使英國感覺到將來能夠獲得安全。

英蘇間的敵對，其關鍵所在是戰後在德國和中東所發生的若干事件，第三次世界大戰正在德國境內醞釀

中，當確定德國境內各佔領區時，英國和蘇聯分割了舉足輕重的普魯士。普魯士是德國境內醞釀戰爭的中心，它具有原料和工業，港口，侵入低國（The Low Countries）和波蘭的大道，它是國內人口薈集之地——亦為商業中心，同時國都柏林也在普魯士境內。

相互猜忌的敵對者英國和蘇聯都深知普魯士的潛勢力以及它在未來戰爭中的可能性。

蘇聯外交政策的「黨方針」沒有比在普魯士更顯明的了。蘇聯正在支持納粹政權下殘留的共產黨和左傾的社會主義工人份子。他們希望在共產黨統治之下製造一種勞工運動，他們使人民大眾幻想到一個統一而強盛的蘇維埃德國。此種技術和使用於南斯拉夫者如出一轍，而且和在狄托統治地區一樣，德國境內正流佈着一種新生而強有力的國家主義。

好像在意大利一樣，英國在德國正支持着保守派的軍事和財政份子，社會民主黨以及共產主義的勁敵保守份子。而那些德國人也有劇烈的國家思想和復仇心理。對於上述二種狀態的危機，英國人和蘇聯人似乎都惘然無知。目前德國的政敵一旦聯合，將再行造成一個強盛的德國，這正是這世界的下一代必需與之競爭之勁敵。

蘇聯對德政策跡近造成一九三九年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外交。蘇聯希望用此政策以保障其西部邊陲，而保留德國之實力以對付英國和法國。在另一方面，英國的政策似乎在復用使德國的黷武主義針對東方之謀略。

二國的政策都失敗了。我們沒有理由相信他們不會再失敗，他們無可避免地將造成一個復興的德國，或

者彼此造成一次戰爭，這一種戰爭，我們將來是要被牽涉進去的。貝爾納斯向蘇聯建議二十五年的聯盟，是由於他無疑的認清這些危機，他是很熟悉這些事情的。而事實上非但蘇聯對此二十五年聯盟滿懷猜疑，即使是英國人和法國人對此聯盟也是看得很淡漠的。

造成目前混亂局面應歸咎於那一方面——英國人或蘇聯人——這是很難確定的。責任似應各負一半，而美國未能勉力以强有力的領導地位去避免此災難，因此也應分担些責任。

報導地中海戰事的若干人士根據個人的經驗深知；對意勝利日很久以前，事實上亦即一九四二年秋厄爾，阿拉明（El Amein）的決定性戰爭結束以後，英國以前曾聲嘶力竭地呼籲建立一個根據大西洋憲章的新世界，當時却消聲匿跡，隻字不提了。一旦獲得勝利，理想便一變而為強權政治的意圖。

當我們以通訊員身份奔波各地時——在意大利，法國，希臘和中東——英國官員曾談到蘇聯是下一次而且是最可能的敵人。一九四三年十月，當我們開始對意大利的流血征戰，而對德勝利似乎還很遙遠（雖然有把握）的時候，在巴利（Bari）有一個英國高級軍官公開談稱與盟邦蘇聯的戰爭行將發生，我們若干通訊員聞及此言，大為震憾。

當然這也是很可能的：假使在蘇聯的通訊員也有同樣的採訪自由，他們一定也會聽到蘇聯人對於民主主義同樣敵對的論調。蘇聯方面的戰事未能充分報導，乃是最大的一種過失，要不然，聯盟國間的敵對便煙消雲散了。

蘇聯新聞檢查的徹底，美聯社駐莫斯科通訊員在三月五日的經歷可資證明。在他投到蘇聯郵局二十四封

電報中僅有十封到達目的地。其中一封的二百字被蘇聯檢查員截剩了五十一字。

貝爾納斯國務卿會再三強有力地抗議蘇聯的檢查制度，但至今得到的僅是相反的效果。蘇聯的檢查制度是「治療性的」也是「預防性的」，那就是說，假如使蘇聯對於你所寫到的感到不滿意，他可以把你從蘇聯境內驅逐出去，你的急電給他們截削而你竟不知道被去掉的是些什麼呢。

蘇聯通訊員可在美國各處自由旅行，而將所見所聽和學習到的繕作報告，美國和其它聯合國的通訊員們在莫斯科猶如被禁錮在獸欄內，很少允許旅行，也不准許自由報導。美蘇之間缺乏新聞報導的互惠精神確是很嚴重的一件事。

然而，強國間的衝突，最主要的是蘇聯和英國。在過去和現代的歷史中，我們發現充滿着英蘇不和的根源。五百年以前俄國在伊凡三世（Ivan III）治下成爲名符其實的國家，而到伊凡四世時始成爲一個帝國。

以歷史言，被大陸所封鎖的蘇聯極想伸展到海洋。在伊凡三世和伊凡四世之間一世紀內，波蘭，立陶宛和瑞典曾經侵入俄國領土。伊凡四世在十六世紀中葉時，以波羅的海爲其外交政策的目標，而與侵略者經過很長的戰爭並獲得勝利以後，竟達到了目的。

但伊凡四世的承繼者們都是很懦弱不過的。得芬蘭和立陶宛援助的波蘭人和瑞典人乃再行侵犯。直到十八世紀初期彼得大帝即位後，俄國始復興爲一個大國。當時它乃變成一個可能的歐洲強國，而彼得稱他的新邦聖彼得堡爲蘇聯的「歐洲之窗戶」。然而波蘭依然保有着俄國的西部諸省。

喀德麟二世（Catherine II）的統治乃俄國真正帝國榮譽的開始。她打了許多勝仗，恢復了給波蘭兼併的

領土，而且伸展俄國境界到黑海沿岸。亞力山大一世在一八〇一年至一八二五年間向西擴展勢力，深入歐洲，是英國認為它是一個強大的聯盟，而且，也是一個可能的征服者。

英國和俄國共同征服了拿破崙，一八一二年莫斯科降服以後，亞力山大的軍隊在解放戰爭中將拿破崙追趕至巴黎。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以後，亞歷山大一世被尊為「歐洲的拯救者」。對於俄國在戰爭中的勝利和獲得被解放人民之愛戴，當時英國並不較今日更為悅意的。

此後，英蘇二國在爭持歐洲霸權時，一變而為緘默的幕後敵對者。今日所發生的事情僅僅是往昔衝突的必然結果。（譯自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柯里爾雜誌）



## 論蘇聯外交政策

到今年十一月時，蘇聯又將紀念其三十週年的生日了。

一九一七年共產黨革命的時候，一個農業經濟佔重要成份的蘇聯，還未列於那些進步的資本主義國家之中，根據馬克斯的理論，無產階級的獨裁是要在這種國家之間，首先建立起來的。

但「歷史是不能原諒革命家的遲延的」，列甯在布爾塞維克革命的前夕這樣寫道，「他們在今日已可取得勝利」。但在同時這位蘇維埃國家的首創者也充分知道新建設的蘇維埃政權的容易損壞。

「假若資本主義世界能有一盎斯的團結」，他有一次說，「我們連二十四小時都不能生存。事實上」竟然沒有人來推翻我們」對於他實在是「最令人驚異的事」。

到一九四一年六月納粹進攻蘇聯以後，列甯早年所恐懼的事，竟然成了一個現實的威脅。但適與他的理論的推測相反的是，資本主義的盟國反而幫助這個極受壓迫的蘇聯了。

在第一個無產階級國家的短短一代的時間中，竟然有過極大的變化。從一個脆弱的國家組織，已有一日千里的進步，目前已成爲世界兩大列強之一了。

蘇聯在一開始即遭遇到一個極難處理的問題，即將來的邊界問題。即一個具有各種種族的蘇聯將來還是成爲一個單位的國家呢，還是分化爲無數較小的國家單位呢？

僅在經過多年內戰和外國干涉之後，以前帝俄的一大部份才重新團結，成爲目前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由於內戰時的軍事上的合作，才使得俄國各個領土部份間得到軍事的聯盟，這是走向以後聯邦基礎的第一步。

在內戰停止以後，由於各個蘇維埃共和國間需要經濟合作，以復興國民經濟為目的，造成結為聯邦的第二個條件。

以後的若干年中沒有什麼變化，蘇聯領土獲得極大的擴張。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蘇聯所歸併的計有東部波蘭、東部芬蘭、東普魯的一部份；三個波羅的海的共和國——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這樣一來，蘇聯共和國的數目已增加到十六個；還有比薩拉比亞，北部巴庫惟納及喀爾巴阡山的烏克蘭，南庫頁島及千島羣島一帶。總計歸入蘇聯的領土共有二十六萬餘方英里，人口二千三百萬人。

然而蘇聯的政治軍事及經濟的勢力還不限於目前的蘇聯邊界為止。她由於經常顧慮到對於蘇聯本土發動攻擊的可能性以及出於安全的需要，布爾塞維克已經沿着西部及東南部邊界一帶建立了一些具有對莫斯科表示「友好」政府的附庸國形成一連串的安全帶。

在以前，列甯常常指責帝國主義國家「想以財政上的聯繫及經濟上的利益來把那些小的政治上獨立的國家拉到各國的鬥爭之中」。

也就恰好是這種同樣的技術，似乎目前已為克里姆林宮中的人物所學習了去，並且正就最大的利益加以利用。蘇聯政府運用各種經濟財政及軍事的協定，已經把各隣國歸入蘇聯集團以內，並使他們的政策和行動都與莫斯科的相一致。

共產黨們都把蘇聯當作一個位於中間區域的政治軍事經濟及思想上的重心。

蘇聯專家的意見一致認為，在蘇聯仍然面對着非蘇聯型式的社會時，蘇聯人民是不能安枕就眠的，而所謂「國家的死亡」也不可能在共產主義的蘇聯出現。在蘇聯高等教育部最近所舉辦的一次講演，以後又分印十萬份散發的講稿裏說：

「當資本主義的環境為社會主義的環境所代替，資本主義的干涉和恢復最後被克服的時候，國家才會死亡……；史達林已經斷定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還未在國際的規模上取得勝利的時候，國家是不會死亡的。所以蘇聯的要求安全是與建立世界的共產主義蘇維埃相一致的。

最近美國的副國務卿艾其森指出蘇聯行動的特點是「侵略和擴張」。對於這種觀察，凡是住在蘇聯以外的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會反對的。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這種蘇聯擴張的新的爆發是否就可解釋為蘇聯愛好戰爭的企圖，以及是否即表示蘇聯目前已準備接受新的世界大火的危險。簡言之，蘇聯是否是真正需要戰爭以及目前已經在準備戰爭呢？似乎只有少數的專家才會相信這種情形的。杜勒斯認為蘇聯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除了尋求「安全」與「機會」以外，就是「和平」。

然而杜勒斯也沒有忽視下面的情形，即共產黨領袖方面可能有估計上的錯誤，以及蘇聯的侵略有使世界和平忽然中斷的危險。

國際局勢對於蘇聯憲法發展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根據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的蘇聯憲法，明白承認「

芬蘭的完全獨立」，「亞美尼亞的自由自決」，以及俄國自伊朗撤兵等，這個組織的法律後來完全塗上了俄國的名字，這是故意使得蘇聯成爲一個流動性的國家組織，具有各種向外擴張及歸併的可能性。

在一九三六年的憲法裏，已可預見到新共和國加入蘇聯的可能性，並在第十四條列有規定。自從一九二〇年以來，史達林就主張一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均得自由加入蘇聯，無論他們是已經存在或是將來將要出現的。

另一方面，憲法第十七條也規定各共和國有退出蘇聯的權利。

美國的憲法早在一百六十年前左右即已成立，現只有過二十次的修改，而蘇聯憲法每兩年就要修改一次，一九三六年的新憲法裏，由於危險的國際局勢。對於民主理想已有某種讓步。

新憲法已經不是內戰以後最初那些年裏的軍事文件的性質。鑒於兩條戰綫的戰爭威脅，爲要保衛國家，必須將政府權力的社會基礎儘可能的加以擴大。

對於以前應在排除之列的人民集團也成立了和平。在理論上，甚至「以前的高利貸者和政治警察目前也都加入了無產階級的隊伍」。

然而規定蘇聯人民政治權利的蘇聯憲法上自由的各節，絕不能視爲即代表目前的情勢，這只能當作將來蘇聯立法的主要原則。

蘇聯由於建立免費的醫藥服務，普及初等教育，對工人的社會保險，對母親及嬰兒的國家的保護，婦女的一律平等，包括做同樣工作可得同樣待遇等，已經奠定了社會民主的基礎。

一九三六年的憲法已允給予蘇聯人民以言論，出版、遊行、集會的自由以及人身及家庭的不可侵犯等，但這些自由都還未實現，我們應診記着蘇聯憲法絕不把前四項的自由當作不能讓與的基本權利，而是爲了「加強社會主義制度」才把這些權利給予蘇聯人民的。

根據共產黨對於自由的特別的概念，所謂自由並不是指得以免除國家干涉的自由，只是得以脫離資本壓迫的自由罷了。無產階級獨裁過去是現在仍然是蘇聯政府的基礎，而且照現任副外長維辛斯基的話說來，蘇聯的國家是一種「新形式的國家」，是獨裁的民主。

在蘇聯一九三六年的憲法裏，對於國防的能力極爲重視，後在憲法中又間接涉及集體安全的概念，並在憲法的修正案中允許給予蘇聯最高委員會的主席以「任何時期如爲實現有關對抗侵略之相互防衛而須實行其國際條約之義務時」，得有宣戰之權利。

憲法一百二十四條仍然保證蘇聯公民得有「反對宗教宣傳之自由」。

在一個國家的生活裏，內政與外交是不能分開的。一個國家的內政與外交之間總是不斷的相互具有影響，蘇聯的內政無疑對於蘇聯的外交關係也有很大的影響，毫不容忍已成爲蘇聯外交政策上一個極顯著的特點，當維辛斯基在聯合國第一次大會上發表下列言論時，已經完全明白的表現了這一點，他說：

「我們絕不接受容忍——我們已爲他付了太大的代價」。

懷疑和不信任也是蘇聯外交政策的另外兩個基本特點，他們常被引用來防衛蘇聯的各種外交行動，否則這些行動就成爲不可瞭解，經過了一代時間之久的對於自由世界的孤立，對於那些批評蘇聯制度和生活方式

的人們的懷疑，已經成了蘇聯官方的一種習慣了。

當然，懷疑也能够是很真實和合理的。在革命以後最初的那些年裏，對於外國的懷疑一部份是由於內戰時期外國的軍事干涉而來的。到希特勒登台以後，自然更有許多新的理由保衛共產主義的國家以作應付萬一的準備。目前由於恐懼對於第二步的擴充政策有所反對，自然也容易造成蘇聯的不信任。

不過懷疑也能够入為的製造起來，這常是極權國家技術的有機的一部份，以使人民保持在一種高度的緊張之中。一個不斷出現的毫無來由的外國戰爭的幻想，可以用來作為藉口，好使蘇聯的日常生活陷於悲境，並將消費品不斷減少，以便對蘇聯人民作更大的榨取並使其作更大的犧牲。

人們都知道無數蘇聯的公民從小都被養成一種觀念，即他們是生活在「資本主義的包圍」，經常恐懼外國進攻無產階級的祖國。

共產黨的報紙無線電每天都在宣傳要人相信蘇聯社會是最前進最進步的民主形式，而美國是沒落腐化失業的國家，教育程度低落，種族間不相容忍，獨佔資本，政治和社會落後，蘇聯的民衆是否完全相信這一套說法呢？蘇聯人民中是否還能有一部份人民保持獨立的判斷，不接受這種排外的教條宣傳呢？

幸而，各觀察家都似乎一致認為「蘇聯人民尚無渴望戰爭或對美採取不友好態度的徵象」。美在戰時給予蘇聯的援助，是不能不受普通蘇聯公民的注意的。

在反抗軸心的所謂保衛祖國戰爭的期間，又有一些新的思想加入到蘇聯政治裏去，即承認歷史的傳統，蘇聯的愛國主義，斯極夫人的團結等。

然而雖有這種薄弱的國家主義思想的表現，在基本上講來共產主義蘇聯的思想仍與革命以後最初的那些年裏一樣。馬克斯和列甯的理論目前仍被認為共產主義國家的官方的教條。

蘇聯竟然重生了意料不到的國家主義，縱然是研究蘇聯的真正的學者也不能不天真的說蘇聯共產主義的「大大退步」和沒落了。

關於蘇聯外交政策的性質及目的的解釋也是同樣令人迷惑的事。蘇聯目前的擴張主義究竟僅是革命以前沙皇外交的自然而合乎邏輯的繼續呢，抑或「蘇聯的帝國主義」，代表一種新的革命的現象呢？

前合衆社駐莫使科主任沙利斯鑿里明白宣稱「蘇聯的每一外交政策都必然是任何沙皇時代的外交部長所極贊成的唯一健全的政策……蘇聯目前的外交政策是什麼呢？遺和沙皇時代的政策是同樣的，只是有一個重要的不同之點，——安全。安全的觀念是蘇聯一切對外關係中最為重要的一點。尤其重要的是蘇聯獲得安全的第一步是要把以前帝俄一度所會要求主權的國土拿回來。

自從一九一九年以來，莫斯科即成爲第三國際的所在地，到一九四三年五月解散該組織。這是在蘇聯作生存的鬥爭中，滅除資產階級世界的懷疑，但這當然絕非表示停止各國的共黨活動的意思。

一部份作家由於忽略了共產主義在歐、亞、非各地的擴大以及日漸深入西半球，他們竟相信「蘇聯正自顧其內政之不暇，何能再從事於抽象的革命主義的宣傳」。

世界革命的夢想雖未在一九二〇年代及一九三〇年代實現，但仍未被共產黨所放棄，他們甚至還繼續認爲「極權主義蘇聯政權的殘暴是正當的」。世界革命不可避免的到來，並非僅被遲延而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蘇聯領袖們都相信他們可以側身於德國與西方民主國家的戰爭之外，而成為歐洲的主人。然而對抗軸心的鬥爭竟未能變為階級鬥爭，實現共產黨所希望的無產階級的勝利。

另一方面，雖然由於美、蘇、英的聯合努力使得對抗納粹的戰爭獲得勝利，但蘇聯與各盟國間的不信任的情形又出現了。當資本主義各國一旦進入共產黨們相信不久即會到來的蕭條階段時，這種仇視的故意甚至還要變得更為劇烈。在共產黨的眼光看來，戰後的世界即代表一種革命的環境。

所以共產黨都期望各國的社會混亂，以便有利於他們，他們並想利用這些危機。根據他們的觀點，「若讓混亂平息下去」，於他們是毫無所得的。

莫斯科雖然最近正式宣佈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蘇聯制度可以與資本主義世界長期的和平共處，（這是列甯所極為否認的），但使我們對於蘇聯外交政策的原則和方向仍不能明白瞭解。

去年九月二十四日倫敦星期時報記者詢問史達林：「蘇聯與民主國家間雖有思想上的不同，是否尚有保持友誼及永久合作的可能」時，史達林鄭重的答道：「是的，無條件的可能」。

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他六十七歲的生日時，小羅斯福也就同一題目向他詢問時，他也重申他的信念，認為美國式的民主與蘇聯的共產形式的政府是有可能和平共處的。

但就同一來源所發表的其他的言論觀察，又令一些樂觀的觀察家們的印象陷於模糊。史達林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致伊凡諾夫同志的有名信件中，又與列甯採取一致的意見，即「蘇聯與許多帝國主義國家長時期的共存是不可想像的事。到最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史達林又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選舉以前發表著名的演說，在分析了兩次世界大戰的起原，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趨勢，以及鄭重指出每年必須增加鋼、鐵、煤、石油等生產以後，又重要的指出：

「只有在這樣情勢之下時，我們才能認為我們的祖國受到免除一切意外的保證」。

史達林又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手令中，警告蘇聯人民「無時不得忘記正在策劃新的戰爭的國際間的反動勢力，……要經常提高警覺性，對於國家的軍事力量與國際力量要盡量保護」。

蘇聯從其原來被排於國際之外的地位，即以一箇衛牛帶使其與其他文明世界相隔離的地位，目前已成爲國際中最有力量的一員——雖然還帶有一點恐懼心。

在列甯看來，舊的「資本主義的國際聯盟」，只是「魔鬼的廚房」罷了。爲了自衛起見才迫使蘇聯加入國聯。但日內瓦失敗了，根據社會主義的觀點看來，這是由於國聯是建築在「會員國純粹形式上的平等」，以及「計票的獸笨的制度」。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在要求安理會的決定應遵守大國一致的原則，在舊金山被通過以後蘇聯批准了聯合國憲章。

除了紅軍以外，聯合國似乎又提供了蘇聯一道新的防綫，蘇聯的附庸國以及宣傳蘇聯思想的歡迎的講台。

一九四五年蘇聯也加入了海牙國際法庭，這是以前革命的俄國所忽視的一箇組織。但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由艾登在下院所提出，並受外相貝文所支持的建立世界政府的辦法，在共產主義的俄國方面却極表冷淡。

然而蘇聯先在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繼又在安全理事會中堅決反對有效的國際控制原子能的辦法，特別引起了美國廣大羣衆的反感，他們認爲美國關於原子能的建議是世界走向和平，以及嚴格保證足以保持和平的第一個急進的步驟。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史達林否認蘇聯具有原子彈或其他任何相似武器。早在一個月以前，即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他甚至還想減低一般人對於原子彈所加的重要性。

在重要的科學家似乎都一致認爲在不久將來，大約在數年以後，蘇聯就可以獲得原子彈的「祕密」，具有兩倍或多倍的原子彈將要成爲事實，蘇聯甚至還可對於目前存在的設計加以改良。蘇聯這種技術上的進步對於國際局勢將有什麼樣的直接影響呢？

據勞斯威爾的預見，一部份反蘇份子可能在蘇聯邊未在武器上獲得平等地位以前，就對蘇挑動防禦性的戰爭。

但從戰略的觀點看來，這樣的戰爭不僅是危險的，而且也是困難的。

蘇聯的外交政策——很成功，很機動，毫不猶疑再不相信以前的公開外交——是綜合了蘇聯的地理，歷史和高度的馬克斯哲學的具體表現。

布爾塞維克爲努力達到他們的目的，是隨時準備拿出任何足以保證在一定情勢下達到最大成功的手段，今天所拿出的是一張國際主義的牌，明天也許拿出一張國家主義的牌，是一張保守的牌，也許是一張革命的牌，在共產黨的眼中看來，目的當然是較之達到這目的的手段，更爲重要。

最後分析起來，共產黨的最大希望，目前也像列寧時代一樣，是使全世界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狀況全部改變，蘇聯外交政策的基本目的是想使全世界能安然實行共產主義或蘇維埃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這兩大盟國間的關係，曾經危險的趨於惡化，在班漢的一篇論文裏甚至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禍根已經埋下，他認為這是在一九四四年四月的時候。

但世界上有無任何的希望足以阻止這兩大國墮落到用武力進行流血而勝利莫決的衝突呢？能否各自用其自己的方法和依照其自己的歷史發展的計劃進行光榮的競爭以爭取提高人類幸福的機會呢？

當然，誠如一位批評田恩夫人著作的人所指出，將來如何絕不僅在美國方面，如何以為定，也要看蘇聯領袖們的政策和希望如何，但究竟的情形如何，就連最近赴莫斯科的訪問者之間也沒有一致的意見。

史塔生認為莫斯科會議的失敗是由於波茨坦的協定的「懦弱和推諉」，這是一切簽字國都應負責的。於此，我們又遇到一個更為基本的問題，即對蘇聯擴張的堅決的反對，是否就足以保持國際和平與安全呢？

是否純用消極的態度就足以對付共產主義的傳佈呢？唐弼最近認為「蘇聯還沒有原子彈，但他們已經表示出有使西方人的靈魂變為非西方人思想的力量」。

美國外交政策的反共特點，在國外已引起極大的注意。最近又聽人說，「為要充份有效，我們的政策絕不應僅屬消極性質」。它必須是積極的，建設性的，主動的——不僅反對造成分裂的主義，也應發揮民主思想」。

不管對與不對，歐洲所希望於美國的不僅是貸款，也希望有精神上的領導。紐約時報編輯海利在亞洲（蘇聯、緬甸、印度除外）各地旅行了五個月以後，深信「亞洲對於形成生活方式和幫助其解決問題上所寄以最大希望的是美國而不是蘇聯」。

（譯自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一日紐約下午報）

## 論蘇聯帝國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的第一次真正世界大戰，所有的大陸都牽連在內，此次戰爭中及財產的損失是難以想像的，對於世界大部份地區的經濟都發生破壞的影響，這次戰爭也像上次戰爭那樣繼之以不安騷動及革命，但這次所引起的不安，騷動及革命遠較上次為懸延，各國騷動的程度也各不相同。

受西方列強保護或控制已達數世紀的殖民地人民現正取得自由，我們美國已把菲律賓解放了，印度、緬甸及錫蘭正變為不列顛聯合國中的自由自治領。

### 警察國的威脅

「但一種新的，更有威脅性的帝國主義——即警察國的——已來到世界，這種帝國主義不僅侵吞了殖民地人民並且幾乎泛濫到東歐所有的人民，其勢將淹沒西歐。

「現在我要申述的是今日有兩種很不同的人類組織觀念存在——一種已經有一個權利法案或者鼓勵一個權利法案，另一種既沒有權利法案而且也不鼓勵，用另一種說法來表達：有一種觀念是建立政府為個人服務，另一種觀念是個人必須服事國家。

「第一種觀念是人民是被信託的，經過自由及公開的討論後，由人民作最後的決議，政府必須迎合人民的願望，另一種觀念根本上不信任人民。把他們當成一羣無知的羣衆，掌握權柄的，知道得最多的是少數人；人民必須服從武力及控制性的教育，情報是專用以輔佐那些當權者使無訛誤的，但他們的決議可能是違背

人民的真正利益的。

「讓我們不要誤解這兩種人類組織的基本觀念的根本性質，我們已知道任何國家有人民自由決議的就是我們的朋友，我們已知道不管是在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的偽裝下，凡有獨裁權存在的地方就是自由人類安全及進步的一個威脅。」

#### 狡猾的宣傳

「權力可藉運用武力而獲得，但也可更狡猾地藉運用新的武器——藉引誘的宣傳及錯誤的語言滲入而獲得，我們應承認後一種方法在所有的國家施行已相當成功，包括我們本國在每一個國家的公民在內，其中有些好意的人民，已經在明知故犯或不知不覺中變成一個外國對抗他們本國的特務人員。」

「美國現在感覺有壓倒之勢時，最強大的力量來對付這些對自由制度的威脅，如果我們閉目不視已使我們成爲自由的標準負責者的命運，那我們的前途將較爲愉快，我們已知道我們不再能背棄世界而不顧；我們爲保全我們自己及我們自己的生活方法我們必須盡力於重建經濟及政治秩序的工作。」

「我們知道我們必須協助其他自由的人民，協助他們自己保留他們的自由制度，我們也不應喪失我們得以藉財政及技術上的協助以提高落後國家爲發展自由制度所必須的生產能力的遠大及有利的機會。」

#### 四大原動力

「我認爲我們爲担当這些偉大的工作我們應記住四種主要的原動力，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種是我們必須維持及增強我們在本國的生活。我們美國的制度，離開圓滿的程度尙遠，雖則我們的政黨不常承認這些缺點

及同意如何去矯正這些缺點，我們正經常尋找美國制度的缺點，這是我們的德性及我們的實力，無論如何我們準備應付改革的需要，在數十年中作有益的改進。

「我們已供給人們所未知道的更大快樂與繁榮。最重要的是保全我們的自由，其次是擴大我們的生產能力，個人精力及創造力的發揮造成我們無敵的生產能力，惟有藉永遠擴大我們的生產能力使得我們能強大及自由。

「在參加當前的鬥爭時，我們不應低估我們的力量，我國人口佔全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工業生產量比世界其他各地工業生產量的總和還要大，我們已發明一種制度，藉這種制度，一個美國工人的生產量數倍於任何其他國家的工人。

#### 蘇聯看到了美國的命運

「事實上，蘇聯的領袖們雖承認我們有若干成就，他們自馬克斯主義的教訓中知道一個自由資本主義的國家不能保持穩定，因此我們將在數年內發覺我們自己陷於嚴重的不景氣狀態中，這種不景氣將拉着世界與我們一同下沉，我們既已變弱就不再能繼續我們的領導權了。

「他們相信，當我們衰落時，世界上將重行發生經濟騷動，就給蘇聯一個推進及擴展他們的控制區的機會，我們對於經濟力量的了解已加深，我們一切團體合作的誠意也增加了。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我們的能力能達到我們經濟方面重大的安定。

「基於雙方的貨物交換的一種健全對外貿易必能對我們本國的繁榮及安定有所貢獻，今日國家所雇用的

人員中每十二個人中有一個是藉生產輸出品謀生的，我們需要增加基本物資的輸入以保持我們目前的生產水準。

### 空中優勢是無比的

「這裏要說到第二原動力了，我們在與其他和平國家合作以對付軍事侵略中必須保持一強大，很平衡的軍事設備以保障我們自己，最近一次世界大戰發展了力量過大的空軍，強大的空軍不僅是一種防禦的方法，並且是迅速報復的惟一方法，如果空軍力量足夠強大就可為那些有侵略動機者的當頭棒喝。」

「在這原子時代空中報復是無法防禦的，我們能發動一次即刻而強大的空中報復的能力是對其他國家使用武力的最大可能的防止物。」

「我們的和平意旨舉世都很明瞭，所以具有和平目標的人無一害怕美國的武力，他的恐懼就是怕美國將不保持足夠強大的武力以遏止侵略的意圖。」

「國內經濟及軍事力量對於我們本國的生存固然是重要的，在全盤大局中，我們必須寄希望於發展國際間的一個有效的組織，這是我所要申述的第三種因素，我們已在聯合國的發展中擔任領導，我們雖遭遇種種的挫折，但我們不應喪失對這種制度的信心及這制度所根據的原則。」

「我引述我們會同意的聯合國憲章內的話：「我們已決定拯救後代免於戰爭的禍患……重新確認我們對基本權利的信心……團結我們的力量及保障國際安全……並運用國際機構以促進各國人民經濟及社會發展」。



「話幾乎不能說得比這更明顯更強烈了，我們並不是說我們僅努力促這些事實現，我們說過我們決心這樣做。」

「某一國家藉運用否決權以阻礙該憲章的尊嚴目標的事實並不能且不應阻止我們的誓言，這裏我引述我國出席安全理事會代表關於巴爾幹三國反對希臘行動威脅和平所說的話，「美國政府認為安全理事會的繼續不克採取有效行動不能阻礙那些願意遵照聯合國的一般目標及原則而行動的國家之個別或集體的行動。」

「因此我們承認我們不是單單說明原則就算了，這裏就提到我所說的第四種原動力，如果我們要使其他國家也能在該和平組織中與我們共同工作，我們在隨處都可能遇到飢餓，寒冷，疾病及失望等因素，這些因素損傷了自由及和平的基礎……」

「馬歇爾國務卿會向歐洲諸國建議由他們共擬一互助及運用他們自己的資源至最大限度的計劃，再給我們一個建議，說明他們需要美國貢獻什麼可以使這個復興計劃成爲有效，馬卿的建議已獲得美國方面廣泛的贊同。」

馬卿提出該建議後不久，我適在歐洲，我可以確實告訴你，歐洲的每一個人除共產黨員以外，無不把這建議當做一個希望所寄託的真正基礎而額手稱慶的。

「我們雖然強有力，但我們沒有用不完的資源，所以杜魯門總統在同時任命政府中的兩組及由十九位傑出的私人組成的另一組的入員與担任商務部長的我共同來研究我們的能力，俾我們接到歐洲方面的建議時有

所準備可向美國會及人民提出建議：即我們應採取何種積極的步驟。

「照我們想來我們應確保歐洲的計劃將產生我們有權利希望的結果，我們應保證我們的貢獻品應在我們本國經濟健全的立場上安全及聰明地發放出去，我國人相信就現在巴黎開會的十六國家所表現的合作精神看來，必能草擬一個我們能在其中安全及聰明地合作的計劃。

「我們得順利地與那些國家合作，則一個健全的西歐將重行崛起的日子當已不遠，生產量既增，加世界貿易既擴展，就可建立一個穩定及繁榮的經濟秩序了。」

（節譯自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 蘇聯共黨擴大控制權

蘇士柏格

可稱為戰後蘇聯「政治改變」的與蘇聯的經濟調整同樣重要。

共產黨管理當局充分的再聲明及職業軍人與「愛國戰爭」中盡人皆知的英雄之故意隱蔽顯出上述的政治改變。

共黨憑藉審慎的，目光遠大的計劃，以完善的形式渡過戰爭，該黨黨員雖遭受重大損失，但從未遇到喪失權力與軍隊的危險，高級軍官們，可嘉的青年們及受訓的英雄們，都被引誘着去申請入黨。

一年以後，該黨有黨員四百五十九萬九千八，候補黨員一百四十二萬七千八，以上人數中，有三分之二是戰時徵收入黨的。

## 可注意的兩種新因素

自戰爭結束以來，在幕後決定蘇聯真正權力的政治戲法中顯有兩大發展，第一發展為有一連串的跡象顯示史達林總理已加重倚畀副總理勞倫特，比里亞及共黨中央委員會書記日丹諾夫，同時不出名的黨組織及幹部專家馬林可夫似已潛跡。

第二發展為政治局顯已決意鼓勵公眾忘却戰時鼎鼎大名的人物。

在十一月七日革命紀念的閱兵典禮上，及在去年冬季選舉前的運動中，莫洛托夫，比里亞及日丹諾夫諸先生顯居中央委員會其他同志的上位，馬林可夫不但為上述三人的影子所掩，並居三位副總理伏羅希洛夫、

米高揚、安德里葉夫及烏克蘭共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卡哥諾維區之下首。

馬林可夫先生在黨的祕書處之工作有些方面可與史達林先生於波爾希維克早期在列甯手下時所擔任的工作相比，馬林可夫知道每一個黨員在黨機構中的地位如何，但自從他成爲部長委員會的副主席以後，似乎顯出他已擺脫共黨祕書處的職務，看來似乎是史達林委員長已把政府警察及黨機構的直接行政權分別交給莫洛托夫，比里亞及日丹諾夫了。

史達林在副總理貝爾加甯協助下，自然保持了上述各项工作的全部監督權及軍隊的直接控制權，最高蘇維埃是一道護牆，政治局及其他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在這護牆後活動着，重要的命令是由部長委員會及中央委員會聯合發佈的。

兩三年前的老英雄已潛入隱暗的地下，史達林在軍事方面的新臂助貝爾加甯將軍是一個黨的將軍，甚於爲一名沙場宿將，當史達林總理，宴蒙哥馬利男爵時，貝爾加甯的座位在與宴的任何蘇聯元帥之上，科尼夫現爲蘇地面軍總司令，但他的工作很少對外宣揚，朱可夫現雖爲蘇軍事部副部長，但亦不宜揚。

不問生活及思想各方面的嚴密管制如何，各種煩惱使蘇聯公民彷徨失措，主要的煩惱是在國際方面的，引史達林的話來說：「煽動者運動」本年第一個問題中即以一項國際煽動爲主，就是說「國際反動者」正計劃一個新的戰爭，蘇聯人民痛切反對戰爭」。

### 蘇當局想和緩人民的批評

蘇政府暗中企圖把軍隊所見到的繁榮的記憶自國民心目中抹去——即使這種繁榮僅是歐洲最貧窮的方面

蘇政府并企圖和緩知識份子引用馬克思主義及列寧主義的言辭對於現實的批評。

批評中有抱怨對官僚徇愛而冷淡工人的，也有憤恨缺乏言論自由及史達林憲法中所規定的其他權利的。有些跡象顯示黨的領袖謹防青年中對外國貨——尤其是美國貨熱愛的傾向，雖則官方沾沾自喜的誇耀蘇聯「文化」的優越性，在租借中及自聯總方面收到的美國貨的衝擊力很大。

克里姆林官的一個宣傳要點為「史達林主義者的國家政策」。這個政策規定所有的非蘇聯人民享有充份的文化及政治自主權甚至包括空論的脫黨權利。

但舉例來說，莫斯科嚴密控制中亞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生活，蘇人是一種特權份子，在若干城市如塔什干等有「本鄉人」及蘇聯人的住宅區，

在莫斯科方面可聽到克里姆林官方面仍害怕烏克蘭、高加索及中亞離中央甚遠的軍隊之竊竊私語。

戰後，在聶伯河與聶斯德河間的諸村莊中喜歡談說的一樁事是史達林總理已在雅爾達會議上答應把烏克蘭給羅斯福總統了。（譯自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紐約時報）

# 蘇聯在北美的間諜活動

古森科

如果美國明天把原子彈的全部秘密透露給世界，最感震驚的莫過於蘇聯人了，這正是蘇人希望美國做的最後一樁事情。

表面上蘇聯的統治者們將趕忙熱烈地向白宮致賀，並宣佈美國已再度對人類作一次偉大的服務，他們將聲明世界其他各國都有信心地等待這則新聞，知道這則新聞必將到來，現在，世界其他各國對美國的信心已大大地增強。

但私地裏，自史達林以下均將驚異地面面相覷，他們將憂愁地搖搖頭，奇怪爲什麼一個人會敏感到這樣地步。

我所以這樣說，是因爲在我服務於蘇軍情報處的時候——起先在莫斯科，後來在加拿大——我得到每一個機會親眼看到蘇聯官方對於美英加或任何外國共享有價值的軍事情報之態度，即使在戰爭最吃緊的階段，蘇聯各盟國的友誼很關重要的時候，蘇聯仍然儘可能少把情報告訴盟國蘇聯預料盟國，也將以同樣緘默和懷疑的態度對待他們，當蘇人獲得盟國慷慨供給情報時，這事也並不使蘇人具有好的印象，蘇人認爲盟國不得不這樣做，而供給情報者的慷慨，僅僅使蘇人認爲這供給者有趣而可笑而已，蘇人覺得這樣的合作是很幼稚的。

美人及加入對於軍事秘密的公開，實不斷地使蘇人感覺驚奇，舉個例子來說，我記得在一九四三年七月

，沙堡廷担任蘇軍在加開謀網的首領時，會派他的秘書羅曼諾夫到哈里法克斯去，目的在得到關於那裏的港口情報，莫斯科方面對於加拿大及美國港口的活動經常很感興趣，西方盟國在歐洲戰爭勝利以後開始調排他們的軍隊時，蘇聯的那種興趣更增加了，幾天以後，羅曼諾夫從哈里法克斯回來，臉上顯出得意的神情，他迫不及待地在沙堡廷的辦公室內打開他的行篋，說道：

「閣下或將慶賀我得到了若干良好的戰利品，說着檢出幾張地圖及藍皮書放在桌上，這些圖書是哈里法克斯港口的詳細計劃，表明一個船塢及一所房屋在每張圖書的面上都用不能消去的墨水標着「機密」或「秘密」等字樣。

沙堡廷仔細而懷疑地審視這些圖書，沙氏說：現在再慢，你不應該在你第一次參觀該地的時候，就開始偷東西的」。

羅曼諾夫說：「這並不是我偷來的，是一個官吏給我的，當然，我只好允承歸還這些東西。」  
「這些可能是假的情報」。

羅氏說：「我也曾考慮到這一層的」，但該官員陪同我遊遍該港，他把每一座房子指給我看，我則一面核對這些房子在圖上的位置」。

沙堡廷驚奇起來，他說：「這些加人和美人，他們把我們當作彷彿他們自己人看待」，以後兩年中，我在渥太華蘇大使館爲沙氏當密碼譯電員時，他常常復述上面的話。

第二天沙氏把那些圖書影印送往莫斯科，蘇軍情報局長覆電說，羅曼諾夫的資料是「有價值的」，沙堡

廷是一個修長文雅的人，具有社交場中的各種優美風度，從那時起就開始在各外交歡迎會上及非正式的雞尾酒會上結交加拿大及美國官員，但他很謹慎，並不濫用這些人的信心。

有一次他對我說：「你問的愈少，他們給你的愈多，祇要坐下來聽，不必說什麼話，他們將把每一件事，都告訴你」。

蘇軍認為在最近一次大戰中，他們軍事上的盟國是率真，多話及坦白到成爲一種弱點的，蘇聯政府官員，在他們估量西方民主國家的外交代表時，也有此同感。

沙堡廷於擔任駐加拿大大使任內，曾與莫洛托夫在舊金山第一次聯合國會議上密切合作，沙氏從舊金山回到渥太華時，已被認爲蘇駐英大使了，他召集加拿大大使館館員聚會一次，席間他報告舊金山會議的內幕，他稱，這次會議是蘇聯對付民主國家的一個勝利，這次聚會，我也參加的。

沙氏說：「我們藉英美人的協助，已贏得我們所需要的東西，英美人關心作措辭美麗的演說甚於爭取勝利」。

沙氏說：「英美人是在錯誤的心境下參加舊金山會議的，他們完全沒有準備使任何鬥爭止息，他指出，在另一方面，史達林却會通知蘇聯代表堅持他們的每一項建議到底，即使這樣的堅持將破壞會議，也在所不惜。」

他說：「但我們在舊金山會議中得知許多事情，其中一樁就是南美諸國的重要，我們這許多年來，都忽略南美實在錯了，美駐南美的幾個公使館的館員爲數在數百人以上，蘇聯必須效法這種策略，俾時機到來時



，我們能够從美人手中擄取這張勝利的將牌。

自舊金山會議後的兩年內，許多觀察家都注意到蘇聯已集中力量於與南美諸共和國建立強大的關係，史達林從前曾攻擊過斐倫，並稱斐氏為親希特勒法西斯黨徒的，現在史達林已與這位阿根廷獨裁者交好了，中美及南美的共產黨迅速增強，無疑是受到莫斯科方面之資助的。

沙堡廷繪形繪聲地敘述烏克蘭首席代表曼紐爾斯基在舊金山聯合國會議上所運用的政治策略，因為諸小國的代表得任諸委員會的主席，曼紐爾斯基就設法取得舊金山會議中重要的政治及安全委員會主席一職，烏克蘭在聯合國機構中雖居獨立國的地位，實際上，當然是從蘇聯分出去的，正像亞拉巴馬是從美國分出去的一樣，作為這個所謂主權國家發言人的曼紐爾斯基，恰好是史達林的一個密友及顧問，事實上，曼紐爾斯基不出席聯合國會議的時候，是在克里姆林宮的一座官舍中住宿和辦公的，他從沒有充分的閒暇去訪問他所代表的烏克蘭人民。

沙堡廷微笑着說：「曼紐爾斯基在小問題上投反對蘇聯的票，這樣使若干其他代表，相信烏克蘭的確是獨立國家，但曼氏達到重大的建議，總投與我們一致的票。」

曼紐爾斯基也像沙堡廷出席軍事會議那樣感覺流利講話的時候，坐在後面傾聽，比較更得益處。

沙堡廷說：「當英美的雄辯家們正侃侃而談的時候，曼紐爾斯基必不參加辯論，他要等到他和其他代表對於若干論點已陷於絕望的僵局時，始參加辯論，當時間已不早，英美雄辯家已討論至精疲力竭時，他們必不願轉向曼氏請問他的意見如何，曼氏這時，就安詳鎮靜地提出一個解決方法，曼氏出席會議，準備較充分

，對於問題比任何人都熟悉，並且他的意見是在所有的其他意見經過幾點鐘的討論之後，才始提出來的常常顯得有識見而新鮮，而且在那時候其他代表都已厭倦開會，急盼隨便怎樣把會結束，所以曼紐爾斯基的提議總是被每一個人接受及嘉許的。

去夏在紐約某熟食店中發生一次攔擊事件，一個神經質的槍手意外地射擊烏克蘭出席聯合國的一位代表，曼紐爾斯基認為這槍手是一個反蘇政府的特務人員。

蘇聯即使在共同對法西斯主義作戰時期，仍懷疑民主國家，並愚蠢地不願與民主國家合作和交換情報的唯一原因是在蘇聯方面的大多數美人都不明瞭這原因，就是任何真正信仰共產主義的人，都不能信任共產黨以外的人。

這也就是蘇聯今日爲什麼在加拿大及美國保有這樣多間諜網的原因，在現代世界中，完全孤立是不可能，每一個大國如像蘇聯，都必須知道其他大國的經濟、政治及軍事活動，蘇聯對於任何非共產主義國家完全缺乏信心，這使蘇聯避免與他國正式共同交換情報，像英美間正式互相交換情報那樣，蘇聯寧可從外國間諜那裏得到那些必須的情報，蘇聯所以甯可求助於外國間諜的原因爲「這些間諜雖爲外國人，但他們常是忠心的共產黨員，蘇聯人知道任何共產黨員不論他們是法人、義人、波蘭人、美人、還是英人，他們總是首先忠於莫斯科的。

這樣毫無疑問地服從史達林使蘇聯能在國外建立與歷史上任何外國間諜制度不同的第五縱隊，傳說的外國間諜——爲英國工作的德人及爲日本工作的中國人——總是爲了金錢而幹這工作的，至於爲蘇聯做特務工

作的美人及加入，他們的獲利動機不是很次要就是根本不存在。

爲沙堡廷手下的紅軍軍官及三個加拿大間諜充當聯絡員的加人魯南在調查間諜案件的加拿大皇家委員會作證道「蘇聯常常供給他金錢，但他從沒有拿，魯南和其他一同工作的加人甚至不願讓蘇人爲他們付車費。加拿大皇家委員會的法律顧問提到魯南間諜隊中的其他加人時說「照你們所說的話，他們不要拿任何金錢甚至連辦事費用及其他開銷都不要。」

魯南道「對的」。

那位法律顧問又問道「他們做間諜工作的動機何在？」

「他們的動機是由理想的及政治上的」。

法律顧問追問道「什麼是政治上的？」

魯南運用當該委員會想要盤問間諜們不忠於他們的祖國之真正原因時，這些間諜們所採的閃避方式說「我不能代他們敘述他們的動機」大多數美國及加國共黨爲了某些原因憎恨把「共產黨」一辭加在他們身上。

「你所知道的他們的政治動機是什麼？」

「做這類工作必有動機的，這動機當與各種理想有關」。

「是黨的同情嗎？」

「是的，這種說法是公正的」。

「當我們說「黨」的時候，意思單是指共產黨罷」

魯南最後屈服了，勉強地點點頭。

下面一事很重要「蒙特利爾首富之一波葉爾博士是沙堡廷間諜網中最忠心的特務人員之一，也是一個供給極端秘密及可貴情報——如供給RDX炸藥的方程式——的人波葉爾博士是一位著名的化學家，母須爲着生活而工作，他從事間諜工作並非爲維持生活，加皇家委員會法律顧問盤問波葉爾與加議會共產黨員，沙堡廷的聯絡員羅斯的關係時，問道：「你把情報供給馬斯，是因爲你也有同樣的共黨傾向或對共黨的同情，這是一個公正的判斷否？」波葉爾說「是的，我認爲這是一個公正的判斷」。

蘇人當然會把金錢給他們的加國特務人員，但不過是很少的數目而已——這裏給二十五元，那裏給一百元，爲間諜投効決定因素是對共黨的忠誠，舉一個顯著的例子，伍伊金夫人充當間諜，就是爲對共產黨盡忠的。

伍伊金夫人的父母是蘇聯農人屬於某宗教共產派，在加拿大生她，一九四四年她已寡居，在加拿大外交部任密碼譯電員，她與蘇大使館商務參贊助理索柯洛夫的妻熟識，索柯洛夫的官銜至少是如此，實際上索柯洛夫以所有的時間爲沙堡廷，做間諜工作，索夫人對她的丈夫說伍伊金夫人是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如以索柯洛夫在藏有加拿大最重要最秘密文件的加外交部的密碼司竟發現一位史達林的崇拜者，真是如獲珍寶，索氏立刻與伍伊金夫人結交，并使她成爲心腹，「在幾個月後，她特別爲他繪水彩畫，索氏覺得她正可以爲他描摹加總理金氏與加國諸大使間交換的機密文書，索氏就到沙堡廷那裏去請批准任用伍伊金夫人爲間諜。

他們討論任用伍夫人的那一天，我恰好也坐在沙堡廷的辦公室裏，米爾斯天上校也在那裏，米爾斯天是

莫斯科蘇軍情報部的一個高級官員，那時剛完成視察在美加蘇聯間諜網之行。

沙堡廷告訴索柯洛夫，說他將打電報與蘇軍情報局長，請批准與索夫人接近，同時米爾斯天建議，索格洛夫應繼續與伍夫人建立友誼，米氏說常常到她家裏去拜訪她，索柯洛夫就提醒米氏道，莫斯科方面不回家裏去招收間諜爲然正式的政策是在餐館及公開場所會晤他們。

米爾斯天說：「這是愚蠢的，你應該到她家裏去，並在你自己家裏款待她，送禮物給他，」沙堡廷同意米爾斯天的話。

沙堡廷把關於伍夫人的事電告莫斯科方面，說明索柯洛夫已與伍夫人很相熟，所以可立刻與她共商間諜計劃了，莫斯科方面的回電，並非對任用伍夫人一事的決定，而是要想知道索柯洛夫是如何設法與伍夫人如此相熟的，蘇軍情報局長來電責問道：「在最初爲什麼不把他擬與她相熟的事報告我，不得到莫斯科方面的准許，不應採取這些步驟。」

後來該局長電令索柯洛夫應研究伍夫人，但不得發展她」。

沙堡廷把這張電報拿給他的助理馬第諾夫看，馬第諾夫說「不理它，伍夫人這個間諜已成熟了，並且已準備工作了，她能從加國外交部給我們弄來的資料將爲我們的光榮，讓索柯洛夫把她帶進來工作吧」。

馬第諾夫及沙堡廷不陸起來，馬氏慫恿沙氏，爲了很好的理由不遵守局長的命令，沙堡廷揣想伍夫人的事將引起蘇聯的麻煩，那時莫斯科方面將責備沙堡廷。

馬第諾夫及沙堡廷把那電報帶給米爾斯天看，米爾斯天看了惶惑地皺皺眉。

米氏望着沙堡廷說，研究伍夫人，但不要發展她，沙堡廷對馬第諾夫微笑着說，研究與發展有什麼分別呢？幾個月之前，他們會被關於另一件間諜事情的莫斯科來電所困惑，那張電報上也有類似這樣的話，那張電報曾經米爾斯天簽過字。

米爾斯天說：現在是什麼月份？八月？哦是了，我想局長的意思是說不要把這問題向他提起，或者直到十月份再提，在同時，讓索柯洛夫增強他與伍夫人的友誼，但不要讓她知道他所需要的是什麼。

但伍夫人自己來表提她的事情，而且無意中逼到問題上去了，她到索柯夫那裏告訴索氏說，她想要幫助蘇聯，她說明她熟悉俄語。

她的結論是：因為這樣我想放棄我在加政府的職務，我想在蘇聯大使館工作，或者為商務參贊擔任秘書工作，我想照這樣做，我可對蘇聯很有用處。

索柯洛夫大吃一驚，他發覺他的審慎計劃將被粉碎了，現在只有一句話好說，而且必須趕快說出來，他盡量以乞求的眼光望着伍夫人說，不要這樣做，在你目前的工作上，你可對蘇聯有更大的用處。

伍夫人把這話想了幾分鐘，他說：「我懂了，但是不要把這事告訴任何人」。

於是伍夫人在談起任何關於間諜的建議之前，就同意做一個蘇聯的間諜，事情已明朗化，索柯洛夫開始告訴她，莫斯科方面所要的是那種加大使館的資料，她答應取得這種資料。

沙堡廷電告莫斯科方面道：「索柯洛夫已提出建議，伍夫人已同意為我們工作，她明晨將帶電報來」。當我在蘇大使館的密碼室翻譯電報時，沙堡廷轉向在附近桌上工作的米爾斯天說道：「我們將給她什麼

假名呢，馬嘉麗特好麼？」

米爾斯天說：「不好，我們已經有好多個馬嘉麗特了。」

「瑪莉呢移」呢？

「現在已有更多的瑪莉，連我們自己已都認不清了，爲什麼不叫瑞拉呢？」

沙堡廷說：「這個名字倒不壞，至少這個名字很短」。

自此以後就有瑞拉所得到的很多資料送往莫斯科，但蘇軍情報局長很憤怒，因爲伍夫八是在他批准以前任用的，局長警告沙堡廷以後除非與本國情報局說妥，勿得再向任何人提建議。

如果瑞拉不是一個可靠而有能力的間諜，將使沙堡廷及索柯夫感到棘手了，一九四五年九月底在我已把告發沙堡廷間諜網特工人員的文件交給政府以後，伍夫八被從加外交部密碼司調到護照司工作，她在這司無從再接近加政府的祕密情報，在她和其他加籍間諜於一九四六年一月被捕的前幾天，她會往蘇大使館填一張請求加入蘇聯國籍的申請表，她承認違犯加國官方祕密法，被判監禁兩年半，現在執行期中。

伍夫八在莫斯科情報局批准前充當蘇間諜而使沙堡廷受到申斥一事，顯示共黨與在外國的蘇聯間諜間的密切關係，在蘇軍情報局長任用一個美籍或加籍間諜之前，必先獲得第三國際的批准，第三國際就是共產國際在莫斯科的總部，一九四三年史達林循羅斯福總統及羅斯福特別幫辦賀浦金斯之請，向全世界宣佈蘇聯正解散第三國際，如是取消蘇聯對各外國共產黨的控制，每一個蘇聯人都知道史達林此語是一種愚弄，第三國際從未解散，該組織仍舊控制着美、加、巴西、法、英、義及其他各處的共黨，并用鐵腕統治他們。

第三國際與外國的蘇聯間諜網密切合作，例如加國共產黨主要組織八兼沙堡廷的聯絡員卡爾紀事錄，一九四五年——時為第三國際假定解散兩年以後的紀事中載道：「在第三國際的總部有詳細的傳記情報」，某蘇聯的特工人員藉第三國際的協助，於一九三八年進入美國，這人所用的的一張加拿大護照是共黨特工人員從參加西班牙內戰國際旅團中的一個加軍，那裏取來的，但就間諜網而論，第三國際的主要任務為供給關於有希望成為間諜者之可靠性的情報，莫斯科的第三國際總部中藏有世界每一個共產黨員的全部歷史及最忠誠的共黨同情者的歷史，由於共黨服從莫斯科的主義，第三國際常得利用他們名單上的外國人作為第五縱隊。

這個機構的潛力很大，舉一例來說：美工業團體協會及美公用事業工人聯合會在巴拿馬運河區的力量很大，就大體上論，聯邦州及市政府職員協會的會員並非共產黨，但他們的領袖是共產黨及共黨的同情者，這個協會的領袖們都受莫斯科第三國際的控制，所以這個協會，就控制了巴拿馬運河區的一萬七千名公務人員，如是一個潛在的第五縱隊今已建立在西半球防綫最重要的戰略據點上。

這樣的第五縱隊的內層工作，第三國際以外的人鮮有知之者，事實上連共黨自己人也很少認識與共產國際最接近的北美共黨領袖，所以他是美洲最有力的共產黨員，他名叫寶巴，是英格蘭人，過去十二年來他都担任美國共產黨管理委員會的委員長，他無庸上訴或聽審訴就可開除任何美國共產黨員的黨籍，寶巴担任第三國際與共黨外圍政治組織如共黨所控制的工業團體協會，布里奇所領導的國際碼頭工人協會，貨棧工人協會，電氣工人聯合會，美國無線電管機器工人協會及全國航業聯合會等的共產黨員間的聯絡人。

第三國際招收外國籍間諜的便利，解決了蘇聯間諜制度的一項困難，就是在本國訓練有效的特務人員到



國外去從事秘密工作的困難，戰時美軍可在美國找出很多男女女士堪在敵國勝任軍事情報間諜工作，美國不乏富有語言及敵佔領國的知識，能擔任間諜工作，不洩露秘密與所遇到的第一個秘密警察的人才，上述知識是他們從戰前旅行中得來的。

蘇聯的情形不同，因為蘇聯的制度禁止人民自由旅行國外，人民絕對不知道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活方法，以致紅軍難以製造能在短時間冒充一個紐約人的蘇籍特務人員，沙堡廷在加拿大的工作被認為是至關重要的。派沙堡廷至渥太華的命令，為史達林所發，在沙氏離莫斯科之前，有一切的權力的政治局官員馬林可夫會給以最後的訓令。以急需北美正確的間諜相叮囑，馬林可夫說：「史達林將親自披閱從你的機關發來的電文，但當莫斯科的紅軍官員指定沙堡廷對受命往加國的情報局人員講演加拿大的情形時，沙氏不得不承認他對於加國並不熟悉，他說：「我總是在美國的，我在加國祇耽過一短時間，加拿大在我看來是神祕的」。

那時是一九四三年，大多數在外國的蘇聯間諜人員太忙於以所在地的正確幕後情報供給莫斯科，這些情報可應用於訓練學校中，從那時起蘇聯已大大地擴充間諜人員及間諜課本，美境的蘇聯特務人員所寫關於加拿大及美國的文件，現被紅軍情報學校用作研究資料，這些資料幾乎告訴你必須知道的每一件事，俾你可在一地生活及工作，毋須發問題，這些文件中甚至詳載各城的街車價目，大飯店及餐館中房間的方位，給侍者及工役小賤的適當數目，各國節日及宗教季節的意義，國家及城市政治機構的評述，為紅軍情報局最聰明人物之一的馬第諾夫，曾在加拿大化一整年功夫寫作這類報告，莫斯科方面電令沙堡廷道：「報告不僅是統計式的，還須生動出色」，馬第諾夫遵從這命令，使他的報告讀起來好像是一個從城裏來的人向一個朋友敘述

他在鄉間的度假所在那樣。

馬第諾夫並以間諜的細微末節教導蘇駐加大使館的特務人員，他教他們用步數測量某些街的長度，俾能與另一特務人員準時會晤，他教他們美國和加拿大的紙牌遊戲，及餐桌上的禮儀，並擬定一制度用來分析有希望做特務人員的人，這制度中規定探究這位候選人的財政狀況，他的事業心，他對他太太的感情及對其他婦女的意向，他的政治意見，他的朋友他的書籍及他的嗜好。

但訓練蘇人在外國工作仍有困難，一般原因為他們缺乏四海的屢雜經驗，尤其是因為他們語言上的困難，因為蘇聯的青年幾乎都未到過外國，很少人能講流利的外國語，為此你將發覺有多數外國籍學生暫時在莫斯科情報學校學習，以後即回到他們的母國充當蘇聯特務人員，當我在莫斯科柴門斯基街十九號巨廈及蘇聯情報部工作的時候，有一天我在飯廳上看到一個輪廓長得很好，白面金髮碧眼的女孩，她穿着很好的衣服，她的俄語說得很壞，我詢問她，知道她是一個從美國來的特務人員，她看上去像當一名圖書管理員，數個月後，這人不見了是回到美國去担任那裏的蘇聯間諜指定工作的。

還有許多外國籍特務人員在莫斯科情報部內，有英、美、中、義、法各國的人，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在情報部就着，但不與任何人交往，並且顯得無事可幹，我注意到有時不見他們的蹤影，達兩三個月或更久一點，繼而他們又回來，在情報部闔居一短時間。我知道他們是特務支部的人員，該支部由高魯貝夫率領，這部分人員是專做情報部所說的「掃興工作」的，如清理國外的蘇聯特務機關，或國外太危險的，當地人員所不宜做的工作。

外籍特務人員，並在莫斯科著名的列寧學校研究共產主義，沙堡廷在加拿大的聯絡員卡爾，就是那學校的一個畢業生，我記得有一天下午，羅果夫和我曾在大使館審查卡爾的紀事錄，他指着「在列寧學校研究」的一段紀事，幾次對我說：他永不能十分明瞭加入或美人為蘇聯工作所得到的是什麼，羅果夫問道，「卡爾在那裏學些什麼，學習如何偷竊嗎？」下列美人也曾做過列寧學校的學生：每日工人報主筆蔡爾治，久任伊利諾斯州共黨領袖的佛蘭克菲爾德及芝加哥的柏特遜，據該校某畢業生說，他現在懷疑他在列寧學校的時間是化得值得的，課程中有一門技術是用鋼琴絃勒斃人。

但建築在外籍共黨能力及才能上的蘇聯間諜制度，似是收效宏大的，由美境的間諜網收集及送往蘇聯的資料份量是驚人的，把莫斯科的標準來衡量加拿大的沙堡廷間諜網，并不算是一個特別大規模的組織，如我上月所提起的，我是處理沙堡廷電報的惟一密碼譯電員，但在華盛頓的一個軍事間諜網的首領薩拉葉夫需要用五個密碼譯電員，我尚記得沙堡廷於一九四五年八月致紅軍情報局長的一個電文如下：

我們已經自己多街十七號收到關於戰地砲台無線電測測器問題的祕密文件（英美及加國的），一九四五年的三種祕密科學研究報告，共計約七百頁，在收集期間，藉萊卡攝影機器的幫助，已把所有文件都攝成相片，不日我們將於三小時至五小時內收到幾乎同樣多的資料和一捲我們不能處理的軟卡，我認為為考察科學研究委員會的整個圖書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換句話說，沙堡廷告訴莫斯科方面說，他的攝影設備不能迎合工作上的需要，全國科學研究委員會是一個指導加國一切科學戰爭工作的政府機關，蘇聯特務人員把該委員會圖書館中祕密刊印的科學報告取出，拿

到蘇大使館攝影約三小時至五小時之久，在他人發覺這些文件不見以前，把它們放歸原處，沙堡廷想攝取所有的加國科學報告，不僅是少數重要的報告而已，但他警告莫斯科方面說，恐怕他所信託的小型萊卡機不夠應用。

像這個電文所顯示的：沙堡廷及北美其他軍事間諜首領致莫斯科總部的情報，不僅是從餐館中竊聽來的話而已，担任沙堡廷在蒙特利爾聯絡員的索柯洛夫，偕同五個，有時六個加拿大特務人員在蒙城工作，他們把內裝三四百張圖畫、計劃書及藍皮書的信封送交蘇駐加大使館，每星期送兩次，莫斯科方面有一次訓令沙堡廷通知某間諜把每週關於軍用品生產及運輸情報改為每季情報，莫斯科方面埋怨該特務人員以太詳細的報告壓過去，使他們讀都讀不完了。

沙堡廷藉外交郵包把大量的科學及政治情報送到莫斯科去，那些政治情報是從加外交部的伍伊金夫人及英駐渥太華高級委員公署的威爾薛小姐那裏得來的，包括加駐蘇大使致加總理金氏的祕密報告，及英駐蘇佔領下的巴爾幹國家代表致英政府的祕密報告，軍事情報則詳細報告加拿大及美國的原子彈計劃，美國及加國關於雷達 RADAR 炸藥及帶電子砲彈的計劃及方程式，但這些情報從不能使莫斯科方面十分滿意，他們常常還需要知道關於北美兵力及加美特種戰鬥部隊方位的消息，當歐洲戰事勝利進行調動軍隊的時候，莫斯科方面電沙堡廷道：

收集關於下列問題的情報一事很重要。

(A) 證實自歐洲調美軍至美國及太平洋的正式消息及第九軍、第三、五、七、十三裝甲隊，第二、四

，八、二十八、三十、四十四、四十五、一〇四步兵師以及第十三裝甲師司令部自歐洲遷往美國及太平洋的正式消息證實遷調的日期。

(B) 第八十六裝甲中隊，第二十九(七十五)、八十九步兵師、第十坦克師司令部移動位置及巴西步兵師司令部的移動位置。

(C) 第六及十二集團軍是否在歐洲？兩軍的編組位置，調動日期及方向如何？

(D) 在德境的美佔領軍已成立司令部嗎？位置怎樣？誰擔任司令？

(E) 第一空運部隊的調動，該部隊的未來使用計劃。速報為要。

沙堡廷向莫斯科方面說明軍隊調動一事，使他吃了大虧，他說因為軍隊調動，解除了加拿大軍隊中情報人員的伏案工作，那時沙堡廷寫信給卡爾道：

「你有在國防部、空軍部、海軍部或軍事參謀部發展我們工作的可能性嗎？目前這些部份對我們很關重要，我們要你為這事作最大的努力。」

沙氏得到卡爾的回信之後，致電莫斯科道：

「卡爾已答應在現役軍的總管理處物色幾位軍官，目前因為加國正在替海外歸國的軍官在參謀部安插位置，所以這事不易辦」。

情報局長答覆沙堡廷道：

「我們對自上述部門中物色人員一事，確感興趣，在參謀部安排就緒後，讓佛蘭克保荐兩位候選人供我

們探究」。

雖然蘇人愛把西方民主國家作事的方式認作天真幼稚的，聯邦調查局，蘇格蘭庭及皇家加拿大馬巡隊倒從沒有運用過若干意想不到的傳奇式的方法，這些方法却是蘇聯間諜工作中的標準方法，蘇軍情報官員祇要有些微可能，於深夜在寒冷黑暗的街角會晤所屬特務人員，他們決不在清潔光亮的酒吧間中會晤，沙堡廷本人有一次當我在場時，與馬第諾夫認真討論用外交郵包把一個特務人員從莫斯科運往美國的可能性，還有關於隱蔽所的事。

每一個國外的紅軍情報特務人員，都奉命在他所在的城市尋找隱蔽場所，隱蔽所是供聯絡員與間諜交換秘密消息、金錢、電碼書、武器，甚至雷達設備的零件或炸彈瞄準器用的，蘇駐加大使館的特務人員必須找尋兩種隱蔽所，一種小的是為藏納文件的，另一種大的須能容納一隻箱莖，當沙堡廷獲知批准一個似可作隱蔽處的場所後就該處所的詳細描寫及位置報告莫斯科的總部，總部就把這處所詳情記下備用，奇怪的是莫斯科常運用在華盛頓、倫敦或巴黎的隱蔽所——這隱蔽所或是某藥店電話棚中的高架，或是某教堂雕像後的一個小孔，用來傳遞情報與該城市蘇聯間諜網所不知道的一個特務人員。

隱蔽所設在最令人想不到的地方沙堡廷的特務人員應用渥太華銀行及單鞍街街內某店舖中的一個隱蔽所達數月之久，直到沙堡廷見報載該店舖發生小火警及皇家加拿大馬巡隊隊員會在那所小房子中聆聽急救講演之後，才不用該隱蔽所，伍伊金夫人應用牙醫所中的一個廁所作為交付加外交部情報與蘇人的隱蔽所，當她到牙醫師那裏去就診時，她就溜入廁所，而把她寫好的消息，放在水箱的蓋下，沙堡廷部下的一個隊長郭希

科夫就於第二天去那牙醫所把那消息檢去，然而郭希科夫並不知道伍夫人，她也從未看見過他。

當我在莫斯科情報部工作的時候，有一個在柏林的蘇聯特務人員被疑心做着雙重間諜——同時為德國及蘇聯做事，他的任務之一為報告轟炸機加諸柏林某區的損失，他的報告常是不利的，據他說，該區從未為盟國的炸彈所波及，在柏林的某蘇聯情報員偶而想到讓這個特務人員至該區的某隱蔽所取他下次的費用，該特務人員却用電報提出一狂妄的要求，請另換一個隱蔽所，他經過盤問之後，才解釋道，莫斯科方面所指定的那所房子，已於數週前被炸。

蘇聯所有的其他策略彷彿是受了雜誌小說的鼓勵，蘇聯派在國外的特務人員不斷從他國的外交代表那裏搜索政治情報，美國的一個蘇聯特務人員於數年前與另一個歐洲國家駐美大使館的一個歐跑差交好，該蘇人想賄賂那跑差把他的郵包內容透露給蘇聯，那跑差說他不願這樣做，因為沒有方法可打開郵包的鎖，而他不能讓蘇人損壞郵包。

那蘇人告訴他說：「哦，請不要為這點憂慮，我們有種祕密的方法可把包的內容攝影出來，而不在包上留一點痕跡。」

那跑差同意作這種試驗，蘇人把他的郵包借去三小時，未加損傷，深深謝他，並付他酬金一百元，那跑差很感動，第二週他趕速把他的郵包送到蘇大使館，但還一次蘇人把郵包交還時，邊上却有了一個裂口。

（譯自美國「水星」雜誌一九四七年四月號）

## 蘇聯在北美之活動（註一）

克魯克漢（註二）

南美洲在地理上是美國的門戶，若是蘇聯由地中海進襲美國，南美是唯一捷徑。同時，南美供給美國以製造原子彈及其他最新式武器之必需原料，所以南美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

蘇聯的勢力潛伏着在北美大事活動，在巴西特別活躍，每天有一萬字的莫斯科的電訊，攻擊美國。稱美國為「帝國主義的強盜」。散佈流言說：若美蘇戰事爆發，南美絕對不幫助美國。又借了工會的組織，牽制南美之各種水陸交通和運輸，經過南美政府一年的精確調查，才發現一切的工作，背後有另一國家主使，幸而這些活動被發現得早，巴西就實行驅逐共產黨，智利也由國會裏革除了三個共產黨部長的職位。

我們仔細研究共產黨所以能在北美活動的原因，不外：（一）美國未能實地應付及截止共產黨的活動，（二）當路行政不能適合人民的需要。但是最大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貧窮，人民貧窮，就被共產主義所煽動。共產黨在北美活動的目的：

- 一、使南美停頓以主要物資接濟美國。
- 二、在北美表現共黨之力量，用以輔助在其他各地共產工作之進行。當然，最後的目的，為奪取巴西政府政權。

以下是南美各地共黨活動實情的簡報。

巴西



在巴西的共黨首領是一個名叫普雷斯托斯 Carlos Luis Prestes 的青年，外貌平凡而鎮靜，看不出他坐過八年半的監徒步走過三千哩的路，流亡到波利維亞。他在莫斯科的政治學校，受過三年的訓練。在談吐之間，我覺得他很有智力，他很公開的反對美國。他說：若是美蘇有戰事發生，巴西不會協助美國。他說在南美的黨員人數有十四萬，有五萬人在政府工作，在一九四六年，巴西選舉時，共黨的票數佔百分之十一。他說：共產的勢力，在聖保羅城 Sao Paulo 最有把握，果然，今年正月，共產黨獲得那城選舉的勝利。

他對共黨在南美的工作，有十分的信心與把握，但是他認為現在還不是共黨奪取南美整個政權的時候。

智利

一年前，我（作者）到智利去，那裏各城的牆上和裝運礦產出品的貨車上，都貼滿了斧頭和鐮刀，在首都聖地牙哥（Santiago）他們告訴我，共黨勢力已成過去的了。有一個時期，守舊黨內部分裂，共產黨居然在國會奪取了三個部長的職位。並且使國會執行那三個部長所提出的經濟政策。但是智利是一個不足自給的國家，需要向美國提出大量借款，要向美國借款，就不能容忍共黨在國會，並且上次的選舉，是守舊黨得勝，所以三個共黨部長終於下台。

但是根據愛西格羅（El Siglo）城共黨日報館的一個代理編輯說：在智利的共產活動的基礎是「核心」（Cell）不會被消滅的。

亞松森

亞松森是巴拉圭（Paraguay）國的首都。地方很窮而好客。我到了那裏，知道共產的工作，都是地下的

組織。所以就和一個店員談起，我希望和任何一位共黨領袖談話。果然，經過了相當的接洽，我在一家茶館裏，和一位共黨領袖晤面了。他說：共黨準備在需要時，停止糧食入亞松森的運輸。但是他認為現在還未到做這項活動的試驗的時候。

委內瑞拉

這是在南美最北部緊靠巴拿馬運河的一個國家。在這裏，共黨異常活躍，他們派黨員赴南美各地，作調查工作。以前此地的共黨，又分兩系，現在兩系協力合作，成爲有名的「反對」團體，他們在任何的政府會議席上，都以「反對」票來阻止一切工作的進行。

烏拉圭

烏拉圭在糧食上，是足以自給的國家，美國也會一再的協助她的獨立主權。比較起來，烏拉圭是南美各國中最民主的國家。他的政治是悠閒，中庸的，正適合他們人民的性格。

上次選舉時，據說：共黨會受某處津貼十萬美元，作活動費。但是選舉終是右派勝利了。若是左派爲了奪取實際政權，而與右派合作，那就會惹起更大的麻煩。

在烏拉圭的共黨活動做得很明顯。俄大使館每天發出由莫斯科來的近一萬字左右的電訊，這電訊不但在本地用，並且轉南美各城。

總括說起來，我們很難指定蘇聯是怎樣在經濟上協助南美共黨的活動，但是我根據觀察而推測，以下幾點是不錯的：一、蘇聯在南美的大使館工作人員很多，開支很大，遠超過蘇聯國庫的預算。並且在南美的宣

傳陣線和共黨政策在各地同時都隨時變換，是必定有組織的。

二、巴西的警察說：共黨團體收到由墨西哥來的電報，這不能證明那電報是由莫斯科來的，但至少，墨西哥，美國和南美有共黨的祕密通訊網。

三、蘇聯船隻經常出入南美港口，蘇聯利用船員做政治工作，阿根廷的總統裴倫將軍（General Peron）就親自遇見一個蘇聯船主，向他質問政治上的問題。

四、在蘇聯受訓的共黨領袖在南美主持活動，這些人就自然地做了蘇聯和南美的聯繫人。

但是南美的情形，不是不能改善的，要改善必從積極方面下手，在南美各國方面，必積極改善政治情形，以適合人民的需要，然後美國才能加以協助，在美國方面，必需鼓勵增加當地生產，設法分配平均，在技術人員上，加以協助，在財政上，加以管理。

在南美的共黨活動勢力，是逐漸增強的，不但危及南美本身，並且也聯帶到美國，現在這勢力，還在壓制之下，還能可以被制止。這是我們當注意的一點。美國必需在積極方面以民主國家的立場，制止這勢力的進展。

（註一）本文原名 *Moseo's Beach head in South America* 譯自星期六晚報九月十三日版。

（註二）作者克魯克漢 *Frank H. Klueckhorn* 為紐約時報記者，曾為戰地記者，赴西班牙，北非，遠東，墨西哥等地。一九三九年，著書「墨西哥之挑戰」（*Mexican Challenge*）

## 蘇聯向天空伸展

考特納

當代沒有比「鉄幕」一辭更惹人注意的了，每一個人都注意到它，但很少人知道它的大小意義和目的，它是一個什麼樣的怪魔，其他西方國家——尤其是英國把他們的杯子撞到鉄幕上去了，但鉄幕之張掛，主要的是用來對付美國及美國的飛機和飛行員的。

你聽見過這些故事吧！幾個高級美國軍官與他們的蘇聯對手同餐，在照例互敬過白蘭地酒之後，那些蘇聯軍官開始冷靜地討論蘇美戰爭的可能性問題。

高級蘇聯軍官道：「我們將打勝你們，因為紅軍是世界上最龐大精良的軍隊，無人能與爲敵」。

某美國軍官漫應道：「你們的軍隊誠然是較龐大，但我們的空軍又如何呢？」

這時每個人都看着靜靜地在乾杯的蘇聯空軍參謀部代表，他對他的同國人道：

「這些美國人所想的或者是真的，我害怕這點，我們恐怕不能在空中打勝他們。」他又很快地乾一杯。然後反駁道：「但如果他們以足夠的租借飛機供應我們，那末我們也能在空中打勝他們」。

這些蘇聯軍官都特別有學識，是真的，但這個故事暗示各種階層的蘇人都敏感於美國目前的空軍力量，我們知道蘇聯的領袖們正集中一切於空軍的準備，我們從蘇聯的報紙及廣播中，從黨的演說及其他情報中可知蘇人正引導羣衆的志氣，希望及全體蘇聯公民的思想向一個方向就是向空中發展。

蘇聯像英美一樣知道空中領導權的利益，所以以將苦鬥以取得空中領導權。

蘇聯是一個最大的國家，面積及人口都比北美全部的面積及人口大，比歐洲大了五倍，蘇聯佔全球陸地面積的六分之一，如果無人居住的南極洲不算在全球陸地內，則蘇聯佔全球面積約五分之一，蘇聯的龐大地完全位於北半球或「陸」半球，這北半球常是以赤道而分的兩半球中更重要的一半。

北半球包括一塊很大的陸地，即歐亞這塊歐亞陸地與非洲之南隔一條廣一百九十六英尺人工開掘的蘇彝士運河，歐亞陸地與南北美之間，祇隔一條廣五十英里的白令海峽，地理政治學家把歐亞陸地看作「世界島」。

這個世界島的中心因居中央控制地位而被稱為「心臟地」，這個心臟地的周圍是「外緣地」，當代地理學家相信任何人控制了這「心臟地」及「外緣地」，自然就能控制這世界島。

沒有一個征服者——從亞歷山大大帝及凱撒匈奴汗到拿破崙及希特勒——能够宰制心臟地或邊緣地的全部，「距離」常常阻礙這些征服者的陸軍及海軍力量過度發展，現在空軍力量已藉「時間」取「距離」的決定性而代之，這點引起戰略家的籌思，如今中途不停歇的轟炸機隊自龐大的赤色心臟地起飛，可於數小時內飛過亞歷山大行軍十二年所經的路程。

邊緣地有兩種：一種是多少保證已屬於蘇聯的另一種雖然傾向蘇聯，但蘇聯仍想收為己有。

屬於第一種的是波蘭，捷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新疆省及蒙古的兩地方（外蒙及唐努烏梁海），以上共計二百萬方英里，佔蘇聯統制下的北半球地區三分之一。

第二種包括自波羅的海至太平洋的將近二十個國家，在有些國家中，蘇聯的威望很高，在其他國家中，

有舊惡和新的耳語運動所造成的戰爭，叛亂及騷動，這些國家有的將在歸入蘇聯的懷抱以前，死在這只熊的爪下。

美國爲顯明的本身利益計，應想到這些國家爲美國商航業不能通達的一端，這些國家的領空是兩洋間「無飛機的上空」，在戰爭期間，這些國家都無助地與蘇聯並列，這些國家佔了蘇聯所控制北半球的一半以上。

面積或戰鬥人力自然沒有像過去那樣的有威勢了，在這空中時代的初期，所足特的是國內的糧食，工業入力，精神及政治統一與科學及飛行力量，我們必須憑這些來檢討這鐵幕的內容。

單單蘇聯本國，有各種的氣候能出產超過和平時或戰時需要的糧食，蘇聯所有的產穀地倍於美國，蘇聯在糧食方面的弱點是幅員太遼闊，以西方的標準來衡量蘇聯的分配方法，或內地運輸制度，尙是原始是時代的，蘇聯所有的平坦一等的公路比任何美國中西部州內所有的爲少，蘇聯鐵路線僅及美國的五分之一，但蘇聯鐵路的乘客却爲美鐵路乘客的三倍強。

每一種礦產及重要的資源，連同鈾及鈷在內，蘇聯都有出產，惟橡皮爲例外，人造橡皮工廠在蘇聯的工業計劃中佔優先地位，世界最優良的天然橡皮產源位於東南亞的邊緣地。

我們不能因所稱蘇聯工業的無效率而過於自滿，蘇聯從德國取去賠償品，由於無知及疏忽，使價值數億元的機器及工廠設備生鏽，棄置在通達蘇聯的道路上，這事是真的，但蘇聯在三十年中使許多人民由農夫變成機械手，這種顯赫的成就也是真的，更重要的事是蘇聯的工業已因無數德人的幫助而加強，蘇聯並藉商務

協定得到工業國家中最有技巧的一國即捷克的技術援助。

蘇聯的飛行力量，有兩道主流，一是紅軍航空隊，一是民用紅航空隊。

戰後蘇聯在航空上的收穫。

美國的飛機工業由於軍事協定的取消，已自戰時的高峯暴跌，作為蘇聯政策工具的蘇聯國營航空事業，已較戰時擴展一倍，並獲得德國及捷克工廠中的生產品，特別是雷達，精確器，飛彈及遙遠操縱火箭砲的帶電體等物件，一九四七年，蘇聯將生產軍用民用的各種型式的飛機十萬架，一九四五年紅軍航空隊有飛機一萬六千四百二十架，內有戰鬥機七千架及轟炸機四千二百架，迨一九四七年機數增加一倍，戰鬥機與遠程轟炸機的比率大大變動，轟炸機數增加了。

另外還有「幼年」紅軍航空隊在保加利亞方面，蘇聯用蘇聯教官為所有的巴爾幹國家建立了兩個飛行訓練團，一個設在索菲亞，另一個設在普洛美迭夫，自土耳其乘戰鬥機半小時即可抵達普城，蘇聯並在各國設立當地訓練營，及將這些國家的青年男女帶至蘇聯受一年或兩年的地勤及戰鬥訓練，自歐洲戰事勝利以來，南斯拉夫青年受這種訓練的達七千人，還有波蘭及其他國家的青年數千人。

戰前蘇聯的商業航空業既不應大，也不成功，今日的民用紅航空隊，已是克里姆林宮的一個寵兒，蘇聯已把發展民用紅航空隊的任務交付強有力的蘇聯空軍元帥艾斯塔科夫，由於戰時的需要，使蘇聯國內的航空業務人員增加到十萬人，飛機七千架，其中大多數是租借的 C-47 型機和蘇聯獲得許可自造的道格拉斯廠 DC-3 型飛機，一九四四年蘇聯每日能製造這種型式的飛機二百架，現在則為三百六十架（蘇聯稱這種型式

的飛機爲 CI-2 型 P-3.84 型) 蘇聯由於地土的廣闊，曾於一九三〇年實驗巨型的多引擎運輸機，如蘇聯著名的「馬克斯高爾基」式機等，實驗結果平凡。

蘇聯今日已較幸運，除了自己設計有效的四引擎搭載乘客六十人的飛機外，還有改良的德國容克式機即 TU-90 型機，穿梭似的往來於遠東的蘇聯航空線上。

十年以前，蘇聯僅有正規的航空線數百英里，現在的民用紅航空隊擁有航線五萬英里，使蘇聯十六個共和國和區域中心爲蘇聯的附庸國與莫斯科相聯絡，航空運輸業務爲兩年前的五倍強，蘇聯有六年後造成十五萬英里航空線的計劃。

蘇聯已用信用貸款，飛機設備及技術上的輔助，作波蘭，捷克及巴爾幹國家。他們自己國家及與莫斯科之間建立很好的民用航空網，蘇聯藉秘密條約，握有這些航空網三十年的管轄權，這管轄權在有些國家如波蘭及捷克是隱瞞着的，在其他國家如匈牙利及羅馬尼亞是公開的，但一概被鐵錘起來。

蘇聯經驗的淺薄及一般所說的蘇聯辦事無效率及官僚政治，易使人懷疑蘇聯商業航空的功績。

這裏有一個啓示，可答覆上面的問題，蘇聯並不是單獨發達商航業務的，事實上蘇聯不過是一個「助手」而已。

戰前歐洲最大最好的商業航空經理人爲德國的國家及國際航空公司，即漢莎公司，就人員訓練安全維護上論，堪與任何美國航空公司匹敵，在運輸及搭客細節上，還優於美國最好的航空公司，蘇聯藉補助金制度從遙遠的外國吸收駕駛員，技術人員及世界飛行的技巧，智慧及經驗。



實際上今日尚存的漢莎公司職員都在替蘇聯工作，爲複雜的航空事業所必須的數千熟手，駕駛員囉，機務員囉，地勤人員囉都到蘇聯方面去了，這些人大都可與美國及他處的人才媲美，漢莎公司簡直就是從柏林搬到莫斯科去了。

### 蘇聯的空中鐵幕

這些以金錢收買的德國飛行人員是蘇聯民用航空網的祕密基礎，他們的效率及經驗加之於艾斯塔科夫組織的瘋狂熱情，造成蘇聯民用航空事業的發展。

不惜巨資的紅色漢莎公司是對於美國商業航空前途的一大威脅，正像蘇聯所僱用的德國航空科學家對於美國軍事是一大威脅，史達林格勒之役倒戈的德將鮑盧斯及他麾下的『自由德國』軍官對於西方參謀總部是

一大威脅，然這裏我們看到空中鐵幕的兩方面。

目前蘇聯運用空中鐵幕的策略凡三：（一）爭取時間，這是當代蘇聯最急要之務，（二）使外國航空公司及飛行人員不進入紅色飛行區，（三）使紅色空軍進入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天空。

「時間」對於蘇聯的意義與對於我們的意義不同，我們用數學的頭腦來設想時間，蘇聯是用哲學的頭腦；亞洲人的方法來設想時間，蘇聯的農民常常照亞洲人的方法來設想時間，蘇聯的農民常常照亞洲人的方法來生活，憑藉太陽，黑暗及季節來生活，一個蘇聯平民要旅行的時候，他就走到最近的一站，以東方人最大的宿命論的忍耐心坐下來等待，蘇聯的火車除了國際貨車外，都是沒有時間表的，這樣的時間觀念甚至傳染

到斯拉夫族的蘇人，引起西方人與蘇聯官僚交際時的憎怒，瑞士是世界上產鍊最著的國家，瑞士的統計證實蘇聯是西方國家中購鍊最少的國家。

蘇聯外交人員也像甘地及蔣那樣，所關心的是趨勢及感情，而不像我們關心的是時間，克里姆林宮中的人物認為時間的意義非他，時間就是結果。

所以蘇聯在成功湖及莫斯科會議上斷斷爭論，待蘇人感覺到蘇聯，在各方面都比他們的敵人要強，這期間需要多少時間，會議就得開多少時間，蘇聯必須發展工業及內陸運輸，在全蘇聯的資源已登記入目錄的不及一半，西伯利亞的資源已登記的不及十分之一，這些物資被單獨地開採着，蘇聯必須完成民用航空隊計劃，今日載運平民的運輸機明日可能運兵，蘇聯現有組織好的空運部隊十師，計劃要成立卅五個師，蘇聯必須加強在鄰邦的勢力，因為這些鄰邦，尤其是在歐洲的，對於蘇聯顯有雙重的效用，這些鄰邦既有機場及軍需堆棧，就可為「作跳板用的」外方陣地，以使經過歐洲向大西洋及地中海發展，使匈奴王阿提拉「天討軍」及其他中世紀的匈奴人都轉旆的歷史界限，不過是蘇聯從心臟地向西擴展的一個起點而已。

同時，蘇聯對空中鐵幕的第二種應用，不僅是使所有的外國飛行人員不進入蘇聯的領空，並阻礙他們在他們自己的領空飛行，美民用航空局保證美海外航空公司可達華沙及莫斯科，但該公司到了斯德哥爾摩就轉回頭了，保證在到達印度途中可經巴爾幹半島的法美航空公司，開始作測勘飛行，但從未觸及傀儡國的土地，據某巴爾幹國家駐蘇外交人員談稱「克里姆林宮方面總說夫國如此，驚跳起來了。」

從鐵幕上彈回來的，不僅美國的飛行人員而已，最近蘇聯為與瑞典訂立關於莫斯科與斯德哥爾摩間航空

業務的協定，而大吹大擂，看起來這幕上到底要有小飛機了，但卻一直沒有行動，內情是：蘇聯強求丹麥，挪威及瑞典遵守下列條件，瑞典及挪威飛機飛往赫爾新基，丹麥飛機飛往麥爾默，爲蘇聯飛機擔任轉運工作，佔這個共同業務一半的蘇聯呢？則可直接飛往奧斯陸，哥本哈根及斯德哥爾摩。

我們應承認蘇聯在西方強國的記錄中找不到先例，當飛機的威力足以越過疆界時「像空氣一樣自由」的美麗辭句除了對飛鳥之外，已失却效用，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把恐懼帶到天空時，所有的國家想到陌生人可以從天空俯瞰他們，都覺得太沒有遮掩了，於是趕緊擬訂條約草案一九一九年在巴黎簽訂的第一次國際航空公約第一條規就提起「每一個在下國家對於在上的空間」的主權。

在最近一切大戰以前，大多數歐洲國家——依照他們的主權或者是無謂的權利——在軍事設備之外，劃出走廊除了本國的飛機外，一切飛機都須繞走廊飛行，而且乘客都不許攜帶照相機，後來逐漸產生一種互相容忍的態度，芝加哥會議及百爾慕他會議有堂皇的意向，收效也很宏大，蘇聯拒絕出席這類會議蘇聯在那些可加以控制而並不屬於蘇聯的國家劃出走廊，修改了戰前歐洲國家的態度，迫令美國和英國的飛機冒着被擊落的危險，在這些走廊內飛行。

### 空中的障礙

於是蘇聯又創出些新的辦法「公路障礙」是所有的軍事及稅務人員控制公路所慣用的方法，蘇聯使「公路障礙」長了翅膀，在太空中造成第一道「空中障礙」，這是歷史上的創舉。

國際航空人員看到兩種商業飛行方式，一種是「特快」或遠程，中途不停止的，各國京城與商業中心間的飛行，另一種是「運貨」飛行——國際區間飛行的一種，最有効的向東環球商業航空綫繞過維也納的東南，經一連串巴爾幹國家的京城，直飛土耳其，因為巴爾幹的空中障礙，飛機須自維也納經義大利至伊斯坦堡，這樣多繞了一千英里路程，維也納雖有美國機場，可在維也納停歇的泛美航空公司飛機甯願繞支路自倫敦直達安哥拉作中途不停歇的飛行。

飛機航程的長足進步保證了許多特快定期飛行，根據各種運輸方式的記錄，顯示運輸業務的創設常促進人口散布、商業發展及經濟繁榮，自美國至西歐的特快航空業務將不遭遇到巴爾幹的空中障礙，但在飛往中東的最短一段航空綫上却很受障礙，所以有利可圖的特快航空業務在中東勢必遲延一代（四年至七年）。

北極的空中障礙使美國或加拿大計劃家的「曠且不遠」的夢想受挫，阿拉斯加是到遠東之富庶市場的天然捷徑，預期在民用航空業務上的重要性可與在軍用航空上的重要性相比，但西北利亞却跨在通到北平重慶上海或加拿大的捷徑上。

蘇聯空中鐵幕的第三種用途暗示蘇聯計劃最不費力地飛過我們有失整頓的天空，同時保持蘇聯的領空不受資本主義氣息的沾染，這個計劃的支柱就是那一羣中歐國家，這些國家彷彿是蘇聯強大翅膀羽翼下的一羣鷄娃兒，經濟、航空、軍事、工業協定、祕密警察的控制及一個共產黨佔優勢的政府的選舉都是那翅膀上的羽毛。

蘇聯的一部份政治目的是照蘇聯內部共和國的模樣，在歐洲的蘇聯合法疆界外輔助成立一串社會主義共

和國，蘇聯的更大更欺詐的目的爲造成由「兩面國家」組成的國際唱和團，這些有兩副顏面的國家在西方跳舞歡笑，却向東方鑿眼示意。

當莫科方面認爲某些國家已經「安全」時，就把這些國家當獨立國家看待，在外國人衆目睽睽之下，蘇聯的控制就隱沒了，如此使這些偶像國家能自由地爲着某國的特點，而與該國做朋友，爲着美國的財力，而與美國做朋友，如波蘭舉行選舉後，於今冬轉向美國，就是一個例子，義國的拒絕貸款與捷克，也是一個佐證，美國務院有良好的理由如此拒絕貸款捷克，一如蘇聯有良好的理由考慮在所有的「畫諾國家」中以捷克的安全爲最要。

捷克已與美國訂立一個雙邊協定，規定泛美航空公司的飛機有權降落普拉格——經過以維也納爲起點的走廊——捷克的飛機在準備就緒時，就可飛入無走廊利益的美國，於兩年來不理美國航空條約草案的波蘭，爲取得在美國的互惠便利起見，即將准許美機飛華沙了，南斯拉夫尙未有此種準備，但不久後終有一天，狄托元帥將從男低音變爲女高音，在柏爾格來德的什門機場歡迎美國的飛機，南國的飛機也得降落紐約。

以上所述蘇聯的策略已變得很明顯，蘇聯漢莎的計謀之價值也顯露出來了，當蘇聯藉諸附庸國家的赤化航空線能享受國際飛行的利益，而毋須給出利益。蘇聯藉聯合公司能分享這些公司的經驗及飛往美國的業務，而美國的飛機祇能飛至蘇聯的附庸國，不能飛至蘇聯時，蘇聯就毋須參加航空會議或訂立協定。

我們能藉堅決實施芝加哥航空會議的規定，而阻撓蘇聯的計劃，這規定就是任何互惠協定的締約國發覺另一締約國航空公司的人員或所有權顯然並不嚴格地由本國的國民組成時，即可撤銷該條約。

但事實並不像規定那樣簡單，在這個外交裏有着很多的障礙。

### 美國的主義必須推行

姑置證明假冒人員或掩蔽所有權的困難於不論，單單因為懷疑，就掃興地撤銷我們會殷切祈求的條約，這樣無異是佈置一個自己的鐵幕，這非但與美國的主義不相容，並且違反美國的教言，美國的一般利益及世界納入常軌的願望，這樣將使蘇聯大事宣傳美國為「資本帝國主義」國家，並擴大標語的範圍，將放棄蘇聯附庸國內無數與我們為友的平民，並將彈回我們對空中鐵幕，尤其是巴爾幹空中障礙的輕微染指。

在另一方面，蘇聯精明地算計巴爾幹支路的交易價值，這條支路不僅在時間及金錢上並且在進步上的價值是如此重大，克里姆林宮的人們充滿了東方商人對物品的市場價值觀念，而這條支路的價值却是地理上的。

這個問題很棘手，因為我們知道這鐵幕到底是什麼，和這鐵幕是用來做什麼的，所以問題更為棘手。我們必須根據無可指摘的證據，絕對相信或不相信在一個充滿「諒解」及善意的天際，蘇聯的鐵幕是否會鏽蝕，再從而作最後的決定。

（譯自「柯里爾」雜誌一九四七年四月號）

# 訪莫斯科記

柯培特

我們於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天晚上，到達列甯格勒，我們已接洽於星期二夜間開往莫斯科的火車紅箭號的票，但下午，却在接送旅客的蘇聯旅行局，碰到了麻煩……在莫斯科沒有房間給我們住，我們不是外交人員，被認可的記者或受邀的客人，我們不合戰爭發生以來准許入境的任何一種規定。

我們的簽證是到莫斯科去的，所以我們不獲特殊許可不能逗留在列甯格勒，蘇聯的旅行局，又想知道我們有任何外交方面的朋友在莫斯科，可把我們安頓在那邊嗎……我們在莫斯科的外交界，是有朋友的；我們一直等到下午四點鐘，才把事情安排好。

某熟識大使館的軍事參贊不在……我們得在他的房間裏安適地住上旬日，同時，該大使館加緊向當局要求，給我們地方住。後來，我們終於獲得一張簽證，蘇聯政府本是要以立即出境或住在街頭的方式，對付兩名已准入境的訪客的嗎？

這樣的攻擊，產生了效果。第十天在國家飯店派給我們一個房間……該間房有兩張床，熱水及冷水設備很清潔，房中溫度也根調節……我們得到一本可用一個月的配給簿，可用早餐，中餐，茶及晚餐。食物雖不吸引人，但是夠飽。

每天二十美金

這樣的食住，每人每日約化一百盧布，照官價計算（盧布五元三角合一美元）合美金二十元。

蘇聯旅館房間的奇缺，是外國訪客的真正困難。在寄宿舍及私人住所，找到房間的任何可能性，也不能減輕上述困難。住處也像食物一樣，是受統制的，但住處不同於食物的是，沒有自由租屋的市場，即使有錢，也買不到需要的房子。至於准許外國人住在蘇聯人家裏一事，即使蘇人有多餘的房間，也需要獲得特別許可，才准留外賓……

今夏，有若干外交人員獲得許可在莫斯科外圍地區，不僅租到整所房子，並且還租到蘇聯人家中的房間，這恐是最近的例外情形。

官方統計顯示：在被破壞的地區，新房屋添蓋得很快，但莫斯科及列寧格勒，仍然很少為擁擠的居民添蓋房屋的跡象。通衢之外的曲折街巷兩旁，盡是一幢幢破舊的房屋。這些房屋建築，在未鋪磚石的，多泥多窪坑的天庭遇圍。

### 處處有窮乏景象

到美國旅行的人，可在陋巷區，發現類似的情況，但不能在我們的任何城市中，看到像在列寧格勒及莫斯科所見的那種房屋傾圮，排隊購麵包，衣衫襤褸，面目愁苦等觸目景象，來自斯德哥爾摩的人，看上去雖嚴肅，但這種印象已為蘇聯最富的城市中的人類苦難，及幾乎人類所能忍受的景象所沖淡……必須强有力的統計，才能使一個觀察家相信蘇聯公民並不在英勇敢地付出戰勝德國的代價……

來訪蘇聯的人，只准攜帶美金五十元入境……在另一方面旅客所帶的支票，却是無限制的，究竟帶多少支票，須在邊境報明……隨後旅客得到一張他們所帶款項的清單，如果他想攜出同量的款項，他必須在離去



時，交出那張清單……忽視這些官樣手續的旅客，就遇到麻煩。

旅客所帶支票，可照盧布五元三角合美金一元的官價，在高斯銀行的支行兌現。外交代表團享有較高的兌換率——美金一元兌十二盧布。但這種利益，須有與蘇政府簽訂的互惠協定為根據，即蘇聯派在該國的外代表團，也同樣享有較高的兌換率。

這裏，應聲明的一點為：即使照十二盧布合一美金的兌換率計算，蘇聯大多數物品的價格，仍顯得極高……茲舉幾個例子如下……一九四六年九月至十二月間：

麵包……每磅六盧布

奶油……每磅七十盧布

鮮肉……每磅二十五盧布

蘋果……每磅五十盧布

出乎意料的结果

我曾訪問蘇聯的對外文化處，以前有不斷的謠言，說這個機關的目的，不是安排文化的接觸，却是阻礙文化接觸的……但事實上該處的效果，却是出乎意料的好，一位官員要求給一封信，上列希望會晤者之姓名，所需書籍及雜誌的科目，我或願去工作的圖書館及其他機關的名目。

在兩個半月內，蘇聯對外文化處，僅安排三次會談……但在圖書目錄及實際供應書籍及刊物方面，該官方機關却有很客氣和寶貴的貢獻。

因為蘇聯對外交處，在安排會晤方面，顯得不很有效，我即開始訂我自己的約會，就是直接到我所要會見的入所服務的大學和研究機關去。我幾乎每一次都看到所要見的人帶我去的，大都是蘇聯人。

與蘇聯的學者會見，當然都是客氣的，但很少是熱誠的，他們並不請你到他們家去，或者到他處去用午餐或晚飯，但這在物質上的種種原因，食物稀少，餐館的價錢很高，住屋往往不够寬敞，不能很客氣的招待陌生人。

### 中庸立場

但還有其他的原因，當我在蘇聯的時候，政府和黨推行的澄清及加強正統馬克斯——列寧——史達林學說的運動，正到達最高峯……我感覺我所拜訪的幾位學者，一定是神經過敏地懷與外國人交往，連在他們自己的辦公室中，與外人交接也不敢，他們疑心這樣的交往，可能減損一個教授的信譽……

有一次，當我正要盤問蘇聯政治哲學的是非曲直時，我的對談者，從他的座椅中站起身來，指着掛在壁上的馬克斯和史達林相片說——「那些就是我的政治科學……」

在這種環境之下，不難了解為什麼與教授及研究員討論只能保守中庸的立場，我會詢問他們和他們的同志，正在從事何種著作，將在何處出版，有無那一段著作要翻譯出來，他們在獲得美國的資料方面需要什麼幫助。

我於會談結束時總是說：美國諸大學殷望蘇聯的學者蒞至，並且詢問這樣的訪問，是否即可能實現——不管這位對談人在科學院中有崇高的地位，還是一位剛開始執教的青年的大學教授——回答總是與外國機關

接觸是一個政治問題，惟高等教育部及外交部，有資格來處理這個問題……

我不久即知道我與政治科學家及法學家的疏淡的接觸在蘇聯完全是正常的。我的在外交和新聞方面的朋友，見我甚至圖謀會晤研究國際問題的學者，就覺得有幾分驚奇；果真有任何友誼發生，他們必更覺驚愕。

我的許多朋友們，正盡他們最大的力，與蘇人交往，他們在最初締交的時候，就邀學生、教師、士兵、新聞記者，政府部門的官員，工會職員，工廠經理，到他們的房間裏去，請帖常是被接受的，但很少邀約。

有一個外國人，顯示給我看，在幾個月時間內，共邀了五十人，但赴約的只有六個人……

在街上結交蘇聯朋友的運氣比較好。莫斯科常常有許多自蘇聯其他部份來的觀光者，這些人有時甚至向外國人問路……我們在莫斯科住了幾星期以後，常常就能够把一個陌生的人，帶到他們的目的地有兩三次，因帶路而開始交談了。有的問路者，對於美國及美國的生活方式，感覺很奇怪。

#### 偶然的談話

有時我們在戲院中，在遙長的休息時間內，得與鄰座的八快樂地談天，這種經驗是很稀少的，但次數多了，也可為情報的一個重要來源……

兩個半月在莫斯科，四天在列甯格勒，兩星期在蘇聯船上——這是我旅途的單簡報告……就我所覺察到的而論，我並未在行動方面受限制，也未受監視，跟蹤，或偵探……無物阻止我旅行於廣大的蘇聯境內，但只是缺少時間，並怕如果我一遭離開蘇京（那裏有做不完的工作），回來時，或許找不到旅館房間，所以除了作幾次短短的遠足外，我想不如將來可能重訪蘇聯時，再去參觀京城以外的地方罷。

（譯自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四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 蘇聯人鮮與外界接觸

## ——莫斯科記行之一

如若要記者描寫「鉄幕」，我想可以照辦，我曾于嚴冬的某日在白雪皚皚的蘇聯瞥見這鉄幕。

整個下午我們乘車向莫斯科開駛，車子在凜烈的空氣中輾過爲雪所瀰漫的田地和森林，車子的雙重玻璃窗結了冰，我們祇能站在無熱氣的車臺上向外眺望。

我們在這寒帶國家很少看到人跡，某次，我們經過雪中幾輛被焚坦克車的殘骸及數隻黑烟函，那裏是一個村莊。

接着我們的車開進一個名叫波烈索夫市鎮的車站，覺得那裏非常有生氣。

好像那鎮上的每一個人都到車站來看這一車「外國人」了，車站外的方場上擁滿了數百人，耐心的在寒冷中站着看我們從車中出來，向新把雪劃清的月臺伸展我們的腿。

在月臺與車站的方場之間，是一道木柵欄，羣衆不許走近柵欄，祇許站在廣場的中間，一個警察站在他們前面，把他們攔回去。

他們都是高大魁梧的人，着了淺色填毛的上衣及高統靴，男子們戴有大耳垂的氈帽婦女以白色的披巾裹着頭，他們站在警戒線的後面觀察我們，有時向我們驕然而笑，有時以肘輕觸相鄰的人指出看去特別顯赫或愚蠢的「外國人」收拾行李走下月臺。

月臺上除了穿灰色冬大衣，戴灰色皮帽的兵士外，沒有其他蘇人，有一個蘇軍走近來向我們索一個火種，我把火給了他之後，藉一能操俄語之乘客的通譯與這蘇軍調笑。

這蘇軍是一個奇特的入，他是一個意氣揚揚的砲兵隊長，藝術家可能把他畫成蘇軍的典型人物，他要知道我們到底是美國人還是英國人，美國是否也像這樣寒冷，美國人在隆冬如何取暖，他似乎樂於看到我們，記者們也說樂於就在蘇聯。

忽然他說他必須離開我們，於是開始朝相反方向走上月臺去，我們注意到有三個高級軍官迅速地走向那砲兵隊長，我們看見那些軍官盤問他關於我們的談話，我們無理由假定他們是在譴責他，恐怕他們祇不過想要知道這些「外國人」說的什麼。

無論如何，那隊長沒有再給我們講話了。

我們走進車站，那裏的廳堂中沒有人，候車室的門鎖着，但我們從窗子上可看到數百白俄農民向我們張望並露齒而笑。

通那村莊廣場的門鎖着，我們無法走出去看那些仍耐心地站在雪中的羣衆，我們至多祇能走到月臺上去看看他們，一道木柵欄及一個武裝的衛兵，把記者們和這些白俄隔開了。

當然，這可能是保衛去出席莫斯科會議的一車官方代表及新聞記者的安全措施，英外相貝文也是乘客之一，蘇人們常留心他們的官方貴客之安全。

但在蘇京，並沒有一道永久的柵欄來隔開記者和蘇人，我們可以自由走到我們喜歡去的地方，不用護衛

，但我們仍舊感覺到一切圍着我們的藩籬存在。

官方很優渥地接待我們，但我們大多數都沒有被請到莫斯科人的家裏去，或在餐館中與蘇人同食，如果我們自己先邀請，他們常常不來。

一種有利的解釋是莫斯科人喜歡酬答盛情，但因他們房屋「困難」，不能這樣做，但在紅色廣場上同我們散散步，總不是難事，我們大都連這點都得不到。

莫斯科人與外人往還感覺不安，除非蘇人為職務的關係有此需要，一個蘇人被請赴外國人家中或飯店時感到惶惑，當他們與外人交往時，就發生懷疑。

這種隔閡，並不新奇，遠在蘇聯政府成立以前，就有這種隔閡了，沙皇在數世紀前就運用這種隔離的策略了，這種策略幾乎與俄國同時興起。

在哈克露特所著的「航行」一書中，有幾節敘述同樣的藩籬曾用於隔離最初派赴莫斯科朝廷的英國大使們，十六世紀有一位英國大使等候護照簽證等了三個月之久，接着他在莫斯科受到一切尊敬，像我們一樣，住屋及飲食的優渥，像我們一樣，但被阻與人民接觸，也像我們一樣。

當我們在莫斯科的時候，蘇政府發行印刷得很富麗的英國版的「伊凡葛羅士尼」，這本蘇聯傳記想恢復那偉大但殘酷的十六世紀沙皇的名譽，這沙皇就是出名的可怕的伊凡，這書的前面數章回憶可怕的伊凡之父伊凡第三拒絕丹麥政府請求，讓丹大使偕他在莫斯科結婚的妻子同返哥本哈根。

這事發生在公元一五〇〇年年初，這書出版適當蘇聯政府禁止英人及美人的俄籍妻室離開俄國之時。

你立即可在莫斯科發現這些現象及今日蘇聯的其他許多現象根本不是史達林的發明。

新聞檢查是沙皇的一個策略，運用放逐西伯利亞為一種政治武器，於是沙皇的發明，勞働營及強迫勞動也是如此，產生「清除運動」的陰謀及猜忌空氣也是如此。

某美國觀察家寫道：「在蘇聯有些情形是來自教育自由，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國家的，人民所不能了解的……當你翻出一份由美國寄來的報紙時，發現有半頁被檢察官用很濃的黑墨水塗去，使你無法索解其中的一個字，有些人恐怕他對政治問題的坦白談論被竊聽而去時表現的胆怯，兼以恐懼集中在某一個入手中的龐大權力」。

這是華盛頓的葛羅斯維諾博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俄國革命發生前的一九一四年所寫的。

沙皇也像他的蘇聯後繼者一樣，常常企圖藉阻止人民與外界思想接觸，以增強他們的權力。

這些藩籬并不能阻止蘇聯人民的友好態度，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可辦到這一點，但這些藩籬能阻止我們的人民及國家成為蘇入的朋友。

## 蘇京固陋

### ——莫斯科紀行之二

外長會議休會的一週，莫斯科人從他們冬日蟄居的房屋中走出來了。

春天第一次和暖日子已經來到，所有的莫斯科人都很歡欣，過去的一個冬季，即使在這每屆冬令照例嚴

寒的北國都城，也要算是冷酷難熬的了。

在這些早春和暖的日子。小女孩們於入行道玩「造房子」及「跳繩」遊戲，男孩子們在街旁踢足球，我們來蘇京赴會的人看了這些景象，彷彿置身於家園。

婦女們取下她們裹了一冬的頭巾，男子們脫去他們的黑色，褐色，或灰色的氈帽，或皮帽，換上了列甯戴過的那種工人式的便帽。

警察們卸下沿着獸毛邊的巍巍寶藍色冬冠，代之以藍色有肩庇的普通帽子。

大多數人遲至四月下旬還穿冬天的靴子，因為街側及郊外的雪堆溶化後變成雪泥，雪泥溶化後，地上仍舊是爛的，着靴子的行人們走過時，發出一陣輕輕的擦擦聲。

在那些早春日子步行在莫斯科的街道上愉快的，羣衆已不若他們穿着冬裝時那樣生動入畫，無論如何，他們不能在全市賽美會中得獎了，但他們看了春裝，看來更爲迎人，更像道地的城市中人。

莫斯科也像紐約那樣，是許多國籍和許多人種的大鑄鑪，這城的入民在數目上雖多如恆河的沙粒，但就一個參觀者所看到的，這些入民各有各的不同。

他們幾乎表現出特權階級或窮人間每一種可想像到的不同，他們隨着時序的需要穿可以想像到的各種各式的衣服，他們代蘇表聯的大多數入種，許多入民北蘇斯拉夫種的高額骨，但更多的入都沒有這種高額骨。

他們惟一相同之點爲臉部表情的有力，原因是三十年來，甚至更長的時間，莫斯科的生活是艱苦的，莫斯科羣衆的面容雖常常不比任何大都布羣衆的面容更顯得敏感和智慧，但每一個莫斯科入的面部都有個性，



有些並且相貌堂堂，看上去很有力量。

莫斯科城除了那莊嚴的紅色廣場之外，其他地方都很簡陋，但你不久就習慣於這京城的陋樣了。

你可以向任何方向走去數里路，看見房屋牆壁上的灰泥剝落下來，比較新的房屋從遠處看去是好的，但牆上有大的罅隙，磚砌的牆角顯得參差不齊。

### 車子是特權階級所有的

革命前的老房子——蘇京大部份的房子都是舊的——從前一定很煥然，但是現在看去都頹廢失修了，幾乎每一條街都有整個冬天都高堆着冰雪的空場有許多空場的周圍築着木屋，浮在春日的泥濘之中，作為這過度擁擠的城市中之住所。

不論在最近二十年來有着大規模的破壞及建設，以引納陽光並開闢市中心的交通，你將察知這京城在外觀上仍是一個沙皇時代的城市。

街上的交通工具很少，連自克里姆林宮通出來的廣闊通衢上也很少交通工具，車輛是留給特權階級的，專供政府高級官員，高級軍官，及科學研究院等的重要知識份子使用。

### 地道是神氣的

除了敞車以外，別無他種汽車出租，這些敞車上漆了白色大的「出租字樣」，如果你要搬運傢具或笨重的行李，到火車站去，你可以雇這類敞車，把你的行李堆上，自己爬到旁邊去。

另外有電車及銀鑰作響的貨車，在街道底下是堂皇的地下交通網，這確是莫斯科足以自豪的地方，地下

有大理石砌成的車站，羅馬式的地道頂，地道中點了不很亮的燈，凡此一反莫斯科簡陋的外觀，使每一個蘇京的人士獲得躲避他四週之陋狀的場所。

### 參觀者有自由

去蘇京赴會的人，但有時間就可自由到他們喜歡的地方去（克里姆林宮內當然不能去），逛街囉，乘地下鐵道囉，或到他們大多數認為新奇的地方去探險囉，七週的時間，還不够一個美國記者去懂得蘇聯的真相，還得到比印象更深的東西——我們大多數都得到印象了。

於外長會議期間，在莫斯科舒適的住幾週，有精美的食物，有獨佔的一個房間，有可使喚的車輛及因官方及言語上的藩籬而與蘇人隔離，并不能就使任何赴會的人，概稱自居或裝作一個蘇聯「通」。

### 蘇聯人民令人傾心

記者並未去參觀列甯格勒，基輔敖德薩或烏拉爾山後面的廣大地區，我會從火車的窗子中看到白俄，我會以赴會的特權份子之身份，儘可能觀察莫斯科。

我即使看到些煩擾，有時還令我厭惡的事物，但我也會看到許多真善美的東西。

無論在地道中，在戲院內，或在市街上，有莫斯科人向我圍攏來時，我感覺被他們吸引，我喜歡他們，並希望我能够更了解他們，無論如何，我認為即使我們有半個機會，都能與這些人民合作建立一個更快樂的世界。

# 蘇京居不易

## ——莫斯科紀行之三

今日的蘇聯是艱難的，連最熱心的共產黨員也承認這一點，連外來最表面的觀察家，也能看到這一點。侵略白俄羅斯的德軍雖已於三年前被逐，我看見那裏有些人家仍住在地下的防空洞內，原因是缺乏住所，沿着通莫斯科的鐵路貨車被用作軍營，車頂開一個煙囪，旁面挖一個小窗。

在史達林格勒（雖非記者所親見）因為戰爭破壞的房屋尙未修復，現有廿萬工人及工人的妻孥仍住在地窖及臨時搭蓋的棚舍中，工廠的復建居先，住屋的蓋造祇可等一下了。

### 蘇京房荒

莫斯科本城所受空襲損失很小，但房屋添蓋工程實際上已停頓數年之久，入口却繼續增加，一個不比哥倫比亞區更大的區域，有獲得居住許可證的合法入口將近五百萬人，但莫斯科的店鋪、交通及娛樂設備，遠比蘇聯的大多數其他城市為佳，據說另有二百萬人口從蘇聯其他各地擁至京城，沒有居住許可證就不合法的住下了，當局很少過問。

在這樣擁擠的情形下，除非你是很特殊的階級，否則全家不能有一個以上的房間。紅星報主筆劇作家西蒙諾夫是蘇聯最富有的人，也是克里姆林宮的寵兒，他有八個房間，高級政府官員，高級軍官及重要的知識份子，也是能够得到空屋的特權階級。

## 每家一室

但普通都是每家一室，家中每個入至多得到四十三方英尺的地盤，祇够安一張床，再別想做什麼了。在此情形下，不容許有活動的餘地，廚房及浴室即使存在，總是公用的，由該住宅或公寓中所有的家庭分享。住所遂變成莫斯科入最寶貴的財產，如被別人佔據，必訴諸人民法庭，莫斯科入是有權利來爭訟的，這是他們反抗小官僚的少數自由之一種，而法庭在此爭訟上常常支持他們。

某日下午，我在一座陳舊的人民法庭裏聽得一個參加史達林格勒戰役的軍入為他的房子權辯護，他曾在那房子中住了十八年之久，這間房是他所在工廠的廠屋，那廠裏的入正設法把他趕到另一間沒有中央暖氣設備較小並較壞的房間中去。

他述說他的戰績，但那法官是一個面貌鄙而乖戾的入，他並不為原告的話而動容，法官說：「我們在戰時都受過很可怕的苦，所以你自己的經歷並不足數」。

## 禁軍在房屋爭訟中勝訴

該禁軍辯道：他在戰前曾患肺病，缺乏中央暖氣設備將危害他的健康，法官仍不動容，祇說：「你很清楚，在室中放一架火爐，比中央暖氣設備還要溫暖。」

這時法官就走到臨室去與他的兩位「選拔」的陪審官討論這樁案子，這兩位陪審官一半是法官，一半是法庭的職員，他們着上去都是有能力的中年婦入，他們或者會做過這個堅固的美國鄰邦之社會工作者。

他們一定使法官受了影響，當該法官於進去十分鐘之後走出來時，宣佈廠方的要求已被駁斥了，該禁軍

可留住在他的那間房子中，不論蘇聯的法官如何嚴厲！——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之間百分之四十七的案件都經一年以上的審理始告結束！——至少有一個蘇聯公民已得到法庭的庇護了。

### 此情由來已久

莫斯科的擁擠情形如此嚴重，使日常生活成爲一種鬥爭，住屋問題佔了今日人民法庭訴訟中的大部份。兒童們不得不與父母擠在一個臥室中，一間廚房及浴室必須由四家、六家、或八家來共用時，即使最有忍耐性的人也勢必煩燥了。

這並不是新近發生的情形，自蘇聯革命以來，莫斯科及其他蘇聯城市就已如此，戰爭不過是使這種情形更爲惡化而已，因爲戰爭阻礙了房屋的建造及保護，去年莫斯科全城的新房子總共不過佔有十萬二千平方碼的地位，不能滿足蘇京的需要於萬一，如果算作每一個八應得四十三方英尺的地位，新增的房子僅够供給一九四六年的二萬一千人，今年莫斯科的建屋目標爲四十二萬方碼，祇够全城七百萬人中的八萬七千五百八人住。

### 沒有去處

冬季我從莫斯科街道上走過時，常常奇怪爲什麼凜冽的黃昏中還有數十萬人逗留在街上，祇有於最寒冷的北寒帶夜裏，街道上才比較空一點。前述情形的原因爲大多數人沒有其他去處可消磨黃昏。電影院及咖啡館小而且少。大多數店舖在晚上都關了門，工會的會議廳不能容納很多人，縱使莫斯科有類似晚間圖書館、彈子房、跳舞廳、俱樂部或其他家庭娛樂場所的地方，我却不能找到它們。

在這種情形之下，蘇聯政府禁止人民到國外去看他國人如何生活，有何足怪呢？

## 蘇人食不足

### ——莫斯科紀行之四

耶穌復活節的前一晚，我穿過莫斯科人行道到城郊的「蘇柯爾尼基文化及休憩公園」去，我想知道，我不能找出春天的任何跡象來。

這次的探春是失敗了，公園進口處附近的巨型列甯及史達林塑像所眺望的盡是冰雪及泥濘的荒涼田畝。但春天已在途中，道旁有人賣着點綴復活節的輕氣球，當母親們在購物時，孩子們在嬉戲。

#### 配給麵包雜

路邊排了兩長行列的婦女，每行約莫有八十人，她們是來購買公賣食物店所出售的不統制之糧食的，行列移動得如此慢，各人必已等至一點鐘以上了。

這些婦女在公賣食物店的窗子外推擠得很厲害，使在場維持秩序的警察感到麻煩，我看見警察罰兩名婦女站到行列的最後面去，因為他們向窗子推擠得太猖狂，并擠進別人的位置去了。

就我所看到的，引起這場推擠的目的物為半個麵包，從中間切開，裏面放一撮肉鬆，大多數婦女把她們的寶貴贖物塞在她們的購物袋中匆匆離去。

也有些婦女，黧皮的臉蛋上裹着面巾的老婦，迫不及待就開始把她們的半個麵包當場咬來吃了。

但根據這事實來判斷所有的莫斯科婦女都須爭取額外配給食物，或所有莫斯科或蘇聯其他各地的人都患食糧不足，是不對的，實際上婦女們除非他家庭像上述婦女那麼飢餓，否則，當無須來爭取半個麵包。

莫斯科的定量配給物很少，每一個人如有足夠的盧布購物，都想用不配給的食物來補充。

例如在莫斯科公務機關的女孩子，每人應得的配給爲：每日一磅麵包，每月三磅半的澱粉質食物如通心麵，乾豆及煮過的穀物等，每月兩磅半的肉類和肉，每月不到一磅的脂肪及一磅糖果。

#### 工人待遇較優

重工業工人的待遇較優，得到莫斯科八種配給券中最多量的一種，其他工人及大學生的待遇也比公務員好，年過十二歲的眷屬得不到這樣好的食物，年過三歲的兒童祇有豆漿，沒有牛奶。

「沒有正當賦閒藉口」的成人，眷屬領一種很繁腳的配給，這種配給適用於五十五歲以下的無職婦女及六十歲以下的無職男子，這些人除了每月一磅鹽及三盒火柴外，根本沒有其他配給了，他們不得不在配給之外去找糧食，意思說要担負幾爲官方所禁止的高價。

規定的配給物和蘇聯的其他許多糧食，並不能照它們表面上的價格取得，獲得這些食物須視供應情況，尤其冬月的情況而定，莫斯科人實得不到應有配給食物的全部。

#### 配給票藏不得

記者們在莫斯科每殮濯有大量奶油，莫斯科人則祇要得到豬油，或人造奶油，向日葵子油就算幸運了，有時他們不得不以酸的果醬代替配給的一部份，他們不好把配給證留到下一月，因爲過了證上戳蓋的時限就

沒有用了。

在另一方面，莫斯科人如有充足的盧布，就可買配給以外的食物，如果他擠得上擁塞的火車，可於假日去鄉下，以遠較配給店為高的價格在農民的市場上購物，他還可在官有的變相黑市上買奢侈品及珍饈，這種變相黑市就是「商店」或「美食店」，但這些豐富合意的店舖祇有財力充裕的人才能嘗試。

物價是高的

配給物必須供應蘇京大部分的居民，以德奧以外的任何歐洲國家為標準來衡量，這些配給品實在簡陋稀少得可憐。以收入來作比較，配給物的價格是高的，這是你衡量莫斯科價格的惟一方法。

一個普通工廠工人的收入不足購買自己及妻與兩個孩子的配給品之全部，假定他每月賺六百盧布，經過扣減之後，拿回家去的不過五百三十四盧布，過去的冬天，他全家每月單靠配給品的伙食錢已達到六百三十八盧布。

換句話說：須賴妻同時工作才能糊一家的口，遑論仰事父母和撫養小孩子了，大部分莫斯科人所付的房金是名義上的，因為政府就是房東，房金不過估工人每月收入的百分之三或四。

一個暫時訪問莫斯科的人不能判斷在蘇聯這個偉大的糧食生產國家，糧食為什麼如此缺乏，如此貴，去年烏克蘭收成的壞，顯然有點影響，有人懷疑政府為滿足貯藏量起見，可能留着食品不予消費者，在蘇聯的歷史上有過很多次的飢饉，使當局得一致訓，就是必須貯藏糧食，縱令消費者暫感缺乏，亦在所不惜。

說莫斯科的羣衆看上去不飢餓，這話並不足數，因為飢餓病弱的人通常不出街，這在莫斯科或其他地區



都是一樣。

你在莫斯科可看到有些腿子纖細的孩子和許多面現愁容和皺皮的老年人，你很少看到肥胖多肉無疲紋的面龐。

但必須申說的是，莫斯科羣衆充滿精力，他們給你的強勁的印象，足以彌蓋那肌肉不豐的印象，以美國爲標準來衡量，莫斯科人雖缺乏食物，但在一個參觀者看來，他們並不在消瘦下去。

## 蘇京的惟一廣告

### ——莫斯科紀行之五

莫斯科是一個沒有商業廣告的城市，在一個初次到這城裏來觀光的美國人看來，這是該城奇怪的地方，并且也可說是該城的一種可愛之處。

就我們所知道的，因爲蘇聯沒有私人企業，蘇聯電台自然也沒有商業性的，莫斯科的報紙祇有一種登載廣告，如果你需要爲私人工作或出賣財產而發表廣告，你可在那些牆壁上有鉄絲網照着的小佈告板中購一位。

你可在莫斯科古舊的街道上走上數里路，仍看不到那種嬉然而笑，擺着姿勢，頭髮梳理得很好，鼓勵你去買些什麼的美女招貼。

表面上完全沒有這種鼓動性的廣告，惟一能在莫斯科存在的廣告家就是那些爲克里姆林宮工作以及苦心

研究官方宣傳的人。

在蘇聯的制度中似沒有把五千元一輛的卡車廣告刊登在價值一角銷路甚廣的雜誌上之售賣哲學（因為沒有公開發售的卡車，所以登廣告是浪費時間的事）。

### 被鼓動的莫斯科人

沒有招貼廣告來引你化錢一事，也許使你想像莫斯科是沒有嫉妬或引誘之刺激的城市，但這個印象是錯誤的，也像許多對蘇聯的錯誤印象一樣。

實際上莫斯科的公民是一天天受着刺激物的鞭策簡直使你懷疑一個莫斯科人如何能忍受得了這些刺激，他的工作是以生產更多貨物，賺更多金錢的動機及報酬為基礎的。

莫斯科人的報酬通常是按工作的件數計算的，如工作超過政府為他訂定的「份量」，就獲得分紅，凡此造成財富的不均，並規定一種奇特的與美國不同的廣告方式，使莫斯科人化費金錢。

也像美國的廣告家使買主的心目中存着那些夢樣的奢侈品一樣，莫斯科人無論走到那裏，總有那些夢樣的報酬在面前引誘他。

### 奢侈的食物

官辦的「商店」是富於引誘力的一種場合，這些商店中的奢侈品，對於那些日常生活中少安慰及奢侈品的入是有引誘力的。

有些商店公開陳列着每一種想得到的珍饈，如果你渴望一條巧克力糖，你就可以得到一條，價值六十盧

布，相當於一位蘇聯教師平均每週所賺薪水的一半以上，一塊糖值五個盧布，一罐菓汁值七十個盧布，一磅奶油值一百二十盧布（一個政府機關的汽車夫如果每月賺一千盧布，足可以爲此）。

你將以爲在這樣一個配給量稀少，且如此貧窮的城市，政府必把這些奢侈之宮藏到隱蔽的側街去，但事實却相反，這些難以得到的奢侈品儘放在櫥窗裏炫耀，因爲真正的肉塊看上去還不够津津有味，故有令人饒涎欲滴的仿製肉塊樣品，擺出來引逗顧客。

### 官辦商店很擁擠

官辦商店是使食物不足的莫斯科人工作得更勤快，及額外增加工作時間的一種刺激，這種商店給予莫斯科人一個賺盧布及化盧布的動機，我並不是說賺「額外」的盧布，因爲莫斯科七百萬人中除了賺維持生活的盧布以外，很少有「額外」的盧布可賺，但官辦的商店却比我們看到的任何商店都擠，不論衣冠楚楚或衣衫破舊的人都推推擠擠擁到櫃台前去買一些魚、肉、乳酪或水果，價格不及普通商店的五分之一。

你從沒有看見任何人拿了大包從官辦商店中走出來，顧客們所買到的常是很少一點珍饈，小心地包在一張真理報紙內，再塞進手提袋或購物袋中去，購得物份量是如此少，光顧這些大城市店舖的蘇人爲數是如此少，所以你不能說這些奢侈品改變了蘇聯情況，然而這些商店開辦的目的是爲了抑制物價高漲的，但這些商店最顯著的作用是刺激蘇人工作得更辛勤。——在一個外國人看來，這似乎是今日莫斯科生活上的一個最殘酷的特色。

## 蘇聯國家主義的復興

### ——莫斯科紀行之六

我雖不能親自保證，但據人說，史達林在克里姆林宮他自己的辦公室內僅掛四張像片。

其中兩張自然是馬克斯和列寧，另二張爲沙皇時代的將軍，即十八世紀下半頁波蘭，土耳其及法國革命軍的災禍蘇伏羅夫及一八一二年協助阻礙拿破侖進攻蘇聯的庫杜索夫。

凡此都是崇拜蘇聯國家主義的象徵，蘇聯的國家主義表示明白脫離早期波爾希維克領袖的國際主義教訓。史達林政府早就開始教導人民爲紅軍而驕傲，爲革命的成就而驕傲並爲蘇聯的偉大而驕傲。

戰爭開始前，蘇聯政府重引起對沙皇們及沙皇時代的將領們之回憶，在衆所周知的所謂「偉大的愛國戰爭」時期，上述風氣最盛，自戰爭結束以來，這種宣傳的範圍已經縮小，但對於過去的重新發現仍繼續下去。當莫斯科的學童上月度復活節時，我在紅場的偉大歷史陳列所注意他們學童們成羣的走來，有的由老師領着，有的自己列隊走過寬大佈置整齊的陳列室，將使我們美國辦教育的人生羨哩。

蘇聯已取消男女同校制，所以女學童和男學童是分別列隊而往的，女學童垂着辮子，並常常打着小的領帶，態度像英國精修學校的婦女那樣拘謹，男學童的頭髮剪得短短的使他們的臉上呈現睜睜渴望着的目光

我在陳列館的那些日子觀察學童們很少注意關於韃靼人入侵或西伯利亞拓殖的陳列品，關於一九四一年保衛莫斯科的大陳列品室比較空虛。

最擁擠的陳列室是陳列關於領導俄軍對拿破侖作殊死戰的庫杜索夫之遺跡的共產化以前的俄國之遺物，今日被小心地保藏起來，在薩哥斯克的偉大三一修道院中，有一個國家所辦的堂皇博物館陳列沙皇們贈給教會的珠寶鑲嵌的聖餐杯及其他禮物。

### 淡忘托洛茨基

來自各地的優秀共產黨員，由政府招待旅行莫斯科，被帶往參觀各教室及克里姆林宮的各宮殿，在克里姆林宮的兵庫中陳列着羅曼諾夫朝最後一個帝王尼古拉二世贈給皇后的禮物，現在不再恐懼，這些景象可能迷亂他們的共產的頭腦了。

在這復興蘇聯國家主義的過程中，革命家托洛茨基比久遠前邪惡的沙皇們更爲遭災這是一樁奇怪的事。學校中所讀的革命史上已把關於托洛茨基的資料刪除列寧博物館及其他革命史陳列所中的每一張托洛茨基像片都被撤去了，好像這個人從未存在似的。

我懷疑在修改像片的時候，連歷史書也竄改了，因爲雖則在無數次革命之役中，托洛茨基總站在列寧的旁邊，但我不能在那些波爾希維克得勝日子的任何團體照片中找出托氏的面孔。

### 伊凡的茶壺

至於古時的沙皇，尤其是那些最專制暴虐的沙皇，情形就不同，有一天我會提起關於十六世紀統治者，可怕的伊凡之一本新的正式傳記伊凡已成爲首屈一指的帝俄沙皇。

馬克斯主義者企圖在這本書中表白伊凡是真心爲着人民的，因爲他爲欺詐所包圍，所以不得不做殘酷的，那些把他當做精神錯亂的殘酷狂的外國觀念，來自伊麗沙白時代英國史家「隨便」的誤解或十七世紀德國史家的恐蘇病。

我在莫斯科看到的所有戲劇中，惟一藝術上有輝煌成就的一劇爲墨索格斯基的歌劇「波黎斯哥都諾夫」這劇本描寫一個也有殘酷行動的沙皇，這個沙皇也在他自己的宮廷中受到欺詐的痛苦。

### 生產量可佩

墨索格斯基寫作此劇巧妙而有力地爲沙皇時代人民的痛苦提出抗議，這位波爾希維克主義者以高超的舞台技術寫作這一劇時非常尊敬，這一位俄國的早期統治者，早期的馬克斯主義者曾不屑提起他的。

這個歌劇輟演已多年，偶而又回到莫斯科波爾斯劇院的節目單上來了，所以輟演的原因一部分是爲了完全上演這劇費用浩大及技術上的困難。

但如果這劇在思想上不被認爲是適合的，關於這事的公斷人絕不會准許該劇在今日上演，縱然該劇是歌劇中的傑作，也不會允許的。

你懷疑在這個蘇聯重發現過去的奇怪過程中，其次輪到的將是誰呢？蘇聯政府早已抹去彼得大帝，尼夫斯基，伊凡及波黎斯，下一人或將爲喀薩林女皇或者——誰知道共產黨的黨綱將如何轉變呢？——仍將爲於

不到三十年前被共黨軍殺在卡特林堡地窖裏的可憐的尼古拉二世。

### 早年國家主義的教訓

高級學校才開始教授馬克斯主義，但早在初級學校中即授蘇聯的愛國主義及民族主義了，史達林已成為今日的「小父親了」，像沙皇們喜歡被人稱呼的那樣。

我被介紹與一個女學生認識，因為她能寫詩，所以被人稱羨，我藉一位通譯的傳話要求她把她的所作的一首詩念給我聽，就我記憶所及，她的詩有幾句是

「史達林聰明，史達林仁，史達林監護他所有的人民」。

這個小女孩要將來到了高級學校及大學才懂得史達林是所謂不分階級的社會之領袖，是列甯在革命中的良好臂助，是無產階級及黑暗的資本家掌握中的被迫者之希望的維護者。

### 軍人不再驕橫

但就我這參觀者所見，這是對於國家主義的崇拜，而不是對於軍國主義的崇拜，這一點很重要。

莫斯科的街道上雖很多着制服的人，我估計每十個壯丁中，就有一個壯丁穿着某一種制服，但並無神氣十足的軍國主義存在，祇見頻頻敬禮，不見趾高氣揚的傲態，蘇軍雖有很多特權，但你不覺得有在戰前德國所看到的那種驕橫。

像莫斯科生活的許多其他方面一樣，蘇聯常備軍數目之衆，是一個蘇聯的現象，而不是一個共產黨的現象，即使最初到莫斯科的旅客，也注意到蘇軍的數目比起西歐的軍隊來是很大的了。

蘇聯迄未頌揚戰爭

蘇聯歷史上遇到過這麼多次的侵略，單單口俄羅斯的明斯克一城，就被外國軍隊佔領過一百零一次，故蘇聯一直未頌揚戰爭，該是理所當然。

蘇聯的宣傳家從未頌揚戰爭是美麗及光榮的，他們從沒有把一個炸彈比做一朵含苞欲放的花。

當今對國家主義的崇拜應被載於史冊，這不是因為這事是不祥的，而是因為這事是繼承過去的，這種繼承性為革命計劃家所忽略了。

今日莫斯科的不祥方面——有很多方面——隨處都可覺察到。

## 蘇人崇拜神和列甯

### 莫斯科紀行之七

在蘇聯那樣一個表面上無神的社會中，至少仍有兩種崇拜的方式。

一種是到一個耶穌正教的教堂去做禮拜，一種是去朝拜克里姆林墓地玻璃棺材中蕪香的列甯遺骸。

神的崇拜及列寧與史達林的崇拜是并行的，像你所能想像得到的，這兩種崇拜吸引了完全不同的信仰團體及表白不同的虔誠。

革命前莫斯科有數百個耶穌正教堂，現在仍有五十二個。蘇聯久已停止迫害教堂，波爾希維克黨的領袖們，現在容忍教堂，并發覺教堂對於他們是有用的，可用以抑制人民的不滿。



我曾乘禮拜天分別到不同的地點去做過兩次禮拜，兩處都非常擁擠，人體及人氣的熱氣，簡直把嚴冬的教堂溫暖了。

這裏有着大部份莫斯科人民枯燥的生活中所缺乏的色彩，這裏有臘燭，聖像，香，國有的金花衣及蓄鬚的牧師吟唱斯拉夫語的無伴奏的正教聖歌，多年以前，蘇聯已相習吟唱這種聖歌了。

### 乞丐成羣

這裏即求乞者之衆也是莫斯科的其他地方所有不見的，跛了脚的乞丐，紛聚在教堂門口，每一個進室內參拜的客入必須經過數重女丐和童丐的關口，始能脫身，出教堂，在教堂中佈施，也是一種虔敬的舉動，蘇聯政府允許這種舉動與正教教儀的其他部份同時存在。

我注意到進教堂的入大部分都是在共黨的不威運動中所有不到的比較年長的入，他們不斷用手畫十字，并吻牆壁上的神像，在禮拜結束時，魚貫經過牧師之前，去吻那十字架。

這些舉動雖都是照着規訓去進行而已，但他們覺得這樣能帶給他們安慰，這些都是在蘇聯堅苦的生存鬥爭中落後的疲乏人民，我感覺這些教堂中的老年人已是與世無爭，并正準備修來世了，如果我在蘇聯處於他們的地位我想我也會這樣做的。

### 參謁列寧之墓

在社場上整着長行的隊伍去參謁列寧的人民中，很少有年事長大記得起革命的人，就我所看到的進出於陵園的人，大多數是青年軍人及青年夫婦們，有時還攜着他們的孩子，長列的隊伍靜默的走下梯級進入一個

深入廣場地下冰冷的彷彿土牢似的地室中，這地室是用光滑的雲斑岩所砌成的，室內雖有通氣設備，仍覺窒悶，室內中央置一玻璃棺，裏面躺著那革命的導師。

列寧的遺骸展放在一張紅旗上，雙手合攏，頭枕在枕上，身體看上去像蠟，尤其是雙手，反耀出肌理中的光澤來，他的臉部毫無表情，好像蘇聯站崗兵土的那副尊嚴樣子，他的頭上及兩腳上都放著刺刀。

羣衆也無表情，他們都肅然起敬，但看上去他們並不對這個他們奉到訓言應當作他們之救主而加以崇拜的人之面目懷畏懼之心，無論男女都不流一滴眼淚——應記着蘇人是很富情感的人民。

但那些青年共產黨員，尤其是從鄉村中來的共產黨員，把這陵園看作一個有吸引力的場所及一個象徵，當他們已經參謁過列甯以後，他們就能回到村鎮上去說，他們已到過麥加了，在墓園開放的時間內，參觀的入絡繹不絕，在墓園關閉時間，那廣場上仍有一羣羣參觀的入在張望着那花崗石做成的金字塔，那所關閉的塔門上寫着俄文「列甯」的名字。

那些不能進入墓園去致敬的人還可以去參觀與紅場毗連的列甯陳列館，在這所巨型的建築物內的許許多多陳列室中完全陳列這一個人的事蹟。

有自列甯兒童時代一直到他死的連續相片，以及仍適於共黨參觀的列甯之同志的相片（不包括托洛茨基及其他「破壞者」在內）在許多玻璃盒中，陳列手稿和書籍，還有列甯在革命前所有的祕密印刷的圖樣。

在末一個陳列室中設計得很優美，富於宗教色彩，這一間完全是關於列甯死事的，燭光黯暗，掛了捲起的紅旗數面，室中的主要陳列品爲一個玻璃盒子，盒中盛着列甯面部及雙手的塑像。

無疑的，莫斯科將來會有一個關於史達林的陳列館，以後並將有史氏繼承人的陳列館，這些新的圖解都是完整無缺的，你在一次參觀中所看到的列寧及史達林的小彫像、胸像及照片多得無其數。

史達林肖像的數目遠比列寧爲多，我從搜集帶回美國的莫洛托夫石印象及木質胸像的數目判斷，知道莫洛托夫已繼史達林之後了，這事看起來很有趣。

凡此當然都不過是一種宗教的表面象徵，這種宗教在每一個工廠，每一個工會，會議廳及大學的教室中，都有崇拜的地點，大學中的惟一必修科目爲馬克思的辯證學。

托恩庇於一九三四年所寫的，也許是真的，托氏寫道，蘇聯一面宣講敵視西方的一種宗教，一面却不顧一切地按照西方的模型使蘇聯工業化。

就一九四七年我這個美國參觀者看來，很顯然的是這個新的「戰鬥教會」將永遠保持其戰鬥性，該戰鬥教會仍運用一個偌大國家的全部機構會撲滅異教，遣傳教士會崇奉異教的地方，向全世界宣講階級仇恨的學說，並強迫二億多少馴服的人民相信及尊從。

## 蘇聯如何報道國際新聞

### ——莫斯科紀行之八

蘇聯的報紙如何報導世界局勢與讀者？

這個問題使出席莫斯科會議的我們全都感到興趣，我們爲解答這個問題起見，養成了每日閱讀真理報，

消息報及其他報章雜誌之譯文的習慣，我們發覺這些報紙實予我們啓迪。

舉例來說，當杜魯門總統關於希臘及土耳其之咨文刊載於蘇聯報紙的一天，我們發覺根據蘇報所載，美國實無任何人看起來是贊同這咨文，或贊同支持此咨文之政策的。

片面的報導

我們發覺大多數報紙在「美國對杜魯門聲明之反應」的標題下，有一欄半的地位登載塔斯社自紐約發回的關於該項反應的電訊如下：

- 一、美國進步的公民們所發表的一個聲明譴責杜魯門的咨文為達到戰爭的一個步驟。
- 二、從華盛頓致紐約前鋒論壇報電文中節錄的一段說，美國會中有十三人已設法勸阻杜魯門實行其政策，杜魯門尙未發覺。

三、對希臘政府的攻擊都是下午報及海外通訊社的記者所發的。

四、杜魯門的政策甚至引起了國會以內及國會以外最保守之議員的重大懷疑。

五、美衆議院長馬丁，參議員潑貝爾及參議員羅索的不贊同的批評。

六、美國斯拉夫族代表大會有一批評該咨文的電文致白宮。

在美總統發表咨文的三月十四日這一天中，祇有消息報一個報紙在下角二欄社論內提起紐約時報贊同該政策。

因此蘇聯的讀者如想像美國會將一致反對杜魯門的政策本可予以原諒。

我簡直難於把蘇聯處理國際新聞的累積影響報導給一個美國的讀者。

蘇聯的任何日報除了逐日累積的影響以外，不見有任何公平的報導。

真理報三月十七日的一則新聞引起了我的興趣，該新聞的標題為「美國的反民主運動」，我起先以為是敘述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芮斯及該委會之事的，實際上是個卅八項的條款建議規定美國的共產黨為違反法律及對美國的共黨「嚴重抗議」的。

三月十七日這一天，美國的報紙均度一個沉悶的星期，華盛頓郵報的首頁報導莫斯科會議的第一週結束，美國會對於希土綱領的辯論，美國軍隊接濟德國糧食的努力，以及伊拉克政府抗議美聯邦調查局搜查美境的阿刺伯機關，郵報的內面報導巴力斯坦戒嚴令結束，英國的颶風，中國國軍向延安推進，德境蘇軍佔領區內一丹麥作家被扣，巴位圭的內戰，德國政治團結全國委員會的組織成立，倫敦方面關於美貸款蘇聯的猜測。

同日真理報的國際新聞除了那美國反民主運動的三十八項條款以外，尚載有下列各條：

- (一) 白地拉那發出之電訊，報導向聯合國在阿爾巴尼亞的代表團提出反希證據。
- (二) 自紐約發出之二十六行電訊，標題為「孟斯菲爾特主張增進英國的國際發展」，該電訊報導，眾議員孟斯菲爾特對外國政策協會發表之演說。
- (三) 英國工黨議員薛立克斯

引錄一方面的話

(四)自倫敦所發長七十二行之電文標題為「下院辯論援希問題」，該電文僅引錄兩位批評英國對希政策者的話。

(五)自貝魯特所發長十五行之電文引錄達斯得報關於敘利亞英國所有之伊克拉石油公司之「可疑活動」之報導。

(六)自紐約所發長五十四行之報導引錄美蘇友誼全國委員會呈杜魯門總統的電文，該文反對援助希土政策。

(七)為真理報簡兒之一的朱可夫所作二欄半評論，為蘇聯對小盟國在對德和會中之任務所採立場辯護，該文敘述「美國及英國的若干人士」企圖「為他們自己的權利」而剝奪小盟國參加的權利，於是「藉機械的投票制度，以多數人的意志強加於少數人」。

(八)自倫敦所發長十行之電訊報導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團之到達。

(九)真理報派駐布魯日記者所發長三十七行之電訊報導英法為軍備標準化所作之「初步協商」，該記者云此則新聞來自「當地新聞界」及「某等評論家」。

(十)自海牙所發長二十三行之電訊引述外國報紙之報導云英荷即將訂結軍事同盟。

(十一)自柏林所發長三十行之電文報導招募德國志願隊在英海軍部指揮下進行掃雷工作。

這個引錄雖然乏味，但可為蘇聯讀者經常如何報導國際新聞之示例。

選定這一日子并無何意義，不過是因為真理報是星期早晨的惟一報紙，就此報作一引錄，比作一個規定

週日所有莫斯科報紙的全部引錄比較好辦。

大多數蘇聯報紙的語調及所論載的事情，都是一樣的，因為蘇聯報紙避免用激動的標題或動字，所以有一種「客觀」的空氣，蘇聯的說教工作，並不是做在字裏行間的，而是做在刊登新聞的選擇上的。

逐日對蘇聯讀者的影響，就是把一個陰謀世界及反對蘇聯及其朋友之惡行示告讀者，除了那些附庸國家及他處的「民主」或「進步」運動之外，就是一個妖精世界。

莫斯科的讀者如欲知道這些事實的「另一方面」，必須依賴：

一、英國所辦的英蘇週刊，此刊物自由出售并代表蘇聯政府對較少數的二十萬讀者的一大讓步。

二、美人所出的雜誌亞美利加月刊，此雜誌非政治性的，故僅有間接的影響。

除了這些被認可的外國方面外，蘇聯的讀者除非偶有短波電台可收聽英國或美國電台的播音外，無其他方面可得到外國的消息了。

蘇人如果去聽時事演講，就將聽到歷史家泰爾或其他有聲望的蘇人講述同樣的事，蘇人如果到書店去，就可買到關於近代史的同一種結黨理論的各種版本，如果買雜誌來看，也可得到同樣的知識，如果他沒有短波電台而依賴莫斯科電台，他能聽到關於外國資本家欺詐為惡的同樣陰沉的故事。

真理報的三百萬讀者是否完全相信這些是另一個問題。

### 不准出國遊歷

我有若干理由猜想那些共產黨內人是相信的，但大多數黨外的人如果根本討厭閱讀國際新聞就會將信將

疑了。

生活在長期獨裁政治下的蘇人，有些認為如果將他本人對政治或國際新聞不感興趣，他將生活得壽長些，他在日常生活中，看見國外新聞就閉上他的眼睛，他祇聽無綫電中的音樂，不聽廣播。

並且不想過問他所不懂得的事，蘇人除上面所說的外，還能做些什麼事情呢？蘇人是不能出洋的。

（本文譯自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一日至十八日之華盛頓郵報，為該報派赴蘇京採訪外長會議新聞之記者庫恩（Kerainand Kuhn）所作，庫恩在蘇京逗留七週之久，本文為其八篇連續通訊的第一篇，氏曾任美臨時國際新聞處處長。）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5667B

3/10/2008

上海圖書館

版 不  
權 准  
所 翻  
有 印

蘇聯報道選輯全一

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每冊定價國幣

圓

編輯兼  
發行者

中聯出版社

地址：南京第八一一號信箱

印刷者 大夏晚報印刷廠

地址：國府西街三三號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